

# 目 录

- 忆同我先后共事四十余年的傅作义先生  
.....董其武 ( 1 )
- 傅作义在后套组织的“动委会”  
.....于纯斋 ( 51 )
- 共产党在傅部中的政治工作片断  
.....鲁志浩 ( 85 )
- 傅作义在河套实施“新县制”的忆述  
.....刘培荣 ( 92 )
- 我参加“抗战建国讨论会”的见闻  
.....王兴亚 ( 109 )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傅部的影响  
.....董炎炳 ( 135 )
- 忆包头、绥西、五原抗日三战役  
.....董其武 ( 149 )
- 我所经历的包头、绥西、五原战役  
.....鲁乐山 ( 199 )
- 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亲历记  
.....李敏才 ( 217 )
- 河套人民抗战的一些见闻  
.....以平 ( 231 )

- 抗日战争时期河套地区的征兵征粮  
.....许庆阳 (243)
- 傅作义对河套土地的整理  
.....周北峰 (257)
- 傅作义主持下的绥西地籍整理  
.....任安国 (269)
- 抗战时期河套交通和陕坝市镇建设片断  
.....石兆奎 (282)
- 傅作义军将在河套兴修水利和修建军营略述  
.....白焕玉、陈祖良、李敏才 (295)
- 傅作义在河套时期的工商业概况  
.....高德福、孟传志、王廷英 (308)
- 忆傅部在河套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张 沧 (316)
- 傅作义将军的喉舌  
——《奋斗日报》在陕坝出刊前后  
.....刘映元 (333)
- 傅作义先生创办的私立奋斗中、小学  
..... (355)
- 抗战时期河套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概况  
.....李俊 杨自强 (368)
- 忆傅作义先生生活中的两件事  
.....许庆阳 (381)

# 忆同我先后共事四十 余年的傅作义先生

董其武

早在北伐战争中就因守涿州而闻名中外，后又因百灵庙抗日大捷和解放战争中毅然率部起义，实现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全国人民尊敬的傅作义将军，是当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我从早年，就仰慕傅作义先生，二十八岁时，便毅然脱离原部队，从上海奔向天津，投效于他的门下，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作事。我先后任傅作义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政治训练所少校队长，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军长，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主任和绥远省保安司令，西北军政副长官。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起义止，我在傅将军领导下作事二十一年。

绥远起义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傅作义将军除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水利部部

长外，还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我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军区副司令员及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我们又一道工作一年多。此后，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回国后，我长期担任某军军长，虽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但我们时常来往，交谊愈厚，互相劝勉。我们决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党和人民所交给的一切工作。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将军不幸逝世。我们之间先后共事和交往近半个世纪。

回忆四十六个春秋，我从内心里深深地感到，傅作义将军实实在在是我的严师益友。纵观他的一生，我认为：傅作义将军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有许多永远令人钦佩和怀念之处。他是国民党中自始至终坚决对日抗战的名将。他是在抗战时期，真心实意与共产党携手合作的模范。他是时刻想着要为民众做事，关键时刻坚决走向人民一边的明智之士。他是平易近人，俭朴正直的布衣将军，他还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和非凡军事才能的军事家。

### **身在军阀时代 耻与军阀为伍**

傅作义将军生于一八九五年，当时刚刚发生过中日甲午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

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加之慈禧太后等人卖国求荣，国家民族任洋人宰割欺凌，傅作义就在这样的年代里渡过了童年。一九一〇年，已经十五岁的傅作义，看到劳苦大众受人鱼肉，中华民族濒临灭亡，决心弃文经武。当时，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推翻清朝，振兴中华的革命浪潮，鼓舞着热血青年。小小年纪的傅作义，远离家乡荣河县（现山西省临猗县），毅然投考了山西陆军小学。入学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腔热情投身革命。他剪掉辫子，参加山西起义，任学生军排长，到娘子关一带作战。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全国上下一片义愤。血气方刚的傅作义，曾经谋划刺杀袁世凯而计划未遂。傅作义在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肄业二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一九一八年毕业，时年二十三岁。

结束了八年军校生活后，年轻的傅作义分配到阎锡山部第十团当见习军官，三年后任上尉营副、营长，过了一年又升为少校团副，四年后由团长升为第四师师长。当时，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勾心斗角，你争我夺，贪污腐化，完全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傅作义原想弃文经武，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想到时局混乱，又身处军阀部队之中，壮志难酬，十分苦恼。一九二七年奉

系军阀张作霖割据东北、华北大部地区，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傅作义积极率部投入讨伐奉系军阀的斗争。他的部队从晋北直插奉系军阀的要害——北京外围涿州。涿州是京汉铁路通向北京的咽喉，是北京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当时，奉系军阀王之佑部驻守涿州，受张学良直接指挥。傅作义部快速运动到涿州城下，以奇袭的战术占领涿州。涿州的被占，引起奉系军阀极度惊恐。“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奉军军团长张学良，立即调动重兵四万余人，组成反攻涿州总指挥部，由张学良任总指挥，全力进行争夺。奉军先后发起了九次总攻，动用了步、炮、坦克及化学武器，飞机昼夜轮番轰炸。结果，奉军未能得逞，涿州城屹然不动。万般无奈，奉军只好由围攻变为诱降。张作霖亲派高级参谋、原保定军校战术教官、傅作义将军的老师于国翰，进城递送劝降书。傅作义在大军围城，形势困厄之时，毫无屈服之意。在复信中风趣地说：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因此不敢从命。傅作义将军率领全体将士和涿州城内百姓，苦守三个月。城内粮食断绝，部队和百姓只好吃酒糟、树皮。部队进城时身穿单衣，进入隆冬部队只好穿老百姓捐送的男女杂服。后来，涿州部分百姓实在困苦难堪，派代表呼吁停止战斗。傅

将军出于对父老百姓的爱护之深情，不忍让百姓再受痛苦，便决定只身出城谈判，寻求挽救全城百姓的良策。当时的一份文件上有这样的记载，傅作义师长说：“吾一身赴敌军为质，要其解围。幸而得允，吾军余众，或可由旅长率部退却，吾死而不虚矣。……吾死而城开食入，亦吾所以谢涿人也！”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作义束发从军，以救民为职志。……涿人由我而死，作义宁不痛心！”涿州百姓听到傅作义的肺腑之言，万分感动，纷纷表示：傅师长决不能出城。如傅师长只身出城，我们全城百姓愿与全体将士殉城。后来，傅作义只好遵从涿州百姓的意见，派旅参谋长朱锡章出城谈判，并授意朱锡章：同奉军谈判，不是投降。他们如答应以下三点，就可签字：一、战斗结束后，我部改编为国防军，不参与军阀混战；二、涿州百姓因奉军攻城而死伤及财产受到损失的，应抚恤和赔偿；三、我本人退出军界，不接受任何职务。

张作霖、张学良表面上接受了傅作义将军提出的全部条件，涿州战事遂告平息。

涿州战役，表现了傅作义将军的爱民思想，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扬。从此，傅作义将军一举成名，声震中外。

对于军阀们和那个时代的腐败生活作风，傅

傅作义将军深恶痛绝。但处于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他要明哲保身，也是很费周折的。他一贯用尽量不沾、尽量摆脱的办法来处事；有时实在摆脱不了，就想方设法，给以应付。试举一例：阎锡山的骑兵司令和第十九军军长，是两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人物，他们与傅作义将军都是保定军校同学，所属部队分别驻在傅作义三十五军防地的两侧（绥远东部和西部地区）。这两个人常离开职守到归绥尽情享乐，抽大烟，打麻将，叫条子，常常故意邀请傅将军参加。傅将军对于这种邀请总是能推就推。完全推托实有难处时，就用找“替身”的办法来应付。办法是：让另一个人替他奉陪，然后抽身回去处理军政公事。

傅将军不仅自己不沾恶习，而且也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他不论在天津任警备司令，还是在绥远主政，以至到北平任职，对部队都有“约法三章”。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天津是一个花花世界，妓院、赌场遍地，吸毒贩毒成风，是各种罪恶活动的渊藪。我在天津任傅作义将军部的上尉参谋时，耳闻目睹了这些情况。当时，傅将军要求部队坚决做到“三不”：不许吃喝嫖赌；不准敲诈勒索；不能贪赃枉法。有个别跟随傅将军艰苦守涿州，立有战功的人，违反了规章，傅将军也坚决予以惩罚，不循私情。为了使部下很好执



行规章要求，傅将军首先以身作则，坚持身着粗布衣服，吃家常饭，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也很少喝。

## 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中华民族奇耻大辱。中国各阶层人民坚决抗击日寇，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傅作义将军在抗日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不仅为我本人永远钦佩，而且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肯定和赞扬。一九七四年在傅作义先生的追悼会上，叶剑英副主席在悼词中说：“傅作义先生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六年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我作为傅将军的老部下，在他的亲自组织、指挥下，不仅参加了上述各次抗日战役，而且了解“九一八”事变后傅部关于抗日救国的主要活动。“九一八”事变一爆发，傅将军就表现得很突出。当时，由于蒋介石反动的不抵抗政策，我东北三省三个月即沦陷敌手。对此，傅将军痛恨之极，当即在绥远向所属部队全体官兵进行了抗日动员，响亮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的口号，并规定，部队早晚点名后，齐声高呼：

“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同时，针对日军战术，开展战前大练兵。几乎每天各部队都全副武装进行一次四十里急行军训练，并着重加强射击、投弹和刺杀训练。这些做法，对提高和坚定全军将士抗日的信心，做好抗击日寇的军事技术准备，都起到了良好作用。

一九三三年，日寇侵犯热河。接着，日寇的魔爪又伸向我长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企图直犯北平。傅作义将军决不失掉这个抗日好时机，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主动写请战报告，要求率部投入战斗。三月初，部队开往张家口，先头部队开抵多伦。五月初，长城一线战局逆转。五月十九日，傅将军急率第七军团五十九军（即三十五军）开赴北平外围密云、怀柔一线战场，痛歼日寇西义一师团。日寇在飞机、大炮、坦克、步兵的协同下，日夜狂攻，始终未能攻破傅部阵地。我愈战愈勇，决心为中华民族雪耻。但是，万没想到，南京政府在我军在前线痛击顽敌的情况下，竟与日寇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二十一日晨，何应钦勒令傅将军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将军极其愤怒，提出：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后撤，否则，我军决不后

撤。后来，经过交涉，决定双方同时后撤，傅作义将军才忿然下令撤兵，全体将士更是满怀气恨。当时，傅将军的秘书就曾写下如下的诗句：塘沽协定事堪伤，自拆樊篱引虎狼，死战怀柔坚不退，放到最后一声枪。”

长城抗战结束后，全国及海外各阶层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我五十九军。记得当时赠送给战士的毛巾上印着“保我疆土”，“第五十九军抗日纪念”等字；赠给各旅、团、营及军部直属队的锦旗上绣五彩菊花，异常壮观。各旗上的题词有：“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民族精神”，“战史流芳”等等。傅部开赴怀柔前线时，北平就有不少爱国知识青年，来到军队做宣传工作，以鼓舞士气。这说明，傅作义将军的坚决抗战，与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一九三六年的“绥远抗战”中，傅作义将军指挥所部表现得更为英勇。长城抗战后，根据《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卖国条款，华北实行特殊化。日寇在控制了冀东二十二县之后，于一九三六年春又指示蒙伪军侵占察哈尔以北六县，妄想以此为契机，夺取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进而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塞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与苏联的联系，实现其

“满蒙政策”。

为实现上述企图，日寇在绥远和华北各地，大量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在察绥，日寇就扶植民族败类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和李守信，成立了所谓的“蒙古军政府”；还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了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这些军队，连级以上均有日本顾问官，是蒙汉伪军的实际指挥者。这些军队是日寇豢养的反动武装。

日本帝国主义在绥远的这些侵略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更激怒了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傅作义将军。傅当时是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他决心寻找战机，铲除日寇在绥远的大小据点。这年十月，他去洛阳向蒋介石一再陈述了自己准备反击日军及蒙奸抗敌御侮的意见。但蒋介石、阎锡山要傅将军以忍让为主，非到不得已时，不同意对日作战。

傅作义将军实在忍无可忍。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当他得知日蒙伪军将在近日内分三路进犯绥东后，八日晚便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商讨反击问题。当时，我参加了此会。在会上，傅将军坚定地对我们讲：“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说：

“岳武穆三十八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三十八岁，为抗日死而无怨！”傅将军的讲话，对我们与会的每个人鼓励很大，一致支持他的抗日决策。会议决定：进击绥东一带敌人的任务，由我和骑兵师长彭毓斌指挥；进击绥北一带敌人的任务，由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指挥。

十一月十五日，绥远抗日战役拉开战幕。这天清晨六时许，日军指挥部派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投入五千余人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红格尔图是绥远东北的门户，是日伪犯绥的必争之地，也是敌人的重要据点百灵庙的外围，可与大庙、百灵庙连成犄角之势。敌军先后冲锋七次，战斗十分激烈。十六日，傅将军亲临集宁前线指挥。他要我和彭毓斌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我们便亲自率领部队星夜奔驰，十七日夜十二时，我各路大军秘密集结在红格尔图西南的旦岱沟一带。当晚二时发起总攻，分路包抄，打了日伪军一个猝不及防。战至拂晓，敌人纷纷溃散。十八日上午七时，敌人全面崩溃，红格尔图战斗胜利结束。

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为我们攻打百灵庙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当时，敌人在百灵庙屯积着大量武器弹药，并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驻有日伪一个多师的兵力。要拔掉百灵庙这个钉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傅作义将军是个“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人。面对困难，他毫不退缩，决心乘胜攻取百灵庙。于是，再次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集思广益。会议确定：攻打百灵庙要以奇袭制胜。在这一战术思想指导下，傅将军指挥各部队秘密向百灵庙集结。十一月二十二日，各部队全部进入攻击位置，这时，百灵庙的日伪军一点也没有发现。二十三日夜十一点，部队在孙长胜、孙兰峰的指挥下，突然发起猛攻，半小时后，日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上前沿督战。他指挥日伪军，在女儿山上架设十余挺轻重机枪，组成交织火网，使我军行动受挫，无法前进。拂晓前若攻不下百灵庙，敌人的五千名援军一到，十多架飞机一来，百灵庙战局将会逆转。傅将军当即命令孙兰峰孤注一掷：将山炮营推进百灵庙东南高地附近，向女儿山施使摧毁性射击，并命令韩天春营长指挥装甲车车队，配以汽车多辆，共同向百灵庙东南山口冲击。战士们置生死于度外，视弹雨如无睹，终于使战局有了决定性好转。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我骑兵团控制了飞机场，切断了敌军的后路。胜岛角芳和蒙伪军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扔下全军，驾车逃跑。九时半，我军全歼日伪军，胜利地收复了百灵庙。随

后按照傅将军预定的作战方案，留少数部队诱敌，大部队撤出战场，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十二月四日，不甘心失败的日伪军大举反扑，由于傅将军早有准备，我军先敌一天进入阻击阵地。因此，敌人虽有飞机掩护，但仍未逃脱第二次失败的下场。打完反扑，我军乘胜追击，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个日军盘据的战略据点——大庙。此役使伪军两个旅反正，二十九名日军顾问全部被击毙。至此，日寇对绥远的侵略，遭到严重打击，并将其苦心培植的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反动势力，全部摧毁；日寇在绥远所下的赌注几乎全部输光。“绥远抗战，”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光辉一页，载入史册。

绥远抗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在尚未实行全面抗战的当时，曾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瞩目。傅作义将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时，曾发表一篇文章，写道：“就我个人的抗日经历来说，也直接间接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鼓励。收复百灵庙战役前，南汉宸同志就曾带了毛主席的信件，秘密地去绥远和我联系，鼓励我抗日。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在山城堡粉碎了国民党胡宗南军队的进攻后，又发出援绥通电，认为不能坐视绥远局部抗战而不救。”

全国各地的慰问团纷纷赶到前线，举国上下为绥远抗日将士，捐赠了大量款项和物资。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捐赠药品、服装和钱财。后来陈还写了《傅作义高义》一书，来称赞傅将军及其所部的抗战功绩。名记者范长江专题报道了绥远抗战，称赞这次战役是“不平常的胜利”，“揭开民族历史上的新页”。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中华历史上的光荣地位，且已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联合对日作战。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傅作义将军抗日更加积极、坚决。八年间，他带领我们先后转战于察北、平绥线、晋北、忻口、太原、晋中、绥南、绥西等地。收复了多伦、商都，攻打了柴沟堡，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绥南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及五原战役。其中，忻口会战、太原守城和五原战役，至今令人难忘。

忻口抗日会战发起于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刚刚打了胜仗，气急败坏的日军不甘心失败，利用茹越口晋军失守的时机，向忻口地区进犯。国民党各参战部队及八路军一一五师，立即又向忻口集结，



准备联合作战，再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率部参加了这次会战。各部队集结时，傅将军看到阎、蒋各系的部队动作迟缓，不能及时占领有利地形，无法顶住突然来犯之敌，形势十分危急，便主动将自己所属的二一八旅的一个营，用十四辆汽车由五台山快速送往阵地前沿，拚死抗击日军，从而使其他部队得以调动部署。尔后，傅将军又指挥二一八旅，组织了三千名精华，利用黑夜，奇袭了进犯忻口的日军头目坂垣的司令部，收复了旧河北村。此会战历时二十三天，迟滞了日军南下。

正在敌我双方在忻口搏斗，形成拉锯激战之时，娘子关失守，山西省会太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防止太原沦为敌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参加忻口作战各部队撤至太原；傅部负责守城；其他部队集结于太原外围。四日，傅部进城，六日日本关东军铃木军团、坂垣师团及河边旅团等三支部队，即兵临城下，包围太原，与我交火。此时，城外部队因立足未稳，受敌攻击，纷纷南撤，只剩下我们三十五军及友军两个旅一个团，留守太原。敌人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的配合和在坦克掩护下，每日攻城多次。面对强敌，傅将军作了以身报国的准备。当时，他给家人写的遗书式的信中说：“我奉命在平绥

线担任前敌指挥，虽经国军浴血奋战，仍未能阻止日寇的疯狂进攻。目前战火已烧到太原附近，我已奉命担任太原城防司令，肩负保卫太原之责。……作义自幼从军，戎马半生，只知为国为民，早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耿耿此心，有如日月，可以告慰国人和家人矣！’”

在傅作义将军誓死血战的精神的鼓舞下，我们三十五军全军将士，艰苦守城三昼夜，伤亡惨重。后因敌众我寡，装备悬殊，敌人突入城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敌人围城前，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太原。他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临出太原城之前，在同傅作义将军话别时，嘱咐傅：“你是守城名将，勇敢善战，是可以信赖的。但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战争，这就规定了战争性质的持久性、复杂性。焦土抗战的主张是错误的；只顾一城一地之得失，也是不足为训的。要从长远看问题，能够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能够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务请深思熟虑。”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夺取最后胜利，傅作义将军深思中共周恩来副主席的谈话是正确的。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组织部队进行了突围转移。

周恩来副主席的正确主张，使我军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太原突围后，经过短期整顿、补充，傅部又生气勃勃地开赴到文水、交城、离石及绥南各战场去了。尔后，又主动进击绥西。

五原战役发生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敌我相持阶段，蒋介石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先后撤至西安、重庆周围，口头上仍唱抗日高调，实际上经常同共产党发生磨擦。而傅将军部驻防的中国西北一角——绥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傅将军领导我们这支部队，活跃在狼山、乌拉山一带，继续抗击日寇。我们先袭击了日军占领的包头，重创日伪军。日寇遭此打击，恼羞成怒，于一九四〇年初，纠集平绥、同蒲沿线小岛骑兵集团军、黑田重德师团、独立步兵第三大队、小林角太郎独立第四守备联队等日伪军数万人，汽车一千二百辆，坦克四十辆，各种野炮百余门进犯河套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傅将军面对强敌，采用避其锋芒，打其侧翼，分块围歼的战术，同敌人周旋，打得敌人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只好龟缩五原城中。待到春季，绥西一带，五原周围，河水解冻，道路翻浆，很不利于重武器和机械化部队行动。傅作义将军便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有利条

件，彻底歼灭五原之敌。他命令王子修旅，掘开万和长一带的黄河水渠，让大水漫灌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他命令孙兰峰率三十一师，袁庆荣率三十二师为突击队，攻夺五原城；命令我率一〇一师在乌加河畔阻击从包头、安北、固阳来的增援之敌。攻城部队在城内分割包围了日军司令部及各据点，瓮中捉鳖，各个歼灭。我师在援敌来到之前，组织小分队，潜入冰冷的黄河水中，炸毁了乌加河贾粉房圪旦桥梁。一个旅团的援敌从乌不浪口到来后，在八架飞机和强烈炮火的掩护下，用橡皮船强渡乌加河，敌我双方完全处于人海、火海、水海之中。战斗激烈异常，我师三个团长负伤。三月二十三日夜，五原战役以击毙日寇水川中将、大桥大佐、桑原特务机关长，歼敌三千四百人，俘敌三百余人，缴获大炮十六门、汽车五十余辆的辉煌战果而胜利结束。

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蒋介石为捞取政治资本，授傅作义将军“青天白日勋章”（受此勋章的蒋是第一人，傅为第二人）。全国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率代表团前来慰问的有著名作家老舍，我国杰出的音乐家冼星海等多人。许多爱国华侨还组成慰问团，从香港专

程来到八战区副长官部所在地绥西峡坝进行慰问。国内一些报纸称赞五原战役是“气吞河岳”、“历史上的空前伟绩”、“人类历史上光辉记录”等等。

自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来，傅作义将军满怀爱国主义热情，一直站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十三年中，他率领我军在抗日战场上转战一万八千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二百九十多次，基本上保持了不败的记录。因此，完全可以说，傅作义将军是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名将，他为保卫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 维护统一战线 效法共产党

傅作义将军做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一贯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此，他在处理与共产党有关的问题时，总是比较明智。

头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是，傅将军保护王若飞同志。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包头市警察局局长马秉仁扣捕了一名所谓共产党要犯，名叫黄静斋。傅得知后，即令将黄解送归绥。在交谈中，傅得知这个黄静斋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他便甘冒风险，对王若飞采取优待措施：

一是变相关押；二是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为了不露马脚，傅告诉王若飞：对外仍用黄静斋之名。后来，何应钦、阎锡山等人都要傅把“黄静斋”解送给他们，由他们处置。傅均以托辞，保护了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同志在押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次，他要求傅给他几本书看，傅便送给他一套《四书》。王若飞同志在这书上作了万余言的批注，大讲唯心与唯物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理论。然后，王若飞同志将书退给傅。傅还常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接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至深夜。有一天，王若飞同志问傅作义：“你省政府对面影壁墙上写了《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篇文字是什么意思？”傅答：“这是我的施政纲领，也就是我的政治设施要达到的目标。”王听后笑着说：“今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整个的贪污社会，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光凭你自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听了这段话，傅将军很受启发。

一九三六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傅作义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护送到太原阎锡山处。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王若飞同志即回到延安。此后，傅将军与王若飞同志的交情日渐深

厚，对王若飞更加钦佩。每当给干部讲话，常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哩！”后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傅将军每去重庆，王若飞同志都亲自登门拜访，并赠送共产党的书报。

在王若飞同志的影响下，傅作义将军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渐渐加深了好感。一九三七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合作后，傅作义将军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主动而热情地和共产党配合，向共产党学习。

首先，傅作义将军利用一切机会，力争与共产党各级领导人接触，在同他们会晤、洽谈中接受进步思想，探讨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九三七年，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傅和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多次交谈过。一九三八年，傅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在晋西柳林镇，随后移驻临县及河曲。八路军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的一二〇师驻岚县，续范亭、南汉宸和武新宇几位同志领导的山西省动委会也驻在岚县。傅作义及其部属经常与八路军来往。一九三八年初，程子华、曾三两同志奉毛主席之命，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将军，商谈抗日问题。当他们得知傅部抗日兵力不足时，由续范亭同志领导的山西动委会，在临县、兴县、五寨、保德等县动员了三千余名青

年，补充到傅的部队。接收了共产党方面征集的三千新兵后，续范亭、南汉宸同志，在临县与兴县之间的白文镇附近，与傅将军举行了亲切的会谈和聚餐。一九三八年秋，为表示对共产党人的友谊，傅将军曾邀请续范亭和南汉宸到河曲，共谈抗日事宜。当时，召开了欢迎大会，双方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傅将军率部离开山西到绥西河套一带后，南汉宸、曾三等同志专程赶到河套，与傅将军会谈了三天。会谈中，傅将军学到了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制定抗日大策的经验。不久，即在所部组织了三期“抗战建国讨论会”，召集地方乡、区、县以上及军队连以上干部参加，每期半个月。会上，各党各派、各政治主张不同的人，都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展开热烈讨论。这个讨论会，后因国民党中统特务苏寿余的破坏，未能善始善终的办下去，但通过讨论，对提高抗日认识，推动以后的抗日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傅作义将军于一九三八年秋天，派周北峰（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到延安谒见毛主席，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来开展抗日工作。毛主席接见周北峰后，不久即派以共产党员潘纪文（原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现顾问）、王一然（陕西省委党校顾问）等同志为首



的几十名干部、学生，从延安来到河曲傅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将军学习八路军的做法，第一次在傅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这些同志担任，有的任师政治部主任，有的任团政治部主任，潘纪文同志担任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主持开展部队政治工作。延安来的共产党人带来了先进思想和优良作风。从此，全军上下到处唱《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处处歌声嘹亮，充满了生动活泼的解放区气氛。对于这些情况，蒋介石得知后很恼火，不久即派调统特务张彝鼎任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的使命是清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傅部建立国民党组织，严密控制傅作义。张彝鼎的到来，弄得傅将军很难办，在经过多次周旋折冲无效，眼看对延安来的同志无法保护时，只好把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同志，设法送回延安，免遭张彝鼎的危害。

第三是，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加强部队和地方的抗日政治思想工作。一九三八年前，三十五军虽有政工机构，但谈不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军事指挥官指挥、决定一切，从不做政治思想工作，更不开展群众工作。延安的八路军干部来到后，傅将军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十分赞赏，委托潘纪文同志根据部队实际，起草拟定了一个《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时傅任北路军总司令）。这个《守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废除打骂士兵的恶习；实行经济公开；建立“奋斗室”，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改善军民关系；实行军政统一，在军事指挥员领导下进行政治工作。同时，傅还亲自参照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所部制定了《十项纪律》。主要内容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速还，损物赔偿；不许调戏妇女，不许打人骂人；部队行军时，不准踏坏青苗；部队住宿后，院落街道要打扫干净；行军前要缸满院净；部队煮饭烧柴，马食草料要付钱，家中无人者，写清数量将钱压在条下；不虐待俘虏，不许搜俘虏腰包。《政治工作守则》和《十项纪律》贯彻执行后，过去官和兵脱离、军和民脱离等旧军队的一套残余作风，逐步有所改变。

为了改革地方行政工作，实行军民抗战。一九三九年四月，傅将军仿照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在绥远也设立了“动员委员会”。这是一个适应抗日需要，带有绥远省地方战时行政性质的机构。组织为省、县、区、乡四级。省动委会下设组训、宣传、军事、妇女、动员报社等组室，主要任务是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战，后

来它的职能逐步扩大，把清查户口，组织通讯网，建立盘查哨，配合军事行动，组织担架队，设立救护站，发放救济款，征集义务兵等工作都由动委会来做，权力很大。傅任动委会主任委员，周北峰任副主任委员。讨论重大事件傅亲自参加主持会议。初期共产党员潘纪文、王一然等人，分别担任组训、宣传等组的组长；一些延安来的党员、进步青年，分别参加在各组工作。傅强调，民众组训是动委会的中心工作，经常对群众进行慰问、救济，并帮助群众生产，从而取得了群众信任，更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愿意参军抗战，支援前线。当地群众在动委会的组织下，积极实行“空室清野”，军民配合抗敌使日寇侵犯后套时，受到多方面的抵制和打击。农民王大老虎兄弟二人，用铁锹杀死日寇七人。许多小脚女人主动组成担架队，救护伤病员。一九四一年秋，傅部就地补充兵员，原定三个月内动员三千五百名新兵，结果在动委会的组织发动下，十几天内就完成了任务。

第四，是把毛主席和八路军的抗日战略战术，运用到抗日实践中去。全面抗战开始后，傅将军看到，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中处处被动，而八路军却主动灵活，有效地抗击敌人。因此，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他就热心研究毛主席和八路军的

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组织部队干部学习《论持久战》等书中阐述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将研究学习成果随时运用到各次战斗、战役中去。过去，作战主要是阵地战，以后也实行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大大提高了作战效能。

在统一战线中，由于傅作义将军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干了国民党其它军队不愿干、反对干的事，在当时曾引起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蒋军说：“傅作义的部队成了‘七路半’了”（意即将变成八路军了）。

### 毅然率部走向人民阵营

最令人钦佩的是，傅作义将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通过谈判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又促使绥远举行光荣起义，从而，促进了全国的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一九五五年九月，毛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怀仁堂举行的隆重授勋典礼上，亲自授予傅作义以一级解放勋章。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先生病危时，周恩来总理到医院探望他，拉着傅作义先生的手说：“宜生，毛主席让我看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人民是立了大功的人。”

当时，傅先生已耳聋听不见，他的女儿俯在

傅的耳朵上重复总理的话时只说他是立了功的人，周总理马上接着说：“你告诉他，毛主席说他是立了大功的人。”

我当时在傅将军领导下，任绥远省主席兼“华北总部”归绥指挥所主任。了解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并领导了绥远起义。傅将军的举动，是他高度的爱国思想的表现。促使他采取这一举动思想，由来已久。

早在一九四六年秋，傅将军就有了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萌芽。这年十一月间，当我接任绥远省主席，从张家口去绥远前，傅在他的办公室同我谈话时，就流露过。当时他问我：“其武，咱们为谁打仗？”这突然的问话，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半晌答不上来。于是，他又催问：“其武，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我说：“你说为谁哩？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对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停了片刻又问：“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人家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傅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

理？”我答：“青年学生是求进步的！”傅停了片刻又问：“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呢？”我说：“干脆不去。”傅问：“为什么哩？”我说：“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我当时还存在一些小封建思想，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傅和我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里明显地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政权。

在这之前，傅作义将军还经常给我说这样的话：“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除此别无他求。自己没有能力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谁能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我们就跟着谁干！”有一次，傅将军去看望攻打张家口时俘虏的解放军伤病员。回来的路上，他心情非常沉重，曾自言自语连着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简直是造孽！”表明他内心对打内战的痛苦。

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天，傅将军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次，我在北平开完会，去西郊傅将军办公室辞行时，我们谈了很多话，最后他试探我说：“其武，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我说：“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他沉默了一会，兴奋地告诉我：“不要

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这句话当时我还不太理解，事后我才知道，他说这句话，是在充分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而得出的结论。

“北平和平”是傅作义将军在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情势下，克服重重阻力，扫除大量障碍，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

最大的阻力来自蒋介石。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刚结束，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用封官许愿的伎俩，拉傅将军南撤。蒋先让他儿子蒋经国到飞机场接傅，住下后何应钦出面做傅的工作，后蒋又邀傅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会上，蒋一方面大骂陈诚、熊式辉丢掉东北；一方面却对傅作义将军表示慰勉有加。当即向傅作义将军再次谈了他的安排：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华北部队完全南撤；此后所有军队都归傅指挥，他只做补给。对于蒋介石作这种安排全部含意，傅将军心中自然是清清楚楚的。但他不能断然拒绝，只能装出满有信心的样子，对蒋说：“我对华北局势还不象别人所说的那么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局的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蒋介石同意了傅的说法，傅返回

北平。回平后的一两天，傅将军却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女儿傅冬同志，转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派南汉宸同志来北平商谈和平合作事宜。

十二月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此时，蒋介石还不知道傅将军与共产党暗中有联系。为了保住平津军事实力，蒋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到北平，要求傅将军把部队分两路撤到塘沽和青岛，待机南撤。傅将军以种种理由，回绝了徐永昌。这时，北平城内的市民、工人、学生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傅将军的所谓“扭转华北局势的办法”，开始产生疑虑，揣测傅可能与中共和谈。于是，在徐永昌返回南京一、二天后，蒋又派军统二厅厅长郑介民来北平拉傅。郑介民来时，带着蒋介石给师以上军官的信（每人一封），郑表面上要大家都听从傅作义将军的指挥，暗地里却与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秘密紧张地会晤。郑介民对傅说：“部队南撤以后，我听你的命令和听委员长的命令一样。”对郑介民，傅作义将军仍象对付徐永昌那样，将郑打发走了。蒋介石不久又派次子蒋纬国到平，再次劝傅南撤。蒋纬国见傅时，转达蒋介石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伪装对傅信赖、倚重，盼傅率部突围，傅将军婉言拒绝。此时，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飞抵北平对傅大要



政治手腕，说今后美国要把美援直接支持傅，它的太平洋舰队将全力援助傅作义。此时的傅作义将军同共产党之间的和谈，正多方秘密进行中。对于白吉尔的拉拢和许愿，傅巧妙而坚决的回答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此等事应该向我中央政府去说”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得了……。”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这是傅作义将军进行“北平和平”的又一重大障碍。北平围城中，原来的布防大体是：天安门以东为蒋介石嫡系石觉的第九兵团；天安门以西为蒋介石嫡系李文的第四兵团。傅将军所属的一个师驻防德胜门、西直门一带，两个师为总预备队。这种态势对傅作义将军走和平的道路极为不利。具有高度政治谋略和军事眼光的傅将军，为防止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互相制约。同时，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如北平城内的制高点景山，原由蒋系十三军一个师扼守，后来傅让三十五军十七师接防。

事后证实，傅将军所采取的这一重要措施，为胜利实现北平和平扫除了障碍。一月二十一日，当傅将军向他所指挥下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

布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北平实现和平时，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但也无法动作。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军长袁朴，只好要求傅放他们回南京。北平城内各部队，得到北平和平的命令后，秩序稳定，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好的结局，不仅为各界所称道，而且连傅将军本人也很自慰。

一月二十二日，我来到北平见傅作义将军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的特务和他的嫡系，随时都会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拼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现在终于成功了！”充分显示了傅将军的大智大勇和为国为民当仁不让的爱国主义思想。

九月十九日绥远起义前后，傅将军走人民道路的正确思想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北平和平后，我于一月二十二日来北平会晤傅将军，向他请示绥远下一步怎么办？傅将军很明确地告诉我：“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

这句话，傅将军是用特别郑重的语气重复地讲的。此刻，我才更进一步理解了半年多前傅对我说的“走人民的道路”的意思。傅还对我说：

“你回去后，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钱把你家眷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

从北平回到绥远后，我决心在傅先生的引导下，做好绥远和平的准备工作。当即召集部队军、师、旅长级以上干部，地方厅局以上干部，省议会议长、高等法院院长、各界各族代表人物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使大家对绥远走和平道路有一个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傅先生在北平也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促进绥远起义的工作。他指定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三人，为绥远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制定后，他又派随从参谋刘庸笙和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到绥远征求我的意见，并传达毛主席“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的指示。后来，当他听说刘万春、鄂友三、乔汉魁等人在归绥瞒着

我，秘密开会反对起义时，他觉得需要立即派老一点的高级干部帮助我控制局面，便让他的司令部老参谋长张濯清、原“华北总部”副秘书长王克俊等人来到绥远。国民党特务破坏绥远起义，公然袭杀了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同志事件发生后，傅作义先生接到我的报告，立即转报薄一波同志，使党及时了解了我的态度立场。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当绥远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尚有个别问题亟待解决时，傅作义先生受毛主席委托，和邓宝珊先生一起亲临绥远，及时而坚决地给我以支持。他携带大批慰问现金，慰劳了驻绥部队。并在我的陪同下，三次召集旅、师、军级高级将领、各界各族代表分别谈话，着重说明了全国形势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走和平道路是最正确的道路，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前途是光明的。并讲述了毛主席的宽大照顾和既往不咎的政策，进一步消除了一些人头脑中残存的对共产党的顾虑，纷纷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奔向光明，走向人民。

傅先生在绥远的这一系列革命行动，使蒋介石反动政府十分惊恐。傅先生到达绥远后，蒋采取两面手法作垂死挣扎。一面由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某部中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

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一面派军令部长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九月十五日飞来包头，企图说服傅作义到广州为反动派效劳。另外，蒋介石还给傅先生一个电报，蒋在电报中说，傅这次回到绥远，正象当年西安事变后蒋回到南京一样，由于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傅接受这个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对于这份电报，傅作义先生态度非常坚决、明朗。他告诉徐永昌：国民党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能为力！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徐的要求。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傅作义先生在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起义过程中的所做所为，更使我感到：傅将军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完整地交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北平古都完整地交给人民，用北平和平解放推动全国的解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非凡的军事才能

傅作义将军自一九一〇年考入陆军小学至一九四九年离开军界，戎马生涯四十年。在漫漫的四十年军事生活中，他驰骋疆场，身经百战，

不论是当一排之长的初级军官，还是当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都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傅将军有高明的练兵之道。他一贯要求每个士兵的军事技术，必须以压倒战场上的敌人为标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强调战术课目以经常性野外作业（演习）为主，单人教练以日日练为主。一九二二年，部队驻防山西平定，他当晋军第十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长，负责军事训练。部队一起床，他总是亲自带着队伍急行军三、四十里，直到人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才收兵。训练场上，他身穿士兵服装，劈刺、射击、投掷等等，每项课目都亲自做示范动作。训练中，尽量设置难度很大、近似实战的场地和障碍。战士练走独木桥，他把桥架在水沟上；骑兵练骑马，他让把马镫拴起，不让蹬镫，并常常在刚砍过高粱杆的农田里进行这种训练。目的是宁可让士兵在操场上多流汗，不能让士兵在战场上多流血。

傅将军尤其重视干部军事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他给排、连、营、团、师各级干部规定了军事上应该遵守的具体事项，要求能背能做，能熟练运用。其中的战术要求，不搞纸上谈兵，主要靠沙盘演练。当时，傅部不仅各级司令部有沙盘，基层连队也都有。干部应掌握的课目，每年进行两次考核，按成绩给予升降奖惩。成绩分甲、

乙、丙、丁四级，取得甲级成绩者优先补缺；取得乙级成绩者，奖给实物；丁级者，不准带兵，调离现职，改任次要工作。傅将军的这一作法，激励全军干部认真钻研军事，有力地推动了干部训练，提高了本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将军对干部的军事素质要求更高，训练方法灵活而有效。一九三九年，为了赶走日寇，收复失地，傅将军在绥西百川堡组织的“抗战建国讨论会”，不仅讨论政治，而且作了军事训练。轮训期间，针对日寇的作战特点，傅将军提出了几种战斗方式，发动大家研究讨论，补充修改，然后把大家共同认为能够制胜的战法列为课题，组织实战演习，让轮训人员参观见学。这种新鲜的训练方法，当时在国民党部队是首创，蒋介石闻讯后极为不满，曾指责傅将军说：“我的步兵操典早已颁布，你为何弃正规操典不用，而另搞一套，究竟想干什么？”

在作战指挥上，傅将军运用战略战术也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对于阎锡山、蒋介石制定的一套，他认为适用自己部队的就采用一点，而大多数内容却不在部队中贯彻，总是突破旧框子，另创合乎实战要求的一套。他先后提出并在战斗中使用“软顶硬打”、“退出来打进去”、“甩开数路打其一路”、“打敌人的长处之短，防敌

人的短处之长”等战术。在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中，他最惯于使用远距离奇袭和“掏心战”，常常歼敌于措手不及。进行著名的百灵庙战役时，时值严冬，大雪覆盖草原，傅将军指挥我们进行了二百四十里雪夜奔袭。各部队严密伪装，行军时车、马、人统统披上白布单，借茫茫白雪做掩护，人无声、马不嘶地向百灵庙附近集结。这样，当我部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一九三九年，攻打日寇占领下的包头城时，在傅将军的指挥下，还进行过五百里长途奇袭。部队从五原秘密出发，昼伏夜行，仅用三天就出敌不意地插到包头城下，一举攻进包头城内。第二年攻打五原，傅作义将军首先组织了一支八百人的“掏心战斗队”，让这支尖刀队以敏捷的动作，悄悄插进城内，控制敌要害据点。然后，大部队便攻入城内。

傅将军的这些战术思想，平时均由贯彻社编印成《贯彻》小册子下发部队，作为全军上下统一的作战条令。傅经常讲：“旧军校学的那一套，远不够用，真本领要从作战中获得。”因此，他十分重视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每次打完仗，他都要召集连以上军事干部，总结战斗经验和教训，凡是克敌制胜的战术都肯定下



来，作为以后战斗的指导。另外，虚心向共产党八路军学习，这是提高他指挥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日战争中，他反复研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对毛主席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十分钦佩。多次要求部队学习贯彻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阳方口战斗时，就曾仿效八路军，派小股部队出击袭敌，“抓一把就走”，打得日寇很难找到我们的主力。

这里，要附带说明：以上叙述的傅作义将军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从实践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取得成功的情况，主要是就抗日战争各战斗战役说的。至于傅部执行蒋介石“戡乱”政策所进行的二年另七个月的反人民战争的情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全是违心的军事行动。这方面的事，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 总想着为民众做好事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任命傅作义为政务院水利部（后改为水利电力部）部长。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的事业中，积极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给我讲过，当水利部部长是他自己选择的。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从河北省西柏坡刚刚搬到北平后，有一次，毛主席在香山双清

别墅请傅作义和邓宝珊谈话，问他们开国后打算干点什么？邓将军说：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好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傅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主席便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傅当了水利部长后，决心在这个岗位上大干一番。当时，面临着的是国民党长期失修的水利烂摊子，水旱灾害频繁，亟待修治。在党的领导下，拟定计划，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展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运动，并制定长远规划，逐步由治表走上治本，除害兴利，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水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傅作义先生每年都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 间，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全国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当面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他的足迹遍布各省城乡。一九五二年，他到洞庭湖进行考察。然后，又转赴汉口，乘船沿汉水而上，研究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一九五三年，到珠江考察。一九五四年风尘仆仆赶到新疆，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问题。一九五五年，又马不停蹄地先后到淮河流域的梅山、佛子岭等水库工地做了视察。一九五六年，东北松花江发大水，他又亲临抗洪前线。一

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我国黄河上最大的水电工程三门峡开工，傅参加了开工典礼后，不顾身体不适，又急忙赶到晋南地区考察。因为劳累，心脏病突发。周总理闻知后，立即从北京派飞机将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送往太原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继续考察，山西省委坚决不同意。他说：

“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哩！”后来，由于省委和医护人员的阻拦，他只好派随行工作人员下去继续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九六二年一月间，党中央有意安排以陶铸同志的名义，请他到广州休息一段。傅作义先生表示愿意为看看水利做点工作而去，不愿单纯为休养而去。到广州后，他几乎每天去考察，一连走了五个县。到水库、排灌站、水电站工地，他总是坚持自己步行上坝，心脏如有不适，就服用随身携带的药物。

由此，我想到傅先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绥远军政干部学习团开学典礼大会上，给我们的一次讲话。他在讲怎样为人民服务时，曾说：

“如果遇到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发生了矛盾，那么就要放弃自己的小利，服从人民的大利，或者牺牲自己而为人民。以忘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这样说，首先带头这样做。有一件事，我至今念念不忘。一九六三年，河北平原发生了历

史上罕见的洪水，天津将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当时，傅先生生病刚刚出院。他从简报上看到此情况，在家里一天也坐不住，天天打电话给防汛指挥部，了解抗洪救灾情况。后来，他竟要求亲临抗洪第一线。党中央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不同意他的请求。他就先到北京附近的密云水库查看了防汛情况，随即又赶到天津。他打着雨伞，巡视抗洪大坝，情景十分动人。那时，我带着部队正在天津抗洪。傅先生的行为，对安定民心，鼓舞抗洪士气起了一定作用。

正如邓宝珊先生所说的那样，傅先生很早就确立了为民众造福的思想。一九三一年，他任绥远省主席时，就曾为当地劳苦百姓办了大量除弊兴利的好事。那时候的绥远，土匪横行，金融混乱，农牧业萧条，真是千疮百孔。他一接任，首先进行剿匪，为老百姓解除最大的苦难。他指挥部队先后消灭了以王英、杨猴小、苏雨生、李根车四人为头子的四大股土匪数万人，为百姓创造了安居乐业的局面。接着，他整顿财政，稳定物价，开源节流，扩大流通，使绥远财政扭亏为盈，被人称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时，绥远库存现金八十四万元，白银二百一十万两，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一九三九年，部队驻绥西后套时，

人少地多，十六、七万人养活十五、六万军队非常困难。他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学习诸葛亮屯田五丈原和八路军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一方面组织部队屯垦戍边，自己生产粮菜油；一方面动员十万军工支援老百姓发展生产。每年一到春天，部队就全部出动，有的帮助地方修渠打坝，有的赶着马匹、车辆帮助老百姓春耕、送肥。秋天，我们又全军出动帮助百姓收割庄稼，结果老百姓富起来了，部队补给充足了。那时，傅先生最重视抓水利建设，他指挥部队协助地方修的水渠，大的可以航船、养鱼。一九四五年春，后套地区所修渠道，宽五丈以上的干渠，全长一千七百里；宽一丈以上的支渠，超过一万里，使后套形成了渠道纵横，渠水遍流的局面。这种助民、屯田活动，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后套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后套当时被誉为“鱼米之乡”、“塞上江南”。军民因此而丰衣足食。一九四五年，美国的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到绥西河套参观时，看到我们部队官兵素质好，身体健康，曾说：“与世界强国的军队相比，毫不逊色！”此外，傅先生对绥西的土地制度进行过整理改革，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按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交租。这是傅先生主政绥远时为百姓办的又一件好事。

## 名符其实的布衣将军

说到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凡是熟悉他的可说没有一个人不称道的。他不论作为军事指挥官，还是作为行政长官，对待部属和人民群众总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赏罚分明。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则要求极为严格。古人有句话“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傅作义将军就是这样做的。

对待犯错误干部，他坚持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不一棍子打死。他规定“前功不能遮后过，后功能抵前过”。按照这个原则，他处罚过不少曾经立过战功的人，也重新重用过犯过各种错误，甚至判了重刑的人。我本人就是犯过两次错误，在改正后而又被信任、提升的一个。一九三八年春，在绥南抗日战役中，我任一〇一师师长。我部一个营长邵德禄，因贻误战机而被正法，团长李思温撤职，我受警告处分。一九四〇年，在绥西抗日战役中，傅将军命令我的司令部，与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司令部驻在一起，伏击日军。不料，当我率部到达三十五师驻地时，该师已撤走，日军突然出现在我部正面，使伏击战变成遭遇战，打乱了傅将军总的作战部署。战后，傅将军对我从严处

罚，记大过一次。受了这两次处分后，我不泄气，不自馁，愈挫愈奋，吸取教训，在新的战斗中，认真指挥部队作战，多次取得优良战果。傅将军便用“后功能抵前过”的原则奖励我，曾颁发过一枚勋章，并提升为暂四军军长。一九四三年，傅又任命我为三十五军军长，把自己精心培养指挥多年的三十五军交我指挥，给了我以极大信任。与我同时受处分的团长李思温，后来改正了错误，也重新任命为团长。

李景新是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团长，是傅将军守涿州时的上尉参谋，属于老干部。后因绥西抗日战役指挥失利，傅将军以军法论罪，下令枪决。当时，连棺材都买好了。我们师团干部考虑到刘景新是百灵庙战役中的“五位民族英雄”之一，战功显著，中外闻名，杀了不妥，请求傅将军免刘一死。傅将军开始不答应，后经大家一再央求，才改死刑为交军法处关押，关了五年之久。关押期间，刘景新表现积极，释放后，傅将军仍给以任用，只是不让带兵打仗就是了。

傅作义将军对待士兵和伤病员，亲如手足，爱如父兄，关怀他们的成长，重视他们的意见。每次到部队巡视，他总是不进团部、连部，先到士兵中去看望。见到士兵，他往往翻开眼睛看眼红不红，然后询问能否喝上开水，伙食如何。到

了连队，他总是要到伙房去察看，他掰开馒头闻一闻，看一看，辨别蒸的好坏。假若伙食不好，他决不答应。有一年春节，他到医院见伤病员没有吃饺子，便找到军军需供应处。一进门，供应处的干部们正围着火炉包饺子。他当即命令供应处：马上找人赶着包饺子，包好后先给伤病员送去。逢年过节，他都要到连队与战士同吃、同娱乐。他提倡士兵直接向自己写信反映情况。凡士兵来信，他一律亲自拆阅。平时，听到士兵的意见、要求，尽可能予以解决。有一次，看望士兵时，他问一个战士“冷不冷”，战士说：“睡地铺，冷”。回到军部，他立即让军需部门赶制铺板，一周后发给部队。

傅将军尤其重视关心伤病员的疾痛。每次战斗一结束，他的第一件事是上医院看望病号，发慰问金、慰问品。对伤残较重，离队后生活有困难的，尽量从优给以照顾。一九四〇年五原抗日战役后，一位排长腿部受伤致残。住院期间，其母赶来看望，提及回乡后如何养老，这位排长便找到傅将军说明情况。傅情意殷切，不仅教给这位排长回乡后如何生活的方法，而且送给他一千元作经营生活的本钱。这位排长和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至于阵亡将士，傅将军简直把他们当作神灵来供奉。为了永远铭记阵亡将士的战功，深切



怀念他们，傅作义把历次战斗阵亡人员名单抄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四面墙壁全是名单。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结束后，傅作义将军亲自主持，在归绥修建了烈士公墓，并建烈士碑，将战斗经过及全体阵亡将士的名单刻在碑上。现在，这座抗日烈士纪念碑，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重修，仍巍然屹立在呼和浩特市郊。五原战役后，在五原城郊也修建了烈士公墓，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傅将军关怀全军干部的家属、子女。战争频繁的年月，傅将军为解除干部后顾之忧，成立眷属团，集中管理全军干部家属子女。每次战斗结束，部队进行整训时，前方干部还未撤回营地，傅将军早就着人把干部家属从后方接到营地。逢年过节，每户发面粉、肉和青菜若干。为解决干部子女上学问题，傅将军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创办三十五军子弟小学，取名“奋斗小学”。学校设在宁夏黄渠桥。一九四三年五月，又在绥西陕坝创办“奋斗中学”。这两座学校，随着部队的转防而转移，曾在归绥、张家口办学，一九四八年迁进北平。现在，北京复兴门内库资胡同的“奋斗小学”，就是原三十五军子弟小学。北京紫竹院的曙光中学和小学，也是在傅将军的资助下，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兵团子弟学校。这些

学校毕业的各届学生，正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对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傅将军是怎样的呢？他身居要职，统率千军万马，位高权大，但从不特殊，他一年四季都与士兵穿一样的市布衣服。夏天士兵穿草鞋，他也穿草鞋。当军长后，他平时一直只扎腰带。被褥一律为白布里白布面。吃饭不讲究，平时从不吃大鱼大肉、顿顿是家乡饭，馍馍、米粥、一节葱，一碟辣椒就心满意足。常常一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早上起床后，直到深夜十二点才上床。这种艰苦作风，一直保持到逝世。

傅将军对孩子从不娇惯。旧社会，大官的孩子都是公子小姐，而他的孩子一不穿绫罗绸缎，更不胡作非为，都是身穿布衣，本本份份上学。

傅作义将军有一个弟弟和侄子都在所部工作。对于这两个人，他不因是兄弟、叔侄关系，就提拔重用他们。为了学习先进，他曾于一九三八年送其弟到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其弟中途辍学，返回部队。傅将军很不满意，批评他：“回到我身边干什么？为啥不跟共产党闯？”从此，不重用其弟。与其弟同期的一些人提拔为团级干部时，其弟仍是营级。侄子原在东北某炮兵任中尉排长，来到傅部后，傅三年内未给他提过级。

他的连襟蔡某攻打百灵庙时第一个负伤，立有战功，还是北方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所部的。同时分来的十多名干部都先后当上师长，蔡某在北平和平前夕，还是个保安团团长。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解放前傅的军队中。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傅将军能自觉地做到这一切，对我们许多干部都是教育，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当年，许多人称呼傅是：“布衣将军”，这话一点不假！

傅作义将军去世已经十三周年。十三年间，祖国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傅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人民康乐的局面已经实现。在这样令人鼓舞的形势下，我本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也和傅先生生前对我不断引导，悉心帮助是分不开的。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更加怀念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傅作义先生，更加崇敬这位胆识过人的良师益友。最后赋诗二首，表达我的情怀。

### (一)

一生知遇仰傅公，  
大事大节悉相通。  
共抱爱国救民志，  
携手进入革命营。

(二)

作我新民开新篇，  
中山马列步前贤。  
神州今朝最妖娆，  
人间天上开笑颜。

# 傅作义在河套组织的“动委会”

于纯斋

“绥远省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是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为了适应当时后套的特殊环境，仿照共产党在山西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巩固和发展地方政权而建立的。动委会于一九三九年春末夏初在五原县成立，计分省、县、区、乡四级。它是当时党、政、军、团的统一联系机构，也是绥远省政府在行政上的辅助机构，同时又是军民合作的桥梁机构和基层政权的中心机构。这在当时全国各省市当中是很特殊的。这个动委会在抗战初期和在五原战役中，配合军事行动，推动军民合作，发动群众供应军事需要，组织担架队，支援抗日前线，征兵、征粮、训练壮丁、办理通讯网等等，起到一定作用。一九四二年春末夏初，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和傅作义在政治上的需要，动委会结束了。全部人员，经过“新县制”的训练，都改任

当时省、县、区、乡的各级行政人员。

动委会从筹建开始，至最后结束，是由傅作义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兼任主任委员，我任委员兼书记长。现就记忆所及，将当时情况分述如下：

### （一）“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的建立

傅作义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到了后套，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都设立在五原县城里。他把军事安排就绪后，就布告通知所有流落在后套的知识分子到绥远省政府秘书处登记，审查，录取了中学毕业及程度相当者五百多人，连当时在职的行政人员及游击军政治部和三十五军政治部的一部分人员共七、八百人，加以训练，其中亦包括一批地下共产党员。训练内容分军事、政治两大项：军事是简单的基本动作，由三十五军参谋长张濯清担任；政治以傅本人的讲话精神为主，另由我讲国民精神总动员，潘纪文同志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潘当时任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当年夏季离绥远回延安）还有张遐民讲三民主义概要等等。傅作义不但对政治课作大会报告和发言，讨论会每次也要参加，聚精会神地听，借以观察每个人的真实思想。就是连军事课，也每堂必到，有时还亲自参

加到行列里自当排头。他这样带头，谁还能不参加呢。这时大家都是穿着灰军装，吃着馒头、糜米干饭、大烩菜。睡的都是就地铺上千草、糜穰，圈上个砖沿，打地摊的大铺。在课外活动时间，由延安来的同志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分队、分组教唱抗战歌曲。真是有艰苦、朴素、紧张、热烈、活泼的干劲和新风气。

傅作义为什么在这个场合里还叫潘纪文同志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呢？反映了他当时接受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号召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他在后套领导的军政工作的思想。也可以从这些课程的讨论发言中，了解每个人的真实思想，以便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心中有数。

这次训练是比较成功的，当时舆论评价也很高。把后套死气沉沉的情况，四分五裂的现象，各自为政的局面，一变而为有了团结一致，紧张活泼的新气象。有些顽固的反动派，认为傅作义要“向左转”，向八路军学习了。

在这次训练一个月期满的前夕，傅作义让我担任动委会的书记长，并在五原及时筹备成立动委会。从参加训练的七、八百人中，挑选比较优秀的三百多人，立即组设省、县、区、乡各级动委会，迅速开展工作。这时我认为动委会的一套办法，是由当时的绥远省政府秘书长王一然同志起草

的。王是共产党员，也是绥远省财政厅长兼代主席职务李居义老先生的同乡，我如任此新职，恐开罪于李老；况且我把刚由西安招来第二批青年知识分子分派到游击军，部队政治工作刚安排就绪，动委会又是个新开创的工作，我也不愿去干。因此我对傅作义说由王一然或周钧干都比我强（周当时任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傅说：“王一然我打算调他去担任临河县县长，周钧任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不便调动”。他坚持非要我干不可。并且说：让崔载之代理游击军政治部主任，再从西安招来的游击军政治工作人员中，抽调一部分精明强干的适合作地方民运工作的，来作动委会的骨干（崔载之当时任游击军政治部秘书，后任暂三军政治部主任、《绥远奋斗日报》社长。日寇投降后崔任《北平平明日报》社长，解放后任中央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一九六一年病死于北京）。傅又坚定地说：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和当前政治形势的要求，急需马上筹备成立，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接受傅这一命令，着手组织成立动委会。

经傅将军同意，我将所有挑选出来参加动委会工作的三百多人，集中到五原县立第一高小，以十天的工夫，拟定动委会各级组织机构、任务与具体工作内容和办法，经傅同意，即由潘纪



文、王一然、崔载之、武践实（武在“七七”事变前即同我在集宁、萨县一起工作，事变后赴延安抗大学习。我由西安招生返回绥远，路过延安时，通过组织关系，跟我回来，先在游击军政治部工作，后任动委会组训组主任，共产党员，凡从延安来的在绥远动委会工作的同志，都由他负责领导。一九三九年秋末返回延安。解放后任《绥远日报》总编辑，以后任《内蒙古日报》社副社长，一九五八年逝世）、马名骅（他是由西安招收来的）等人协助拟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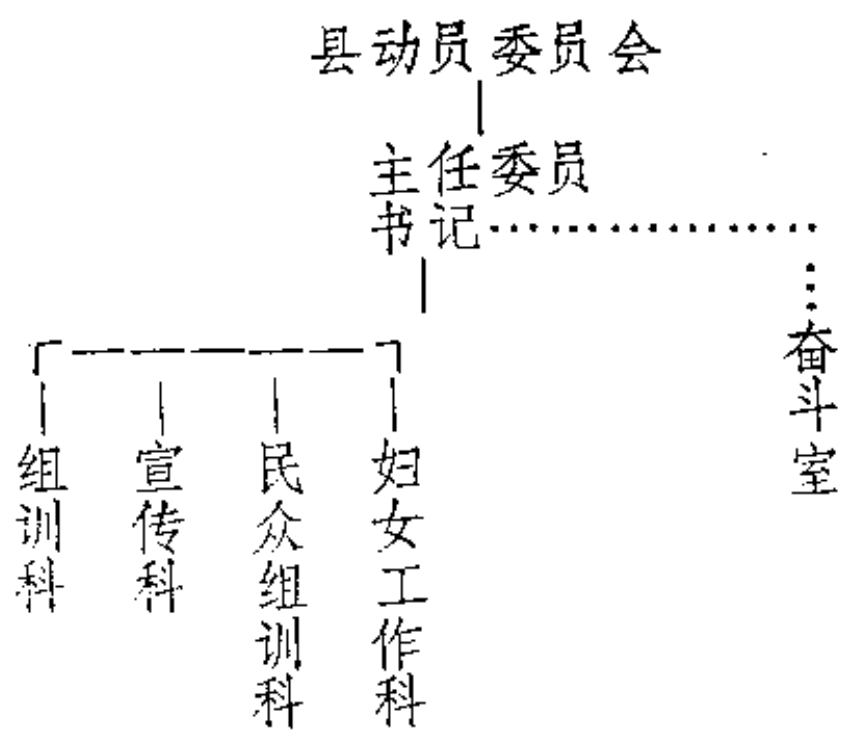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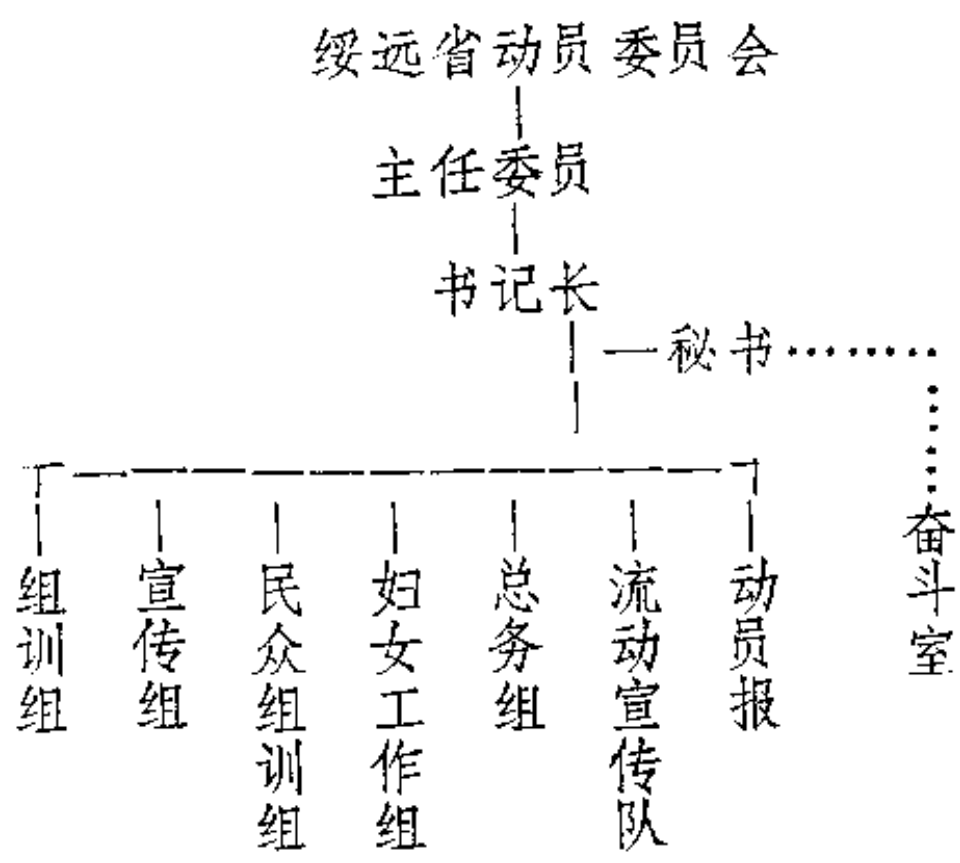
记得当时拟定的有：绥远省动员委员会各级组织条例、清查户口、壮丁训练（包括通讯网、盘查哨、担架队、救护队等组织运用），妇女工作、除奸工作、军事供应、军民合作等，还印发并教唱许多抗战歌曲。这些条例、方案、办法等，回忆起来，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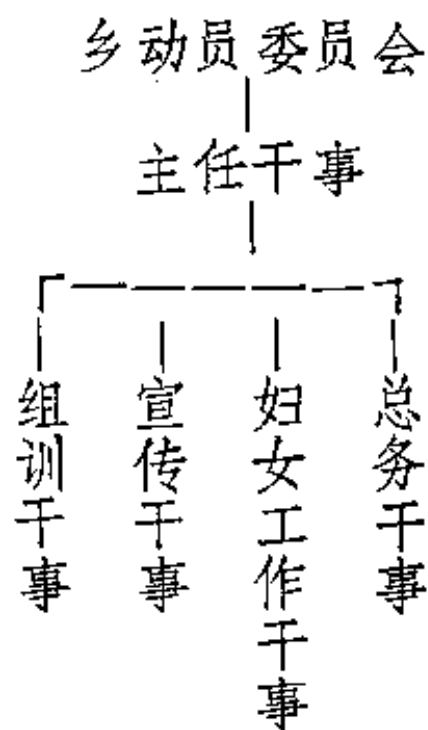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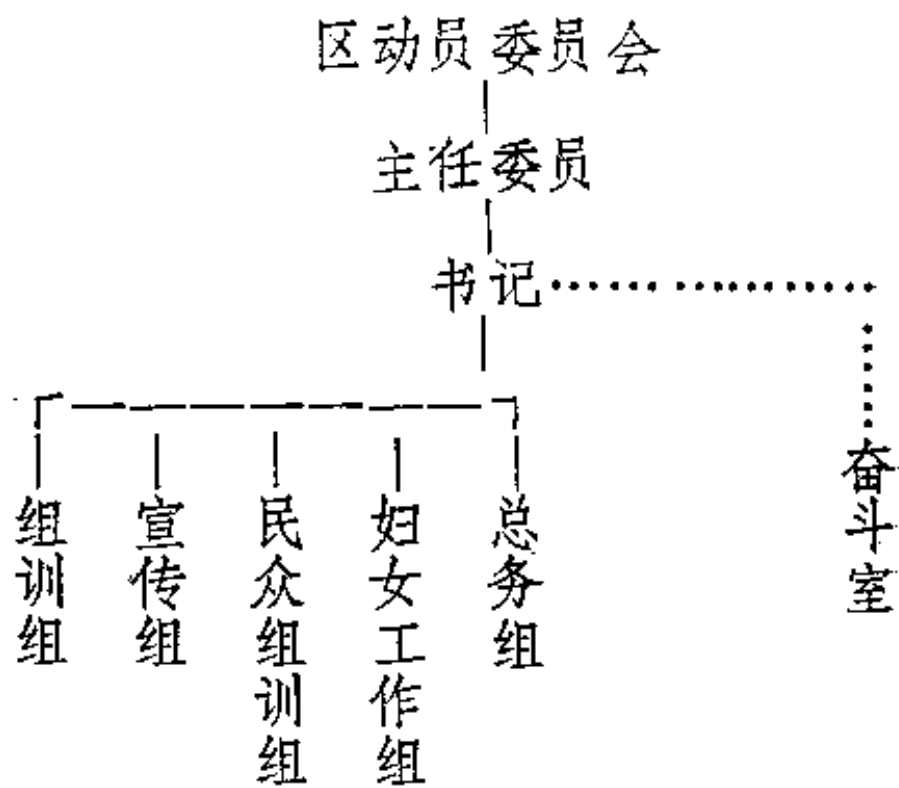
动委会的性质和任务：它是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临时的行政机构，又是绥远省在配合战事需要的党、政、军、团的统一联系机构，也是联系当地军民的桥梁，在组织上，是与绥远省政府平行的。直接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领导和“全国总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但对全国总动员委员会实际上只不过是有很少的公文来往而已。

当时全国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蒋介石自

兼，王宠惠任秘书长。一九四一年傅作义派我到中训团受训时，曾专函介绍向王报告工作，表示满意。各省市也有动委会的组织，只不过是由各省市政府兼办的一个有关军事供应的统一联系机构，有事就召集当地党政军团各方面的负责人，研究决定有关发动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战的军事供应等问题。决定后，即分别由有关的各主管单位来执行。没有单设机构的，更没有下级机构的设置，

动委会一成立，傅作义就把所有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组织通讯网、建立盘查哨、配合军事供应、组织担架队、设立救护站、发放救济款，以及发动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战的具体工作，都交给动委会来作了。当时省政府只不过是传达命令、公文，办理“等因奉此”的行政机构而已。所以当时有人说：“动委会是二政府”。根据上述绥远省动委会的性质和任务，确定各级组织如下：





傅作义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任绥远省动委会主任委员。因他初到后套，军务繁忙，不能亲自主持一般工作，为了加强和省政府工作的密切联系配合，所以另由绥远省民政厅长兼代主席职务的袁庆曾兼任副主任委员，替傅处理比较重要的工作。我担任书记长，负责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和傅交办的任务，或决定的计划以及日常事务的处理。但重大事项与人事安排，均须由傅决定、处理。为了加强党、政、军、团各方面的联系，便于运用动委会的职权，开展这一项新的工作。所以当时绥远省民政厅长袁庆曾，财政厅长李居义，建设厅长王国英，教育厅长阎伟，秘书长曾厚载，第八战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鲁英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彝鼎，副主任苏寿余，三十五军的参谋长张濯清，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张遐民，常务委员耿正模、王华灼，三青团绥远省支团部书记赵仲容，都是省动委会的委员。就连客军门炳岳、马鸿宾、马占山也都被聘为委员，但他们很少参加开会。

省动委会按规定一个月召开全体委员会一次，遇有重大事件，得召开临时委员会，由书记长提出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经研究决定后，由书记长执行。会议一般的是由袁庆曾主持。遇有

重要事件，傅作义也亲自参加主持。

最初王一然同志起草的省动委会组织，计  
分：组织、训练、宣传、民众武装、除奸工作、  
妇女工作、敌后工作、总务等八大部。后来经与  
傅研究，改为组训、宣传、民众组训、妇女工  
作、总务等五个组织。当时确定由潘纪文担任  
组训组长，崔载之担任宣传组长，王一然担任民  
众组训组长，李特担任妇女工作组长，李郁之担  
任总务组长。但潘纪文是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  
长，崔载之是游击军政治部代理主任，王一然是  
新发表的临河县长，傅作义明明知道他们三个人  
不能到会工作，为什么又把三个比较重要的组长  
让他们担任呢？潘纪文、王一然是共产党员，崔  
载之是我介绍来的，思想进步。这三个人的学识  
能力都相当好，在当时后套的知识青年里边都有  
一定的威信，傅所以让他们三人担任三个重要组  
长，是有一定用意的。

既然潘、崔、王三人不能经常到会工作，只  
开会时来参加，而组训、宣传、民众组训又是动  
委会最重要的三个组，不能无人负责。因此，在  
组长之下各设主任一名，负实际责任。组训组主  
任由武践实担任，宣传组主任由肖离担任，民众  
组训组由马名骅担任。

各组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在组长

和主任的领导下，分别办理主管事宜。

各组主管事宜如下：组训组主管干部分配、安排、调整、训练、考核以及政治思想领导等。武践实在职时，为了加强各级工作人员的联系，并从中了解各级动委会的工作情况及人员思想动态，除来信必复外，还每天有计划地、主动地给县区乡工作人员写五封信。宣传组主管宣传有关抗日战争及动员工作的政策法规，编印《动员报》，刊登抗战形势、重要新闻、法令、指示、以及动员工作动态。《动员报》最初是周刊，后来改为三日刊。在工作需要时改为日刊或出特刊。这是个油印小报，对于宣传抗战起了不小的作用。另外还组织歌咏队，教抗战歌曲。民众组、原名自卫武装组，主管壮丁训练、组织通讯网、盘查哨、救护队、担架队、动员新兵等。妇女工作组主管妇女训练，妇女识字班，组织缝洗队，为伤兵军人拆洗被褥、衣服等工作。总务组主管会计、总务、伙食、招待、勤杂人员的管理训练等。流动宣传队共有五六人，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分赴各区、乡演剧，写标语，画漫画，出大型壁报和教抗战歌曲。先由刘育斋任队长，后由张毓楷任队长。

各县动委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县级党、政、军、团的负责人及客军的首长兼任委员。下

设书记一人，主持会务。分设组训、宣传、民众组训、妇女工作、总务各科，分别主管各项业务。当时五原县长周念慈，书记乔培新；临河县长先是王一然，后是王映荣，书记刘进仁；安北县长乔学曾，书记安建国。

各区动委会的主任委员兼任区长，这是与省县两级动委会不同之处。所有各区动委会主任委员只有贾克让一人是原任五原二区区长的，其余八个人都是新挑选的。人员情况大致如下：

五原县一区白阳，共产党员，由延安抗大来的，当年秋末与武践实返回延安。二区贾克让，绥远省区长训练班毕业，曾任集宁县三区区长，“新县制”后，任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处长，后任东胜县长。三区韩振海。四区刘奕山，共产党员，五原战役后，离开后套。

临河县一区马珍，回族，曾任乡指导员，新县制后调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工作。二区王国华，共产党员。三区郭映宽，曾任乡指导员。四区李萍，共产党员，五原战役后赴延安，李萍走后由卫力石继任。

安北县二区马子诚，共产党员，曾任乡指导员，一九四〇年闻将被扣，迅即转移，返回延安，解放后任中央司法部副司长，改名彭达。

区动委会在主任委员下设书记，并分设组



训、宣传、民众组训、妇女工作、总务各组。各组设主任干事一名、干事一名（有的不设），分别办理各主管业务。区动委会的委员是由驻军负责人、地方上有些名望的人。

乡动员委员会设主任干事一名，组训、宣传、妇女工作、总务干事各一名（妇女工作干事，许多乡因无适当人选未设），在主任干事领导下，办理全乡一切动员工作事宜。

当时规定乡公所是受乡动委会的指导、监督。尤其是壮丁训练，必须由动委会主持。乡村财政必须受动委会的监督，所有开支，没有乡动委会主任干事的签名、盖章，就不能对上报销。就连乡村的小学校，由于请动委会人员教抗战歌曲、报告时事、写壁报、画漫画，关系搞得很密切，无形中也受动委会领导了。

傅作义对于整个动委会的组织运用主张是：省动委会是全省动员工作的主持、领导机构，县动委会是以县为范围的动员工作的督促、检查机构，所以比较简单，人员也少。区动委会是以区为范围的中心领导和推动全区动员工作的机构。乡动委会是各乡动员工作的开展和具体执行各项任务的机构。区动委会的主任委员兼任区长，并配合以坚强有力的人员和组织，授予乡动委会以很大的权力。

当时后套仅两个半县，渠道纵横，只有两条汽车路，地区辽阔，交通不便。只能以区动委会为直接领导、推动工作的机构，若由县动委会负责，鞭长莫及，指挥不灵。这样一种组织安排，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多培养和锻炼出一部分有具体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

## （二）主管工作概况

省动委会是在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建立，初期由于延安来的共产党员和抗大一些同志的带头和影响，在当时的抗日战争的军事配合和文化促进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思想领导（即组训工作）。动委会工作人员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总的来说，第一阶段还是共产党和左的力量占上风。省动委会组训组主任武践实，组员葛红（是延安抗大来的，共产党员）。民众组训组的主任马名骅和各科的负责人肖风、庄珉、高萍以及宣传组的主任肖离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简称“民先”。妇女工作组主任李特（原姓廖，湖南人，一九三九年末赴延安）。

各县动委会书记：五原乔培新，共产党员。临河刘进仁，共产党员。安北安建国，

“民先”队员。九个区的动委会主任委员马子诚、王国华、刘奕山、白阳、李萍都是共产党员。还有从延安抗大来的刘映元任省动委会组织科长，马映光任临河县动委会组训科长。程又新任五原县第一区动委会书记，后兼任区长。

在当时动委会工作人员中，未参加任何党派的人员还是占多数。国民党员如马珍、贾克让、郭映宽等，也不敢有所表现。凡从西安和汉中各地招来的知识青年，在好的方面说，是基于爱国热情，愿赴前线参加抗战；另一方面想到延安又怕吃不下苦，到后套总比在后方失学、失业、到处流浪好得多。这些人大部分是跟着环境随波逐流，思想动摇混乱。我自一九二六年就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二九年因反蒋失败被通缉，一九三一年被傅作义邀来绥远做了行政工作，此后再也不愿意参加任何党派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傅派我两次到西安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先后建立三十五军及游击军的部队政治工作。现在又让我创建动委会工作，自觉是很受他的重视与提拔。只好是以他的主张为主张，惟命是听而已。此时延安的刊物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游击战》等著作，在各级动委会都可以公开阅读。一九三九年八、九月，罗瑞卿同志还从延安抗大给我寄到大批的革命书刊。

“奋斗室”是各级委员会内部群众性的领导组织，所有工作人员都参加。设有主任一人，负责计划和领导全部工作。分设组织、宣传、生活、学习、编辑各股，各设股长一人，干事若干人。由主任、各股股长组成委员会，也就是领导小组，由组织股股长主持小组会议，搜集整理和反映意见。宣传股收听广播，整理报纸，配合《动员报》协助编辑股出版壁报。生活股主管清洁卫生，并设有伙食委员会协助动委会总务组办理伙食，招待县乡工作人员来省工作者。学习股主管重要时事政策文件的学习讨论研究，包括炊事员，通讯员，饲养员的学习辅导等。编辑股主管壁报稿件收集、审查、编排、出版等。壁报每周一次，至多不超过两周。

动委会因为有了这一群众性的组织与领导，又有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所起的领导与核心作用，因而在思想与工作上，既表现了民主，也表现了集中。如武践实任组训组主任时，为打通思想，解决纠纷，经常与工作人员个别谈话至深夜，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并主动与各县、区、乡动委会建立正常的关系，使上下打成一片，团结一致，因此，虽说当时自书记长至乡级动委会干事，一律都是二十元法币的生活费，穿的都是草绿布军衣，吃的都是简单的大锅饭，但大家都

觉着很光荣，真是“精神奋发，工作活跃，生活艰苦，心情愉快”。男女之间，老少之间，不分彼此，互助合作，亲切友爱，宛如手足。这种新的风尚确实令人羡慕。

动委会为什么要建立“奋斗室”这个领导组织呢？原来一九三八年在晋西北河曲，傅作义将军在三十五军开展政治工作以后，傅作义和我研究这些从西安和晋西南运城一带招收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论思想，共产党、民先队员、国民党、无党无派，什么都有。论资历与学历，大学生、中学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有。论地区就更复杂了，华北、东北、南方各省都有。怎样使这些人能统一思想呢？以什么组织作为基层的领导核心呢？据他说，国民党中央军有“中山室”的组织，八路军有“列宁室”的组织，我们叫什么呢？再三研究考虑不出一个适当的名堂，最后他说：咳！我们为了抗战而奋斗，为了抗战的胜利而奋斗牺牲到底。我们就叫“奋斗室”吧！

从此，又把当时由三十五军政治部主办的油印《新闻简报》，改为《奋斗报》。这就是后来在陕坝、绥远、张家口所办《奋斗日报》的前身。又把三十五军政治部所办的剧团改名为“奋斗剧团”。后来在陕坝办起“奋斗小学”、“奋斗中学”。日寇投降后，在绥远、张家口、北京、都

办起奋斗中、小学来。

二、宣传工作。各级动委会都有专设的机构与负责人。又有《动员报》的配合和流动宣传队经常到各县、区、乡巡回演出。当时所演的小型戏，如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自己编的配合当时战事情况的活报剧，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相声等，都很到群众欢迎。宣传队还协助区、乡动委会出壁报，写标语，教抗战歌曲。

省动委会乔东君、樊清璋是从延安鲁艺来的，肖离、肖风是从山西招来的“民先”，都是教唱歌能手。朱绍斌、凡塞的相声，也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为有了“奋斗室”的组织，对于歌咏抓得更紧。当时所有动委会人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唱歌的，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教歌的。这些穿草绿布军衣，扎小皮带的一群人，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唱的又尽是抗战歌曲，所以有人把动委会的人们叫“九路”（意思是靠近“八路军”了）。

这时许多地方都组织了青年、妇女、儿童歌咏队。各县乡小学也请动委会的人员教唱歌。国立绥中等学校专请乔东君、樊清璋等教唱歌。就连当时陕坝天主堂的“普爱小学”，也请省动委会的葛红教起抗战歌曲来。当时还有三十五军政治部和游击军政治部的同志们，也在驻防地区教群众唱抗战歌曲。这时的后套，不论在城镇或乡

村，不论在田野或河边，都会听到“军民合作”“青年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抗战歌曲。壁报在各县城和区乡动委会所在地，都能经常看到，标语更是普遍了。

三、民众组训工作。民众组训是整个动委会的中心工作。傅作义也特别重视这项工作。所以动委会刚开始，所有向群众发放赈款，对群众进行的慰问工作、救济工作（在日寇飞机轰炸以后），都交给动委会办理，借这些直接给群众利益的工作来接近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为动员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此后，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填发身份证，训练壮丁（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为常备队，三十六岁到四十五岁为后备队，县为总队，区为大队，乡为中队，自然村按人数多少，分为若干小队），组织通讯网，建立情报站，设立盘查哨，以区为范围，以乡为中心，根据地理形势，情况和需要而建立。在后套时局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以在重要路口和没有军警的河渠渡口上，经常遇到拿大刀片、红缨枪的妇女、儿童或五十以上的老人，盘查来往行人。在夜晚也可能遇见五、六个壮丁组成的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巡逻会哨，或在留人小店里盘问来往客商。这都是民众组训

的设施与表现。

当时傅作义在编组保甲与地方治安上的要求是：“人必归户，户必归甲，一个坏人不能隐藏，一句谣言不能流散”。经过一年左右的工作，后套的治安，确实比从前好得多了。

一九三九年冬季，日寇侵犯后套以前，动委会配合军事计划，在整个后套施行了“空室清野”：埋藏粮食、财物，假填水井，人口牲畜作了疏散、隐蔽。陕坝因为是当时的军政机关所在地，由省动委会协助临河县三区动委会办理。最后经过我和省动委会民众组训组主任马名骅、总务组主任高秉仁检查，只剩下一个又瞎又拐的病人，没有离开。另有天主堂比利时籍的神甫们坚决不离开陕坝，整个后套的军政中心为之一空。当时我们感到，平时闹闹嚷嚷的陕坝，竟然变得如入无人之境，一方面觉得“空室清野”的任务执行得还算彻底，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感到大战将至，杀气森严，但有足够的信心，撤退是暂时的，不久就会回来的。

据说，日军侵占五原后，又到了陕坝，有一百多辆坦克，几十辆大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所有坦克、卡车的水箱都没有水了，不能动弹，到处找不到一点水。我们潜伏在陕坝附近的军队，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再好没有的



良机，正准备回陕坝对日寇猛予袭击的时候，远见鬼子们都驱车逃回五原。原来是他们最后找到天主堂的比国神甫，在天主堂的井里取了水，才能开动逃跑。

五原战役，群众在动委会和部队政工人员的领导和协助下，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兵，办理通讯联系，军事供应，维持地方治安，出力很大。当时群众有的故意将日伪军的汽车引到渠道纵横，泥泞难行的地区，再向驻军报告，乘机袭击致胜的很多。

五原县金先生圪旦的农民王大老虎、王二老虎兄弟二人与几个壮丁，将逃到他们村的五个日本鬼子，用杀鸡喝酒的计谋，安顿鬼子睡觉以后，动手将这五个日本鬼子全部杀死。天一亮王大老虎就用小毛驴驮着五杆日本枪，用毛口袋装着五个日本鬼子的脑袋，亲自送交才收复五原的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当时轰动一时，传遍后套。百川堡附近乡村小脚妇女抬送伤兵，在后套一时也传为佳话。五原战役结束后，傅作义让动委会搜集了两种不同的材料，编成两种小册子。一种是《民族英雄》，专刊登打杀日本鬼子和协助抗战的乡亲们的事迹，傅作义又为此在陕坝召开一次发奖大会。另一种是《孬种》，专刊登了一些当了汉奸或帮助敌人办事的败类们的

罪恶，予以谴责。

一九三九年十月，省动委会由五原迁移到陕坝。一九四〇年春季，曾召开过几次甲户长会议，分组由省动委会派人主持。主要是宣传抗战形势，并收集群众对驻军及行政人员的意见，分别整理，向副司令长官部汇报会（每星期举行一次，长官部参谋长、各处长、省政府各厅长、秘书长、动委会书记长、省党部书记长、三青团书记都参加，当时苏联首席顾问乌斯蒂敏克也参加，由傅作义主持）反映、报告。如有借物不还，买卖不公，欺压人民等情况，均能及时得到解决，并分别答复原告人与被害人。有时在壁报上公开答复，也有时在壁报上表扬一些在军民合作方面的好人好事。从此动委会的工作，在群众中逐渐提高威信，但也受到国民党特务们的攻击。

一九四一年秋季，傅作义为了补充兵员，让动委会在三个月内动员三千五百名新战士，并将安慰家属等工作做好。当时他对我说：“现在各机关对动委会的责难很多，做好三千五百名新战士的动员工作，谁还能再责难你们。”我即答应保证在一个月把它做好。当即召开全省动员工作人员大会，立即开展这一新的突击工作。各区大部分是在十天以内完成任务的。最迟的也是在半个月内连欢送新战士入伍和家属的慰问工作，都

已办理完毕，出人意料之外。傅作义甚表满意，曾在国民月会上提出表扬。

在一九四〇年曾动员过七百多名新战士入伍。人数不多，也是在十天半月内办理完毕的。一九四一年又动员了三、四千名新战士。

当年秋末冬初，日寇飞机袭击陕坝，侦察总队（即傅部的宪兵）关押着的三个日本俘虏：浅沼、平仑、马志达，在陕坝郊外防空时，乘隙潜逃。当时傅作义甚为震怒，立即命令军警出发逮捕、追拿，并由他亲自下令、布置。命令发出后，又让我迅速利用民众组织逮捕这三名逃跑的日俘。当即根据陕坝交通情况立即写了六封“鸡毛信”，交由临河县三区动委会，按照通讯网与情报站的组织选派精干可靠壮丁出发。当时是午后三、四点钟，到晚上十时左右，就由班斗甲拉渡口上搬船的老汉，送回来逃跑的日俘一名；不到十八个钟头，另两名日本俘虏也由老乡们扣送回陕坝。傅作义为此特召开市民大会，表扬了动委会和奖励了逮捕日俘的老乡们（可惜年代过久，忘记他们名字了）。从此动委会的工作，在舆论上更得到了好评。

日寇自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失败后，仍以包头为据点，经常派坦克、汽车部队进行窜扰。西山咀附近驻防是杂牌队伍，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则

以扒子补隆为据点。所以每到冬季黄河结冰后，整个后套即处于紧张状态，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即以区乡动委会为中心，加强民众组训工作。按照一九三九年的规定，除积极完成配合军事作战时的各项动员工作任务外，直至随时可以动员群众实施“空室清野”。因而基层的民众组训更有加强的必要了。为了加强基层民众组训的力量，一九四〇年秋后，举办过一次保长训练班，为期一个月。事前由省动委会根据当时绥远的政治情况和形势需要，编辑训练教材，定名为“民众训练课本”，等于一册识字课本。内容包括：国家民族意识，民众组训，生产技术，军民合作，治安，卫生等常识。这个课本通俗易懂，油印成册，每人发给一册。傅作义又亲自到团（八岱训练团），经常作精神讲话。省政府各厅长和指派主管业务的官员，也来团作专题报告。整个训练由动委会负责，并利用课余时间教抗战歌曲。时间虽说不长，但在当时说来，收效很大。

回忆起来，当时的保甲长，都是由各乡“选举”出来的。虽然不能说各个都是土豪劣绅，但真正劳动人民确不很多。这也是当时阶级社会的产物。

四、妇女工作。妇女工作在当时的后套说

来，还是一张白纸，以前根本就没有做过。这时动委会由西安招来的六名女干部：李特，高萍、庄珉、肖风、王健、朱惠芝，都是大、中学生。后来又在晋南、汉中等地招收了几位妇女干部，也拨到动委会了。动委会在五原建立的时候，由李特等办过几次妇女训练班，以教抗战歌曲、识字、及讲时事新闻为主。当时青年妇女、不论姑娘或媳妇，由于封建家庭的束缚，多不愿参加或不能参加。参加者多是老太婆与小姑娘。

在每次日寇飞机轰炸后的调查、慰问和发放救济粮款，都是由妇女工作组来办理。因为便于深入住户访问调查，了解具体情况。这些工作做得还不错。因为她们都很吃苦，与当时的男同志生活、行动无甚区别，甚得社会好评。后来，庄珉调临河县动委会，王健调安北二区动委会担任妇女工作。肖风愿做宣传工作。高萍因性格关系不愿作妇女工作。因此，只留下李特任妇女工作组主任，朱惠芝协助。省动委会自五原迁移陕坝后，妇女工作即不如在五原县搞得有声有色了。再加上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在陕坝恢复后，对动委会的敌视与迫害，李特、高萍、朱惠芝等就先后离开后套。王健因为其爱人马子诚的逃跑，先是被扣，后改任教员，不久也离开后套。省动委会只好调庄珉回来任妇女工作组主任。另由陕南招

来的几位妇女干部如李子建等协助工作。从此以后，只好办理一般对妇女的宣传工作和动员工作了。后来在陕坝也办过妇女训练班，大部是由机关家属参加，真正劳动妇女参加的不多。各县区的妇女工作与陕坝的情况，大致相同。

### （三）动委会的干部来源及其变化与归宿

一九三九年春，动委会成立初期，干部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由西安招收来的几十人，其中包括从延安抗大借来的十人；由三十五军政治部民运工作队的几十人，和由后套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干部中，有共产党员如武践实、白阳、王一然、乔培新等人；有民先队员如萧离、高萍等人；其他虽非共产党员或民先队员，但大多数均系要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然其中也有老牌国民党员如贾克让、黄逸民等少数人。当时傅作义为什么让这些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参加他所领导的行政工作而且当作基层骨干呢？这完全是随着抗日战争初期形势发展，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吸收这些进步的政治力量，在后套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为他打开前进的道路奠定基础。因此，傅作义在一九三八年冬初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武功会议，把所属的军队调集后套安排就绪后，就以动委会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大抓地

方行政工作。他经常对我说：“动委会是咱们的青年统一战线组织，不论什么党、派，只要跟着咱们抗战，都很欢迎。”

蒋介石本来让傅作义由晋西北率领所部回师返套，一则是分割阎锡山的封建势力；更重要的是牵制延安，防止共产党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哪能容许傅的政治作风向左转呢？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派军事巡回训练组到后套，对傅部所有排长以上的军官，进行巡回训练。实际上是宣传国民党统治理论，毒化绥远的军政人员，调查了解后套的政治思想情况。以三十五军政治部、游击军政治部，绥远省动委会的人员为重点。

巡回训练组在五原开始工作不久，傅作义对我说：“巡回训练班的张主任（少将）想和你谈谈，要你把动委会的共产党员姓名开列名单，向他交代一下。”我当即对傅说：从延安抗大来的几位青年同志，是经过您的同意向罗瑞卿教育长要的，向他交代什么？傅又说：没有什么，向他说明一下，今后好工作。当时我从内心里发生不快。即对傅说我随您工作多年，如果您对我怀疑，或是认为我在您这里工作不便，我可以马上离开，到那儿也是抗战，没关系，因此我未向张某交代。训练班在五原东门外省动委会周动委会

围的树林里开始了。这一部分训练的实际任务，是由章泽群（上校）负责。有时与我闲谈，彼此都有警惕，未曾涉及政治内容。

当时蒋介石政权认为，傅作义领导下的军政人员的政治思想是“粉色”的。经过巡回训练班这一长期、普遍调查了解后，当然更不放心了。此后，特务组织机构，接踵而来。一九三九年夏末，先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姚大海（山西人，CC首要分子）和前绥远省教育长潘秀仁，于傅作义在临河百川堡主持抗战建国讨论会的时候，特来后套与傅联系，恢复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后于当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又派政治部专员张彝鼎（山西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苏寿余（山西省人）为副主任，张凤来（山西省人）为主任秘书。之后又在杂牌队伍中建立政治部，所有各政治部主任及工作人员，大部都是“统”字号特务。一九四〇年春，又派军统特务史宏（天津人）在副长官部参加工作。这年中统局又派特务头子张庆恩代替了张遐民省党部书记长之职，把张遐民改任绥远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张庆恩并在后套建立“调查统计室”，自兼调统室主任。后套一隅二县半，特务组织迭次增加，乌烟瘴气，无孔不入。已往生气勃勃的景象，逐渐变成恐怖郁闷的气氛。当时特务组织的



目标都集中到三十五军政治部、游击军政治部和动委会这些青年身上来了。尤其是从延安抗大来的青年同志和共产党员，更是他们的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

一九三九年冬初，傅作义让我向从延安要来的武践实、白阳、葛红、孙蔚祥等十几人做工作，劝说其离开后套。当时我向傅要求说：这些青年同志是我以您的名义向抗大罗瑞卿教育长要来的，来到后套作了不少的工作，此地既不便再继续工作，应当给他们以足够的路费，并保证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绝不能在中途发生什么危险。傅完全答应，还恳切地说：我们绝不能作出对不起人的事。从西安招收的女共产党员李特，也同武践实等回延安。一个多月以后，武践实由延安来信说，他们都安全地到达延安，我才放了心，并向傅作义作了报告。

一九四〇年春季，五原县动委会书记程又新（又名程昆山）被捕后，即变成最凶恶的叛徒了。抗战前，他原在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当过乡指导员，抗战后前往延安抗大学习，一九三九年返回后套即参加动委会的工作。自五原县第一区动委会主任兼区长白阳离开后，即由他兼代区长。他对于动委会的情况最为熟悉，开始出卖大批青年及共产党员与民先队员。就回忆所及，仅

先后被捕者计有：

安建国：共产党员，安北县动委会书记。

王国华：共产党员，临河县第二区动委会主任兼区长。

范建中：共产党员，临河县动委会干事。

刘映元：共产党员。

陈元夫：五原县动委会干事。

王福田：五原县某乡动委会主任。

王会文：五原县某乡动委会主任。

耿吉文：临河县某乡动委会主任。

赵英超：临河县某乡动委会主任。

姚宣泽：临河县某乡动委会主任。

马映光：临河县动委会科员。在参加“新县制”训练毕业时，填写自传，其中有“你最敬佩的现代人物是谁”一栏，可以填写三个人。其中一人他填写“斯大林”。旁边有人提醒他说：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他马上就改写了别人。不久即被扣送兰州集中营受训。

杨格非：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组主任。

张毓楷：民先队员，绥远省动委会流动宣传队队长。

王滋桐：民先队员，绥远省动委会组训组主任。

李行：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科干事。

吴荣琦：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科干事。

马子诚：共产党员，安北县二区动委会主任兼区长，闻讯将被扣捕，即转移回延安。

以上这些人，大部经过关押训练释放后改任其他职务。安建国、陈元夫、王会文、耿吉文有一个时期曾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工作。杨格非改任绥远省《奋斗日报》编辑。张毓楷任绥远省政府侦察员。王滋桐送西安集中营训练，日寇投降后才释放。李行解放后在北京参加工作。赵英超、姚宣泽、吴荣琦情况不明。

自一九三九年后半年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进入后套，为了毒化、迫害被扣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又成立“青训班”，“纪律科”，由叛徒程又新负责。当时程又新一跃而成了特务组织的红人。穿军装，持手枪，凶狠狰狞、横行霸道，青年人望而生畏。青训班、纪律科迫害共产党及进步青年，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恐怖黑暗，达于极点。比较进步的青年都视绥西为危险地区，纷纷托故离开。当时省动委会主要骨干走的走，扣的扣，工作陷于停顿状态。一九四〇年秋趁霍先赴重庆中央训练团返回绥西之便，在西北联大邀请王滋桐、罗吉照、杨炳彩、宋永年、张毓楷等五人来充实省动委会的骨干力量，在工作上才又有些办法。

傅作义在后套一隅，在抗日期间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花费这么大的精力与经费，不顾当时他周围许多人的反对，坚决要成立动委会唯一的目的是适合当时抗日的需要，在政治上培养一批新生力量，因此不能不竭尽全力保全这部分青年势力。一九三九年夏初，国民党中央在绥西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绥远省支团筹备处。一九四〇年秋末，傅让我动员所有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一组织。拿动委会当作“三青团”基本力量。当时除极少数的三、二人外，其余三四百人都在中山堂参加入团宣誓典礼。傅作义亲莅监誓并讲话。从此，这些纯洁的青年，都打上了这个反动组织的烙印，让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点，罪恶莫此大焉！迄今思之，我为祸首，悔之莫及！

当时认为动委会人员都加入了“三青团”，对一些进步青年的迫害可能缓和些。不料这些反动成性的特务们，虽然他们之间互相排挤、斗争，水火不容，但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时特务们的目标都集中到我身上来了，除之欲快。但因我跟傅作义多年，傅颇为重用，不敢轻易下手，屡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一九四三年，董其武升任三十五军军长后，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将校班受训时，何应钦、陈果夫曾问他，在绥远主持动委会的于纯斋是不是共产党？他答不是。他返回绥西

即向傅作义说明此事，傅认为不妙。一九四一年夏初，傅派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时，把他亲笔签署的给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王宠惠、康泽等人的信交我携带，并嘱咐一定要去见这些人面谈，问啥说啥。当时我认为跟他多年，待我真是天高地厚，感恩不尽。几年后，董其武对我谈及此情，这才了解此中的内幕：傅作义在给这些人的信中，代我作了解释。

我受训返回后，特务们对我的敌视稍轻一些；但对动委会的进步青年，仍未放松。回忆所及，王滋桐、马映光、李行等就是在一九四〇年冬季扣捕送西安集中营和兰州集中营的。

动委会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在绥西黑暗恐怖时期，被迫离开者就记忆所及有下列等人：

乔培新，共产党员，五原县动委会主任。

王一然，共产党员，临河县长兼临河县动委会主任委员。

李萍，共产党员，临河县第四区动委会主任兼区长。

刘奕山，共产党员，五原县第四区动委会主任兼区长。

萧离，民先队员，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组主任。

萧凤，女，民先队员，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科

干事。

高萍，女，民先队员，绥远省动委会妇女工作组干事。

乔东君，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科干事。

樊清璋，绥远省动委会宣传科干事。

刘育斋，共产党员，绥远省动委会流动宣传队长。

蔡海峰，女，民先队员，流动宣传队队员。

杨树林，民先队员，流动宣传队队员。

李佩衡，共产党员，流动宣传队队员。

李畏，流动宣传队队员。

凡塞，原名范春军，流动宣传队队员。一九四一年在宁夏被捕，四五年秋释放。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的形势进入相持阶段，傅作义为了加强后套的政治力量，增强行政效能，撤消了动委会，实行新县制。

原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

本文有删节

# 共产党在傅部中的政治工作

鲁志浩

抗战初期，傅作义的部队于1937年从太原退到山西中阳县、石楼县一带，中阳，石楼区地处于八路军一二〇师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当时国共合作抗战，全国的统战形势是比较好的。傅作义将军出于抗战爱国的思想和受全国统战形势及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要建立部队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开展爱国主义的教育，鼓舞士气，以利抗战。我们党当时从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战，促其进步、坚定其抗战胜利信心的方针出发，是支持他建立部队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的。在他派人到西安和晋南招考政工人员时，我党动员了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了他的部队的政治工作，还应傅作义的要求，并派了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协助其开展部队政治工作。1938年×月南汉宸、罗贵波二同志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到河曲，向傅作义说明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和介绍了应傅的要求派到他部队作政治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名单，说明由潘纪文同志领导那里党的工

作。在1938年——1939年前后，在傅的三十五军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潘纪文、左青、鲁志浩、洗依、黄剑拓、黄克、赵会巧、吕林、李健生、杨子明、阎又文等十余人。当时还有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二十余人，其中有：陈有道、左芹芳、李仲、侯建权、冉志恒、李钢、王家驹、周平、王芳等。党组织指派鲁志浩为民先的领导人。在傅作义的地方部队绥远游击军作政治工作的有：白杨、梁鸿钧、武践实等。为了帮助傅作义扩大部队，晋绥军区还为他动员过三千多名新兵。

当时傅作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制度规定：政治工作人员不定级别，从军政治部主任到连指导员、政工员，除伙食、服装由部队供应外，每人每月都是发生活津贴二十元。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分布在军、师（旅）、团政治部和部分营、连工作。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宣传科长、个别师的政治部主任和几个团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有的党员担任干部学校的队长、指导员和教官。在政工人员中还有大批进步青年。当时在傅的部队中，可以公开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宣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三十五军的干部学校两次派人到延安



（侯建极同志就曾奉命派去过一次）购买大批进步书刊，如《论持久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斯大林选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这些书刊在干校和部队都可公开阅读和宣传。当时在政治工作上提倡官兵一致，军民团结，实行定期上政治课，每周开小组会，开展批评帮助，也都起到积极作用。

经1938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工作，党组织在傅作义部队宣传了党的政策，促进了官兵对共产党的了解，进行了抗战爱国的思想教育。共产党员革命的政治方向，勇敢坚定、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思想作风，在他的部队中有了很好的影响。这段党的工作对傅作义部队积极开展抗战和后来的北平和平解放与绥远的“九、一九”起义，也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傅作义部队是阎锡山的部属，其内部虽没有国民党的机构和组织，但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共顽固势力的活动是很明显的，与我党的斗争是很尖锐的。他们以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反对所谓封建割据（指抗日根据地）；反对我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在1939年傅作义部队举办的抗日建国讨论会上，政治斗争的辩论，达到公开的白热化程度。他们还

经常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发我们共产党的活动，攻击靠拢我们的进步人员，挑拨我党与非党人员的关系，破坏党与非党人员的团结。在全国反共高潮、统战形势已明显恶化的情况下，1939年下半年，傅作义脱离了阎锡山，依靠了蒋介石，国民党便开始在傅部建立、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实行反动的“全军皆党”的政策；并派反动头子张彝鼎、苏寿余等到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建立反动的政治工作机构，反对共产党，打击进步力量，把过去团结抗战生气勃勃的局面完全改变了。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压力下，傅作义对在他部队中已发现的共产党员一律撤销工作，礼送出境。除个别没有暴露能潜伏下来的党员外，几乎全部党员、大部民先队员和部分进步青年成批脱离他的部队，先后回到延安去的约有百人左右。

我个人是1938年1月同冉志恒同志一起，通过王一然同志的介绍（他当时在傅作义的绥远财政厅当秘书主任），在西安考入三十五军作政治工作的。先到山西离石柳林镇（现已改为柳林县），在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受训（主要是军训）两个月，然后分配在干部训练所一队任指导员（皆政治教官），二队的指导员也是共产党员洗依同志。当时学校的教官还有共产党员杨子明同志和由八路军120师临时派去讲“游击战

争”的一位经过长征的连长。干部训练所的所长是苏开元（东北人，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抗战期间去过延安，解放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已去世）。当时干部训练所的政治课，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战争三阶段（防御、相持、反攻）、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部队政治工作等。在干部训练所工作了半年，八月份前后被分配到211旅420团任政治处主任，团长是安春山（后来成为傅作义将军的军长），政治处的干事有侯建极（后改名为侯真，当时不是党员，因受党的影响，1940年去了延安，解放后曾在八一农学院任党委书记），各连都有政治指导员。安春山有个弟弟安智（后改名石基），当时安春山决定叫他到西安去上中学，我经过争取工作，介绍他到延安上了抗大。安发现后对我十分不满，认为我把他的弟弟引入了歧途。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知道安智在四川省委统战部当上了处长，安又对我引导他弟弟走上革命道路表示感谢。

在这个团工作期间，我和团、连政治工作干部经常开会研究工作，进行学习，向他们讲解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些政策，向团、营、连的一些军事干部也定期地作些形势和政策报告。有些年轻的军事干部也愿意和我们接近，我们也尽

可能与他们谈国家大事、抗战形势和国家前途，启发他们的进步思想。安春山本人是个出身贫寒，打仗勇敢机智的旧军人，抗日战争中打过不少胜仗，很得傅作义的赏识，他也很自负，但政治上缺乏远见。后来在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上，傅曾派他携带《和平解放绥远协议》，到呼市传达贯彻，他未能很好地实现傅将军对他的期望。

我在这个团工作半年，于1939年春又调到211旅（我离开前改为新31师）政治部主任，旅长孙兰峰是1935年绥东抗日的名将，行伍出身，文化不高，但作战指挥机智果断，常打胜仗。我到这个旅不久，傅作义的部队奉命由山西河曲、偏关一带向绥远河套地区进发，我随旅部一同经东胜从马七渡口过黄河，先到执子补隆，后驻新公中。当时旅政治部干事有李文超、雷轰、郭仰宽，后来李文超、雷轰同志在党的影响下去延安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李曾和我一起，在绥蒙区党委和绥远军政委员会工作，后在包头师专任党委书记，现已离休。雷到延安后改名雷时雨，解放后在甘肃军区后勤部工作。当时的党员同志们因为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傅作义部队共同抗战，并真诚地从政治上帮助他们进步，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促进他们部队内部的团结，受到他们的尊重

和信任，并且和他们部队的有些军政干部建立了友谊，交了朋友。1939年8月，因为潘纪文同志去延安请示工作，在离开河套之前，经过他向有关方面进行了工作和我自己的争取，调我接替了他在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的职务。因为这个职位是管政治干部的岗位，我到职后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员的提拔调动和反对特务、顽固分子的压抑作了一些工作，深为特务分子所痛恨；并且在一次三十五军军部军政干部的朝会上，我讲话时阐述了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痛斥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破坏团结的罪行，更引起国民党特务和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不久我就调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政治部（张彝鼎为政治部主任）宣传组当组员。但在特务监视下我无法工作。这时，党组织已发现蒋介石的军委政治部主任陈诚给傅作义来电称：“据密报原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潘纪文系共产党员已去延安，现任组织科长鲁志浩亦系共产党员，要撤销他的工作，监视他的行动”。在此形势下，我于1940年1月底接到潘纪文同志转来延安通知，调我并叫我通知其它五位党员速去延安。我就以赴西安治病为名请假去了延安。

# 傅作义在河套实施“新县制”的忆述

刘培荣

一九四二年傅作义在河套地区推行了“新县制”。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五原战役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后套地区的统治，一九三九、四〇年在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下，在河套的一批共产党人陆续被傅作义送回了延安，在共产党影响下建立的“抗日动委会”已不能发挥作用，傅作义便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推行了“新县制”。

## (一)

为了增强战时体制，提高行政效能，傅作义首先对省政府的机构、人事，作了新的调整，人事安排情况是这样的：

主席傅作义、民政厅长陈炳谦、财政厅长李居义、建设厅长曾后载、教育厅长潘秀仁、视察室主任阎伟、秘书长于纯斋；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张遐民、地政局局长周北峰、水利局局长王文景、会计长兼粮管局局长俞杰、工路处处长刘建

勋、物资管理处处长王子才、田赋管理处处长李居义（兼）、副处长张丕烈、农林处处长张立范、警保处处长陈光斗、国民兵征训处处长马秉仁、社会处长待缺；省银行董事长王国英、总经理陈善教、省人事委员会由民政厅长陈炳谦领衔、省府各厅、局、处长为成员。

另外指派张濯清为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于存灏为省法院院长，李世杰为绥干团教育长、康保安为训导处长、张维勇为教务处长、张淑良指导处长、王景泰总务处长、刘春芬军事处长、刁可成政工处长。

在培训干部上，国民党中央曾提出“党对国家负责，党员向党负责”以及制定了“军政干部条例”、“党员守则十二条”、“军力读训十条”等，傅作义又认为这都是些空虚的教条，缺乏内含的力量。他则提出并坚持“地方对国家负责，地方对部队负责，地方对干部负责”及禁绝烟赌脏（淫乱）的政治要求，推行他所制定的“干部条件”。并对干部颁布了十二戒条。其具体内容是：

“四有”、“四要”、“四为”、和“五个一致”。

四有是：有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对国家、对整体、对职

务的责任心。

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

四为是：为国家，为整体，为将来，为胜利。

五个一致是：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干部十二戒是：（1）绝不贪污腐化；（2）绝不存雇用观念；（3）绝不明无意见、退有后言；（4）绝不自行敷衍、忌人努力；（5）绝不党团分派、划小圈子、站小立场；（6）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7）绝不诽谤同志，鄙视他人；（8）绝不掩过饰非，拒绝批评；（9）绝不接受民众和下级的馈赠；（10）绝不与奸商来往，兼营商业；（11）绝不自己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结婚；（12）绝不自己在自己工作范围内置产。

这些“干部条件”和“干部戒条”，不但在绥干团培训新县制干部时一再阐明，反复讲解，并对违反戒条的行为，随时给以惩罚。在新县制将要推行的时候，为了贯彻他禁绝“烟、赌、赃”的政治要求，以惩一儆百、杀鸡让猴看的办法，将贪污有据的五原一区区区长王清、临河永宁乡主任干事武少象、安北太宁乡干事赵亚民，执



行了枪决。并对五原四区区长徐元善之失职行为，以及临河庆乐乡乡长刘明谦等人的利用职权损公肥私之行为，均分别给予撤职查办。为推行禁烟、禁赌，还惩办了一些嗜好成性的个别干部和社会上的不肖之徒。

为了推行“新县制”，一九四二年傅作义首先成立了“新县制”筹备委员会，由省府委员及国民党三青团、法院、动委会等有关负责人组成。其筹委会成员有陈炳谦、于纯斋、辛崇业、赵仲容、于存灏、耿正模、李大超等十七人。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绥干团分批培训准备充任“新县制”的中下级干部人数，达一千五百多人。学习的内容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农林、水利、田粮、地政、保安、司法、合作、交通、民运、党务、团务以及物资等有关业务。有关地方自治的内容和民运工作的方法，亦列入学习讨论的范畴之内。尤以“新县制”的“干部条件”与“干部戒条”，则是绥干团五期培训干部中特别强调和重视的一课。所以每一受训的行政人员，通过反复的学习讨论，都能将干部条件与戒条背得烂熟，作为言行的准则。一九四二年五月结束了“新县制”的学习任务，各县乡组织了划界委员会，勘划新的县乡界线。同时宣布取消各级“动委会”，各县原有区公所也一律裁撤，

废除民选乡长制，实行委任制。

## (二)

为了推行“新县制”，傅作义把原来后套五原临河两县及安北半个县划为安北、五原、晏江、狼山、临河、米仓六个县，并将临河的陕坝（太安镇）升格为市政筹备处。撤消了区级行政建制，重新划分乡界；缩小了乡的范围，加大了乡长的权力，以增强基础行政组织。推行保甲制度，便于屯兵兴农，征粮征兵，控制户口，强化治安。新县制的乡长统一由省政府直接委派。原来的乡长虽属民选，实质上是由当地大户轮流坐庄。新县制实施突出了以管字为中心的治理方法。以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而到训练壮丁，征粮派款，所有政令之贯彻，无不以乡保为基础。

新县制实施后，确立了陕坝为绥远的临时省会。成为与张家口、归化城（现呼和浩特市）、包头、多伦齐名的重镇，从而也就成了傅作义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正如民间传说的顺口流：

“东口（张家口）至西口（归化城）、喇嘛庙（多伦）到包头，也不如今天的园子渠头”。

新县制的行政区域规划情况：将安北第二区划为安北县，县政府设在扒子补隆（今前旗新安镇）。五原的二区和三区划为晏江设治局，后改

为县，县政府在塔尔湖。（晏江两字的命名，是为纪念五原战役阵亡的五临警备旅二团团长贾晏如和三十五军的营长赵寿江）。五原一区和四区划为五原县，县政府设在隆兴长。临河县的二区和三区的一部，划为狼山设治局，后改为县，县政府设在永安堡（今临河市狼山镇）。整个四区和三区的一部划为米仓县，县政府设在三道桥。（米仓县的命名是为吹捧山西河曲人杨满仓、杨米仓弟兄俩开挖杨家河干渠的功劳，同时也怀念了当初创挖杨家河的山西平鲁人杨风珠）。并把原来临河三区公所所在地的陕坝，改为陕坝市政筹备处。临河县所属范围光留下原一区和黄土拉亥河以东和庆乐乡（乌兰加圪素）以南的地区，县政府仍在旧县城（永济镇）。

新县制县长人事安排情况为：首任临河县长王映荣、米仓县长张福生、五原县长由竹生、安北县长乔学曾、狼山设治局局长赵国鼎、晏江设治局局长家业峻、陕坝市政筹备处处长常佩三。

七县市共辖九十二个乡镇。

临河县十九个乡镇：永昌乡、永灵乡、永嘉乡、永福乡、永康乡、永和乡、永泰乡、永刚乡、永宁乡、永盛乡、太昭乡、太武乡、太成乡、太平乡、太章乡、太乐乡、永新乡、庆远乡、永济镇。

米仓县十九个乡镇：平化乡、平章乡、平教乡、平理乡、平成乡、平和乡、平治乡、平定乡、平西乡、平政乡、平顺乡、新中乡、新乐乡、新成乡、新理乡、新化乡、新和乡、新教乡、新隆镇。（县府所在地）

五原县十五个乡镇：中恕乡、中兴乡、中盛乡、中元乡、中诚乡、中允乡、平安乡、平善乡、平乐乡、平原乡、平太乡、正心乡、正礼乡、正风乡、隆镇（即隆兴长为县府所在地）。

安北县九个乡镇：太吉乡、太余乡、太有乡、太富乡、太兴乡、太安乡、大礼乡、大正乡、新安镇（县府所在地）。

狼山设治局十七个乡镇：庆乐乡、庆福乡、庆隆乡、庆鲁乡、庆余乡、庆有乡、庆荣乡、庆裕乡、太和乡、太华乡、太仁乡、太宁乡、太丰乡、太熙乡、太麓乡、奋斗乡、永安镇（县府所在地）。

晏江设治局十三个乡：正泰乡、正又乡、正大乡、正新乡、和定乡、和瑞乡、和中乡、和顺乡、和悦乡、和乐乡、和利乡、和协乡、绳武乡。

六县局共辖九十二个乡镇，比原来套内四十六个乡镇，扩增了四十六个乡。在勘划新的县乡界时，各县乡在省府统筹规划下，组织了划界委员会。根据原有乡界和地形、渠道、沙丘等自然状

况，确立标志、绘制县乡新图，分别报省备案。

原来的河套县政府设县长一人、秘书一人、民、财、建、教四科及会计室；另有警察局、司法处。一九四二年六月“新县制”实行以后，各县政府组织日渐庞大。到一九四五年初的县政府组织机构则设有县长、助理县政秘书各一人；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粮食科、军事科（是政府军事职能机构）、地政科、合作指导室、会计室；还有警察局、司法处、水利局、田赋管理处、国民兵团、税务局、县银行、民教馆等十七个县直单位。县长兼水利局长，和国民兵团团长（省征训处派一名中校副团长为专职），协理县政（即副县长）兼田赋管理处长。

乡公所设乡长一人，乡附一人；民政、经济、户籍、警卫干事各一人；文化干事由乡中心小学校长兼任。业务分工：乡长综理全乡工作，乡附协助之，并主管财务事宜；民政干事管查禁烟赌、社会救济、建设、水利、地政、调查；经济干事管田粮、公租、财税；户籍干事管户口登记、清查、征丁、缉逃、差徭等；警卫干事管警察、自卫及有关军事设施。每乡干部七人，另设乡警四人。

废闾隣、立保甲后，每乡辖五一八个保，每保设保长一人，副保长一人（专管推派、要

粮)、保队副一人(专管壮丁之征召)、保警一人。每保六——八甲,每甲十户左右,基本上按自然村划为一甲。凡征兵、要粮、派差、征款等任务都由保甲长亲自执行。

为了强化治安,在清查户口,整顿户籍的基础上,填发良民证。凡年满十六岁至五十岁的男女,必须随身佩带良民证,否则寸步难行。良民证用白布印制,正面有姓名、年龄、职业、性别、籍贯、身高、特征等项目,底面有发证年月日。由各乡户籍干事、民政干事,下到保甲,按户口簿,挨户逐人对照填写。然后造册登记,经核对无误后,加盖印鉴,发给本人,缝在上衣右前襟上,以备不时检查。倘或遗失,须立即申报,更不准借与他人,一经发觉,要受严重处罚。被认为是来历不明的人,不给发证。按规定在良民证上须附贴一寸免冠半身像,因抗战时期,一切从简,均以双手十个指姆印代之。对来往住宿的亲友,须及时连同其良民证报请乡保登记,倘因疏忽漏报,一经查觉,以隐瞒论处。并在保甲内实行“连保连坐法”,让保内各户,互相监督,一户违法,连保的户要受“连坐”处分。总之,新县制的特点是缩小县、乡、保的范围,充实基层,加强行政效能。特别是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法”,增强了统治人民的力量。

省政府为了策进新县制乡干部的积极性，根据工作表现，先后提升了临河太平乡乡长张玉璞、狼山太和乡乡长张亨信、五原的乡长薛佩印、米仓的乡长傅观兰，分别担任了安北、晏江、五原的县长和桃力民办事处处长。

### (三)

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新县制的行政以发展生产、粮政、兵役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新县制实施后，从一九四三年到四五年七月，共轮训了七期国民兵，在后套设有两个补训管区。第一管区在米仓县新乐乡（现杭后南渠乡）、征训米仓、临河、陕坝、狼山的壮丁；第二管区在五原新公中（现永利乡），征训五原、晏江、安北的壮丁。每期3—4个月，期满还乡生产。傅作义为了坚持抗日，保卫河套，并且养活进入河套的大批军政人员，他采用了寓兵于农的方针（即适龄青年平时种地为农，战时扛枪从军，有意把后套的壮丁暂时保留下来务农生产，并作为扩充兵源时的后备力量。而当时的傅部兵员则从甘肃、陕西、河南等县去征集补充。

为了促进河套地区的生产发展，傅作义在新县制实施后，便开始了土地整理，以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耕种问题。原则是凡在垦务局挂领的土

地，除按照地契上出售的土地数目外，多余出来的土地收归公有。另一个办法是计款留地，十顷以上者由合作农场经营管理。十顷以下者卖给少地、无地的农民耕种。经过清丈整理后，除大段土地交由合作农场经营，为了促进生产，傅作义建立了几个生产农场。如五原平乐乡的西圪卜农场，晏江和悦农场、安北大召农场、临河青年农场、狼山奋斗农场、米仓合作业务代管处农场，负责这些农场。部分土地雇工垦植，部分土地租给农民佃耕、承收积粮。剩余的小片土地大部分由大中户抢先挂领购卖，真正耕种多年的原来佃农，由于没钱很少买到土地，这样反而给大中地户及个别官员创造了侵夺、抢购、调剂土地的机会，形成了大中地户垄断土地的合法化。

各县合作农场和代管处，高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以“推行租佃合作、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宗旨。也有一些经营管理人员，徇私舞弊、玩忽公令，承租土地的佃农，除每年向农场交租金积粮外，还要受收积人员的额外敲诈勒索。

傅作义在河套素以治军与治水并重，对水利建设极端重视。为此，他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治理黄河的测量工作。傅作义陪同该会的负责人赵守钰到现场实地勘察，掌握第一



手材料。对从宁夏石咀山到后套这一段黄河的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作了一系列的勘察工作。并筹建“四首制石闸”引黄灌溉，力图振兴河套水利。

为了保证军政人员的供应，傅作义在促进生产的基础上实行了严格的粮食政策，抗战前田赋征收是由县财政科办理，按农民所种地亩征收现金，抗战后则改为征收实物。在后套地区建立了田赋征实和粮管机构。征粮名目繁多，如征实粮也叫田赋粮。征借粮由粮食部统一发给征借粮支票，规定五年分期还清，实质上是向农民强借粮食。征购粮：即按公价向农民强购粮食。省公粮：按比例征收、供给省党政人员薪俸。县公粮：供给县政人员薪金及办公费用。乡公粮：按定额征收，每乡征收小麦二百石（六万斤），作为乡级人员及乡学校教职员工的薪金与办公费用。水费粮：按全县水利开支，分配给各乡，向农民征收。乡造产粮：作为乡的机动粮使用。军粮：是供给部队人吃马喂的粮料，是征粮数额最大的一项负担。为把征收来的粮食保管好，各县设置了军粮仓库和公粮仓库。各乡也都设有粮食保管员。

#### (四)

傅作义虽身居高位，但生活上则与一般公务人员一样，他对“新县制”的县乡干部在讲话中强调“生活标准化”。坚持“待遇不同、生活一致、为养成艰苦朴素、上下同心的思想基础”。他提倡“官兵一致”从自己做起，他穿着士兵的服装鞋帽，扎着士兵的绑腿、皮带。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具有朴实无华的气质。他在河套地区，极力创造清廉、负责、合作一致的优良环境，对国民党部分地区拥兵自卫消极抗战，政治腐化，贪污成风的现象甚表不满。要求干部做到智仁勇诚。他解释智：就是知所廉耻，警觉迅速；仁：就是深明礼义，热爱整体；勇：就是勇于负责，坚决奋斗；诚：就是守纪保密，作风民主。他向干部提出了“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同生死共患难”的口号。经常教育干部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团结友爱、遵纪守法。傅常说“为政不在多言，只求务实力行”。一次，他在河套县长会议上讲话指出：河套地区强凌弱、富欺贫的现象很严重，大户逃避摊派，豪强欺压善良，都是民间不平等的事情，以后要严加取缔，彻底消除。他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实行“廉能政治”。从而提出了“人民第一、士兵第一”的口

号。傅作义在选择使用人员方面，虽说是“用人唯贤，为事择人，不分地域，一视同仁”、“忠诚奋发、择优录用，有才不屈、无能不官”，但毕竟也有他自己的界线。

傅作义在河套期间的言行和政策主张以及政令之推行，均由特设之“贯彻社”，按期出版《军事贯彻》《政治贯彻》和《奋斗日报》、《时事周报》等舆论工具随时予以刊载。

### (五)

傅作义进入后套后，励精图治，认为后套是他奋发迈进的起点，收复沦陷区的基地。所以于一九四四年，当抗战胜利在望、即成立了战地复员委员会，傅自兼主任委员。委员有：陈炳谦、李居义、潘秀仁、赵仲容、王玉宾、张钦、于存灏、阎伟、张遐民、于纯斋等二十余人。并指派了到沦陷区开展工作的县长或者党政负责人，计：包头县长乔培新、萨拉齐县长于维欧、和林县长武勋卿、固阳县县长张国宝、凉城县县长乔汉魁、托克托县长韩国梁、归绥党政负责人弓国华、丰镇袁希平、集宁弓致中、武川高玉璧、兴和、陶林两县人选不详。并对所辖之伊盟东胜县、达拉特旗织训处、桃力民办事处的人事、亦作了相应的加强与调整。同时指派邱明星为绥北

专员、赵大义为绥南专员、赵励师为绥东专员、陈国祯仍任伊盟东胜专员（后由张国林接替）。

## （六）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傅作义即率部东进，抢夺胜利果实。并下令征召一至七期国民兵全数入伍。把河套所有壮丁一鞭子吆了个净光。按兵役法规定，有“孤子不征、二丁征一，超龄不征，病残免征，新婚缓征”等条款，但在当时征兵中，县乡干部、警保人员均未执行这一法令。各县长设有党政军团联合组成的兵役协会，只能是掩人耳目的虚设机构，没有任何权责。当时省府颁发了兵役奖惩规则，其奖励事迹为：（1）办理兵役认真，成绩优异，堪为一般模范者；（2）办理军属优待确实迅速，使受优待者享有实惠而无缺憾者；（3）慨捐优待军人家属基金者；（4）协助推行兵役成绩显著者；（5）父兄鼓励子弟，配偶鼓励丈夫从军已成事实者；（6）其它有具体事实者应奖励。

应受惩罚行为：（1）征兵调查表报无故不依限呈送者；（2）体检不实者；（3）监督不尽职责者；（4）办理优待军人家属不力者；（5）误解兵役法令，致使兵役推行发生阻碍者；（6）办理兵役不遵守法律程序者；（7）

管区及县市政府、乡镇公所无故不反映实情者；（8）征（招）兵期间管束保育无力而至逃亡者；（9）阻碍或玩忽兵役法令未致犯罪程度者。对兵役工作有特殊成绩者给以勋章，有重大过失者应依法惩诫。但当时征兵任务很紧，这些条例也都没有认真执行。

河套人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中，出钱、出粮、出力、出人，无不踊跃慷慨奉献，付出巨大的代价，为的是取得抗战最后胜利，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迎来的却是这次大规模的征兵，抓走了大批青壮年，形成了满目疮痍，一片凄凉，人民苦不堪言，把河套推向灾难的深渊。

### （七）

随着大军东去，省府抽调了部分行政干部前往东部接收。傅作义恢复了绥西专署，派周钧为行政督察专员，于霖瑞为绥西警备司令。并对后套各县长人事，作了新的调整和安排；米仓县长王中、临河县长高映明、狼山县县长高淑远、五原县长刘惠元、晏江县县长郭映宽、安北县长陈质文。

在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幌子下，将委任乡长改为乡指导员，各乡乡长由乡民代表会选举产生，各县均成立了县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实行地方自治。

随后，各县相继建立地方武装，县设民众自卫总队部，县长兼总队长，设副总队长1—2人，下有编练、政工、动员三个组，另有督导员、办事员各一人。

乡民众自卫队设大队长一人，由各该乡长兼任，副大队长1—2人，由当地通晓军事者充任。下有编练、政工、动员三股。每大队辖三个区队，每区队三个分队，每分队三个班。并规定每一乡大队务须保持常备队员80—100人。专职副大队长薪俸小麦二石（600斤），区队长薪俸小麦六斗（180斤）。最基层为保办公处，为承办自卫的具体单元，其应办事项计有：工程、运输、供应、救护、向导、侦察、守望、盘查等。

关于推行地方自治的层次为：县设县议会；乡有乡民代表会；保定期召开保民大会；甲叫户民小组会，对各级行政人员有监督、弹劾之权利。

县实施民众组训的对象，以少年团、壮丁队、妇女会、长老会、在乡军人会以及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团体成员为主。所贯彻的内容，仍以“新县制”政令为衣钵。当然矛头是反对共产党，参加反革命内战了。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起义后，进行民主建政，便结束了“新县制”的一切。

# 参加“抗战建国 讨论会”的见闻

王兴亚

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是傅作义于一九三九年夏在河套举办的。一共举办了三期，我参加了在百川堡举办的第一期。现将该会的创办起因，组织章程及活动情况，介绍如下：

## 创办抗建会的起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的铁路线，并且在占领河南省开封后，逼近洛阳，使陕、甘、宁、川各省，都受到威胁。同时日寇还在山西隔河炮击河南郑州，陕西潼关。对此，蒋介石急忙召开最高军事长官会议，以研究对策。到会的计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副司令长官马鸿逵等。会

上，除讨论军事问题外，蒋并在征得阎锡山和朱绍良的同意后，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令率所部，由山西开赴后套驻防。

傅作义奉命后，一九三九年二月率部陆续到达后套，并分别在五原设立了副司令长官部，在陕坝设立了绥远省政府。

当时，后套的情况是，驻军庞杂。在归绥包头沦陷以后，从前方溃败下来的正规军、杂牌军都云集在后套。形成了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局面。其中有：中央军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前绥远国民兵改编的绥远游击军马秉仁部，前阎锡山的绥西屯垦军改编的五临警备旅徐子珍部，蒙骑第三师白海风部，还有宁夏马鸿逵派驻临河的八十一军马鸿宾部。还有似军而匪的杂牌军武驼羔（武俊峰）部、郭四儿（郭青云）部、郭长清部。他们都在补充势力，争权夺利，向当地随意要饷、要粮，索吃、索穿，军纪废弛，扰害地方，并且把持地盘，形成割据。如马鸿宾部驻在临河时，不经过他的军部许可，县政就不能实施，甚至连交通、电报、电话都由他管理支配。当时河套地区居民既患乱军之扰害，又恐日寇之犯境，每日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更谈不到安心从事生产。

有鉴于此，傅作义考虑到当前的首要大事必



须是先整顿好后套的局面，才能担当起抗日守土之责，尽保境安民之职。他经过深思远虑，对如何开始整顿，又应从何处着手等方面，得到的结论是，必须先由整顿军政开始，整顿必须从组训方面着手。从而使他脑海里有一个组训轮廓，然后决定召集所属军政高级幕僚，开会研商。

六月初，在五原副司令长官部召开了军政高级幕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袁庆曾、老参谋长现任绥远省政府民政厅长陈炳谦，还有未到任的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鲁英麟，省府秘书长曾厚载，长官部秘书长赵钟琦，前北路军政治总指导周北峰，三十五军政治主任崔载之等人。在会上，经过六天深入细致的商讨，最后决定创办一个类似组训型的机构，命名为“抗战建国讨论会”，并草拟了组训章程。

### 抗建会的章程

1、为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奠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决心和信念。特创办抗战建国讨论会以期军政各界，高举爱国旗帜，共同努力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2、本会推选傅作义为主任委员；袁庆曾、陈炳谦、为副主任委员；鲁英麟、周北峰、曾厚载、赵钟琦为委员。

3、本会下设三个组，即：军工组，组长袁庆荣；政工组，组长周钧、崔载之；总务组，组长俞杰（副司令长官部的军需处长）；医务组，组长杜勤书（副司令长官部的军医处长）。

4、本会类似组训机构，但不讲课，不训练，无课题，无教材，而是使与会者出谋划策，各抒己见。对提出来的与抗日建国方面有益处的好办法、好意见，经过讨论成熟后，要切实贯彻执行。

5、会内要认真发扬民主，当长官的不能认为自己做得对，说了算，也不能对人有强制和命令式的言行。要虚心接受别人提出来的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6、在会内不论职位高低，不分新旧，不分党派，不分畛域，都一视同仁。主任与委员之间，一切起居饮食待遇一样，决无特殊。

7、会内无假日，无星期，不准请假，不准外出。在会期中不需要的一切物品，都不准携带。

8、本会暂定开办三期，每期时间为一个月。第一期由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开始。

9、本会会员拟每期召集三百五十人左右，分成六个队；队设队长一人，政治主任一人，每队分编四个组，设组长一人，以十三人至十五人

为一组，每队人数最多不超过六十人。

### 抗建会的筹建经过

当时在五原县境内，无适当的会址，后在百川堡（现在的临河新华镇）寻到比较合适的地方，即：阎锡山成立绥西屯垦队的队址，绥西屯垦督办办事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院落，约有四五十间房舍，还有一个极大的广场，可以容纳千人，遂决定百川堡为大会所在地，并立即着手维修。

这里的房舍很能容纳下大会的全体人员，但问题是无一个开会的地方。当时，正值炎夏盛暑，又不能露天里开会。为了避免日晒、风吹、雨淋之苦，在物质困难的条件下，费了很大力气，搭起一座可容纳四百多人的大席棚，作为会场。并在棚顶上铺盖了一层打好的蒲草帘子，以防漏雨。

在靠近会场的北面，用土坯垒了个土台，台中间垒了一个土桌。作为会场主持人和讲演者的讲台。三百多人的座位，则用八块土坯砌成四方型的座，共垒了三百八十一个，横平竖直，也很整齐。

每组住一间宿舍，宿舍里大多数无炕，是在地下铺垫的麦草和蒲草上席地而卧的。每间房是面对面的铺，中间留下的路，只能走开一个

人。按规定除了会部、队部及办公的住所外，其他宿舍都不准点灯（灯也是光亮如豆般的小油灯）。

抗建会制定的各项规章守则：

在进大门迎面的影壁墙上，张贴有《大会须知》，内容概述如下：1，凡参加开会者须按指定的日期到会，先去报到处填表登记，再到医务处检验身体，然后到检查处检查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按指定的队号入队，听候编组。2，本会除主任、副主任及委员外，下设军事组、政治组、总务组、医务组。报到期间，临时设有报到处、医务处、检查处。以上三处，会员报到后，即行撤销。3，大会的一切规定和方式，都是按军事制度订立的。行政人员在履行时比较困难。为此要求行政人员加以克制，力求适应，从而养成军队的习惯和作风。4，本会上至主任、下至会员一视同仁，不分高低，不分彼此，一切起居饮食，待遇一致，任何人也不得有特殊之表现。5，在抗战时期，物资缺乏，设备简陋，望与会者树立爱国爱民的精神，向困难做斗争。当前，生命尚不怕牺牲，困难也不难克服。6，在会场前方张贴着“会场守则”，广场正中张贴着“大会公约（共同守则）”。大队院内张贴有“作息时间表”，厕所前设有“密告箱”，附带有说明，

要求会员细看，细读，并严格遵守。7，严守大会的一切规章制度，如有违犯，定予加倍惩处。虽罪不致死、亦必按死刑执行。不要等闲视之。

### 大会公约（共同守则）

1，凡到会人员须按大会通知规定携带的物品到会。如经检查发现有其它物品时，即予扣留，会后发还。如查带有武器、弹药、医药、刀剪等物件除予扣留外，还要追究思想、企图，并按情节予以处理。2，会期中，无星期，无假日，不准事假，不准外出，如有故违，定加惩处。3，不准与外面通信。对外面来信，先经检查，如无特急事故，先予以扣留，会后发还。4，不准接见外人。即使事系公事，如不是急公要务，须在大会后（休息时小组会时）再办。总之，不能占用大会时间，离开大会。5，严禁烟、酒、嫖、赌，违者除按情节处罚外，还要追究来源（即烟、酒、赌具的来源及递送人），同时并给队组长以失查之处理。6，如患重病，经医务组诊断后，确不能参加会者，即送其归返单位治疗；小病要坚持开会。也就是说：“小病坚持，大病治疗，下期再来”。7、不准串队、串组。如有要事、亦不能占用开会时间，必须在休息时，向组队长说明情况后才行，不能私自离去。8，不准吵架斗殴。

如有故犯，轻者重处，重者加倍惩罚。屡教不改者，送军法处依法判刑。9，不准集伙结党，拉拢关系。10，不准歌唱黄色歌曲，说道奸盗邪淫的故事。11，如发现有害于抗日建国言行的人，以及违法乱纪者，要及时检举揭发，倘发见而不检举，应与犯者一律治罪，甚至还要加重处罚。12，凡过去和现在为敌人效劳者（敌探、汉奸）只要本人自首自白，定予以从轻处理，或不予处分，或送交集训单位教育。13，对屡犯规定，但情节轻微者，除随时警告教育外，还须留在下期会内学习。如下期仍然不改时，即交原部管教，留待特训（特别组训队，这是一九四二年成立的劳动营）。

### 会场守则

1，在开会前十分钟，各队要整队集合，检查人数，并按指定的次序，鱼贯入场。第一、二、三队进会场东门，按三、二、一的顺序进场入座，散会时按一、二、三的顺序出场。第四、五、六队由西门按四、五、六队顺序入场，散会时按六、五、四的顺序出场。各组按每个队的一、二、三、四组的顺序前后入座，形成为由东向西是，一、二、三、四、五、六队，由前到后是一、二、三、四组的排座。队、组、个人都是固

定的座位不得乱坐。最前的第一排座位是主任、副主任、委员、以及大会各组长和办公人员的席位。2，大会台上，只准担任指点发言先后的工作人员或讲话、作报告者上台，其它任何人不得上台，并禁止在台前走动。3，在大会发言时，发言人必须先举手起立，高呼发言，经台上的指点人许可后，再行发言。未经许可不得即行发言，如发现有此情形时，指点人有强制停止其发言的权力。队、组长也有勒令停止其发言的权利。4，在会场的中间和东西方各设记录员一人，发言者在发言前，必须向记录员报名登记。5，在发言中要求声音要大，要清晰；内容要简单扼要，不重复，不赘述；注意不浪费宝贵时间。只要能说明主要内容、方法和措施即可。6，在发言中，任何人不得从中插话。7，要保持会场肃静，严禁离座及出入会场。不得交头接耳、鼓掌、踏脚、大声咳嗽，还要坚持不解大小便。8，对所提出的建议，不论好坏正确与否，在会上不得用辩论、争执、分析、批判或谴责等言语对待；只能发表意见，进一步精益求精地补充，圆满建议的内容，更好的使这个建议发扬光大，顺利执行，才适合讨论会宗旨和期望。9，每次大会，都指定一名监场人，由大会副主任、委员或队长担任。监场人在会场中游动，如发现违犯会场

守则的，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10，大会选派适当的人员，组成一个啦啦队，它可代表群众的呼声，起鼓励发言热烈、情绪高涨的作用，也兼有对会中发生的好的或不正当的言行，予以劝勉、制止、指责的含义。11，大会规定每次会议当中，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 作息时间表

早上四点半，起床，（点名、漱洗、整洁室内外）。五点，朝会、活动、讲解军事常识。五点半——九点，开大会。九点十分，早饭。十点——十二点，各队开小组会。十二点——二点，午休。下午二点——五点半，开大会。五点四十分，晚饭。六点半——八点半，小组会。八点四十分，点名，队内工作。九点，息灯。

朝会，即是大会全体人员，在广场集合，跑步十分钟，然后由军事组组长袁庆荣讲解军事常识约十分钟。

开饭：除刮风，下雨，在大会场内开饭外，其他较好天气，都在广场聚餐，任何人都不得在规定时间内用餐，也不准独餐。

队内工作，即队长安排工作和下达命令等，时间最多不过二十分钟。

在告密箱上规定：1，告密信件，以具名为



佳，保证绝对保密。2，对违法犯纪的人，对抗战建国不利的人，对怙恶不悛的人，尤其对军政高级人员，不论他们在过去及现在所作的罪恶，要做大胆的检举揭发，以有人证、物证为最佳。3，告密信件要真实，要求内容不扩大，不缩小、不含混、不诬陷，切实防止莫须有的情事。4，不存私见、不栽赃、不挟嫌报复，如发现这类恶劣行为，查明情况后，予以反坐。5，为了抗战建国，保境安民，希望各与会的军政人员，以高度的爱国爱民精神，大胆热心的共襄此举。

### 入会前的注意事项

在会员入会前，即通知各部注意如下事项：

1，规定指派参加会的会员名额（校级以上几名，营级以下的几名）不得或多或少。2，对骑马、乘车（自行车）到会人员，因本会无存放的地点及不设保管饲养人员，应由个人自理，不准进入会址。3，携带的物品应按规定办理。即：除身着衣、帽、鞋、袜外，准另带衣帽鞋袜各一件，但不得超过两件。每人准带褥子一条（不准带栽绒马褥和白碴皮褥），被子一床，军用挎包一个，洗漱器具，饭碗二个，筷子一双及钢笔、铅笔、日记本、纸张。其它物品，一律不准携带入

队。4，规定不扎皮带，不打裹腿。5，报名时间，自六月三十日上午六时至下午七时，过期不收。6，报到时，要自到自报，不得他人代报。7，凡被单位指派参加的入会的人员，如过期未见报到，应查明原因予以处理。

现将我本人参加抗建会第一期的实际情况，详细叙述如下：

我当时在副长官部军警宪督察处派驻临河县督察分处任处长，奉令指派参加第一期大会。我当即骑自行车由临河赶到百川堡，时间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先在报到处报名，填写了登记表（姓名、年龄、籍贯、单位番号、职级）后，经报到处审查后，到第一队报到，听候编组。接着又经过医务处检验身体，合格后，复去检查处，检查携带物品。我只带几本书籍（《医学指南》，《中外历史简编》），经检查为非准带的物品，当即扣留。当时有的人携带烟、火柴、刮脸刀、剃头刀、裁纸刀、药品、以及钞票（入会期为一个月，一个月当中，不准外出，不准购食物，用不着钱；暂为保存，必需用时，经由组队请领）等，都被扣留。我到一队报到后，被编入第四组。住室虽然简陋，但很齐整，对面地铺，以土坯做铺沿，围挡着铺草。褥子都挨挤着铺在炕上，被子毯子叠成长方形，整齐划一。衣

物做枕头，挎包挂在每人的距离相等的墙上钉子上。在走人通道的顶头靠墙处，有一个上下两层的小土桌，上层放洗漱器，下层放筷碗，室内井然有序。在报到的这一天，一直到下午七时，各单位参加会的人员才大都来齐。所以在晚七点钟才开的饭。大家都在广场上就餐，全体人员以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各队又以一二三四组的顺序，对面坐在地上，由炊事员给每队抬来一木桶糜米饭和一大桶大烩菜。即：白菜、山药、豆腐、粉条（以后粉条、豆腐、隔几天才能吃一顿），每人一碗。上至主任下至兵伙，都是一样。饭后各队分别带队回到住地。我们第一队队长为少将刘万春，政治主任为阎又文，他们集合全队，按组排成四方队形，组长站在组前中间，队长、主任站在队形的正中，先由刘万春、阎又文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按组的顺序，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姓名、单位、职级。

继由刘万春介绍了大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各队队长及各组组长、政治主任的姓名。第二队队长为王雷震上校，政治主任为康保安。第三队队长为韩天春上校，政治主任为王明德。第四队队长为傅次曲上校，政治主任为樊福煊。第五队队长为王赞臣上校（后调为一队副队长），政治主任为周先。第六队队长为沈金声中校，政

治主任为张登鳌。我们第一队的队员，全部是由校级和将级军官组成；二、三、四、五队的队员都是由尉级军官（连排长）组成；至于第六队队员是由行政人员组成。在人员分配上，每队的一、二组每组为十三人，三、四组为十五人，全队共为五十六人。

后由政治主任阎又文，宣读了大会须知，大会公约，会场守则，作息时间等规则。最后又由刘万春简单说了几句：要按各项规定办事，严格遵守纪律，坚持及克服各种困难，作各队的表率等语。各队也同样做了这项工作。

### 大会的开幕式

七月一日上午六时半举行大会开幕式。在大席棚（会场）的土台上，悬挂着党旗和国旗，下面挂着孙中山遗像，像下有《总理遗嘱》，（是同遗像印就的一张纸幅）。在支持大席棚的每根木柱上，都张贴着“热烈庆祝抗建会胜利开幕”、“抗战和建国要双管齐下”，“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精诚团结，团结一切力量，发扬民主；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守土抗战，保境安民；爱国家爱人民”。“各阶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以抗战为前驱，以建国为后盾”等各种标语。在台上的墙壁上，贴有

大会开幕仪式单。

与会人员都按着指定座位入场坐下。军乐队排列在台的东侧。司仪人康保安上台，高呼“大会开始、奏乐”。乐止后继呼：主席就位（临时主持大会的主席崔载之上台）。全体肃立（全会场人员都起来立正站好）。唱党歌（全体随军乐队伴奏高唱）。全体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脱帽、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覆帽。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全体循声复诵。俯首静默三分钟（全体原地站着低头不语）。静默毕坐下。主席致开幕词。

### 崔载之致简要的开幕词（内容大意）

首先我们热烈庆祝这个会的胜利召开，并预祝会议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的和取得圆满成功（鼓掌）。关于我们这个会成立的目的和宗旨，想来大家在看到各种规章及标语后也会领会到的。以抗战建国为目标，共同协力同心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要求，使每个与会者成为一个洁己奉法、爱国爱民、在抗战建国阵营中的坚强无比的先驱者。我们这个会，不是拿着书本上课，也不是扛着枪杆出操，而是都要当运筹帷幄的好军师，想办法、出主意。提出与抗战建国有利的各项措施，给抗战建国工作修桥、铺路。实

实际上，这个会就是绞脑汁、用心机的讨论会。这次大会的筹办，我们是作了最大的努力，甚至日以继夜的去筹备务期办好。唯因国难当头，在一切物资条件万分困难下，总算大会顺利的开幕了。但是一切设备是极其简陋的，想来大家对饮食起居有些不适吧，对各项规定认为有些严格吧。关于这些，我想大家都能领会到当前的困难情况。相信是能够克服的，也是有决心和毅力去克服的。坦率地说，这总比战场上好些吧。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并殷切地希望踊跃的向大会贡献出每个人所有的韬略和智慧。

### 傅作义讲话（大意）

今天我们的讨论会正式开始工作了。在当前同日寇拼死拼活，没有一时一刻喘息的时候里，能得到这样的集会，这真是不可多得的良好机会，值得我们鼓舞和庆幸。对于这个会的任务，不要我来解释，相信大家都也有了个初步认识和概念。虽然大家的文化有高有低、思力有快有慢，只要注意力用在这一方面上来，我相信肯定能给大家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来。

譬如，在我们与会的四、五百人员中，只要在会期三十天内，一人能提出一条对抗战建国有利的意见来，就有四百多条，三期就要有一千多

条。如果凭一个人去想，其文化再高，经验再多，脑力再强，即使每天想一条，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两者的效果，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如果我们把这些建议记载下来，不仅成为一册巨著，而且还能成为一部抗战建国的经典著作。

现在，我们集思广议，群策群力，出谋出力，献计献策，共同讨论，精益求精，举凡对军政方面应革应兴的事，要大胆的提，尽量的提，务期达到使坏的变好，好的更好的目的。

我们要知道，抗战建国是一个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的任务。不应着重在一个方面。如果只抗不建，就没有抗战的条件和后援；只建不抗，就没有建国的时间和余地。因此，必须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建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建设我们富强的新中国。

但抗日建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各阶层、各角落，人人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的共同行动。不过团结和联合，又须先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做起，进而才能认定一个目标，达到一致的行动。可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方法和措施。这就是讨论会创办的起因。

凡参加这个会的人员都不分职级，不分文化程度，不分党派，不分畛域，不分新旧，一视同仁，一样待遇。以平等方法共同商讨抗建大计。

为此，要求与会人员不得有鄙视、歧视、打击、讽刺、侮辱等表现，这是至关紧要的一点，望大家铭记于心。会上要发扬民主作风，主官不要认为自己说了算，做得对，部属也不要唯命是从。在我们军事机构里向来没有民主风气，过去以“军队无民主”自嘘，成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实际上这是极端错误的认识，真正的民主是促进上下团结，行动一致的最好办法。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比喻。譬如做工的工人们，大的集体有几千几万人，小的集体也有几十几百人，但他们必须有一个带头的（工头）。工头就是代表这些工人说话办事的，也就是维护工人利益，圆满完成所担任的工程责任的人。对工头的言行的好坏，工人们肯定敢大胆提出意见，工头也能采纳好的意见，改善工作。这就使得整个的工程很好的完成，使得工头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更可使得这个集团得到信誉。以我们来比，我不是什么副长官，什么省府主席，我就是个带工的工头，工人的代表，大家就是工人。如果我们都有一样的认识和看法，我们这个会一定会开好。我们军事、行政以及各单位的工作一定会做出成绩来，进而也就能够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最后，我说一句最重要的话，这就是不要纸



上空谈，要确实拿出实际行动来。结果如何？今后就要看大家的表现和态度。

最后，大会在军乐的悠扬声中，高呼口号，散会。

### 这期大会讨论的情况

当日开幕式举行后，九点半召开讨论大会。当时：有长官部中校参谋靳书科站在台上（他担任会中指点发言人、发言次序的工作），由洗依（共产党人）率领以十三人组成的啦啦队坐在最后排。由监场的（大会主持人）宣布讨论开始，按规定发言。

在这次讨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人就提出来反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讨论会是国民党的会，不是共产党的会，应把共产党人请出去！”有的人还提出“共产党人没有发言权”。还有不少对共产党污蔑、鄙视的发言。这时也有一批人提出有根据，有道理的发言。他们说：国共合作是经蒋委员长正式签字，举世皆知的事情。傅副长官一向对共产党是采取拥护、容纳、和礼遇的态度，同时在这次大会上他也谈到不分界线，不分党派，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外，以及国共闹分裂，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也关乎国家的安危等话，未说完，即受到会场上反共人员的

反驳，使会场秩序陷于混乱。后来崔载之上台，他说，“我以大会政治组组长的立场，向大家讲两点：第一点，国共问题，不是我们所规定的讨论范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做无味争执；第二点，国共合作问题，固然是个大问题，可是放在我们这个会上，是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今天的发言，不论正确与否，都是违犯了大会的规定，不符合大会的要求。我建议应该制止这种发言。全体人员应该通过我这个提议。因发言反对共产党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第六队的行政人员，所以崔的话音未落，而一、二、三、四、五队的人员，都举手站起高喊：“赞成！”“同意”！啦啦队同时也站起高呼：“啦啦啦，啦啦啦，国共两党是一家，谁要分裂就要垮”。一场风波，竟浪费了一个多小时。

在下午的大会上，第六队不再发言了，而只是由二、三、四、五队的人员发言。第二天朝会活动后，本应是袁庆荣组长讲解军事，但临时换成由傅主任讲话。傅作义头一句话就说：“昨天的大会开的不好，发言不对头，有的人不是来开会，而是有意识的来打闷棍，泼凉水，也许我说得厉害点、主观些，可是，我想大家对这种反共的发言也是反对的。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谁有意识搞破坏，但是从发言中就看出他的思想认识距离

抗日建国大业还差得太远。今后大家都要加强认识，要一心一意的在抗日建国工作上致力用心。今后，关于国共方面的问题，可以用书面提交大会，或者在小组会上提，使大家讨论，以期得到正确的结论，千万不能在大会上提，这不仅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而且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是，这个时期傅作义的思想对共产党是靠近的。远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陷落后，傅部退晋西北一带休整时，因接近陕北红区，那时有不少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傅作义安排在部队和地方工作，并待以殊遇。因此，外部人扬言“三十五军变色了”。也是蒋介石对傅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傅到后套后，共产党人来后套的为数更多，其中：已公开身份、众所周知的有：如潘纪文、王一然、鲁志洁、肖离、肖凤、司徒亿塞、王健、李特、刘一山、洗依等；真假莫辨，似是而非的有：崔载之、周北峰、秦丰川、由竹生、康保安、阎又文、王明德等，至于没有暴露身份隐蔽的共产党人更不知有多少。

经详密观察，在抗建会第一期中参加大会的共产党人包括正式的、嫌疑重的，约占全会人数的百分之十。其中在行政队（六队）内，约占全

会人数的十分之八九。

经过傅作义在朝会上的讲话后，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在第六队的小组会上，因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多次辩论，争执，但都被进步人员驳斥得体无完肤，无言以对。有时，当傅作义来参加大会时，国共合作问题也同样的提出，但也同样遭到驳斥。有时还被啦啦队和谴责声给打下去。

在两天的大会发言上，第一队始终没有一个人人员在大会登台发言，于是啦啦队便站起来喊：

“嗨啦啦，嗨啦啦，老大哥队装哑叭”，这样以来，一队长刘万春和政治主任阎又文及副队长王赞臣便受不住了，他们在晚间点名时，讲了些鼓励的话，并和队员们互相表示了态度，谁不争先发言，就要在小组会上谈谈原因。

在第二天上午，当大会上宣布发言时，声音未落，一队长刘万春首先举手站起发言，接着政治主任阎又文、副队长王赞臣，相继作大会发言。然后，一队全队队员们都争先恐后的发言。在这天的两次大会发言上，一队的发言人数占百分之六七十。这时，会场上的“啦啦队”又喊起来，

“嗨啦啦，嗨啦啦，红边黄边说了话”。（因军官都佩带符号，在符号四边印就的红边是将级，黄边是校级，兰边是尉级）。

大会每周的星期一上午，由政治组组长报告上一周的工作情形，内容是：本周发言的人次，每队发言的人数，提出建议若干，有利于抗日建国方面的多少。检举违法犯纪的多少，发言中的优缺点以及大会工作中的优缺点，一周内发生违犯大会规定的人数及处理情形等。同时，袁庆荣也在讲解军事常识的时候，对一周内的全国抗日的战局情形和分析，逐一向学员讲解。

抗建会的第一期由七月一日开始，到二十八日结束，用了四个星期的时间，在二十九日上午，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是按以前的形式举行的。在闭幕式上傅作义讲了话。讲话内容概括如下：

今天我们第一期抗建会闭幕了。虽然这个会是初创，都没有经验，尤其是在一切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创办的，但总的说起来，我们的成绩是有的，当然缺点也是不少，这给第二期打下了基础。

在这四个星期当中，大家都以最大的刻苦精神，克服了在起居饮食上的一切困难，并能自觉的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这是很难得的。

经过这短期的讨论会，我相信大家都会得到教育、启发、体会，在思想上认识上对抗战建国也有了正确认识，加强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

信念。

大家归队后要以身作则地教育部下，并将这次大会的精神向民众、士兵广加宣传，使他们加强抗日必胜的信心，才能都团结起来，打成一片。

大家回去以后，要继续大会的工作，如检举不法、出计献策（建议、密告可以直接送长官部和省政府，两处都设有专办的秘书），坚持大会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发扬大会的精神，使上至高级，下至低级，都要养成这样良好生活、工作习惯，这就能奠定我们抗战建国的好基础。在工作中，必须做到，要使军队中的每一个官兵，把驻防所在地视为第二家乡；行政人员要把自己所在的单位视为自己的家庭。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一定都成为爱国爱民的好军队，好单位了。

今后要求大家都严加约束自己，遵纪守法。我本人也下定决心，严行整饬纪律，并且对犯纪的人，予以重刑。小错也应看做是大错，轻的也要重办，甚至罪不应死，也可处死刑。同时还要认识清楚，以往所谓“法不加尊，法不责众”这是过去封建的说道，现在任何人犯法，都要按法判处，我也不例外。就是一师，几万人犯法也要区分首从加以惩办，不论职位大小，人数多少，只要犯法，就要治罪。我认为俗语说：“王子犯

法，与民同罪”这句话是对的。关于严加整肃纪律，是我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对大家确切希望做到的一件大事，万勿忽视。

当天早七时后，各自整装归队，返回原工作单位。

### 讨论会的尾声

及至开办第二期时，一切情况都比第一期好的多了。违犯规章纪律的少了，会场上的秩序也大有好转，在大会上的发言也没出现过多大偏差。虽然对共产党有时提及，但都是用和缓、委婉的语言谈道理。不过在小组会上，个别小组在提到国共合作问题时，往往发生强烈的争执，争执的结果也是被共产党人驳斥的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情况好转的原因是，在总结第一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第二期开幕时，作了妥善的安排，并严防第一期所发生的事故重演，而得到的成效。

在第二期最后的一周中，蒋介石给傅作义拍来密电，内容是：1，创办抗建会是好的，但不得允许共产党人参加。对已参加者亟应清除。以后无论任何会议及训练机构，均不得使共产党参入。2，对已公开的共产党人员，不得使其任领导工作、并严加监视其活动。对涉嫌重大的应随时注意其言行。今后任用人员时，要切实查明来

历后，再任命之。3，今派张彝鼎为该副长官部政治部中将主任，该部所属职员，须均由该主任查清，再行任用。以后如有调动，应商同该主任处理等语。

傅作义奉电后，以一笑置之，并未着手执行。直到第三期结束后，只是着手将任领导的共产党人或有重嫌的人员稍加变动一下。

第三期着重点在军事方面，会员中，连、排级军官约占全体人数的百分之九十，行政人员约为二三十名，并且把行政队的名称也给取消了。但从第三期开始，在国民党中央的压力下，抗建会的讨论中，反共的言论增多起来，内容已有所改变，反映了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的局面。

但是，抗日建国讨论会，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在统一抗日思想，加强抗日力量，建设傅作义的抗日河套根据地上，以及为以后进行包头、绥西、五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对傅部的影响

董炎炳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傅部的形成：

傅作义原是阎锡山的晋军将领，而非阎之嫡系。一九三一年主政绥远，三六年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攻克百灵庙的重大胜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立即发表贺电，赞誉傅作义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之先声”。随之派南汉宸率代表团来绥慰问，更加激励了傅作义部队抗日将士的卫国情绪。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傅作义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号召下，与八路军在平型关并肩作战。忻口会战进入尾声时，阎锡山调傅部三十五军去守太原城。在敌强我弱的势态下，十一月八日太原陷落，之后，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队开到晋西北地区，一面补充整训，一面不断对日寇作战，在一九三八年

绥南战役后，便落脚到河曲一带。

傅在晋期间，虽归阎锡山统辖，但与阎貌合神离，傅虽为蒋介石器重，但对国民党某些做法不满。阎锡山组织的“铁血同盟会”，要派人到傅部成立分会，傅作义没有接受。二战区按所属部队之战斗序列，以军为单位成立军政干部学校，以王靖国的十九军为干一分校，傅的三十五军为干二分校，傅作义不用干二分校这一名称，而改用“北路军总司令部军政干部学校”，由傅作义专门到各地招收学生。阎派到学校的教官苗平章，专讲阎锡山的所谓“中的方法论”和“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学说，傅作义只让停留在课堂上，不许向外扩散。而对周北峰所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抗日民族十大纲领”以及高映明讲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课程，则不加限制。

傅在山西和八路军合作抗战，结下了战斗友谊。看到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合作、纪律严明、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受启示。傅守太原城时，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傅作义在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傅很受感动。认识到“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

同抗日的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全面抗战是取得抗日最后胜利所必需的”。因而在晋西北整训中他仿效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做法，着手招收爱国青年，培训政工干部。并派周北峰去延安谒见毛主席，在共产党的扶助下，派来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协同傅部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如潘纪文任三十五军政治部组训科长、左青任宣传科长、王庆贞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康保安任一〇一师政治部主任，鲁志浩任二一一旅政治部主任，洗依、李刚、冉子恒等为团级政治主任。同时在八路军管区内的战时动员委员会支援下，给傅作义部队补充了三千兵员，增强了战斗实力。傅作义特意把他的女儿送往延安学习，取经求贤。当时也有傅的部属仿行把子弟送往延安学习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慕名而来，参加了北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到校后第一次听傅作义讲话说：“你们不怕艰险，不远千里而来到抗日前线，为国效劳。我姓傅的没长三头六臂，也不能呼风唤雨，只不过有一颗抗日爱国的决心。愿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誓死抗战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当时学校教育长苏开元，总教官周北峰。课程内容以中共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和唯物史观为中心，其次穿插一些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抗战言

论。其时傅作义的处境是“脚踏三只船”，思想上敬佩共产党，表面上听从阎锡山，背地里沟通蒋介石。正如傅自己所说：“我们是在夹缝里生活着的人”。

一九三八年九月，傅作义以北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召开了“河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副总司令邓宝珊、何柱国、马占山等高级军政人员。会议期间中共派代表团罗贵波、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访问了河曲和傅进行了会谈，傅对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作出了安全保证。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地区性的统战会议。正值会议之际，军统特务包介山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给傅作义的信，要让逮捕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周北峰，傅诱称周是阎长官派来的，确实代表我去过延安，如要处理，须将周送阎锡山处理，把包顶了回去。后将周北峰调任军政干部学校总教官，改派周钧为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到陕西召开武功会议，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恢复绥远省主席职务，指令移师河套组织司令部。翌年二月傅率部进套，脱离了阎锡山的管辖。随傅从晋西北前来的共产党人有潘纪文、鲁志浩等十数人。

##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傅部的体现：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在五原新公中（现永利乡）傅作义召集了各部分主要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人袁庆曾、张遐民、赵仲容、曾厚载、于纯斋等二十余人，共产党人潘纪文、鲁志浩、王一然、武践实、黄剑拓等十余人。这次会议是一次在河套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会议。会上傅作义作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形势报告，并提出“军政民一体，团结一切力量，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要求。

会议采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方法，让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在讨论中以张遐民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大讲实行三民主义，只有服从国民党领导，才能团结一致，取得抗战胜利。以潘纪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据理论述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和抗日救亡十大纲领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只有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经过反复争论，基本上达到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实现团结抗战之目的，这就是“抗战建国讨论会”名称的由来。并确定傅管区党政军民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地参加“抗建讨论会”，这

是傅作义进入河套后，有关全局的一大决策。

“抗建讨论会”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先后在百川堡（今临河市新华镇）正式举办了三期，为河套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一期由于成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以抗日民主的气氛很浓，还可以高唱“国共合作，中华民族不会亡”和边区的抗日救亡歌曲。会上国民党人一发言，便要遭到批驳。有人在发言中说应以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思想认识的准绳，三十五军工兵营长赵寿江站起来说，“我不管你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那怕他是王八主义，只要能打走日本鬼子，就是个好主义”。这话虽然说的粗鲁，但表明了他对抗日高于一切的思想认识。

同年五月，傅作义仿效八路军在晋北组织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在五原旧城举行了“绥远省动员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以五原县为试点，先行组成五原县动员委员会，随之推广到整个河套地区。省动委会由傅作义亲自兼主任委员，任于纯斋为书记长。指派共产党员乔培新为五原县动委会书记，刘进仁为临河县动委会书记，马子诚为安北县动委会书记。就在组建县区乡动委会期间，兰州、宁夏的谣言纷纷，说什么后套已经“赤化了”。为此国民党中央派执行委员苗培成与傅商谈，要清除从事部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建

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军队特别党部和政治部，连红色的三十五军臂章也不许带了。傅作义被迫接受了师旅以上政治部主任由国民党军委政治部派人，团以下的仍由原来傅部之政工人员担任。随即国民党中央委派张彝鼎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苏寿余为副主任等十余人前来陕坝，并联合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派人到百川堡“抗建讨论会”进行活动。“抗建会”讨论、斗争趋于激烈。在一次政治讨论大会上，有一个身穿黑制服的高个子人起来发言，他胡说什么“我看陕北边区就是封建割据，如不取消怎能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呢？”紧接着三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左青发言说：“只有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才有保证。有人企图制造分裂，破坏抗日阵线，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顿时会场上就有十几人站起来要发言，会场一片混乱，主持会议的周钧，一股劲的呼喊，“请坐下！请坐下！”才逐渐恢复了平静。最后傅作义上台讲话说：“边区的存在，如果是蒋委员长允许的，那就不是什么封建割据的问题”。“抗建会”到了第三期以及补课期，基本上都是部队官佐，形成一种军事训练的性质。有人说“抗建会”共举办了五期，这就是把新公中的主要干部会议，和最后的补课，统统算

作“抗建讨论会”的期数之故。

### 三、护送共产党人安全出境

蒋介石把傅作义从阎系拉过来，并不放心，又听到傅进套以后，搞的是“粉红色”的一套，自然要对傅管区加强监督和控制，便派特务头子张庆恩掌握绥远省党务工作。在这种情势逆转下，当初从延安请来的共产党人，就不便再呆下去，尤其已经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傅作义所持的态度是“对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在确保安全的许诺下，礼送回延安；对从延安来的干部（包括未公开身份的党员），抱着愿走则走，愿留者仍予重用；对受到国民党特务加嫌陷害的人士，尽力予以保护”。于是派专人专车负责将在傅部搞统战工作的潘纪文同志安全送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时将“中央”早已加嫌的周北峰同志送往西安找同学顾希平去解脱；第三批送走的共产党员计有洗衣、李刚、左青、左清芳、冉子恒等八人；每人发给路费壹百元，派解德轩、陈化民、边金泉三人，于三九年秋末，以到陕北绥德慰劳三十五军伤兵之名义，送到延安。鲁志浩同志是以去西安看病为由，安全回到延安的。



#### 四、排除蒋介石干扰，建立傅作义自己的干部体系

傅作义在“干部决定一切”的思想支配下，于一九四一年在临河八岱组建“绥干团”，对辖区内的军政民干部进行分期分批的轮训。他虽依附蒋介石，却不愿为蒋所控制，当中央派来卢盖军等数人为各师政治部主任后，傅对蒋就更存有戒心，反对蒋介石控制、渗透、分化、瓦解的斗争，日益明显。所以在长官部政治部的人事安排上，特又指派周钧为秘书长，（原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第一科科长李俊秀是中央派来的，而科员李竭忠、刘乃法、全文斗、任宏远等，则是傅部的政工干员；第二科科长俞伯华是张彝鼎提起来的亲信，科员鲁志浩（因病返回延安）、苗瑞凤（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人）、程文章，第三科科长胡兆峰，科员也配备了傅系干部；总务科科长王景泰，原是三十五军政治部总务组长。

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调配，除中央派到傅部的人员外，均由周钧和长官部人事室统筹安排。凡战区政治部须经傅批示的文件，如没有周秘书长的签署或签注意见，傅作义是不理睬的（这不是规定，也不用口头说明，而是一种默契），

这样就把张彝鼎和苏寿余正副主任架空起来了。笔者呆过的三十一师政治部也是这样，如中央派了卢盖军为少将主任，傅部任郭香山为副主任，第一科科长苗平章，第二科科长边金泉，科员除李嗣为西安干四团分配来的外，其它都是傅系干部。

傅作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干部体系，形成有别于“国统区”的腐败气息，拟定了一个“整体干部办法”，这个“整体干部办法”兼有防护整体，对蒋介石反控制、渗透、分化、瓦解之用意。傅对蒋进行的明争暗斗，叫做“挖墙脚”与“反挖墙脚”。“在整体干部办法”中明确提出的要求是：“四有”“四为”和“四要”其内容为：

“四有”是：有热忱爱国思想，有奋斗牺牲精神，有民主平等作风，有三责任心（国家、整体、职务责任心）。

“四为”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为整体。

“四要”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

总口号是：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

还提出五个一致：即：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这个干部条例的实施，既违背国民党的干部政策和作风，又吸收溶化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注意。后来调来一个党棍叫赵浩然，他到任后的第一个“功绩”就是暗中揭发我有共产党嫌疑，并将我调到副长官部政治部一科当编外科员，实际是在审查我。经我找周钧秘书长，又和康保安联系后，才被调到“绥干团”，脱开罗网。

一九四四年美国组织“对华救济总署”，晋察绥成立分署，傅作义让部内公开推选，张彝鼎已有离开傅部之意，愿意参选，在张落选后，傅却让当选者把分署之职让给张彝鼎为分署署长，乘机把张送走。傅作义唯恐“中央”再派主任来，马上电请“中央”，任命正在重庆“陆大”将校班学习的晋陕绥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董其武接任战区政治部主任。随之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卢盖军（蒋介石派来），因开展工作困难，生活处境不良，经自己要求也调往他处。

“绥干团”是傅作义轮训和培养干部的中心，对来自蒋党的渗透和瓦解，采取了严密防范的措施，如按“中央”规定，绥干团须设立党团组织机构，傅以党团人员不设专职，一律兼办。尽管这样，“中央”也还派了个高级政治教官赵傲时，傅未让他兼任党团职务，而把他放到高教室，专

讲三民主义这一课程。

绥干团训练地方行政干部的训导人员，大都是从部队政工人员中调来的，副教育长兼训导处长康保安（曾在晋西北任师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三青团绥干团分团筹备主任），考核科长董炎炳兼分团筹备处组训股长。傅既防止蒋党特务打进绥干团，又防止他的干部被拉出去，并尽力保护被加嫌陷害的干部。

三青团也是国民党与傅作义争夺的地盘，一九四二年，傅已洞察到绥远三青团支团干事长赵仲容（原为傅所器重而提拔起来的省将级干部）倒向蒋系，一切都秉承“中央”意志行事，引起傅的戒心。为了对赵施加牵制，指派长官部人事室主任王克俊为干事会的书记兼组训组长，他到三青团后任职后，清洗了一些赵的嫡系，把这块青年阵地夺了回来。为了加强三青团的力量便由部队政工人员中，调任县市团务负责人，如将三十一师政治部上校副主任郭香山调为支团干事会宣社组长，三十二师中校团指导员郭秉章调任五原分团筹备主任，骑四军步兵旅中校团指导员刘培荣调任米仓分团筹备主任等。

## 五、傅作义考核干部的办法

傅作义由于长期所处的特殊环境，常常遇到

一些不便言宣的疑难问题，需要给以适当处理。尤其对蒋党“挖墙角”与“反挖墙角”的斗争更是如此。故在经常工作或生活中，他总是先提问题让部属各抒己见，看谁的思想和自己一致，能说到点子上，从而来考核干部。在批阅稿件时，如不合自己心意的，不声不哈，退回去再拟，让部署猜摸自己的意图。例如有这样两则笑话，一是傅接到女儿的来信，让身边的一个少校参谋给写回信，该参谋连拟三次信稿，都未得到傅的签署，自愧的说：“我当少校参谋，连个小孩的信都回不了，看来这碗饭是吃不成了”。他便把行李捆起来，准备第四次再要得不到傅的签署时，就自动辞职。当有同事建议说：“你还是去找周钧秘书长，修改一下为好”。这个参谋找到周钧看了后，只在信稿上填了“代问你妈好”五个字，傅就执笔签署了。二是傅规定所属军官一律不准带家眷，当然他自己也从来不带。有次傅奉令到西安开会，随从副官黄世杰借用傅的名义，电告重庆的傅夫人到西安见面。傅到西安后，不意夫人也到了西安，便问这是什么原因，当知道黄假借自己的名义给夫人去电的，即对黄副官给以责斥，但会毕返回陕坝后，却给黄提升了官职。

傅作义有时交给部属一个任务，不说办法，

而让部属看着办，以考验干部的应变能力。如一九四三年六月，“中央”派人事大员杨司长来河套开会，杨指责傅部是自提口号，自树一帜。说什么你们搞的《军政干部条例》之类的一些办法“中央”都有相当规定，为什么不按“中央”已经有的办法去做呢？会上傅作义不便与杨争论，看了人事室主任王克俊一眼，王即站起来与杨司长申辩，致使杨无言以对。傅才说：“克俊你不要说了嘛。杨司长请原谅！年轻人不会说话，但对工作还很热忱负责，提出的问题可以研究。”而使“中央”的干涉不了了之，无所奏效。傅常以“思想有无联系”来考评干部，凡跟傅多年的得力干部，在傅遇到难于处理的问题时，皆能心领神会，虽冒风险或受斥责，也在所不惜，以表忠诚。这也是傅训练培养“整体干部”的一种做法。经过努力，傅作义排除了蒋介石的干扰，培养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干部队伍，为坚持抗日战争打下了有力的基础。

# 忆包头、绥西、五原抗日三战役

董其武

傅作义先生是驰名中外的抗日名将。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抗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十二年间，他率部对日进行大小战役近三百次。在长城抗战时，我任团长，负责正面阻击日寇西义一师团的战斗任务。以后历任旅长、师长、军长，傅作义部在抗日烽火中的历次战役，我几乎都亲与其役。绥西三战役是傅部抗战中较著名的三个战役。当时我任傅部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师长，我师的作战经过，是我所亲历，能写得较为详尽。其他友军各部，则系我闻知，只能知多少写多少，有待当时亲历者撰文补述。

三战役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至翌年一月的包头战役；一九四〇年一月下旬至二月的绥西战役；同年三月至五月的五原战役。三战役先后历时四月余，三战三捷。

## （一）

### 三战役前，敌我形势及我之战备概况

三战役的胜利都是傅作义先生详细研究了当

时国内外的形势，敌我情况，运用适当的战略战术取得的。是“未战而‘庙算’先胜”，“先胜而后求战”，运筹于帷幄，制敌于机先的胜利。

当时世界形势：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德军侵入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美国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暗中则伙同英国搞“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而日阿部内阁也宣布：“日本帝国致力‘中国事变’的解决，而不介入欧战。”就是用政治手段压服蒋介石投降（其时正唆使汪精卫搞傀儡政权），以吞并灭亡中国。

敌我间形势：一、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欧战又起，敌已感兵力不足。虽然在华南进犯长沙，占领南宁，而在战争全局开始形成战略相持的局面。敌人企图暂时执行保点守线，搜刮物资，以战养战的策略；二、敌人两年来侵略的矛头所指，自以为是所向无敌，渐起了骄傲轻敌情绪，以为我们无力也不敢对他们反击；三、由于日本对美、英搞“东方慕尼黑”存有幻想，国内又引起南进北进争吵，对侵略中国的战略策略，一时有些犹豫莫定；四、更其重要的是，我八路军于一九三八年冬，在大青山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九月间在晋冀边区灵寿、阜平一带围歼敌第八混成旅团水原（少将）部后，接着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又粉碎敌人的“北岳区大扫荡”，击溃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与一一〇师团各一部，第八混成旅团长阿部秀吉亦被击毙，迫使敌在华北各线据点采取守势，一时没有采取行动；五、绥西当面之敌，以小岛藏吉中将为首的骑兵集团司令部驻包头，所属有独立第二混成旅团过村部和骑炮步联队熊川致部等。另有驻萨县的片桐茂骑兵第一旅团，驻固阳的小原一明骑兵十三联队和驻安北的小林一男骑兵第十四联队。此外还有驻乌拉山前后的伪蒙军约五个师。从外表上看对我们说可谓大军压境，咄咄逼人。但实际上是敌士兵不知为何打仗，为谁打仗。潜伏着厌战的暗流。敌军官则骄傲狂妄，认为我无力攻击他们。另一方面为了保点守线，又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先生一刻也没忘记把握时机，主动杀敌。我们听到他常说的一句平凡而力重万钧的话是：“我只有一个心眼，就是打日本！”

傅先生以多年来积累的抗日丰富经验，结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高明抗战理论，形成如下的抗击日本的指导思想：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战略防御转变为战役战术的进攻；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整个战线的内线作战变为一个地区、一个局部的内线作战；三、避免阵地战，运用运动战，机动灵活，在敌人运动中阻击歼

敌；四、对敌之据点，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动，袭入据点，予以歼灭性打击。

傅先生根据他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得出结论是：寻求适当的时间地点，采取适合的战略战术，主动攻击敌人，歼灭敌人的一部或数部，给敌以重大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实践证明，这些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我在傅作义先生的指挥下，历经抗日各战役，深刻地体察到傅先生善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性，无时无刻不在加强战斗力，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

一九三九年初，傅先生率部由山西回到绥西河套地区，在五原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后，便立刻整顿军队，将三十五军补充为三个师，自兼军长，辖一〇一师，我任师长，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三〇二团，团长郭景云，三〇三团，团长王赞臣；新三十一师，孙兰峰任师长，辖九十一团，团长刘景新，九十二团，团长郁传义，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新三十二师，袁庆荣任师长，辖九十四团，团长杨新钊，九十五团，团长张世珍，九十六团，团长黄纯烈。另有军直属的刘春方骑兵团，刘振衡炮兵团，以及由国民兵改编的游击军两个旅，共六个团，为主力部队。此外，属八战区副长官部序列，归傅先

生指挥的还有：中央军门炳岳的骑兵第六军（只有门兼师长的骑七师一个师），原属阎锡山的徐子珍五临警备旅，属宁夏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和骑兵旅（旅长马彦），以及由反正部队改编的一些游杂部队。

部队整顿刚刚就绪，就积极开展训练部队，整饬地方，加强战时动员等一系列的活动。这种活动，主要是利用“抗战建国讨论会”进行的。

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抗建讨论会在百川堡（今临河市新华镇）开始，傅先生亲自主持。军队排级以上，地方乡级以上的干部全部轮流参加。讨论会首先完成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任务是：经过大会报告，小组反复讨论，最后由傅先生总结，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加强建国必成的信念，全军上下树起一个奋斗的总目标。军事方面：傅先生对军事训练，一向是要求极严，极为重视，并有其独到之处。这次训练，在原有的军训团训练的基础上，扩大讨论范围，增加训练内容，通过反复研讨，实施演习和讲评总结，结合以往对日作战的经验，针对日军的战略战术及其长短条件，从实际出发，制订了一套对日伪军作战的新战法。如：机动灵活地在运动中歼击敌人，奇袭、夜袭、围城打援，退出来打进去，掏

心战术，软顶硬打，正顶侧打，甩开各路专打一路等等。这种训练，这套战法的制订，为尔后历次战胜日伪创造了坚实有效的条件。战时动员及地方行政方面：傅先生不但长于治军，而且善于为政。几年来，他在同八路军合作抗日中，懂得了非动员民众全民抗战，就难以取得胜利的道理。他整顿军队后，第二件大事就是仿照中共在晋西北建立动员委员会的办法，在抗建会时就筹组了绥远省战地动员委员会。它是战时动员兼办地方行政工作的机构，分省、县、区、乡四级。通过这个机构，主要做了如下种种战备工作：一、利用各种形式，如戏剧、歌咏、报纸、集会、讲演等作广泛深入的抗日动员宣传；二、与各地驻军政工人员配合进行民众组训工作，如组织空室清野演习、宣传军民合作，组编担架队、救护伤兵医疗队、支前运输队等；三、在全河套地区广泛掀起生产运动。傅先生一向极端关怀和扶持民众生产，尤其是战时的粮食生产。在春天给河套农民发放种籽，令各驻军积极协助扩大春耕，秋天积极帮助秋收。那时，我一〇一师驻在五原一带。我常督促部队大量投入人力、物力，春天修疏渠道，协助农民春耕，秋天帮助农民收割打粮。此外，我们军队自己也开垦荒地，种粮种菜，养猪养鸡。这样，入套的第一年，我们争取到一个好收成。

基本上保证了绥西地区的军粮民食。从下述的三战役中，我们处处可以明显地看到上述战备工作的巨大作用。

以下依次叙述三战役。

## (二)

### 包头战役

包头战役，是变战略防御为战术进攻，利用日军骄傲轻敌，疏忽无备，我出敌不意，突然对敌进行奇袭、强袭成功的战例。

在傅先生整军经武，生聚教训，积极备战，相机攻敌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当前安北、固阳、乌拉山前后，包头、归绥、大同以至张家口的敌军情况基本掌握。诸如上述地区敌军之配备，装备、作战意图，官兵作战意志，情绪等等，并密切注视其变化。

一九三九年九月末敌陷长沙，十一月末又侵占南宁，南线形势吃紧。重庆军事当局为牵制北线敌人调兵南下，命令傅先生出兵袭击乌拉山后大余太一带之敌。傅先生认为袭击该地区之敌起不到牵制华北敌军的作用，只有进攻敌军重点防守的据点包头，方能收此功效。同时，傅先生已清楚掌握了包头的敌情，必须趁此有利机会予敌以沉重打击。乃不计牺牲，自请加重任务，决然

进击包头。傅先生的决心下定之后，乃召集团长以上指挥官，详细地分析检查了敌我情况，听取各部队长的意见，补充修订自己的腹案，制定了进击包头的战略战术方针和各项具体措施。

为了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欺骗敌人，在行动之前，傅先生特命令我一〇一师，以及北起狼山南麓经乌梁素海至西山咀一线与敌对峙之各部队，大举构筑防御工事。日夜锹镐并举，人喧马叫，使敌认为我在冰冻封河之际，赶筑防御工事，只图加强防守，绝无进攻之意。另外，让话剧团、京剧团，前往接近前方的五原等城镇，以慰劳军民，庆祝新年的名义，大张鼓乐，白天锣鼓喧天，夜间灯火通明，造成歌舞升平，毫无军事行动之假象。同时，在这些假象的掩盖下，一方面积极发动民众，作种种支援前线，保卫家乡，共同杀敌的准备。另一方面，傅先生令将大批粮食弹药埋藏在黄河以南一带的沙窝里和乌加河北岸、狼山南麓之间。因为傅先生事前已估计到我攻包头后，敌人很可能向绥西反扑。事前埋藏下大量粮秣弹药，如果敌来攻我，我即可从容应付。正是傅先生走了这一步棋，才能有未来的五原大捷。这是后话。

十二月中旬，总部参谋长下达了命令，我军各部行军序列和作战任务大致是：门炳岳的骑七

师，沿黄河南岸运动，进至平绥铁路萨拉齐至归绥一带，破坏铁路，并相机占领萨拉齐县城，以阻击增援包头之敌；孙兰峰的新三十一师附五临警备旅于霖瑞团及一个山炮营为主攻部队，在新三十三师掩护下，沿乌拉山南麓的包五公路，向包头隐蔽前进，至昆都仑召之线，超越三十二师急进，奔袭包头城。袁庆荣的新三十二师附一个山炮营，出发时为前卫，掩护攻城部队。我的一〇一师为总预备队，沿前山红柳滩隐蔽前进，以一部监视固阳、安北回援包头之敌，发现后进行阻击，就地歼灭。后山有王子修新六旅各部，袭扰日伪军，阻击向包头增援之敌。宁夏三十五师在乌镇一带守备后套。

各部均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行动，沿途严密封锁消息，昼宿夜行，务于二十日前到达指定地点。

我攻城的先头部队孙兰峰师所属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三个团及五临警备旅于霖瑞团，炮二十五团，以急行军速度，于十九日凌晨到达指定位置——包头以北黄草洼附近。这时，傅先生得知门炳岳部于十八日已进抵萨拉齐县以东地带，破坏了萨县至归绥之间的铁路，并与遭遇的伪军一部发生激战。傅先生为争取贯彻预定的作战意图，于是当机立断，紧急命令攻城部队指挥官孙

兰峰率新三十一师及马逢辰旅、于霖瑞团，快速前进，提前于十九日夜开始攻城。孙即命刘景新的九十一团及于霖瑞团为主攻部队，由包头北城墙东西两侧分别登城，安春山的九十三团，向包头城东进展，阻击东来增援之敌，掩护攻城。

安春山的九十三团在进抵包头西北城门时，看到守敌毫未发觉，碉堡工事有的无人把守，有的敌人在熟睡，认为机不可失，立即组织突击队登城。时近冬至，塞北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左右。一弯下弦月，几点寒星，我军战士，冒着呼啸的北风，在微弱的星光下，越过冰冻的城壕，架设云梯，争先爬城。城上只有几名伪蒙军哨兵，发现我军登城，竟与我军搭话：“你们是中国军队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告以城上无日兵守备。九十三团一个营由伪蒙军哨兵引路，迅速全歼守西北门的日兵，打开城门，于霖瑞团冲进城内，在沉睡中的日军，突闻枪炮声，仓促应战。我进城部队有的直指日寇驻包头司令部，有的与敌人小股阻拦部队进行巷战。一时枪炮和喊杀之声响彻夜空。我军士气高昂，人人争先恐后，战斗异常激烈。在分割围歼中，敌军有的被消灭，有的被压缩至敌司令部所在地——原绥西屯垦督办公署大院内。

可惜的是我军后续部队未能大量进入城内，



而驻在城内的日伪军，有日军两个联队、伪蒙军一个师，还有宪兵队、守备队等小部队，得以集结兵力，负隅顽抗，并出动坦克，以强大的火力，阻截我军。我各部战士，英勇奋战，前仆后继，逐室逐巷，浴血争夺，包头爱国居民纷纷送茶饭，指引道路。大部敌人均退至敌司令部大院内，城区大部分为我军占领。

当我军进入城内后，傅先生亲临黄草洼新三十一师攻城指挥部，了解突进城部队的战斗进展情况，并告以东西两方面都有援敌出现。即指示孙兰峰师长，在必要时，要变“攻城打援”为“守城打援”，要求尽快调整和加强入城部队，扩大战果，同时要注视东西两方增援之敌，务以有力部队予以消灭。当时命参谋人员通知新三十二师和一〇一师火速前进增援。

当我师的三〇二团，进至昆都仑召时，与固阳援敌之一部，伪蒙军于振瀛一个团遭遇，三〇二团居高临下，迅速将敌歼灭，俘敌团长于振瀛以下近三百人。

二十一日拂晓前，我师进至包头西北十余里之毛鬼神窑子村时，与大余太和固阳开来的援敌相遇，即占领有利地形，予以阻击，猛烈攻打，歼其大部，一部窜至西北附近，遭我宋海潮所率炮兵伏击，全部予以歼灭。

我师在前进中，虽然全歼两处增援之敌，但也迟滞我向城边靠拢的速度。当我师抵达城边时，黄草洼已为敌攻占，孙兰峰的攻城指挥部撤至北山脚下，敌我双方在黄草洼展开争夺战，该地硝烟弥漫，成为一片火海，我师一部立即投入战斗，并与各部切实取得联络。此际新三十二师亦到达附近，彼此配合，展开攻击。黄草洼战斗，双方损失均为重大。

二十一日晚，傅作义先生知敌增援部队自归绥、大同和张家口等地陆续开来，看到我攻城及打援各部，已取得战果。认为奇袭包头，牵制华北日军的目地已经达到，如继续恋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恐遭惨重损失，乃即下令转移。首先指示掩护攻城部队出城，再命新三十一、三十二师，马逢辰旅、徐子珍及其他部队按预定计划，沿包五南北两条大道，向五原转进。令我师为后卫。

当敌发觉时，我主力部队已西行多时。敌军以大量的战车、汽车尾追。我一〇一师作为后卫部队，采取游击战术，利用大路两旁的丘陵、沙窝、红柳滩和芨芨草丛等有利地形，处处阻击。敌汽车队尾追不及，又沿途挨打不敢深入，自行撤回。我军主力部队于二十四日晨已陆续到达中滩，并分散向五原一带转进。我后卫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亦沿乌拉山南麓西撤。

包头战役经三天四夜鏖战，至此告一段落。

战斗中毙敌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和小原一明大佐以下军官二十余人，歼灭日伪军三千余名，击毁汽车一百数十辆，坦克三辆，炸毁军火库一座，虏获各种武器、军需品甚多。俘伪团长一名及伪军数百名。更主要的是这次战役，我军吸引住晋北、察南及华北大部日寇，不能南下。在战略上看，包头战役的战果是巨大的。这次战役也锻炼了我军官兵。诸如爬城巷战，攻城打援，机动灵活，动作敏捷，在实战中取得不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进城部队，能遵守傅先生事前规定的严格军纪，做到秋毫无犯，军民亲如一家，受到包头居民热情欢迎，积极支援。送水送饭，送子弹、抬伤兵，主动领路，指引敌人驻地，对我军提供了有力的帮助。这次战役也使绥包父老兄弟知道我们没忘记收复失地，并且有力量打击入侵敌寇，激励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这应该说是战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里补叙一下关于包头战役的两项重要情况：

一、我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译稿）上读到的关于包头战役的记载。包头敌酋小岛藏吉为推卸他疏忽备战的罪责，谎说他事先已知道我将攻袭包

头。特于十二月十九日一早亲自送出一支讨伐队迎击我军。小岛回到城里时，却发现他的司令部北面已发生战斗。说我军是化装成老百姓，趁他的讨伐队出城后混进城里去的。这恰恰证明，我确实是在敌人丝毫不曾察觉的情况下袭入包头的。二、当我军完成任务主动撤离时，敌即集结了近万人的步骑炮混合追击部队，但却迟迟未敢迅即追击，只是尾随在我军后面，用零星小部队向我袭扰，而小部队跟了一段路程后，就转头撤回去了。这说明我之奇袭确实打得敌人惊魂丧胆，对我产生畏惧之心。说来还算敌人有运气。原来，当我撤退时，傅先生除命我师担负后卫任务外，另命令几支部队在追兵必经之路两侧布置了口袋阵地以聚歼运动中的追敌。如果敌人不是畏惧而退，而是猛追过来，无疑必将遭受更大的打击。

### (三)

#### 绥西战役

绥西战役是傅先生预定将来犯之敌的主力歼灭于运动之中的计划未遂后，立即变为避开敌之主力，以游击战术，困扰消耗敌人，终于使敌主力不得不撤出绥西，而取得胜利的战例。

包头奇袭，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我撤离时，敌虽立即集结强大的追击部队，却未敢实行

追击。回河套后我官兵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敌已丧胆，不敢再来侵犯，产生轻敌情绪。傅先生认为这种情绪是极错误、危险的。他一面令各部队加强整训备战，一方面亲临各部三番五次给官兵讲话，特别分析当前之敌的详情，断定敌军将乘冬季来犯。必须做好各项准备，随时迎歼来犯之敌。包头敌人之败，即败于骄傲自满，我万万不能蹈敌人的覆辙。

果然，敌人将包头之败视为奇耻大辱。张家口的日本蒙疆驻屯军集团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急得暴跳，象一只受了重伤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咆哮：“一定要扫平河套，全部消灭傅作义军。”他严惩了驻包头日军指挥官小岛等几个高级军官，亲自到归绥、包头布置进犯绥西的军事行动。从察南、晋北及归绥等地调集三万余日伪军，汽车千余辆、坦克数十辆以及大炮飞机，由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指挥，杀气腾腾，随时要向河套地区凶猛反扑。

自包头至后套，南有黄河，北有狼山，中有乌拉山。地理学上说这一地区是平原，但从军事观点来看，这里除了河渠纵横如网的田野外，到处都是高低起伏的沙丘和榛莽丛生的圪旦（丘陵、草滩）。自包头西来只有南北两条道路：一条走乌拉山前，由包头经五原至临河；一条走山

后，经乌不浪口、五原至陕坝。全长七百余华里。

一九四〇年一月末，敌分三路犯我绥西：一路（左翼）由小岛率他的骑兵集团、第二混成旅团及王英的绥西联军，沿黄河两岸大部经西山咀，小部过马七渡口入侵；一路（中部主力）由黑田重德率领其第二十六师团经固阳、大余太，从乌不浪口进犯五原；一路（右翼）由伪蒙骑兵约三个师，经中公旗（今乌拉特中旗）分别进犯两狼山、太阳庙。三路敌军分头并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河套地区。

傅先生判断敌将采取寻求我主力进行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对此作出的应战对策是：以我主力军于有利地区布置预设阵地，诱敌深入，两面夹击，一举将敌主力黑田部歼灭于运动之中，其他各部队将不打自退。万一不能得手，立即改变方式，将我主力隐蔽，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术，阻击困扰，使敌大量消耗，无法立足。具体的布置是：我骑六军军长门炳岳指挥骑七师、骑四师在西山咀、马七渡口阻击敌左翼小岛部队，截断其与入侵各路的会合；以八十一军三十五师坚决阻敌主力黑田部于乌不浪口之外，待我夹击部队布置就绪后，乘黄昏时后撤，以诱敌进入我既设阵地。我三十五军为主力，一〇一师埋伏在乌镇

以东地区；三十一师埋伏在万和长与乌不浪口之间，形成夹击之势，待敌闯入此袋形阵地内，南北两线同时全力猛烈夹击，将敌人歼灭于运动之中。当时我们完全相信这种布置是英明的，依计而行是完全可以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的。但没有预料的情况突然发生了，顷刻之间，形势全非！原来奉命在乌不浪口方面抵御敌人的马腾蛟部，一经敌军猛冲，未作坚强的抵抗，便纷纷撤退下来。此刻，我率一〇一师，孙兰峰率三十一师，正在按计划开向各指定地区设置夹击阵地的行军中。开进途中，蓦然看见马腾蛟部乱哄哄地后撤，接着看到从乌不浪口方面攻入的敌人铺天盖地般压来。遇此突然情况，我向前开进各部，不明就里，有的脱离掌握也在混乱中向后撤退。在此一发千钧之际，我即火速命令一〇一师各部，改变任务，停止前进。一方面掩护友军安全转移，一方面各就所在位置，截击阻挠入侵之敌，但要避免与敌死拚，必要时，应相机转移至有利地区。

我师一部在乌镇以西沙梁地带，与敌先头部队相遇，即展开激战。以密集火力猛射，打退敌数次冲锋，毁敌汽车十余辆，敌尸枕籍，我军亦有伤亡。此际，敌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命令郭景云团长率三〇二团一部掩护，我师主力主动撤

出战斗，向五原以北梅令庙、折桂乡（今什巴圪图乡）一线转移。此时我获悉敌主力向五原突进，我令三〇二团之一部，继续阻敌。亲率三〇三团进入折桂乡圩堡内，依堡野战，阻击敌人。令三〇一团在堡外占领有利地形，与堡内形成犄角之势，攻敌侧背，并掩护三〇二团侧后安全。敌机飞旋上空，发现我军在堡内设防，即施展狂轰滥炸，同时指示炮兵以炮火轰击，妄图在此突破，夺路前进。反复猛攻多次，均被我击退。此时傅先生自电话中指示我要坚持到夜间，方可转移。我即调整部队，除三〇三团仍以圩堡作为依托，从正面反击外，三〇一和三〇二团在堡子外，分左右扇形展开，凭藉沙丘地带，在敌坦克、汽车行驶困难的情况下，以密集火力，三面攻击。敌前进受阻，以步炮结合，向堡子疯狂冲击，一时堡子上空，沙尘飞扬，烟雾迷蒙。我则待敌逼近时，以轻重机枪交叉火力，并杂以手榴弹，密集还击。堡子外两个团，又左右开弓，予以杀伤，威胁敌侧。敌猛扑几次，均被我打退，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冬天的太阳，很快就沉落到西方地平线下。黄昏时刻，我先命将伤兵运输后方。夜色渐浓，敌人炮声稀疏。我即通知堡子外两个团，除留小部机动兵力掩护外，与堡内三〇二团，按预定序



列，撤往百川堡一带，休整待命。折桂乡战斗，比乌镇阻击战尤为激烈。堡子外开阔地上，横七竖八躺着敌人尸体。是役毙敌约二百余人。我军亦付出不小代价。三〇二团王赞臣团长受伤，连排长牺牲数人，士兵伤亡一百余人。敌人夜间不敢行动，将坦克、汽车围成一圈，聚集在圈内，汽车灯四下照射，以防袭击。翌晨，敌发现我军转移，即向五原方面搜索前进。因被我几次伏击，损失惨重，行动极为谨慎，走走停停，至下午方到五原。夜色沉沉，我监视敌人的小分队，折回追赶部队，归还建制。我一〇一师在百川堡附近宿营一日，即越过冰冻的乌加河，进入狼山湾休整。

北线进犯的日寇，侵占乌不浪口后，分兵两路，一路为我一〇一师在乌镇、折桂乡阻击；另一路沿乌加河北岸进犯，行至黑石虎、三女店及刘存福圪旦之间，遭我预伏该地芨芨草滩中的新三十一师伏击，敌猝不及防，损失甚重，待其调整队伍反攻时，新三十一师在一人多高的芨芨草丛的隐蔽下，徐徐撤至万和长地区。二月二日下午，该敌搜索前进，到达万和长，新三十一师又与该敌展开激战，打了三个小时，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我方猛攻，均未得逞。暮色降临，新三十一师撤出战斗，进入狼山南麓。

南线进犯之敌，自包头出动，由前山行进，在蓆亥滩、马七渡口、杨高明圪旦等地，被我骑六军之骑七师连续阻击，战斗亦甚激烈，双方互有损失。骑七师达到迟滞敌人前进的目的后，沿黄河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边缘，向西转移。

二月二日黄昏，沿包五公路前进之敌一部，在四牛头圪旦一带，被我隐伏该地的新三十二师伏击，敌仓促应战，遭我杀伤颇多。入夜，新三十二师袁庆荣师长，下令脱离战斗西撤。

自一月底，日寇从包头出发，分数路进犯，沿途连续遭我各部伏击、阻击，付出惨重代价，于二月三日侵入五原。

我各部按傅先生的部署，于阻击、伏袭战中，大量杀伤敌人，达到预期战果后，除中央军的骑六军撤至伊克昭盟的桃力民，宁夏部队的第三十五师和马彦骑兵旅，顺狼山脚下转撤宁夏外，其他各部均按计划分别转移至北面的乌加河北、狼山南麓地区；南面的黄河以南的沙丘地带和河套腹地，相机歼敌。

当时各部所在地，大致为：我一〇一师于折桂乡之战后，转入狼山湾，嗣即移至临河东北丰济渠以西地区；新三十一师于万和长之战后，转到乌加河北岸大树泉，又移至狼山乡附近；新三十二师于四牛头圪旦之战后，转到陕坝以北的贾

来旺圪旦；王子修的新六旅移至万和长附近；五临警备旅在蛮会附近；绥远游击军在米仓头道桥左近地区。傅作义将军的指挥部在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北缘的圣纳格尔庙，由刘春方的骑兵团随从警卫。以上为绥西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简况。

二月三日，日寇侵入五原后，企图捕捉消灭我军主力，继续分南北两路进犯临河、陕坝。上旬，侵入该两城镇。由于我方空室清野工作做得比较彻底，南北两条公路边，渺无人烟，陕坝、临河的人口牲畜都疏散、隐蔽，埋藏了粮食、财物，填埋了水井。敌人连个打问道路的人也找不到。在敌人长驱直入中，南北两路到处遇到我军小部队阻截，未捕捉到我军主力，却自以为得计，日本指挥官黑田中将大肆宣扬：皇军进占五、临、陕坝，绥远全省完全为日军占领，傅作义军已全军覆没，傅作义已远逃重庆。绥远、张家口及平津的敌方报纸，亦交相吹捧“皇军”的“战绩”。五原的几个民族败类更是逢迎倍至，伪称打探确实：傅作义残部已逃往宁夏。黑田乐不可支，在五原开会欢庆，并令全喜亭等组织汉奸维持会、委大汉奸王英为“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负责维持绥西治安，巩固伪政权。

这时，傅先生向各部传达指示，大意为：敌军已深入，战线延长，补给困难。侵套日军均自

察绥、雁北各地调集而来，后方空虚，定不能久留绥西。敌意在速战速决，企图消灭我军主力，巩固其绥包据点。据此，我军应采取灵活机动、分区游击的方式，以小部队监视敌人的动向，袭扰其运输线，消灭其分散据点驻军，以消耗敌人，疲惫敌人，造成敌人补给困难，处处挨打被动，欲守不易，欲走难行。各部应齐心协力，密切联系，避不利，找胜利，积小胜为大胜，坚定必胜信念，并为此必胜信念创造良好条件，保持旺盛斗志，想方设法打击敌人，保存实力，为驱逐入侵之敌，收复失地积蓄力量。各部接受指示后，大为鼓舞，先后在南北公路上，百川堡、头道桥、黄羊木头及临河、陕坝外围据点，进行袭击，给敌造成重大损失。

黑田以我主力已经溃败，虽有零星部队袭扰，不足为患，短期内绝对无力反攻。从平绥线、同蒲线调集的大量兵员，已无必要长此滞留，急需回防。二月下旬，黑田乃率主力逐次撤离绥西，分别回驻原防。仅留日军约两个联队，六个战斗力不强的伪蒙师，大汉奸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宪兵、警备队以及特务机关等，总兵力约一万五、六千人，据守后套。司令部及日军坐镇五原，汉奸队、伪蒙军分置于临河、陕坝及五原外围。同时组织伪政权，巩固其占领地区，企图

长久盘踞。

傅先生侦知上述情况后，即令袁庆荣率新三十二师同时反攻临河、陕坝，令各部紧密配合。当时，估计进攻这两个城镇，总要费些力气的，然而事实确是出乎意料。新三十二师向该两城镇推进，临河守敌刚一接火，便全部撤出，伪蒙骑兵师沿五临公路向东逃窜。陕坝之敌孤悬后套最西部，见临河伪军撤离，更感孤立。当我新三十一师进抵陕坝以南园子渠口时，敌骑即向五原方向遁去。我军仅截断其尾部数十骑。临、陕守敌均为伪蒙军，除少数伪军头目外，绝大多数士兵均不愿为日寇卖命。所以，我新三十二师向临、陕进军，守敌一触即逃，我军便收复了临河、陕坝两地。

日军为了避免挨打的局面，缩短战线，将六个伪蒙师分驻于丰济渠以东地区，巩固五原外围。我军于克复临、陕两城镇后，集结兵力于丰济渠以西地区，双方形成隔渠对峙态势。

这时，我率一〇一师移驻丰济渠以西一带。新三十一师驻临河以东阿善附近地区。新三十二师进驻百川堡以南地区。绥远游击军驻三道桥附近。五临警备旅驻蛮会附近，新六旅驻狼山以北地区。傅先生的指挥部由圣纳格尔庙移驻临河东北之亚麻来。

至此，绥西战役告一段落。绥西战役的全过程，是许多次中小型战斗的积累。我军在乌不浪口、乌镇、折桂乡、三女店，黑石虎、万和长、蓓亥滩、马七渡口，杨高明圪旦、铁匠圪旦、黄羊木头、临河、陕坝、阿善及南北公路线上，阻击伏击和袭扰敌人，发生上百次战斗。其中，有些战斗可以说是恶战或苦斗。每次战斗均予敌以杀伤，最后克复了临河县城和陕坝市，将敌逐至丰济渠以东。整个战役共毙伤敌二千一百余人，摧毁敌汽车百余辆，坦克五辆，战马三百余匹及各种武器若干。总的说来，这次战役是贯彻了傅先生“积小胜，为大胜”“避不利，找胜利”的原则的。

绥西战役经过情况，略如上述。这里我觉得还有必要综合起来说几句。侵绥西之敌气势汹汹，扬言要“膺惩傅作义”，“彻底消灭傅作义军”。战争的结果表明，敌人绝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它又吃了败仗。敌酋黑田等一再叫嚷，傅作义军已全军覆没，傅作义已逃往重庆。敌人公之于世的《战史》也记载下“傅作义指挥的军队……向宁夏、伊盟方面逃走了”。这说明敌人在自欺欺人，也说明它承认了跟它打过长期交道的对手，确实是个很难对付的对手，是个可怕的对

## (四)

### 五原战役

五原大捷是傅作义先生的抗战必胜信心的胜利；是他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不计任何艰难险阻，不计任何牺牲，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的胜利；是他唤起民众，军民合作，共同杀敌的胜利。

记述五原战役应该从亚麻来会议开始。为了研讨攻取五原的策略，傅先生在指挥部驻地亚麻来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指挥部的参谋长鲁英麟、张濯清、参谋处长张副元和几位作战参谋外，计有我、孙兰峰师长、袁庆荣师长、绥远游击军司令马秉仁、马逢辰旅长、五临警备旅徐子珍旅长、新六旅王子修旅长、各团长郭景云、王建业、宋海潮、安春山、刘景新、郁传义、李思温、曹子谦，黄纯烈、杨新钊、张世珍、刘春方、刘振衡等人。

亚麻来是临河县东北沙窝中的一个村落，距我一〇一师的驻地五、六十里。二月二十五日我接到开会通知后，即转告郭景云、王建业两位团长。翌日上午，我同两团长及随行人员十余骑，向亚麻来驰去。这时节令虽然过了雨水，但是祖国北疆，仍是寒风凛冽，气温一般还在零下十几度。我们越过黑褐色的田野，灰黄色的沙丘

和仍然结着冰的渠道，这时我想若不是日本鬼子入侵，该是老乡们迎接大忙的春耕季节了。然而此时我们在马上极目四望，却看不到炊烟，也看不到人影。我作为一个军人，身负守土保民之责，看到这种景象，心情是很沉重的。

我们大约奔驰了两个多小时，便到了亚麻来。迎头碰上副官处长王子余，他告诉我傅先生刚吃过午饭，我便直接去见他。一个多月没见面，他消瘦了，但两眼仍炯炯有神，面色黑红，身穿着草绿色棉军装，袖头和膝盖打了补丁，和士兵穿的一样的黑布棉鞋也缝了包头，但是衣着非常整洁。他双手握着腰间的小皮带在屋中踱步，那种镇定自若的风度，一如既往。我向他敬礼问候，并提到在乌镇战斗中，未能使马腾蛟部顶住黑田，过早撤退，我师仓促应战，仗没有打好，请求处分的话。傅说：这些在会上谈吧，你们先去吃午饭。我退出来找到王子余，他招待我们吃了糜米饭和羊肉煮山药蛋。在当时这真是一顿丰盛的美餐。

晚饭后，会议开始。傅先生首先作了总结并带有启示性的谈话。他说：包头和绥西两战都取得了胜利。在包头这一锤头，着着实实地楔疼了敌人。绥西战役，在夹击歼敌的计划未遂后，立即采取分区游击的办法，也消耗疲惫了敌人，打



掉它那种气势汹汹的气焰，粉碎了它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我们对群众发动得好，这些都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主要是有的不完全按照计划办事，未能坚决完成所负的任务；有的不顾全局，只凭自己，一小部分的一时一地的情况去行动；也有的敌情观念不强，消息不灵，行动迟缓，坐失战机等等。在总的指挥方面也有不少的失误。如在包头战役中，令骑七师破坏铁路坚决阻敌的任务，未按计划完成而过早撤退；绥西战役中，令八十一军三十五师坚决阻击黑田部队，竟然与敌人一经接触即行后退，致使形势突变，一时陷于混乱被动。这都应说是总的指挥方面“知彼不知己”的错误。讲到这里，傅先生沉默了片刻，用深沉的目光巡视着与会的人员，以沉重语调说：这里必须给大家讲明白，我们目前的困难相当严重，处境异常艰险复杂，与前两次战役大大不同。一、绥西初战，因未按计划执行，情势逆转，造成一时的混乱后退，大大挫伤士气。个别指挥官，竟然潜回后方，这是我部以前极少有的不良行径；二、包头战役，尤其绥西战役第一阶段损失很大，各部大大减员，未得到补充，而且一时又无得到补充的希望；三、攻包头前，虽然埋藏了一些粮秣弹药，但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而且近期没有得到后方补给的可能

性；四、更令人伤心的是蒋先生不知出于什么谋略，竟来电报让我们向后方撤退。接不接受这样的命令呢？这都使我难于处理。其实，这些情况，我不讲，大家也是清楚的。今天开会主要是检查以往两战役的失败与成功的经验，制定今后的行动计划。并认真考虑，对待以上讲的种种困难，如何战胜它。经过严肃缜密的分析后，再决定这仗打不打，不打怎么办，打又怎么办。大家要从实际出发，认真想想，怎么想的怎么说，这是关系到咱们怎样生存下去的问题，是关系到如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问题。都要严肃负责，好好想想。

与会的人在摇曳的烛光下，静静地倾听傅先生的讲话。有一段时间，室内的气氛象是结成了冰块似的。但到傅先生话一说完，冰块融解了，气氛随之生动活跃起来，群情激昂展开争论。总的来说，意见大致归纳为三种：一个是立刻就打，一个是休整一个时候再打。前者的理由是黑田主动撤走，趁热打铁，与日寇决一死战，一举攻克五原。后者的理由是两个战役之后，部队减员太大，损失很重，部队应有个喘息机会，进行休整补充，部队充实以后再打。第三、对撤退的电令决不执行。

大家的争论，丰富完善了傅先生胸有成竹的

腹案。他很有信心地表示：“我是下定了决心要打的，就是剩下一兵一卒，我也决不离开绥西一步。我决不能离开这块大地和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十几万民众。我们部队有着世人尽知的抗日光荣历史，相信大家也都十分珍爱这个历史。我是军人，抗日救亡是我的神圣职责，我将不计任何牺牲坚决完成我的职责。”他接着说：“仗一定要打，但不做好准备，立刻就打，是没有几成把握的；如休整时间过长，恐将失去战机，也不行”。傅先生作出决定：要利用短时间休整，在休整中进行技术练兵，补充弹药，充分发动群众作好战时配合。在此同时，作出妥善的反攻五原的作战方案。一个月内反攻五原。

为了整肃军纪，当时决定，对作战不力的马秉仁和刘景新送交军法处处理，其它一些人也受到批评、处分，我也受到停职留任的处分。

夜深了，在烛光闪映下，与会的人没有一个面有倦容的。最后，傅先生把技术练兵的要点，作了详细的讲解。拂晓时分，会议结束。大家冒着清晨的寒风，分别赶回驻地。

亚麻来会议后，士气振奋，各部以反攻五原为目标，积极展开技术练兵，进行夜战、巷战、爆破、防空等等训练和演习。各部竭尽所能解决士兵生活问题，从米仓、杭锦旗等地购来大批猪

羊菜蔬改善伙食，将埋藏在沙窝中的粮食弹药挖出来，从宁夏石咀山仓库，运来各种军需品和被服，补充各部需要。政工干部会同动委会人员，深入各乡动员群众，帮助做侦察敌情，运送弹药粮秣，抬运伤兵等工作。为了加强战斗力，减少层次，将各作战单位降低一级，将师编为团。团编为营，……。

经过整训，在作战方法和战斗本领上，都大为提高，官兵勇气倍增，斗志昂扬。在此期间，傅先生和指挥部的幕僚，轮流到各部视察，亲到连队观看演习，具体指导。并在连队与士兵一起吃饭交谈，发现问题，立即作出指示，命各部队长及时纠正和办理。

三月初，傅先生找我和孙兰峰，袁庆荣几位师长到指挥部，由参谋长鲁英麟和参谋处长张副元将拟定的反攻五原的作战方案，拿出来共同研讨。参谋长对敌人兵力部署先作了介绍，他大致说：据侦察，五原城里的日本兵只有一个步兵联队和炮兵中队，另有日本驻五原特务机关桑原中佐指挥的两个中队，再加上宪兵队，特务队，汽车队和警备队，这几部分战斗力较强，武器也好，是我们攻击的主要对手。此外便是伪蒙军六个师，汉奸王英的伪绥西联军和由雁北、察南调来的守备队。日伪全部兵力约一万五、六千人。

敌人的指挥部和桑原特务机关设在城内原屯堡办事处和平市官钱局，周围许多院落打通联成一片，用铁丝网围成一个坚固的防御圈，沿周围构筑工事、碉堡、架设鹿寨，主力部队均在圈内，防守严密。伪蒙军除了一个师在城内义和渠以西守备外，均分驻在五原以西、丰济渠以东，北起梅令庙，南至蛮可素一线的重要据点里。王英的伪绥西联军在五原新城及其附近。义和渠穿五原城而过，日军主力在渠东，伪蒙军在渠西。参谋长又把我军兵力也交了底。他说：前两战役，我军减员很大。目前我们的兵力，不算门炳岳，马腾蛟两部，数量上与敌人差不多，但是我们的官兵已经整训，战斗意志，精神力量胜敌十倍。所以从总的力量对比上看，这个仗有把握打赢。而且主动权操在我手，如果我们在作战计划上，多动些脑筋，想得周到些，可以说稳操胜券。问题是如何有效地阻止援兵问题。我们估计日军的援兵到来，快则两天，慢则三日，所以分兵阻援是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傅先生插话说：根据多年经验和历年资料，黄河在春分前后一两天内，一定开河解冻流凌，冰汛流凌期间，大约要七、八天，船只不通，人马难行，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在五原东北乌拉壕，挖渠放水泛滥，淹没南北两条大路，到时泥泞翻

浆，敌军人马汽车均无法行进，失去机械化的作用，使其逃窜无路，束手就歼，我们要设法利用春分开河这一时机，这是天时。利用乌加河天堑是地利。而且作战地区地理环境，地形地物，我们都了如指掌，这也是地利。再说，我军民团结，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特别是敌人是侵略者，我们是被侵略者，正义在我方，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均在我方。这都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所以，这个仗非打胜不可。

参谋长将反攻五原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加以简要说明。作战方针是：一、我以主力部队攻击盘踞五原城之日军主力。方法是编组突击队用掏心战术猛然插入敌心脏，我主力部队，随之蜂拥冲进城内，歼击敌人；二、其他部队，各按其任务，对付五原外围各部敌人，里外一齐动手，全面开花，分头歼击各处之伪蒙军；三、在克复五原前，有效地阻止敌援军于乌加河之彼岸是致胜的先决条件。阻敌之部队，务必不计任何牺牲，完成任务。兵力布置是：暂规定三月二十日发起总攻。令退到伊克昭盟腹地桃力民的门炳岳骑七师开回临河德和泉以南地区待命，开始总攻时，进攻五原以西新公中之伪蒙第八师，使该敌不能回援五原。令退到宁夏石咀山之马腾蛟三十五师，开回后套，接替丰济渠南北一线之一〇一师

和新三十二师防务，守备丰济渠以西地区。新三十一师的安春山团，绥远游击军的曹子谦团和五临警备旅的阎萝云营为主，从各部挑选勇敢精壮、有作战经验的官兵五百人，组成主攻突击队，确切侦察敌情，做好一切准备，三月二十日迂回五原东南方向，突进城内，猛攻敌指挥系统。孙兰峰率新三十一师另外两团，附五临警备旅及山炮营为主攻部队，自新城西关攻入城内，同突击队合力围攻敌指挥部；袁庆荣的新三十二师，进五原旧城及其附近据点。绥远游击军及游击部队安华亭新五旅进至西山咀、马七渡口一带，阻止援敌逃窜。李国栋部在五原以南南茅庵一带潜伏，发动五原总攻时，即向蛮可素、郝镜桥伪蒙军进行攻击，歼敌后转为追击部队。石玉山部进攻义和渠口以西南牛惧之敌，歼敌后转为追击部队，堵截五原逃敌。一〇一师为机动部队，负责于乌加河一线阻止敌援军的重要任务。该师先派一个团歼灭乌加河二财主圪旦守桥之伪蒙军，并破坏乌加河桥梁，于河岸监视援敌。在攻击五原开始后，全师开往乌加河一线力阻援敌。克复五原前不得放过敌援军。各部均于三月十五日开始隐蔽行动，十九日到达各自攻击准备位置，二十日开始总攻，届时总指挥部前移五原附近以西地区。

参谋长报告完，傅先生征询我们的意见。孙

师长说：“只要使来援之敌，三天过不了乌加河，我师和突击队保证歼灭五原之敌”。傅先生看看我，我说：“三月二十三日前，我们师，绝不让援敌一兵一卒渡过乌加河”。傅先生说：“好吧，你们各自去做好准备吧，相信你们都不会辜负国家民族之重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各部分别行动，三月十九日各自到达预定地点。突击队于二十日秘密向五原运动，黄昏时行至距城里之十大股庙附近，尖兵排捕捉驻该地伪蒙军一名，得到敌人的口令。突击排又分成若干小队，乘暮色苍茫时际，齐头并进。尖兵排到达五原东城门口时，见有两名日军、四名伪军站岗，敌人喊问口令，我尖兵答对口令走到跟前，飞起刺刀，刺死两名日军，捉住伪军，当即占领城门。我各小队象一把把钢刀插入城内。有如神兵自天而降，勇猛袭击。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轰鸣。酣睡中的敌人，仓惶应战，激战至深夜，天主堂、耶稣堂、五原小学、皮毛作坊、直鲁豫会馆以及敌人粮食库、弹药库等重要据点先后被我军占领。天破晓，敌机飞临上空，低空盘旋，因双方交战，犬牙交错，敌机分辨不清，未敢大量投弹，丢了一些炸弹却炸了敌守备队。至此，义和渠以东地区日伪军大部被歼。残敌纷纷逃集在日寇指挥部所在地——原屯垦办事处及平市官钱



局两据点。凭借其坚固工事和优势装备，负隅顽抗，死守待援。虽经我反复冲杀，由晨至午，迄未攻克。傅先生闻报后，即令新三十一师副师长王雷震，率师部预备队令狐狸营驰援突击队，务期于敌援到达前，攻占敌司令部，并肃清残敌。王副师长奉命后，迅即率部驰往义和渠东，与我其他各部合力围攻。王副师长见敌司令部防御工事坚固，围墙高厚，四周建有碉堡，围墙与碉堡上下皆有观察孔及枪眼，火力配备严密。敌兵居高临下，我军一切行动，均难逃脱其视野，轻武器既难奏效，火药爆破又难接敌，以致屡攻不克。

王副师长遂与代营长令狐狸、连长孙英年研究攻坚方法。孙英年建议用山炮平射，摧毁敌之墙堡工事，然后一举歼敌。王副师长采纳了这个建议。二十一日晚，孙英年会同炮兵连长杨跃康，乘夜幕笼罩，穿屋越脊，在距敌百十公尺的义和渠西岸，利用坝坡遮掩，安置炮位。王副师长命我已攻入之部队在围墙东南方向佯攻，以转移敌注意力。午夜，信号升空，立即开炮，炮弹连珠般轰击，敌司令部周围，火光冲天，墙倒屋塌，敌兵大乱，四处逃避。此时，孙兰峰率领新三十一师主力亦赶来。炮火摧毁敌垒后，我各部乘势冲进围圈，敌人四散逃亡中，被我士兵用手榴弹、刺刀、机枪、大量杀伤。水川伊夫中将，

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及伪绥西联军中将司令王英，在混乱中乘隙逃窜城外。敌司令部被彻底摧毁，敌军完全崩溃。各据点伪军，各自奔窜。三月二十二日，五原新城全部为我收复。

袁庆荣新三十二师在三月二十日深夜进攻五原旧城，前后补红及广盛西等处伪蒙军，遇到顽强抵御。一场恶战，双方伤亡均重。袁师长负伤，营长赵寿江及连长张步清阵亡，营长杨廷璧胳膊打断，赵寿江营仅余官兵七名，仍奋战到底，战况极为惨烈。我得报告，即派三〇一团驰援广盛西，守敌见我援兵到来，接战不久，即行溃散。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五原旧城全部为我克复。

我师三〇二团在乌加河畔力阻援敌，战况极为艰苦。攻城开始后，傅先生命我立刻率三〇一、三〇三团增援三〇二团，阻击援敌。来援之敌的主力为：驻包头之小岛骑兵集团，驻萨县黑田第二十六师团之一部和固阳、安北等地之警备队。敌增援先头部队于二十一日下午乘车百余辆，由包头开至万和长，为我新六旅迎击，至夜，我新六旅撤至北山。敌人到达乌加河，桥梁已毁，不能过河，企图强行架设浮桥。我担任沿河击敌的三〇二团，立即向敌展开猛烈攻击，以炽盛火力，阻敌架桥。该敌不能过河救援五原之敌，焦急万分，于是集中炮火，轮番攻击。适于

此时，我率三〇一、三〇三团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我命各团构成交叉火力网，并以炮火射击，该敌退至折桂乡乌拉壕以北地区，拉长阵地，与我隔河炮战。此时敌援兵源源自东开来，麇集于乌加河及乌拉壕北岸窄长地区，为河所阻，不能前进。该敌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不顾一切，以数十门炮火，疯狂轰击我三〇一团阵地，天空有十余架飞机，配合轰炸，攻势猛烈异常。我方阵地，硝烟弥漫，弹雨如注。三〇一团官兵浴血抗击，伤亡极重。团长王建业负伤，营长马增波、连长郝宝瑞阵亡。但我军士气旺盛，继续还击。敌倾全力，凭借强烈炮火，掩护步兵以橡皮船渡河向三〇三团侧背攻击，宋海潮团长身中三弹，重伤倒地。我师已与敌激烈战斗三昼夜，敌之攻势益加凶猛。此时五原新旧两城已全部克复，傅先生认为我师阻援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继续与增援之敌胶着血战，已无必要，遂下令我师撤离战斗，我主力部队即向西转移。

敌人慌慌张张重入五原时，伪维持会汉奸全喜亭、刘子俊、杜风山等人，已被我处决，陈尸渠畔，居民逃避一空，五原新旧两城镇，均成一片废墟。该敌只寻得敌尸数百具，连夜泼洒汽油，堆积焚化。城外我游击部队各部，不断袭击，敌人惊恐万状，不敢继续停留，乃携敌骨灰，循原

路退返包头。

自五原逃出之水川中将、日本特务机关桑原中佐及随行的警务官池田浜崎、特务人员内久保作等百余人，逃至乌梁素海之西岸，前有我游击部队阻截，后有我骑兵部队追剿，于刘家窑子附近，残敌大部为我捕杀，或淹死于乌梁素海中。于水川、桑原等日寇官佐，均于此就死。汉奸王英逃至西山咀，守备该地之新五旅安华亭，原为王英部下，一九三六年百灵庙大捷时，向我反正。安竟将王英放走。事后，傅先生将安华亭交军法处查办。

在战斗过程中，绥西民众同仇敌忾，多方支援军队，在敌人溃逃时纷纷捕捉逃敌，缴夺武器及各种物品，交给我军。有日兵六人逃至五原城东三十余里的老乡王大老虎家中。王与其弟王二老虎杀鸡热酒，假意款待，乘日兵醉卧时，盗出枪支，协同邻人用菜刀铁锹，将日兵全部砍死，割下首级装入麻袋连同枪支一并送到我师部。我接见了这两位兄弟，表示钦佩和感谢，并将这一事迹呈报指挥部，傅先生对他们大为嘉奖。再有百川堡附近小脚老太太刘大娘，发动该乡妇女抬运伤兵，送水送饭。我三〇三团团长宋海潮在乌加河阵地，连中三弹，大肠外露，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以为已死。我师转移时，因情况紧急，亦未

能掩埋。后为老乡刘大宽、郭四毛旦发现其未死，即抬回村内治疗护养，得以再生。在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我绥西军民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令我感动不已。

五原战役我军取得巨大胜利，全军振奋，举国欢欣。报刊称之为“五原大捷”。在这次五原歼灭战中，共击毙击伤日寇水川伊夫中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及其特务人员、伪蒙军顾问中岛少佐、警务指导官内久保作、特务官员池田浜崎以及尉官以上的警务官，到五原勘矿的技术官员等三百余人，日兵一千一百余人。毙伤伪蒙军三千余人。生俘日寇指挥官观行宽夫、警务指导官浅沼庆太郎、西田信一等五十余人，俘虏伪蒙军（包括邬青云部赵城璧团投城伪军）共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各种火炮三十余门，汽车五十余辆，轻重机枪五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枝，毒气筒一千余个、电台一部、橡皮艇及其他军用物资。击坏焚毁敌之武器装备等尤不可胜数。

我方也付出重大代价。团长贾世海、营长赵寿江、阎萝云、冯增波及连排长三十余人均为国捐躯。负伤者更多，仅我一〇一师三个团长全部负伤，宋海潮团长重伤。此外，师长袁庆荣、团长安春山、营长杨廷璧等均中弹负伤。我官兵亦

有重大伤亡。

我军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四〇年四月，历经包头、绥西和五原三大战役，连续苦战一百多天，大量减员，伤亡之众，代价之大，为我军抗战以来所仅有。但敌方损失较我更巨。日寇在三个战役中伤亡四千六百余人，伪蒙军八个师中三个师被歼灭，五个师溃不成军，特别是日本皇族水川中将被击毙，这是继八路军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涞源击毙所谓“名将之花”的日酋阿部规秀中将后，仅仅四个月，被击毙的第二个中将，日本朝野为之哗然，敌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内部也引起互相攻讦。

战后复员工作大致就绪后，在陕坝隆重举行慰劳军民庆功大会。伤愈归来的官兵，作战有功的官兵和抗日爱国民众的代表等参加了大会，为他们演戏、发给奖状、奖金、奖品。傅先生在会上讲了话。他高度赞扬了五原战役中爱国军民，齐心协力，歼灭日寇的英勇事迹。最后他说：

“这次胜利，并不单单是绥西军民的胜利，而是全中国的胜利，全民族的胜利，我们要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以必胜信念，坚持抗日到底，保卫国家，收复失地，把日寇全部逐出我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五)

综述三战役简要经过如上。我从中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一、战胜日寇的原动力是傅先生的抗日决心和爱国赤诚。我认为从五原大捷后，傅先生向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恳辞勋奖的电文中，即可得到充分的证明。五原收复后，国民党政府特电嘉奖。认为五原之捷“不仅保障西北，而且奠定收复失土，驱逐敌寇之基础。在抗战全局上，关键尤为重要，功业彪炳，殊堪矜式。特颁给傅长官作义最荣誉之青天白日的勋章”。而傅先生驰电恳辞，以谦逊之词，表坚贞之志。陈所部杀敌致胜之由来，献争取最后胜利之良谋。其电文云：

“委员长钧鉴：谨呈者，窃以五原战役，猥蒙钧电特予优奖，感愧交加。旋复奉到中央明令，特授青天白日勋章，军次闻命，益增惶悚。即拟电陈国民政府，恳请收回成命，又恐有违服从命令之大义，致未敢有所表白，夙夜徬徨，终难缄默，惟有披沥诚悃，陈请国民政府，准如所请。伏念国家赏勋，所以奖有功者。故有功者，始克当之。而作义自省，则徒多罪戾，并无寸功。计自神圣抗战以来，作义奉命转战千里，经时两三

年，并未能规复失土，驱逐敌寇，上无以报国家，下无以对民众，徒以钧座之仁恕，不罪既往，而责以继续奋战。用是感激图报，不敢怠荒。固百死之不辞，仍寸功之未建。最近仅克五原一据点，而去收复归绥尚远。此作义不敷领受者之一也。作义最悲痛者，即作义本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多年以来，仰赖国家之威灵，并蒙钧座之指导，汉蒙翕悦，全境谧安。凡我各界同胞，无不拥护三民主义，愿为卫国守边而奋斗。然而归绥危急之时，作义方于役晋北，不能与绥民共其患难。及失陷以后，又无以速复失土，以出同胞于敌寇蹂躏之中。我忠勇官兵，牺牲流血，而未能成其志；我爱国民众，日望大军来归，而无以慰其心。每念及此，诚悲愤填膺，顷刻不能内安。今政府不罪其失绥省，反而赏其克五原，岂不愧死作义乎？此作义不敷领受者二也。抑作义近年训练官兵，尝标举一口号，凡作战荣誉，必归于全军，不容为个人所有。作义个人身兼文武要职，受国家之厚养，当此危急存亡之时，任何劳苦，岂足言功，一切牺牲，何非本分？故所部倘有微功，亦应以荣誉归属全体官兵，断不可为作义个人所有。伏查所部官兵，连年转战，实极辛苦，塞上荒漠，冬尤苦寒，运输给养，皆为不易。官兵全体既恪遵钧座伟大之训导，踊跃奋



发，甘受一切穷困劳苦，以与暴敌相周旋。战斗意志愈久愈强；作战技术，愈穷愈进。士兵等在今日，已绝不畏敌人飞机坦克车等威胁，并可用各种方法，以摧毁敌人摩托化之工具。至于临难不苟之精神，勇敢杀敌之意气，则殊多可歌可泣之事实。作义亲行列，必须为之表扬。近蒙钧座赏授五原战役之赵寿江营以荣誉旗，作义谨当领受，以宣达钧座之德意。更激励全军为国效死之决心。然此荣誉之纪念，加诸全军官兵则甚公，施诸作义个人则可愧。况作义目下恤死救伤之不暇，又岂能恬然取全军官兵饥寒苦斗，血汗得来之荣誉，而佩带胸前据为己有乎？此作义不敢领受者之三也。再就抗战全局而论，作义亦期期以为不可。作义自省，个人才识不够，现蒙钧座奖拔，畀以重寄，实已位过其才。其所竞惕自持，勉图效命者，不过竭尽愚悃，不畏困苦，服从天职，勤以奋扬。凡此区区，并无以副我钧座教诲期许之厚。而回顾三年以来，我国家动员数百万人，战斗区域延长数万余里，北起津沽，南尽琼崖，西连湘桂鄂豫，其间大小战役数千百次，我全国袍泽，皆在钧座指挥领导之下，为卫国而抗战。其中阵亡者几何人，伤废者几何人，此皆忠良有功，有待国家恤赏。而各义民奋斗杀敌，各项抗战工作人员之勤劳助战，尚不计焉。而我

国各高级将领，又皆殚精竭虑，为国宣劳，事多挫敌建功之记录。只以战局方在演进之中，故或即胜而不能竟其功，或即克而不久其守，然此皆长期抗战中，当然之现象。原不能以过渡之成败，为国家稽勋之根据。何况战役有大小，时地有参差，而各战区又相互关连，不能仅论一时一地之得失。往往有牺牲自己以救友军，或放弃甲地以全乙地。是以作义以为国家论功行赏，必在抗战胜利之后，至于中间作战过程中，唯望钧座严厉执行国家纪律，使各军勉尽其任务。对于一时一地之战功，片言奖励即足矣。至于国家最高荣誉，则必待失地尽复，抗战终了之日，从容稽核，以授全战役中之勋劳最大者。作义伏念所担负战区前线任务，固与各将领相等，但当前敌人则更非最大之部队，绥西在全国战局，亦非主要战场。作义率偏师以击局部之敌兵，虽克复据点，暂纾西北之忧，然究之何足为经大战而建奇功？此而竟加以最荣誉之勋章，更何以扬殉国先烈之英名？今作义领受不应得之荣誉，在个人则自愧滥叨非分，亦无以劝真正建殊勋于国者之情。此作义不敢领受者四也。作义最后愿为钧座陈述者，作义连年塞上作战，孤陋寡闻，罔知大事。惟以其局部作战经验而论，已证实日寇力量日衰，我胜利日近，故望钧座更严赏罚之标准，

励全军之士气，即乘此积极准备，求贯彻最后胜利，并确立国军不拔之基。回顾抗战初期，敌人攻势实极猛烈，其战斗意志亦强，故我攻据点难，得俘虏难，近时情形则大异矣。敌军作战已不必瞄准，惟浪费子弹以为恫吓。敌军官在初期不易说降，近则势穷作俘，甚感得惠。读此次五原所俘数十军官之供状，莫不痛陈彼邦人民之困苦，政治之紧迫。而于钧座此次电令以重奖抢救俘虏之大仁大慈，则又莫不感我国家民族道德之崇高，因而更悟彼邦侵略之谬误。总之，敌军正在发生内溃之过程，我军官兵战斗意志之消长，其比例恰成相反。因此最后胜利之到来，已成必然之趋势，自今以往，首在配备适当，兵力敷用之条件下，胜属当然，败者可耻。故我袍泽将以达到任务为免罪，更岂可目一时一地之小胜为有功？此作义不敢领受者五也。以上所述，全出乎作义之至诚，而不敷衍呈国民政府。且论军人，必须服从钧座命令，论党员必须请求钧座指导，故掬诚缕述，上渎钧听。敬祈钧座代请收回成命，尚待抗战胜利全国奏凯之日。果使彼时作义有微劳足录，则愿与全体袍泽共同领受我政府之恩赏。至于今日，则实不敢拜领。区区愚诚，伏希鉴察。临呈不胜悚惶待命之至。”电文殷切致意当局，要真心抗战，坚持抗战到底，不可有贰志

他意。奖有功，罚有过，不论亲疏，不分畛域，乃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每读此电文，深感：必有此真精神，方有此大功业；惟有此真血性，方有此好文章。其文实如其人。

二、任何艰难险阻，动摇不了傅先生抵抗侵略救国救民的一片忠心。五原战役的经过，就是证明。五原之役和前两次战役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傅先生战胜内部出现的种种艰难险阻而取得胜利的。首先，在绥西战役第一阶段，我军未能按原定计划阻击、围歼来犯的敌之主力，致情势突然逆转，我军一时陷于混乱，相当一部分人员失去控制，个别的中级指挥官竟逃往后方，大大动摇了军心士气。其次，在第二阶段的战役中，运用傅先生制定的计划，无数次截击歼击大量消灭敌人，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我方亦受到重大的损失。各部均大量减员，一个师的军力只能相当于一个团。在反攻五原时，能拿到第一线作战的主力只八千子弟了！再次，三战役前，虽经按傅先生的指示，在黄河南岸沙丘地带和乌加河北岸、狼山南麓之间埋藏下粮秣军火，但数量不丰。经过两三个月的消耗，补给已感到颇大的困难。可举简单的一例：当敌狼奔豕突于河套地区时，总指挥部由黄河北向南转移中，正是大年除夕，夜间行军于沙滩中，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只能用牛

糞烤烧饼当作除夕的晚餐。更使人伤脑筋的是：军事最高当局可能误信了日寇的宣传，以为傅部已溃不成军，无力再战了。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竟给傅先生打来电报，要傅先生去兰州代理八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部队另指派专人指挥，撤至宁夏境内补充整顿。这无疑是难中之难，险中之险。但是所有这些都，都被傅先生的不计任何牺牲，坚决抗日救亡的大无畏精神战胜了。

三、三战役的军事成就实属辉煌，其政治意义尤为重大。三战役敌人都投上了很大的赌注。结果是，它三战三败，败得很惨。我三战三胜，不但战果辉煌，而且打垮了敌人的精神意志。敌人宣扬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驻蒙疆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无可奈何地说：“由于傅作义的善政”，想要“去占领和确保五原是不量力的”。日军投降后，在绥远地区的受降仪式上，日军根本博少将的代表说了如下的一段话。他说：“傅作义将军是中国的一位英雄伟大人物，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部队是中国抗日部队中最好的部队。如果中国的指挥官和部队，都象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队那样，日本军就早被打出中国了。”这说明，冈部、根本博之类的侵华老手的“日本军人魂”，都被傅先生打得魂飞天外了。

自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长沙、南宁先后被敌攻占后，国民党部队的全部战线上，不是败逃就是处于守势。而军政最高人物，甚至对所谓“政治解决”抱有幻想。正是在这个时间里，傅作义先生领导我们在祖国的西北边陲，在风沙冰雪中浴血杀敌，和敌人恶战苦斗了一百多个昼夜，肃清了全部入侵河套之敌，收复了五原，敌人惊魂丧胆，我军中外扬威。大长了我们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从而展示了日本法西斯侵华的非正义战争必败，而我们的反侵略正义战争必胜的前景，大大鼓舞了我们抗敌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从某种意义上也制止了对敌谋取妥协的暗流。其政治意义和影响是极其深远巨大的。

四、功勋应归之于英雄的战士，英勇的人民。三战役中出现的许许多多英勇壮烈事迹，英雄人物是人们永远景仰歌颂的。在包头战役中，当我奇袭部队秘密运动至包头西城门外时，城上的伪蒙军哨兵发现我军，不但不开枪，却接应登城，引路歼敌，将城门大开，使我军主力部队迅速冲入包头城。在包头城内的搏斗中，有的伪警察给我军引路，送情报；有的同胞给我军送茶送饭，救护伤兵。特别是，当我军从包头城撤出时，城内火神庙（按：应是娘娘庙）有我七名战士未能及时撤出。他们孤军奋战，绝不降服，直

到弹尽援绝，爆炸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包围他们的敌人同归于尽。由于这七位壮士的孤军死守，使敌人直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未敢对我撤出的部队进行追击。

绥西战役时，大量日伪军在我河套地区到处冲撞，我主力隐蔽在有利地区，相机击敌。这使通讯联系，粮秣供应发生了困难。当地的很多同胞有的作通讯联系，有的报告敌情，有的提供军粮。我三十一师的约七个连的部队，驻在乌加河岸边的苗得雨圪旦，正值一九四〇年的春节。村民苗得雨老汉执意要请我全部官兵吃饺子过大年。苗老汉拿出三千多斤牛羊肉，几千斤白面。我们全部官兵美美地吃了三天。当我军向他表示谢意时，他说：“我不给咱们队伍吃了去打日本，留着等日本人吃了打中国人吗？”几句朴素的语言，包含着多么高贵的精神啊！战役后，傅先生指示按规定如数偿还苗老汉粮食和肉。在后来的庆功大会上，给苗老汉带上光荣的大红花。

在克复五原的战斗中，可歌可泣的事迹就更多了。兹略举数事。在反攻五原的战斗中，新三十一师的赵寿江营，攻敌据点，战况极其惨烈。赵营长及张步清连长壮烈牺牲，全营只剩下七名官兵，仍然坚持战斗，后援军赶到，终将守敌击溃。

我一〇一师在乌加河桥坚强阻敌的战斗中，四个团长都受了伤，其中三〇三团团团长宋海潮重伤倒地，我当地农民发现后，救护治疗，方得起死回生，所以后来宋海潮更名“再生”。前面说过的农民王大老虎兄弟的英勇杀敌，小脚老太太刘大娘，发动妇女，抬伤兵送茶饭，许多老乡捕杀散逃之敌，以及其他协助我军的事迹不胜枚举。

我于今天回顾四十五年前的这些英雄壮烈事迹，犹历历在目，敬仰追慕之情难已。长城抗战后，曾在大青山前修建抗日烈士陵园，五原战役后也在五原东郊建立抗日阵亡将士莹墓。前年，内蒙古自治区已将大青山前陵园重行修复，并辟为长城公园，以供人瞻仰。闻五原的抗日阵亡将士莹墓亦将重修，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英勇的将士，英雄的人民，你们的抗日功勋，永垂青史，千古流芳！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 我所经历的包头、绥西、五原战役

鲁乐山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傅作义将军在绥西指挥部积极组织抗战。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对日军（包括伪军、伪蒙军）连续打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正规战役。一是包头战役，二是绥西战役，三是克复五原战役。当时我在傅部三十五军新三十二师第九十四团任少校营长，三次战役都曾亲身参加。如今，虽时逾四十余载，仍记忆犹新。现仅就记忆所及，将这三次战役经过概述如下，供编史者参考。如有舛误，望乞斧正。

## 一、进攻包头战役

1939年12月21日，时值冬季头九，塞北地区已是冰天雪地。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自二战区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地区，率部转移到绥西河套五原一带。只经过半年时间的整训，便

亲自督率所部三十五军、炮二十五团、骑七师、新六旅等部队，兵分两路，神速向包头进发。部队越过退水渠和冰封的乌加河，经过西山咀、大余太，迅速占领了包头西北的昆都仑召、前口子、白彦花等地。根据敌情判断，傅将军下达了进攻包头的作战部署。其要旨是：骑七师进击包头以东地区，担任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和阻击敌援部队之任务；新三十一师并配属一个山炮营，五临警备旅一团，为攻城部队，指定以该师安春山的九十三团为突击队，师指挥所率预备队两个团，位置设在包头城北黄草洼；新三十二师集结于昆都仑前口子与包头城西北弓胡同，随时与后口子东北白彦花的新六旅取得联系，担任截击由固阳、黑教堂来援包的敌伪军，掩护军主力左侧背的安全。傅作义的指挥所率军直部队与一〇一师为总预备队，位于包头城西西脑包、麻池镇地区。

对我军敢于进攻包头之事，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所以，攻击刚开始，战斗进展是很顺利的。那时，我已由孙兰峰部调到袁庆荣的新三十二师，仍任营长。我营位于前口子附近，担任阻击援敌、掩护军主力左侧背安全的任务。

遵照傅副长官的命令，孙兰峰师长任攻城指挥官，具体部署攻城战斗。以九十三团团长为攻

城突击队长，命令该团从包头西门和西北门突入城内，居高临下，实行“掏心战法”，直捣守城之敌腹部。安春山团长亲自率领该团第一营（营长邢绍俭）由西门突入城内，向东急进，敌始发觉。第二营亦由西北门突入南下，沿大街两侧和敌人展开了剧烈的逐屋巷战。接着命令第三营（预备队）紧跟入城，加入战斗。城外炮火支援有力，战斗继续顺利推进，很快进攻到包头城中心的财神庙街，占据了财神庙为据点。

这时，包头市商会会长董其昌（包头市最大的皮毛货栈“广恒西”经理），着人动员商民，以大量热粥、焙子、麻花、香烟、糖果等，前来慰劳攻城将士，盛况感人。商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一·二八”松沪抗战以来所罕见。

战斗打响了，我接到了团长杨新钊转来的袁庆荣师长的命令，率第一营从前口子进入昆都仑沟，出后口子以北，和白彦花王子修的新六旅取得了联系。而后，返回前口子，向东急进，到弓胡同附近，向袁庆荣师长报告了与新六旅联系的情况。袁师长命令我营，仍立即返回前口子，阻击从后山固阳、黑教堂回援包头的敌人。我营当即以急行军的速度回返，于翌日拂晓抵达前口子。立即向昆都仑前口子北大路口设置了加强排哨，严密警戒，并给各连分配了驻地。

天色渐亮，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大地。此时营部炊事员为我送来了早餐。我正欲吃饭，又觉得不放心，便放下饭碗，戴着黄棉军帽，穿着缀狗皮袖头的黄棉军服和白茬无面皮裤，不绑裹腿，少校营长级胸章缝在棉服左上口袋里边，外露“中国人可以死，不能当亡国奴”字样的符号，腰间着“五分子”手枪，带着营部号目李得安出去视察。这时，天气晴朗，举目远望，只见地形起伏，有如叠嶂。我意识到，根据地形情况，有必要对各连的防地进行调整。于是，命令李得安传副营长陈孝和各连连长速来集合。我向各连连长讲了当前地形特点和敌情判断，并重新给各连分配了防地和任务，并命令立即行动，不得迟延。

我指示副营长陈孝和号目李得安回营部吃早饭。然而，我因为任务压力大，还需对地形和敌情，作进一步的了解，乃只身缓步向前走去。我低着头，边走边思考情况，行到距营部二百来米处，抬头一看，蓦然发现前方百余米处，出现了日军先头部队百余人。其中有一人手持“红膏药”旗，向我左右摇摆。他们均身佩战刀、步枪、“王八”手枪，另外还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少数带队者手持望远镜，不时向我瞭望。队前持太阳旗者，周围持步枪者，都上了刺刀，向

我快步走来。突然遭此险情，使我无暇考虑，只好置生死于度外，硬着头皮，提高腿原地踏步，装着向前走的样子，一面高呼营部房顶上的哨兵。谁知哨兵宋连仲已经面朝天沉睡在房上！幸亏一连连长蔡玉庆和该连不少士兵听见了我的呼喊，爬上院墙看到这一情况。我知道副营长陈孝和一连连长会来应付这个情况，便放心大胆地佯装着普通士兵的样子向敌人走去，与敌人行见面敬礼，并假意握手寒暄。在这危急关头，陈孝副营长、号目李得安和连长蔡玉庆突然来到了我身后。想不到陈副营长是那样打扮：头戴日伪军皮军帽，身着灰色布面皮大衣，戴着一副漂亮的带框水晶眼镜，手提山西造11米厘口径冲锋枪，神气十足、大摇大摆地越我而前，与敌人打招呼周旋起来。号目李得安在我身后揪衣示意，我乘机离开现场，脱险回到营部。我一面部署各连面向二百余敌人实行包围，一面等待陈副营长等三人安全返回。不大一会儿，蔡连长和号目两人回来了，陈副营长却被敌人纠缠难以脱身。此时，我迅速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部署，但考虑陈副营长的安全，没有立即进攻。此时，见傅长官部副官处副处长黄世杰，带领着傅的前线指挥所各处人员从我处经过，准备进包头城，显然已知道了我攻城部队已进入包头的胜利消息。我营面

对二三百顽敌，业已处于恶战之境。我特请傅长官部医务处长杜勤书（字敬之，日本帝大医学院毕业，精通日语）代写一封日语信，劝说敌人山野放下武器，向我缴械投降。信由杜亲自送去，并要敌人派军使到中间地带谈判。经过一个多小时周旋，终因敌人受武士道精神教育，宁死不降。我令人喊口号，并用手示意陈副营长迅速脱离敌人，跑步离开险地一段，卧倒在死角内。我当即下令，用猛烈火力向该敌展开攻击战斗。敌人很快被围歼，只有少数敌人占据独立家屋顽抗。

时已入夜，月明如昼，敌暗我明，不易接近，拟待明月西沉，再行攻歼。不料到清晨三时许，忽然接到傅长官电令，令我营向后转进。歼残敌似在垂手之间，怎忍撤离？正迟疑间，我一连郭尚山排长报告说，傅副长官已从包头前线退下来了，向昆都仑召方向转进。几乎与此同时，傅长官部少校参谋李元补亲自来转达傅的命令，令我立即率营向昆都仑召撤退。我率营退到昆都仑召附近后，将残敌未能全歼的情况向傅作了报告。傅又叫骑兵连少校连长刘春方转告我，不该撤退，要我仍率营回前线消灭残敌。然而，时间已来不及了，太阳已经升起，敌机多架分批沿包西公路对我军进行侦炸。我只好派出一个排占领

了昆都仑河东面高地，掩护并收容军主力向西安全撤退。当时我得知傅率其指挥所人员和小部队已离开昆都仑召庙，经哈叶胡同、西公旗王府（营盘）等地，向公庙子以西转进，并见军主力各部已基本西退完毕，即率营沿乌拉山南麓公路，西撤至三湖河马营长地，暂停待命。

此役我营官兵伤亡不多，三连长张禄臣阵亡，机枪连长苏华亭负伤。我营俘获的枪支弹药很多。被我击毙的敌官兵内，有敌酋小林一男大（中）佐（前安北特务机关长）。十二月末，我营移驻西山咀附近卧羊台财生沟，在这里过的新年。

包头战役结束后，包头城内敌特务机关长兼司令小岛，指使宪兵队将爱国人士、包头商会会长董其昌以勾结傅军进攻包头抓捕，略一审讯，就将董倒装在麻袋里，外裹帆布，捆绑紧扔在二里半黄河冰窟里，终于死未见尸。

新年刚过，傅副长官在扒子补隆（原新安镇）集合部队讲话。讲话中对我营在前口子战斗大加奖励，但也指出我打仗时有些心软，乃妇人之仁。说打仗应以胜利为第一，不能怕牺牲（指我过于顾虑陈孝副营长的安全），以致贻误攻击时机。对我这点过失，傅还特拟《手令》一条，颁发全军官兵学习借鉴。

傅副长官讲话后，我又和安春山团一营营长邢绍俭接触，据邢营长所谈及目击麻池一带我军主力撤退情况，我才对这次包头之役，之所以未竟全功而败于幸成的原因，有所了解。其主要原因是门炳岳的骑七师等部，执行破坏包东铁、公路和阻击援敌的任务很不得力。据邢绍俭说：“此次进攻包头战役，行军用了五天到达包头附近，乘夜暗部署攻城，第二天拂晓前攻入城内，与敌激战二十四个多小时。因为从东面援包的敌人源源不断，一下车，就开赴城北对我孙师主力展开攻击，使我攻城部队腹背受敌，虽苦战一昼夜多，终成被动。我团于翌日拂晓忍痛撤出城外，向师主力后方转进。原占领财神庙的一个排，因敌人火力封锁未能撤出来，与敌人死战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无一受俘者。安春山团长在黄草洼西北附近对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令人闻之恻然。

另外，据邢绍俭对我说：“我营一连排长刘一平、司务长邢增福自西门入城，到财神庙附近与敌遭遇，邢增福被敌俘去，后来邢增福在撤退的路上（藉亥滩小召附近）归队，他报告说，敌小岛司令将他放回，并赠银洋十元，当即被安春山团长用日本战刀砍死于地，团指导员许某曾劝阻无效。安团第二营攻入包头西北门，首先斩



关夺门而入城的是五连赵惠民排长和他的全排士兵。”

## 二、绥西战役

1940年元月初，我营由财生沟移驻乌梁素海北四柜村休整。

傅副长官判断，包头敌人可能向我军进行报复打击，下令各部队构筑冰冻工事，注意随时应战。但是，鉴于敌强我弱，天时、地利皆不利于我，而便于敌人的汽车化部队和骑兵快速驰驱，横冲直闯，指示各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或游击战。要求适当分散成小单位，避开公路正面及两旁开阔地，利用偏僻村镇作隐蔽，随时出发，侧击、突击、震击敌人。夜间则多对敌人实行骚扰，小型突击。总之，因为我军刚从包头撤退下来，疲惫之余，尚未整补，决不能打硬战、正规战。各级指挥员应机警灵活，善于独断，捕捉战机，打击敌人。务必避不利和不作无谓牺牲，以保持我军的战斗锐气和活力。我理解傅长官指示之意，旨在只要我军善于和敌人在河套地区周旋，不被打出去，不被消灭掉，在这块有米粮、有鱼肉、襟山带水的富饶之地能站住脚，就有转败为胜的前途。

情况不出傅长官所料。刚进入二月初，腊月

二十三这天，包头敌军经过一个月的调配之后，其主力乘千余辆大卡车，于大余太向乌镇直扑而来。首先与原驻乌镇的宁夏马鸿宾部马全良师接触，该师见势不妙，次日即向后方溃退。接着，敌人有力的先头部队，经过三女店，向西直犯万和长、炭忽烈的我守军新三十一师。炮火连天，撼山震岳，激战四个多昼夜后，新三十一师即告不支，向后溃退。该师九十一团团团长刘景新，对部队失掉掌握，竟与该师副师长王雷震，违背傅长官意图，不思收容集结所部，只带贴身警卫三、二名，一口气逃遁到四百余里外的宁夏石咀山隐蔽起来。敌主力先头部队经乌镇向西南进犯，目标直指战略大据点一一五原。

腊月二十九日，新三十二师奉命向乌加河北折桂乡地区驰援。是日正值大雪纷飞，我营奉命于下午二时许以急行军速度向折桂乡开进。刚一到达该地，立即和敌人接火。站在乌加河岸，举目望去，河貌尽收眼底。只见敌人乘着汽车，挥舞着太阳旗和战刀，端持着上刺刀的步枪、轻机枪，沿冰封的乌加河和两岸冻硬的平地，毫无顾忌地向西急驶而来。令人叹惜的是其他部队根本未向行进中的敌人进行有力的侧击和伏击，敌人才如入无人之境。我营独当一面之敌。敌人越来越多，战斗愈来愈激烈。全营官兵占领住宅区西

端正面平坦开阔地，和敌人相持战斗。天气寒冷异常，脚手皆冻，但不能稍事活动，直到黄昏后约八时许，接到上级向后转移的命令。此时，官兵冻伤者很多，行走成了问题。大家虽然疼痛难忍，因在夜间敌前秘密行动，也不敢哼出声来。离开敌人稍远些了，官兵们仍然步履维艰，行动非常迟缓。辗转行走了两天两夜，停停走走，才走出二百来里路，腊月三十晚上，到达铁李盖图正式宿营。战士们吃好了饭，一躺下就进入了睡乡。

子时一过，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正当老乡们从炕上爬起来烧香、磕头、接神之际，忽然接到报告：伪蒙军第八、九两师骑兵师（虽然骑枪不足一千五、但较有战斗力，纪律也最坏）从东西两乌盖口窜来，配属着张吉祥的炮兵队，边发炮，边向我师主力正面猛扑。接着，敌我两方机关枪、步枪、迫击炮、手榴弹，一齐开火，战斗相当激烈，我营奉命增援前线。敌人被击溃后，向原来的方向狼狈逃去。

与此同时，进占五原的日军汽车化主力部队，继续兵分两路向西猛冲急进，希图迅速捕歼我军的有生力量。然而，我军各级军官已领会了傅长官预先下达的指示意图，不约而同地主动让开了公路大道和平坦开阔地，并有意及时放弃

了临河、百川堡、永安堡、陕坝、黄羊木头、三盛公等村镇大据点，而撤至边缘隐蔽的小村落，相机袭击敌人。傅长官则率其指挥所人员和直属小部队，从碱柜、临河跨过冰冻的黄河，进入了伊盟沙窝子里。敌人到了临河、陕坝一带，扑了个空，毫无战果，惶惑懊丧之余，则认为我军一蹶不振，毫无战斗力可言了。于是，掉头收兵于五原一带，以五原为基地，打算久占后套，作经营开发之计。仅留少数日军和大量技术人员，以李守信的伪蒙古军主力和王英的伪军据守五原一带，日军汽车部队主力撤回了包头。

此役我军伤亡不大，比敌伪军轻得多。唯我营官兵冻伤甚多，仅转送三盛公天主教会医院和战地军医院的重伤患者，就为数不少。我营韩副官竟因冻伤特重致死。我本人亦手足俱被冻伤，两手指好长时间不能自己扣扣子。

绥西战役时间不短。傅长官部参谋处后来汇编有《绥西战役战斗详报》，可供参照。

### 三、克复五原战役

1940年二、三月间，绥西战役结束不久，傅副长官由伊盟沙窝子移驻临河县境内，督飭各部队积极整训。我营由陕坝北新堂附近转移到郟家地以北的五份子桥西各小村庄，投入了紧张的

整训。由于接连两次冬季战役，全军损失较重，缺员甚多，而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整编结果，我全营战斗人数尚不足一个连，三十五军的三个小师，可以继续战斗的仅三千人左右。其他部队，如五临警备旅、新五、六旅、新骑三、四两师，原来编制就小，缺员多，概未补充过。比较正规的骑七师，也缺员甚多，战斗力还不如三十五军。但是，傅副长官早已腹案在胸，决心已下，决计利用三月二十一日“春分”大小河渠解冻季节，不失时机地对盘据五原之敌实行反攻，收复这一战略要点，并驱敌于整个河套境外。

首先，为了“惩前毖后”，傅下令将在绥西战役中，从五原炭忽烈战地擅自脱离部队，远遁后方的新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上校团长刘景新（尽管他年资最深，抗战以来多有战功）予以逮捕，交军法处法办。其次，在临河县某地“前进指挥所”召集全军团长以上部队长开作战会议。据新三十二师九十四团杨新钊团长开会回来传达，大致可知作战会议的情况。傅首先致开会词，对敌我两军态势作了说明。他说，千余日军和大量伪军、伪蒙军盘据五原，控制河套东部广大地区，实行开发经营工矿农牧业的长久计划，实现其“以军治军”、“以战养战”的企图。五原已是敌人坚强而巩固的大桥头堡。我军仅局于套西一

隅之地，四面无路，已被“置之死地”了。面对现实，我军应采取什么对策，才能打开局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首先起立发言：我认为在决定如何办之前，我们大家——包括长官在内，先应当明确一个根本问题。我国以弱敌强，虽然是长期抗战，但总得干，总得打仗，决不能混与干一个样，打与不打一个样。如果是混，我愿意撂挑子，请长假，回老家；如果要干，要坚持继续抗战，就必须严整军纪，分清是非。必须公而忘私，国而忘身，决不能鱼目混珠，当南郭先生。大家应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发扬正气，消灭邪气，发挥我军攻必克，守必固的战斗威力，才能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如果长官和大家都认为应当这样，我愿仍如既往，自报奋勇，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安团长慷慨激昂的发言，顿使全场气氛严肃紧张起来，沉寂片刻之后，大家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安团长的发言。最后，傅副长官作了总结发言，特别指出安团长的话是切中实际的。他郑重地对大家说，我们必须明确抉择，必须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这条正确的道路。目前，盘据五原一带的敌人，是对我们危害最大的敌人，必须很快将他们消灭掉。他指示大家赶快返回防地，加紧整

训部队，做好一切战备工作，等候反攻命令，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奋勇向前，完成各自担负的任务。

作战会议之后，傅副长官还轻骑简从巡回各部队驻地，了解查看整训战备情况，并分别集合各团营官兵，进行战斗动员。傅的讲话要旨是，把我军现实处境告诉给全体官兵，要求官兵们以“破釜沉舟”、有我无敌的磅礴气概，勇往直前，一举克复五原，驱敌于河套境外。唯此才有生路，才能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

对克复五原之役，傅长官在周密部署的同时，一再严令各部队，协同县、区、乡各级党政部门，严密封锁消息，人员只许入，不许出。部队调转或利用晨昏大雾，或在暗夜。白天单人或几人行动，皆利用伪装隐蔽，严防敌机侦察。因此，敌人对我军的动态茫然无知。

三月中旬，傅副长官密令各部队埋伏入指定地区，接着下达了攻击部署命令。三月二十日前夕，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反攻部署大要是：以新三十一师附配五临警备旅、炮二十五团两个营（欠一个连），为主攻五原新城（隆兴长镇）部队；孙兰峰师长任攻城总指挥，徐子珍旅长为副总指挥，指定安春山为攻城突击队队长；

以董其武一〇一师附配王子修新六旅、炮兵两个连为打敌援部队，位置在五原通向乌镇间，乌加河南岸大财主桥等渡口，以阻击由大余太、乌镇方向驰援五原的日军，保证军主力对五原的进攻。

三月二十一日“春分”，大小河渠都解冻了。这天拂晓，反攻五原的战斗打响了。新三十二师早已从五份子桥地区以夜行军方法，密绕东北方向，至乌加河畔以南梅令庙一带。我营担任进攻旧城“城底”王乐愚（五财主）大院的任任务。旧城守敌正在鼾睡，当官儿的还在麻将牌中作乐，被我一举突入院内，惊慌之余，只顾乱藏乱窜，被打死、打伤、活捉的很多，跑掉的是少数。不大一会儿，从五原新城驰来敌援军一部，向占领旧城的我师猛扑。我营首先予以猛烈阻击，击毙、击伤不少，我营配合师主力和敌激战两小时，给敌人重创，残敌向东北方向狼狈逃窜。旧城战斗中，我师九十五团营长赵寿江、连长张举善奋勇在前，壮烈牺牲。我营二连连长张金升身负重伤，一连代理排长段义阵亡，全营三十余士兵负伤。

盘据在五原新城的敌主力，有日寇正规部队与非战斗人员千余人。这些敌人据守城中心“平市官钱局”等处，负隅顽抗，被我攻城突击队一



举入城，猛烈攻击，除大部分被击毙外，所余少数敌人和驻水利局的日寇技术人员，全部被俘。只有日酋水川中将、金藤少将（均系日本贵族）幸逃出城。后水川在五原东，二驴湾被击毙。伪蒙军、伪军3000余人均无战志，除少数逃跑外，其余全被击毙。此役歼敌三千四百余名，俘敌三百余名。李守信、乌古廷、宝贵廷、王英等蒙奸、汉奸头子，亦各自为谋，仰仗人地两熟之便，换上便服，丢盔擻甲，作鸟兽散。我主攻部队伤亡不多，五临警备旅上校团长贾世海（字宴如）阵亡。这次主攻战斗，缴获械弹器材很多，内有山炮多门。敌人的坦克和所有汽车，被烧炸殆尽。

乌加河畔大财主桥等处的打援战斗，激烈异常。五原战役一打响，驻乌镇、大余太的日军附伪蒙军一部，首先前来增援。增援之敌行至乌加河北岸，利用橡皮划子强行渡河，与我一〇一师在大财主桥发生激战。相持不到半天，又从包头驰来大量乘汽车的日军部队，并以大炮多门和飞机数架掩护，亦从多处用橡皮划子强行渡河，加入战斗。我打援部队虽处于劣势，仍死守不退，全线战斗空前激烈。特别是一〇一师三〇三团，已和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白刃交手战。该团宋海潮副团长头部、腰部，腹部连中多弹，当即倒

地。战斗结束后才醒过来，被附近老乡救活，转送后方医院，养伤数月后才归队。我师奉命以我团为主前往增援，与敌相持激战两天两夜后，自动脱离战斗，向西转移。敌人驰至五原时，我主攻五原部队已从残垣断壁的五原城撤出，转移他处。敌人进入五原城，满目凄凉，一无所获，便仓惶捡集日军遗尸火化后，带上骨灰，循原路向大余太、包头急退而去。

日军之所以大举增援五原，目的之一，是想营救日酋水川中将和金藤少将，但是水川、金藤二人逃出五原城后，向东北方向落荒而走，终未逃出我抗日军民的天罗地网，皆被毙命。

五原战役大获全胜。为了永志五原战役牺牲的官兵，特将以身殉国的张举善连长追赠为步兵中校，将五原桥东小南街更名为举善街；将英勇殉国的贾世海（晏如）团长、赵寿江营长分别追赠中将衔和上校衔，并在塔尔湖设晏江县，以表纪念。我师袁庆荣师长负伤，特晋升中将；孙兰峰、董其武两师长分别升任暂三、四军军长；安春山、郭景云两团长与王雷震副师长均升任师长。五原战役的胜利，西安天水行营转来重庆军委会嘉奖电令，誉为“开反攻胜利之先河”，并奖给三十万元，颁给傅副长官“青天白日”最高勋章。

# 包头、绥西、五原战役亲历记

李敏才

## (一)

一九三九年冬季。日寇猖狂进攻我华南各省，傅作义为了配合华南作战，决定袭击包头日军，以牵制敌军南下。当时我新编第三十二师驻防于五原县新公中一带进行整训。旋奉军长傅作义命令，立即开赴安北县大有公、庞三圪堵、四柜（归树林子乡所辖）国虎圪旦（归长胜乡所辖）等地，并在驻地附近对包头方向构筑防御工事。另外派出百分之三十兵力，将乌梁素海和乌加河坚冰打上从北向南高一米七，宽一米左右的冰墙，长约二十余里。此举表面看来是防御包头日军进攻。实则企图迷惑麻痹敌人，以使其判断发生错觉。为奇袭包头创造条件。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傅作义由五原乘汽车来大有公给我全师官兵讲话，针对当时官兵有惧怕日军坦克、汽车的思想，讲述了如何利用集束手榴弹、炸药包、汽油瓶等炸毁坦克和汽车的方

法。还讲了军人既要爱国又要爱民的道理。随后又召集排以上军官讲话说：“防御应当采取主动，以积极进攻代替消极防御，不应当守着一个地方等着挨打。”他主张：“打敌必胜，防敌无成，又快又狠，胜于考虑周详；要抢占好地形，把坏地形让给敌人挨打”。最后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奇袭包头任务。在会上傅作义令我师：“沿乌拉山脉夜行昼伏向包头挺进，行军途中，绝对保守秘密，进村休息后要严密封锁，不准任何人出村，到部队出发后才准许村人行动。”另外，把我新编第三十二师番号改为“欣然支队”（因为师长袁庆荣号欣然。故以得名）以迷惑敌人。

傅作义来我师讲话是乘坐的大汽车，散会后仍乘原车返五原，为了迷惑敌人，行至途中改乘军马，随军向包头前进。汽车则继续向五原驰去。

当我师抵达包头附近麻池村时，突然接到傅作义命令，要我师以急行军速度赶至昆都仑，攻击前口子村日伪军。拂晓前，我团到达前口子村外时，一〇一师早已把该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狼狈向包头逃窜。这次战斗中，一〇一师活捉了日伪军团长李根车等人。我团奉命在前口子附近休息待命。

为了截击从大余太增援包头的日军，我团派

第一营营长鲁乐山率全营到后口子村伏击，翌日拂晓前，鲁营长在出村查哨中，突然发现从大余太增援包头的日伪军开了过来。因当时天还未亮，部队正在休息，鲁营长迅速回到村内，敌人也进了村，鲁营长当即和少数哨兵向敌军开枪射击。日伪军毫无准备，被我军打得四散逃窜。这次战斗击毙大余太日本驻军大佐小林一男及士兵数人，由于没有全部消灭日伪军，战斗结束后，傅作义严厉批评了鲁乐山营长，说他戒备不严。麻痹大意，不该使进入网中之鱼跑掉。

傍晚，孙兰峰师长被日军包围在黄草洼山上，傅作义命令我团即刻前往增援解围。夜十二时左右，我团赶到该地，立即协同孙兰峰师向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敌不支，向包头城内逃去。这次战斗焚毁敌人汽车七辆。

此时，新编第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已攻入包头城内。团长安春山带领全团官兵与日伪军展开激烈的争夺巷战。但由于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破坏萨县附近铁路不彻底。只拆除了几根道轨。因此未能阻止从大同、张家口等地来增援包头的日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傅作义始命令各部队撤离战斗，向河套方向转进。

新编第三十一师从包头撤出时，守卫在娘娘庙的一个副班长和两位战士，由于没有接到撤退

命令，继续坚守阵地，次日虽被日军包围，但仍孤军奋战，打死日兵数人。最后日寇逼迫老百姓去告知该副班长说：“傅作义部队已全部撤回河套了，你们要是投降，保证不杀，若不投降就要用炮把娘娘庙炸平。”这三位战士英勇顽强拒不投降，表示一定要打到底。最后日军果真用炮兵和步兵联合进攻娘娘庙，这三位孤军奋战的英雄，全部壮烈牺牲。由于不知名姓，傅作义在给官兵讲述此事时，称为娘娘庙中的三位“无名英雄”。还将他们的英雄事迹编印成书，发给各部队学习。

部队撤至河套后，傅作义来我师给官兵讲话说：“我们这次进攻包头是胜利而不是失败，因为我们发动包头战役的目的，是牵制敌人南下，而不是为了长期占领包头。由于我军对包头的进攻，致使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日军不敢南下，这样我们就有力地配合了华南战役，所以说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我团由包头撤回河套后，奉命在西山咀卧羊台一带（即现在砖瓦厂所在地）修筑作战工事，阻止日军沿包、五公路向河套侵犯。但西山咀卧羊台附近，没有一户人家，我们全团官兵全都住在自己亲手挖的山洞里。由于没有门窗，洞口只得用干草堵塞。以御风寒，时值腊月，地冻天

寒，风雪交加，尽管全体官兵衣着单薄，为了抗击日寇，人人吃苦耐劳，奋不顾身，以十天的时间，不分昼夜地连续突击构成了防御工事。一九四〇年一月，我团阵地交由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接防，我团则调至四柜、庞三圪堵、国虎圪旦一带整训。

我团从包头转移时：因在日军飞机、坦克的狂轰滥炸下，秩序混乱，以致部队失去控制，重机枪连丢失了重机枪两挺。事后傅作义为了严肃军纪，将该连连长李××逮捕，交军法处处置。

## (二)

驻包头日军司令官小岛，为了对我军袭击包头进行报复，于是派飞机轰炸第八战区傅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五原县城。当时我连驻安北县庞三圪堵整训备战，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能看到由包头飞来敌机数架，去轰炸五原。飞机过去数分钟后，五原方向烟柱腾空而起，接着听见轰隆隆爆炸声。听人说有一次炸弹落到傅作义住的院内，由于他的卫士机智灵活迅速将傅推倒在地，才避免了危险。傅作义的随从副官侯××就在这次轰炸中牺牲了。这样连续轰炸直到日军占领五原以后才停止。

日寇为了打通大西北走廊，占据河套产粮区，一九四〇年一月初，就开始调兵遣将作进攻准

备。从晋、察、绥等地，抽调日、蒙、伪军和驻地警备队等，共拼凑步、骑、炮兵三万六千余人，在一千二百多辆汽车配合下，由日军黑田师团长指挥，于当年腊月下旬兵分三路，向我河套地区大举进攻，从而开始了绥西战役。

傅作义对绥西战役总的战略是“避不利，找胜利；积小胜，为大胜；不叫敌人好来，更不叫敌人好走；既要处处设防阻击敌人，又要机动灵活避免死守硬拚”。同时还规定：所有参战部队，不论在任何艰险情势下，都不能借口“机动”脱离战区地域，只能在战区范围内，依托山脉与敌周旋。以期捕捉机会，歼灭日军主力。

绥西战役开始前，我连住在庞三圪堵。阴历腊月二十三日这天早晨，一架敌机突然飞临我连住地上空侦察盘旋，由于日军知道我军没有高射武器，敌机飞得很低，我们还能清楚地看见飞机上的日本国徽。这时我迅速到屋内取出轻机枪，向敌机打了一梭子，敌机立即向东飞去。连长李玉璋过来，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给敌人暴露了目标。就在这天的傍晚，日军即开始向我西山咀守军攻击。我们听到炮声后，上房观看，只见西山咀方向烟尘四起。入夜炮声更趋激烈，直到夜十一时才平静。这时我们在房上看到敌人的汽车灯，象一条火龙似地沿着包、五公路，向五



原方向驶去。

我师为了阻击向五原方向进犯之敌，以两个团的兵力埋伏在五原四牛头圪堵沙丘内，在二十四日清晨与敌展开激战。日军飞机数架轮番轰炸，坦克和炮兵掩护其步兵冲锋，由于战场系沙漠地带，坦克行动迟缓，不能发挥其威力。日军虽反复进攻数次，均被我师击退。最后日军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我师伤亡甚众，但阵地依然不动，直到夜间我师才奉命向西转移。

翌日，我团在四柜圪旦，与从乌不浪口进犯五原之敌遭遇。当即给予迎头痛击，在战斗中，我连连长李玉璋看到日军汽车十余辆，满载日兵，企图抢占我团阵地左侧一个有围墙的大场面。如果敌人抢占了此场面，依托围墙从左侧袭击我团，我们将处于危险之境地，因此连长当机立断，命令我带领全排火速抢占该场面。我排受命后，立即以最快速度，抢占了场面。这时汽车上的百余名日兵也下车从三面向我排展开进攻。但因我排有土围墙作依托，而敌人却处于平坦开阔地之上，毫无掩护，战斗数小时，敌人始终不能接近我阵地一寸。当时因我排阵地突出团阵地前约一千五百米左右，而且又是三面受敌，特别是经过数小时战斗后，子弹已所剩无几，敌人又毫无撤退的迹象，其情况异常危险。但全排战士却毫无惧色，

非常沉着。为了节省弹药，我命各班步枪在敌人进至距我二百米时方准射击，轻机枪须距四百米时才准射击，最后敌人六十余人冲至距我阵地前一百米处凹地内，我集中全排火力形成火网封锁敌人。致使这六十多个敌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在凹地内隐伏两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敌人施放烟幕弹，乘机逃跑。事后我们去凹地察看，到处是斑斑血迹，敌人伤亡惨重。这次战斗我排牺牲副班长一名，战士三名。

入夜后接到连长命令，全排即刻到连部集合，准备夜十二时袭击敌人汽车。我全排到连部后，又接到团长让我连立即随部队沿山向西转移的命令，随即部队向西转进。

阴历正月初一，我团转移至陕坝西面铁匠圪旦，连长命令休息待命。因为当天是春节，连长叫司务长筹集猪肉五十斤和白面八十斤，分配给各班吃饺子。正在我们高高兴兴地包饺子时，突然一个老乡慌慌张张跑来给连长报告说：“村东二、三里地方一泡黄尘（意即尘土飞扬）你们赶快去看看”。这时，连长立即命令全连携带武器集合，到村东一个大土山上占领阵地。我们刚上了土山，敌人日蒙骑兵百余人，还有十几峰骆驼满载从老乡那里抢夺来的东西，已到了土山下面不远的地方。看样子敌人准备进村过春节。连长一

声喊“打！”全连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因毫无准备，在突击之下乱作一团，抱头鼠窜，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战斗。打死了十一名日蒙军，并缴获步骑枪八支、日式手枪一支、望远镜一架，子弹七百余发，乘马九匹，骆驼三峰。战士们高兴地说：

“咱们这个春节过得好，小日本给咱们送的礼物真不少！”

敌人侵占后套，到临河以西一带时，发现其后方及侧翼，均有我三十五军及游击部队不时袭扰。于是不敢再继续西进，立即命令全部日蒙伪军退回五原，以防我军把他们分隔吃掉。这时三十五军也尾随敌人返回五原附近，积极备战，准备反攻五原。

### (三)

绥西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为了总结绥西战役经验教训和部署反攻五原作战任务，在临河县东南亚麻来召开团以上军事会议。会上对绥西战役进行了总结，认为绥西战役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

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反攻五原有必胜的把握，当即决定攻击五原。其战术是采取“掏心战”。该战术之核心是组织强有力的部队，突然袭击日军首脑指挥机关，摧毁敌人的神经中枢，

使敌军处于瘫痪状态，尔后各个击破。

反攻五原的时间，选定于三月二十日。此时正是各河、渠解冻之际，为使日军坦克、汽车和重炮等不能发挥其威力。随即命令地方行政人员，动员群众在三月二十日前尽量从黄河向各渠道放水，给日军造成行动上的大不便，阻滞机动车辆行驶。

会后，我师奉命秘密开赴五原西什巴圪图一带，积极训练。我团任务是攻击五原旧城，团、营、连均按分配给的攻击目标，在野外设置模型，日夜演练。

在反攻五原前，傅作义曾来我师给全体官兵讲话，其内容大意是敌我情况对比，反攻五原的必要，五原战役必胜的根据等等。最后他说：据情报人员和老乡们反映，现在五原的日蒙伪军，每人都有两三匹马、马上驮满了向乡亲们抢夺来的财物。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而我们的官兵除了枪支弹药和身上的衣服外，其它一无所有。我们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吗？所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次五原战役，每个官兵要有胜利信心，要准备牺牲。我的决心是这次反攻五原，打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打下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傅作义命令参战部队必须在三月二十日夜间零点，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事前必须严守秘

密，给敌军个措手不及。因此我师于三月十九日深夜向五原城郊移动。距五原十几里地方隐蔽休息。中午连长李玉章去营部开会回来，召集我们三个排长开会说：“营长命令我连挑选一名熟悉五原旧城情况的排长，带领三十名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营的突击队，首先攻入旧城。占领旧城内的白墙大院。待营大部队到后，再归还连的建制”。我当场报名愿带突击队首先攻入旧城，随即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全连好武器由我带，二是全连战士由我挑。”连长表示“可以”。于是我从全连挑选了最优秀的班长和战士三十名，携带轻机枪四挺、冲锋枪六支，其余为步枪组成了突击队。

三月二十日夜十时许。我排已秘密前进至前补红村外，因原住该村蒙伪军骑兵一个连撤走不久，没有放一枪一炮就占领了前补红村。在村中休息时，团部司号长到一位老乡家要水喝，发现这家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被刚撤走的伪军四人轮奸了。他当即向团长杨新钊报告了此事。团长立即叫军医去给少女治疗，并召集全团官兵作战前讲话。当他讲明这个少女被轮奸的事实后，非常气愤地说：“敌人简直不是人，谁无姐妹？我们的同胞受这样惨无人道的蹂躏，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现在我们就要向旧城日伪军发动进攻。

报仇雪耻的机会到了，你们要把仇恨压进枪膛，凝结在刺刀尖上，向敌人讨还血债！分配给各营连的战斗任务要坚决完成，一丝一毫也不能打折扣，必须全部彻底地把日蒙伪军消灭掉，才能对得起养活我们的河套乡亲们”。由于少女被敌人轮奸事件，激起了全部官兵的无比愤怒，纷纷表示要坚决消灭日蒙伪军，给河套乡亲们报仇雪恨！

夜十一时半，我率领的突击队已前进至旧城边缘，我们攻击的目标白墙大院，已清晰可见。这时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有敌哨兵抽烟的闪光。我立即命令突击队就地隐伏，等待总攻时刻，虽然离攻击时刻最多不过二十分钟，可是我们都感到度时如年，心情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颗发起总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接着四面八方的枪炮声。喊杀声四起，我们迅速向白墙大院冲去，冲到大院门口时，敌人已将大门紧闭，大门左右两侧碉堡内的敌人，以轻机枪步枪向我突击队猛烈射击起来。因我所处地形平坦无法隐蔽，敌人所占白墙很高，攀登不易，因而第一次冲锋并未奏效，以致牺牲了两位班长、四名战士，另有七人受重伤，我本人头部也受轻伤。当我命令突击队迅速撤至距白墙大院一百五十米左右之渠壕内，准备整顿部队，再次进攻时，营长苗逢安已率全营官兵赶到现场，我当即向营长报告了敌人情况和我

们攻击受挫情形。营长命令我突击队归还九连建制，同时令第七连和第九连，携带炸药、云梯继续猛攻白墙大院之敌。我们两个连的兵力共一百七十余人，又再度向敌人发起猛攻。因为此时敌人有所准备，火力比前更加猛烈，很难接近白墙，但我们仍然顽强地向敌人进攻。最后第七连终于攻至大门附近，将门侧两个碉堡炸毁，碉堡内的敌人全部被歼。这时我也被敌人手榴弹炸伤腿部和臀部，不能行动，连长命令担架把我抢救下去，转送战地医疗所。

我营在数次猛烈进攻旧城战斗中，牺牲惨重，最后全营官兵只剩七十余人。我连连长李玉璋，也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傅作义得知我营攻击受挫情况后，非常震怒，当即命令师长袁庆荣，将营长苗逢安就地正法，以给作战不力，指挥无能者戒。后经袁师长力保才准其带罪立功。

旧城战斗持续到二十一日中午。因广胜西的敌人，在九十五团和宋海潮团的联合攻击之下，向东逃窜后，旧城敌人见势不妙，随之弃城而逃，我团终于攻占了旧城。与此同时我新编第三十一师，已将五原城内之敌全部肃清，至此五原战役，基本胜利结束。

五原战役，日蒙伪军全军覆没，除俘获大批日蒙伪军官兵和武器装备外，还击毙日本皇族水

川伊夫中将。日军因水川是皇族，下落不明，故于三月二十四日又调集精锐部队并附大炮数十门，再次猛攻五原。我一〇一师在乌加河畔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众。傅作义认为五原战役已经取得胜利，为避免更大的牺牲，命令各部做好空室清野后立即转移。于是敌人于三月二十五日再度占领五原，但由于我军主动转移，敌人非常担心，迅速找了部分日兵尸体，火化装袋后，翌日，便又慌忙窜回包头。

由于五原战役给予日寇毁灭性的打击，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为止，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不敢再向河套地区越雷池一步。因此绥西河套一带人民，才逃脱日寇铁蹄的蹂躏。



# 河套人民抗战的一些见闻

以平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全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我是在绥远河套地区度过了一段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那时我在绥远省政府机关工作，虽非直接参战人员，但很注意河套抗战形势的发展，尤其对河套人民爱国家，保家乡，出力出物，支援抗战，配合军事行动，英勇杀敌的高贵精神和他们作出的重大贡献，深为敬佩。在战争中涌现出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令人铭心难忘。我愿意忆述河套人民抗战的一些见闻，聊表敬仰之意。不过事隔多年，错记之处，在所难免，望知情者不吝指正。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平津后，在大举南侵的同时，分兵沿平绥路西犯，气焰嚣张，疯狂已极，及至十月中旬，就抢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当时绥远地区国民党驻军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已南调山西，剩下的只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门炳岳的骑七师、

李大超的部分国民兵以及绥远地方人士临时组织起来的绥远抗日自卫军等，多系游杂部队，缺乏战斗力，抵抗不住强敌的攻势，于是纷纷撤往绥西。敌人则跟踪袭扰，汉奸特务乘机活动，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河套地区顿呈混乱状态。在此紧要关头，门炳岳的骑七师，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布防西山咀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抵抗阻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始稳住阵脚。与此同时，在五原公开处决了通敌卖国的汉奸唐兆明、康三元，安定了民心，振奋了士气。所以一度曾有“西山咀有了一座门，不怕抵抗不住日本人”的民谣流传。此后不久，马鸿宾的八十一军，奉命从宁夏开进河套，加强了防守力量。

河套平原，向有塞北粮仓之称，土地肥沃，渠道纵横，是大西北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九三八年冬，重庆国民党军委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升任绥远省主席，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进驻河套，统一指挥绥西抗战。翌年初，傅作义即由晋西北河曲一带，率部进抵河套，在五原组建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随后，绥远省政府亦从陕北榆林迁回河套恢复办公。

这时的傅作义将军，抗战坚决，雄心勃勃，颇有大干一番的劲头。特别是由于他转战晋西北

时，与共产党接触频繁，并得到了许多可贵的帮助，亲眼看到了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越战越强的情景，使他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启迪。因此，他到绥西后，积极训练干部，整顿军队，成立各级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决心学习八路军的好思想，好作风，整军经武，励精图治，以适应战时需要。一度在河套地区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尤其在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为骨干的各级动委会的发动与组织下，河套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各项抗战工作，诸如动员群众编组保甲、清查户口、组织通讯网、救护队、担架队、建立盘查哨、供应军需品等等。各级动委会深入群众，组织讲演会，演出活报剧，办墙报、编小报，书写标语、教唱抗战歌曲，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战，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使成千上万的群众，提高了民族意识，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巩固河套这块抗战阵地，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正是因为河套有了这样好的群众基础，傅作义将军才能够放心大胆的以河套为基地，指挥所部于一九三九年冬至翌年春，连续进行了袭击包头，会战绥西和克复五原的三大战役。特别是五原之役，军民配合默契，同心协力，把貌似强大

的日本侵略军，杀得尸横遍野，丢盔弃甲，全军覆没，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又一光辉战例，彻底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我们的国家争了光，为我们的民族争了气。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我军在河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从绥西各防地出发，昼伏夜行，秘密长途奔袭，出敌不意，一举攻入包头，占领了大半个城，激烈巷战一昼夜，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并在城外歼灭了从固阳、大余太增援的敌人，使日寇遭到惨重损失。骄横的日本侵略军把包头之败，视为奇耻大辱，恼羞成怒。遂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末，从各地纠集日伪军三万之众，汽车千余辆，坦克数十辆以及大炮飞机，由师团长黑田重德中将指挥，分兵三路，杀气腾腾地入侵河套，疯狂叫嚣一定要消灭傅作义军，报复我军对包头的袭击，妄图速战速决，长期占领河套，进窥我西北地区。我军则针锋相对，采取节节抵抗，迟滞敌人，闪开正面，转进两翼，挫其锐气，开展游击战，与敌长期周旋，“避不利，找胜利”的战略战术。

这时，河套各地的人民群众，在动委会与军队政工干部的组织领导下，紧急行动起来，配合军事行动，支援前线，相机打击敌人。日本侵略军为铺平进犯河套的道路，先派工程兵在乌拉壕

架起了桥梁，被我五原平元乡农民卜根长、樊七两人乘夜幕的掩护，放火把它烧毁了，从而延缓了敌人的行动，为我军组织阻击赢得了时间。河套公路沿线两侧各村的群众，在日军进犯的时候，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了空室清野、埋藏粮食、假填水井和有组织的转移，使敌人来不得好来，走不得好走。在各要道渡口，群众组织了盘查哨，监视敌人活动，严密封锁消息，并广泛开展了游击活动，不失时机地消灭小股敌人。日军在初占临河的头几天，就有二十多人被群众打死。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日寇飞机一架，坠落在世成西东北约八、九里处屯垦九连驻地，附近群众不约而同，手持铁锹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飞机，两名日军驾驶员，一名当即被群众用锹劈死，另一名吓得急忙自杀身亡。五原三区动委会组织的游击队，出敌不意，缴了一股日伪军枪枝，消灭敌人十余人。日伪军由于受到群众的不断袭击，吓得丧魂落魄，提心吊胆，敌探汉奸，不敢出城活动。

群众组成的通讯网，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巧用鸡毛信的形式，日夜传递情报，协助我军，对敌人的动态，了如指掌，得以及时进退，集结兵力，组织有效的袭击，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日本侵略军，由于群众的封锁消

息，对我军的活动，茫然无知。因此，就象盲人骑瞎马一样，东冲西撞，不是扑空，便是遭到伏击，处处被动挨打，疲于奔命，始终捉摸不到我军主力的所在。一天，日军抓住了卜碾房农民柴桂森，威胁利诱强迫为他们带路。柴桂森怒火满腔，无奈将计就计，就索性把敌人引进我伏击圈。我伏兵四起，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横倒竖卧，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乌加河畔阻击敌援的战斗，由于敌人急于渡河，不惜牺牲，反复地拚死猛攻；我军则组织炽盛火力，顽强抗击，不准敌人越雷池一步，战斗惨烈，杀伤了大量敌人。我军伤亡亦重，一时运送伤员的任务又繁重又迫切，原由青壮年男子组成的担架队，已不够用。群众得知这种情况后，一支由妇女自动组织的救护队上来了，她们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个人安危，从阵地上把伤员一批一批地抬了下来。百川堡附近有位老太太刘大娘，是个小脚妇女，行动不便，她却不管这些，带着几个妇女上前线给战士送水送饭，救护伤员，忙了个不亦乐乎。正在浴血奋战的官兵，见此情景，感动得个个热泪盈眶，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增强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我军一〇一师三〇三团团团长宋海潮，在率部与敌拚搏中，不幸连中三弹，大肠外露，流血过多，昏倒在地，部队以为

宋已战死。转移阵地时，又因情况紧急，没有来得及掩埋。战斗结束后，当地农民刘大宽，郭四毛旦，在战场发现倒在血泊中的宋海潮并未死去，便赶忙抬回家中，急救治疗。经过群众精心护理，后送军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宋始得起死回生，返回部队。从此以后，宋海潮即更名宋再生，以铭记乡亲们救命的恩情。

绥西会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正是一九四〇年农历春节期间，日本侵略军凭着装备优势，相继占领了河套的五原、临河、陕坝几个主要城镇和公路沿线的一些大村庄。我军有计划地转进狼山南麓和黄河沿岸沙漠地带，广泛开展游击战，相机歼敌，弄得敌人草木皆兵，日夜不宁。但是，我军随着战争的持续日久，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粮食补给，眼看战前预先埋藏的有限粮食，消耗殆尽。官兵们为了持久作战，多用小米稀饭充饥，维持最低生活，哪能顾及过春节！这时我军三十一师有七个连的部队，驻扎乌加河畔的苗得雨圪旦一带，每天昼伏夜出，行军打仗，生活极为艰苦。苗得雨老人见此情景，看在眼里，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一天，他找到部队长恳切地说：“部队这样艰苦抗战，保国卫民，辛劳已极，自愿宰杀自有羊只，挖出埋藏的小麦，献出羊肉三千斤，白面数千斤，请全军吃饺

子过年，表示我的一点心意。”部队长听后对他说：“守土抗战是军人的天职，你的深情厚意我们领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收，还是留作自己生产生活之用吧。”经再三婉言相谢，他仍执意要送，最后老人急了眼说：“难道这些东西，不叫咱们部队吃了去打日本，留着让鬼子抢去吃了打中国人吗？”老人的一片爱国热忱，溢于言表，真是盛情难却，不得不接受了。于是全军官兵在炮火声中，美美地吃了三天饺子，过了个好大年。战后，经报长官部如数偿还了苗得雨老人的肉面，并表彰了他的爱国义举。

安北县有位农民，名叫安礼，以农为生，勤劳特甚，一贯省吃俭用，一双鞋子随破随补，穿用八年而不弃，多年来他积蓄了大量粮食，舍不得吃。但是当他知道抗战部队缺乏粮食的消息后，主动找到县长乔学曾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大敌当前，支援抗战，义不容辞，愿将自己积蓄的三万斤糜子，全部献作军粮”。傅作义将军得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对农民安礼这种仗义疏财，支持军队抗战的爱国行为，在许多会议上讲话表扬，并传令嘉奖。军民听了，莫不为之感动。并有一些人效法安礼，捐献军粮，如安北的王四献出炒米六千斤，临河的李仁甫也献出小麦六万斤，表示爱国不甘后人。



一九四〇年三月春分时节，冰融河开，渠水溢涨，新六旅奉令炸开渠口，五原周围顿成泽国，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失去了作用，五原战役打响了。我军运用掏心战术，突入五原，里应外合，先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同时向五原新旧两城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敌人大部据点已为我所占领。只有盘踞在屯垦办事处和平市官钱局院内的敌人，凭借围墙高厚，工事坚固，负隅顽抗，久攻不下。这时敌人的大部援军已达乌加河畔与我军激战，情况十分紧急。傅作义将军责令三十一师王雷震副师长，必须尽快拿下敌人的这两个据点。我军急用大炮近距直射的战术，摧毁了敌人的围墙工事。敌人立刻慌了手脚，我军奋勇突入，全歼守敌。至此五原即告克复，新闻界称之为“五原大捷”。消息传出，军民振奋，举国欢腾！

我军攻克五原后，日伪军的残兵败将，纷纷向五原东北溃逃。但是田野一片汪洋，道路难辨，泥泞难行，且北有乌加河，南有黄河，东有乌梁素海，三面均为冰河所阻。狼狈的敌人，好象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四处乱窜，苦无逃路。这时我河套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竞相追杀敌人的战斗。溃败逃窜的敌人，不是被我追击部队歼灭，就是被我人民群众

截杀。就连五原最高指挥官日酋水川伊夫中将，也未逃脱一死。他从五原带领二十余骑，逃到四柏圪旦，企图渡河逃往大余太。看到冰流水深，正在徘徊犹豫，被当地群众发觉后，急报知附近的游击队，预设伏兵，将其诱至二驴子湾后，全部击毙。并割下水川伊夫首级，缴了他祖传的战刀。日寇五原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及其他特务人员内久保作、警官池田浜崎等百余人，逃至乌梁素海畔石窖子附近，亦被我追击部队聚歼，无一漏网。日伪军溃逃人马在我军民四处追击截杀下，急于逃命，慌不择路，大部在横渡乌梁素海踏履薄冰时，掉水淹死。

从五原败逃的日伪军，仅被各地群众诱杀、打死、赶进乌梁素海淹死的就近达千人。许多群众英勇杀敌的动人事迹，一直传为佳话。有十来个日本鬼子，身背钢枪，踉踉跄跄窜到五原东北的金先生圪旦，迎头碰上王大老虎（王贵成）、王二老虎（王乐成）兄弟，就唧唧哇哇，比比划划，示意要吃饭。王家兄弟见到敌人这般狼狈相，恨不得立刻把他们消灭掉。可又一想，他们人多，又带有武器，必须智取。便来了个强作笑颜，假献殷勤，把他们引进家里，请其上炕坐下，连忙给张罗烧水做饭。这伙强盗直乐得连伸大姆指称赞。不料已经跑得精疲力竭的敌人，在

吃饱喝足之后，竟一个个横躺竖卧，都象死猪一样睡着了。王家兄弟见杀敌时机已到，喜不自胜，立刻又找来邻居的两个小伙子，一齐动手，先收了枪枝，然后拿起铁锹，将十一个鬼子全部劈死，无一生逃。翌日，割下人头，装进口袋，连同一挺机枪，十枝步枪，一齐送交驻防五原的一〇一师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并请开了收条，嘱其转报傅主席。王团长高兴地表扬了他们英勇杀敌的爱国行动，答应一定上报傅主席为他们请功。“大、二老虎真英雄，退水渠畔杀敌人，为了咱们老百姓，他把鬼子杀个光。”便是当时河套人民歌颂王大老虎兄弟英雄事迹的一首民谣。另有一伙日伪军逃到五原马六十一圪旦，也被群众包围起来，挥舞铁锹砍杀了十几个，另有少数几个人慌忙逃命。有个日本鬼子偷偷潜入银瑞桥农民王红有的凉房，被王发觉后，给扔进一颗手榴弹将敌人炸死。还有两个鬼子慌慌张张闯进五原某村一家民房，这家的一位中年妇女，恐慌之余，急中生智，举起菜刀左杀右砍，结果了敌人。一时群众杀敌的英雄事迹，频传河套城乡，举不胜举。现在想起当年的情景，犹令人感奋不已。

在河套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我军民连续苦战百天，付出巨大代价，取得三战三捷，以五原战役的胜利而告结束，把日本侵略军彻底干净地赶出了河套地区。三战役共击毙日寇

水川伊夫中将、大桥大佐、小林一男大佐，小原一明大佐、桑原荒一郎中佐以下官员三百余人；生俘日军指挥官观行宽夫、浅沼庆太郎等五十余人；俘虏伪蒙军一千八百余人，歼灭伪军三个师，五个师溃不成军，日军伤亡四千六百余人。击毁汽车一百数十辆，坦克十余辆，缴获各种武器、汽车、军需品甚多。

一九四〇年八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陕坝中山堂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除作战有功的官兵外，群众英雄二百多人参加了大会。傅作义将军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颁发了奖章，并在讲话中盛赞了群众支援抗战，英勇杀敌的光荣事迹，勉励大家发扬光大这种爱国精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大会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写着：“五原战役的胜利是军民合作的胜利”。这是千真万确，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事实。

五原战役后，我军与日寇以西山咀退水渠为界，形成了对峙局面，由于大青山一带有八路军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牵制日寇不敢轻举妄动向西进犯，河套局势始得相对稳定。但是河套人民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仍肩负巨大的重担，他们修水利，耕耘农田，扩大生产，以总人口二十多万人，供应着十万之众的军队，并且积极参加国民兵训练，为支援抗日胜利，竭尽全力承受着艰难困苦，作出了巨大贡献。

# 抗日战争时期河套地区 的征粮征兵

许庆阳

“养儿当兵、种地纳粮”，这是我国相沿已久的国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尤其当国家遭到外来侵略时，全国人民更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进行抗击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以拯救国家的危亡，维护民族的生存。

抗战八年中，河套地区的人民，对保卫大西北、保卫祖国，交纳公粮应征入伍，抗击敌人，尽到了自己应尽的最大努力。可是当时承办兵役、粮政人员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尤其1945年抗日胜利后的大征兵，却给河套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那时我在绥远省政府做视察工作，对河套地区征兵征粮的实况，曾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现将记忆所及之梗概，记述于后：

## 一、后套地区的征粮工作

后套地区，地处我国北疆的边陲，是东北、华

北通往大西北的要道。“九一八”日寇占领东北，“七七事变”后，华北大部地区失陷，绥、包也沦入敌手。在此抗战形势下，后套地区就成为保卫大西北的战略要地。自此，后套地区的人民就支应着往来过境的大军所需的军粮草料、牲畜车辆、人伕差徭。

一九四〇年春，傅作义将军率部歼灭了盘据五原之敌，光复了五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相继设在五原陕坝。从这时起，后套地区就成为数万大军和数千行政官吏聚集的地方。这些军政人员所需的口粮和军马所需的饲料，就全部由后套人民来供应。

后套地区那时仅有十六、七万人口。这个地区数年间遭受兵荒马乱的影响，农业耕作条件十分低下，农民们用简陋的农具，以粗放的耕作方式来从事农业生产。加之，那时河套水利工程失修，渠道流水不畅，灌溉面积有限，每年仅能播种五、六百万亩土地。在这有限的土地上，要生产出后套所有军民所需的粮食是有很大困难的。为了抗战，后套人民便肩负起这一沉重的负担。

### **（一）征粮机构的成立和仓库设置概况**

抗战前和抗战初期，田赋征收工作一直是由省、县的财政部门办理。全国农业税收从抗战开

始后不久，由征收现金改为征收实物（粮食），其工作较前繁重复杂。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全国各省均成立了田赋征收的专门机构。绥远省在实行新县制后，从省到乡建立了系统的田赋征收及粮食管理机构。绥远省成立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由财政厅厅长李居义兼任，副处长由王映荣担任；下设秘书、统计、粮管等科室及督导员若干人。县设田粮科，后亦改为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由县长担任，副处长派专职人员担任；下设统计、调拨等股及催征员若干人。乡设经济干事，专管征粮事项。

粮食的仓储保管，各县均设有粮站，设站长一人，站员及粮警若干人，负责征收的田赋粮（征实部分）入库时验收、仓储期间的检查及支付等责。粮站没有仓库设施，在县城和各乡选定有仓储条件的殷实富户和粮店代为储存保管，称为某某乡（镇）粮食保管员。征购的军粮，则由军政部兵站总监派驻战区的兵站分监、下属驻各地区的兵站，负责调拨及仓储。驻后套地区的兵站亦无仓库建筑，也是选定的殷实富户及粮店代为储存保管。各乡所设保管员数目不一，根据乡的大小及征粮数量的多少而决定。

## （二）耕地的丈青工作

当时后套地区的耕地，一部分是农民向垦务局放垦时通过放垦手续买到的；一部分是地商向蒙旗王公或蒙古召庙承租的，然后转租给农民耕耘的。这些土地，当时没有精确丈量，只指明地段按片划拨的，根本没有确实亩数。又因当时水利条件不好，每年农民只能逐水而种，农业的受益土地也没有固定亩数。所以，政府向农民征收赋税也不能制订出各农户纳税的税额，因此，在后套地区一直采用每年丈量青苗面积、估出每亩青苗的产量。政府依此向农民征收田赋和行政开支以及地方的一切摊派。

后套地区每年的丈青工作，一直操纵在大地户的手中，组成丈青的绳丈、估成、记帐人员，大部是大地户及他们的记帐先生和工头。丈青时所有丈青人员的吃住都在大地户家中，杀猪宰羊。纸烟烧酒，以极其丰盛的饭菜招待丈青人员。这样一来，丈青人员走进大地户的地里，拉前绳的往前多走几步才插钎子（每一绳的标记）；拉后绳的向前再让几步，才向拉前绳的人发出插钎呼号，如此一亩地丈成六、七分。估成成员压低估产成数，记丈员少记地亩或段数，处处偏袒大户，压制小户。结果所有一切负担都是大户少



推，小户多担。丈青中弊端是很多的。

傅作义实行新县制后，绥远省政府和田粮处认识到丈青工作是决定征粮工作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的关键。也深知过去丈青制度中弊端很多。为此，绥远省政府对丈青工作制订了极其严格的要求：要求参加丈青工作人员大公无私，不偏不向，不管大户、小户，一律公平丈量，有一亩丈一亩；在估产时要全面观察、认真对比，不得偏高或偏低，有一成估一成。丈青用的帐簿采用正副两本，由两个记帐员分别登记，数字确实，不得私自涂改。每丈完一户，两本帐簿互相核对后，由监丈员负责盖章。所有参加丈青工作的政府人员，不得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省政府三令五申严令遵行。但因各乡丈青工作始终为大地户所操纵，乡长为在执行乡政中减少阻力，对丈青工作亦不敢违拗大地户的意图。上级禁令虽严，仍不能杜绝丈青中的一切弊窦。督察丈青工作的省、县干部，人少事繁，不能够每个乡跟随监察清丈。当省、县干部到达时，丈青工作进行得十分认真；省、县干部一离去，各乡的丈青人员又随意胡行。这种欺上瞒下，通同作弊的丈青工作，必然是大地户便宜，小农户吃亏，造成穷苦农民负担加重的不公平现象。

### （三）征粮给后套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

农民向国家交纳公粮，本是国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可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后套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用来满足全后套军民所需，数量相差甚大；又因征粮工作中弊端很多，以致征粮给后套贫苦农民沉重的压力。

历年的战乱，土匪的横行，和地主、天主教势力盘剥下，后套农民的生产力十分低下，耕畜缺乏，籽种无备，吃粮更是颗粒无存。每年入春，小农户向大地户借贷，部分大地户向政府或驻军挪借。勉强种庄稼，其收获量不高，傅作义开河挖渠，整理土地，建立农科实验所、青年农场，想促进农业生产，但所辖的部队逐年在不断增加，征粮任务不断加重。往往庄稼一上场，政府就派催粮人员，分赴各乡督促农民交粮。这些催粮人员在下乡之时，就接受了不论采用任何方式必须完成征粮任务的指示，所以，他们在催粮工作中，遇到农民稍有怠慢，便对农民凶狠地训斥和打骂。入冬，场光粮尽，农民担负公粮仍不能如数完成时，县、乡就要把欠粮户关进监牢。有些乡干部将欠粮农民脱去棉衣，圈进冰冷的屋子里；还有些丧尽天良、没有人性的乡干部，数九寒天，在院子里拴马桩的周围拨水冻冰，然后把欠粮农民脱去棉

衣，拴在马桩子上。米仓县的一个乡长，把欠粮农民圈进磨房，把磨扇给压在肚子上，以此进行逼粮。对少数兼养牧畜的农户，若交不清公粮，就逼迫卖掉牲畜顶交公粮。一九四五年，晏江县绳武乡农民张顺气，因欠公粮，乡公所将该户所养的三百余只绵羊，全部赶至当地驻军团部，卖给了部队，顶交所欠公粮，该张气愤之下自缢身死。还有些欠粮户既已无粮交纳，亦无财物变卖抵交欠粮，乡公所为完成征粮任务，就强迫保管员给这些欠粮户开给空票。这样一来，保管员库存粮食空虚，支粮食的部队或机关来取粮时，保管员无粮付给，被逼迫卖去牲畜、田产，为欠粮户垫交公粮。因之有些保管员也被弄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后套地区在抗日数年间，因征粮任务的沉重，使过去号称“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鱼米之乡，“烧红柳、吃白面”的地区，变得贫苦不堪。但后套人民为了抗日救国，就在这悲惨穷困的生活中，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坚持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二、征兵工作

傅作义将军自抗战伊始，就率部同日寇进行数次规模较大的战役，在每次战役中重创敌寇，

战果辉煌；但在保卫太原战役后不得不作战略转移。1939年春，傅将军率部由山西河曲转入河套，又进行了包头、绥西及收复五原的战斗，所有这些战役使傅作义兵员受到很大损失。嗣后，傅将军在河套安定下来，进行补充兵员、整训部队，以充实抗战力量。那时傅将军已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所属部队兵员的缺额，应由八战区征补。自1939年到1942年，他从甘肃、陕西、河南领回几批新兵，将所属部队所缺名额，陆续加以补充，军力得以充实。河套地区的壮丁，除了自己志愿参加部队或自带马匹投入自卫军、挺进军等游击部队当兵的一少部分外，全地区性的大征兵未曾进行。原因是：一、傅将军的直属部队和由他指挥的部队，以及省、县、乡行政官员，共达五、六万人，其所需的粮食、副食及骑兵马匹所需的草料，都要河套地区的农民来生产供应。征兵太多，将影响河套的劳动力。其二，傅将军要暂时把河套地区的壮丁保留下来，一旦要扩充兵力时，就有雄厚的后备兵源。所以傅作义将军从一九四三年开始，便在绥西实施轮训国民兵的办法，集训壮丁，储备力量。

傅作义在河套地区设立了两个绥西输送兵训练管区——第一管区设在米仓县警柜（现杭锦后

旗西），管区主任部定帮、政治主任白震。第二管区设在五原新公中（现五原县永利乡），管区主任刘景新（后任主任李吉祥），政治主任许庆阳。一管区训练原米仓、临河、狼山县（现临河东北部）及陕坝市（现杭后旗所在地）的壮丁；二管区训练五原县、晏江县（现五原西部地区）、安北县（现乌前旗）的壮丁。训练内容为士兵基本训练及班、排、连战斗教练，识字教育和政治课程，每期训练时间为四个月。期满还乡，为还乡国民兵。从1943年2月到1945年7月，共训练了七期国民兵。当河套地区国民兵训练到第五期结束时，由一管区抽出第四营、由二管区抽出第八营，组成第三管区。管区主任营仲岩、政治主任刘承梁。管区部设在伊盟东胜。这三个管区征集训练的壮丁近三万人，为傅将军储备了雄厚的后备兵源。

绥远省政府移来河套后，先未设兵役机构，至1943年3月绥西实行新县制后，才建立起了系统的兵役机关。省级在绥远省保安处成立了兵役科；县设立县国民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设副团长一人；各乡设乡队长；保设保队附。专司壮丁登记和壮丁征集等工作；也负责还乡国民兵的管理和召集工作。

抗战中期，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布过一个“兵

役法”，规定“孤子不征、两丁征一、超龄不征，病残免征，新婚缓征……等条款”。但在实际征兵中，各地均未执行这一法令。就拿绥远省来说，自从45年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升格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傅作义任战区司令长官，自此傅部的兵员补充就要由当地征集。河套地区的征兵任务也一天比一天加重，尤其到1945年抗日战争已到最后胜利阶段，傅将军为达到在日本投降后接收华北，形成雄踞一方之势，这样他就必须扩编军队，壮大势力。在1945年7月，将河套地区训练过的一至七期国民兵，及年龄在十六、七岁到五十岁上下未受过训练的男丁近三万人，全部征集入伍，这就是傅作义在抗战胜利时的大征兵。

回忆当时大征兵的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7月，日军尚未正式宣布投降，傅长官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个召集一至七期国民兵在两个管区所在地听候检阅的命令，待国民兵齐集检阅地点后，傅长官率长官部参谋处长、保安处长和兵役科长，乘汽车前往两个管区进行国民兵大检阅。阅兵后发布了全部国民兵征集入伍的命令。并在同日，向各县下达了征集未受过国民兵训练的所有男丁应征入伍的命令。就在命令下达的当天夜间，各县长、县府所有职员；国民兵团副团长及

职员；警察局长、巡官、警长率领警察和保警队全体人员分赴各乡，挨家挨户进行抓兵。不管适龄或超龄男丁，都被抓回乡公所，绳捆索绑圈在乡公所大房子里，周围布满军警，防壮丁逃跑。第二天，由各乡负责征兵人员会同军警，将抓获的壮丁押送县里；交接兵部队验收，编入了预二零一师、预三十二师、预三十一师，开赴包头、归绥和绥东。

这次大抓兵，悲惨情景实属骇人听闻。有的壮丁为逃避当兵，自己用刀斧剁去手指的；有用石块砸断胫骨的；有企图逃跑被抓获遭毒打而死亡的；有刚交给接兵部队潜逃被抓回，当众枪杀或铡死的，驻防五原第七师二十一团，一次就铡死了三个逃兵……，大抓兵的夜间，村里的犬吠声，妇孺的嚎啕哭叫声，抓兵官吏的怒骂声，数里之外均能听闻。其惨象比杜甫写的《石壕吏》真乃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我印象较深，能回忆起在当时身受其害的人，列举出来以说明那次河套大抓兵所造成的悲惨情景：五原城东金先生村（现和胜乡和义大队）木匠张根小，在抓兵人员将进屋之际，自己拿起斧头将左手五指砍掉，留下一只秃手。五原城里东街张八小，在抓兵时侥幸逃脱，一直数月不敢回家。入冬在莫茆林里躲藏，身上无御寒衣物、脚上无保暖的鞋袜，冻僵

后被人救回。虽未遭冻死，但双脚被冻坏烂掉，后来在五原街头爬行行乞了二十多年，旧居五原城的老幼，人人皆知。住五原城东范碾房村（现和胜乡和义六队）的王存虎和其弟王保同，一齐被抓走，王存虎之妻李氏刚坐月子几天，无人照顾，吃不上、喝不上，几天后断送了性命，留下孤儿幸得其姑母抚养，才留幼小生命（这个小孩名叫王仁普，现在乌海市玻璃厂工作）。

在当时征兵中，有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家，不愿让子弟应征入伍，就花钱买壮丁来冒名顶替。那时外地有些穷苦人家的青壮男丁，为家庭生计逃来河套，卖身替买主应征入伍。其身价先有十石或二十石粮食的，三、五十块银元的，最后有身价高达二、三百块银元的。那时还有部队里的逃兵，由这个部队逃跑，再卖兵补入另一个部队。有些竟有连续数次卖兵顶替，但一旦被原部队抓获多被枪毙丧命。买丁人家所雇壮丁入伍后潜逃，追捕人员至其家中，以追捕逃兵之名进行敲诈勒索，掠取大量财物。雇丁主家不得不卖掉牲畜、田产以赎其罪。如此数次，家产荡尽。自己家的壮丁最后仍被抓走，落得人财两空。

在这次大征兵后，傅作义将军亦想到河套土地无人耕种，商业无人经营，入伍壮丁家属生活无依，为优抚入伍壮丁家属，特发给每个壮丁家



属糜子三石、白土布两文。这点优抚之物，大多作为保队附诱奸壮丁的妻女之诱饵。当时，河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傅长官真狠心，临走来了个大抓兵；三石糜子两丈布，老婆交给保队附；烈性女人不愿受这窝囊气，终日嚎啕哭啼啼；保队附你别神气，总有一天枪崩你”。这首民谣，是当时河套地区大抓兵后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河套人民呼喊出来的心声。

这次大征兵中，河套地区的官僚和豪绅们家中的壮丁，是没有人敢去抓的。而且，这些官僚豪绅还包庇他们的亲戚家的壮丁，也不应征入伍。象五原大豪绅王乐愚，把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壮丁，给带上个五原水利局渠工的符号，谁也不敢去抓（王担任水利局副局长）。临河县豪绅李干臣，把他亲戚家的壮丁给带上了个保安队的符号，谁都知道是他的家兵，哪个征兵人员敢去问上一声（李那时是长官部参事）。所有受到抓兵之苦的，只是河套地区的劳苦大众。

河套地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战期间，为保家卫国尽到了国民应尽的光荣义务。日本投降后，本应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可是，由于1945年的大征兵，使河套地区人民的残破家园遭到更惨重的破坏，土地荒芜，商业凋敝。为什么敌人投降了，还要驱赶

这些壮丁去到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战场上，自己人去打自己人呢？这些壮丁中的很多人不幸死于非命。但未战死的幸存者，经过了数年战争的教训，认清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革命本质，自觉地放下了武器，这是促使傅作义将军选择了走和平起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起义后这些河套壮丁参加了解放军，为捣毁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为维护世界和平、保家卫国，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以不怕牺牲的精神，抗击了美国侵略者。

他们转业回来后，与家人团聚在一起，投入到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 傅作义对河套土地的整理

周北峰

一九三九年冬，傅作义将军率部进攻包头。攻进城后，经两昼夜激战，又受日军反击撤出，退到五原。不久，敌人纠集日伪军三万余，侵占了河套。傅的抗日斗志很坚强，不象国民党其他军队，见日军就望风而逃。于是在绥西地区，与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把军队分成了团以上的单位，在沙窝中与日伪军绕圈作战。

伪军头目王英的父亲（王同春）很早就河套开垦，所以他在绥西地区占有领垦土地和包租蒙古王公的土地，共约有三、四千顷。河套地区到处都有他的牛渠（垦地庄园）。再加上他的垦地代管者和与他有关系的中、小垦户地主或包租蒙古王公土地的大户，布满河套，所以到处都有王英的地产（河套叫做地商人）。这个地区的人没有用仓库存粮的习惯，都是在沙窝中窖埋储藏的。那些有粮食的地主、大户们，都把他们的粮食埋藏起来跑到包头及日军占领的城市内，致使傅作义到处都找不到粮食，情况非常窘迫。

傅作义趁冬末春初黄河及各渠的冰冻融解，日本军队的机械装备不能随意通行之机，乃重整军队直捣五原，一举击溃了日伪军。王英全军溃败，由原系王英部将，以后归顺傅作义任师长的安华亭私放王英逃走了（安还曾狂妄说他演了一出《华容道》）。傅作义将军重新收复了绥西地区。

傅作义于一九三九年初脱离了阎锡山的领导，率部由晋西北转移到绥西河套，直接归了蒋介石的统辖，蒋就给傅部派了个张彝鼎接替我在傅部的军队政治工作。我便脱离傅部到了重庆。当傅与日伪军正在河套转沙窝打游击时，我在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高级政训班结业了。徐冰同志（当时周恩来副主席不在重庆，徐冰是代理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通过张友渔同志（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住在观音岩，与傅作义的驻渝办事处是近邻）捎话说：“傅部现在处境很困难，他的军政干部，不少的人尤其是蒋介石派到傅部的政工人员，都往兰州逃跑了，要是你现在回到绥西，傅一定很喜欢，便可再在傅的身边工作。”并说徐冰同志可以设法为我弄到飞往西安的机票，然后再由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设法使我搭乘由西安去兰州转宁夏的飞机，着我迅速回到绥西。于是我便照计而行。不数日

我就到了河套。我到达绥西，经过若干波折，在临河的一个小村庄（李柜圪旦）和傅作义将军会面了。就在我们会面后的第二天，日军大肆烧毁五原。傅接情报后，判断说：“日军烧毁五原，那就是准备撤离了；看样子，我们不数日便可到五原去。”果然，傅于一、二日即将他的驻在沙窝里的省政府代主席李居义老先生召到临河，组成了“战地复兴委员会”，李任主任委员，并命我任副主任委员兼“逆产处理委员会”主任。傅由临河直接奔五原，我与李居义老先生返回省政府驻地，一、二日后也去了五原。

我们这个复兴委员会及逆产处理委员会，第一张布告就是没收附逆汉奸所有的土地及包租蒙古王公土地的垦地庄园。

这样就在五原又成立了“土地整理委员会”，我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并将河套的几个垦务局接收过来，宣布停止放垦，对已放垦的土地进行清理整顿。

我详细地研究了当年清朝皇帝派貽谷钦差放垦的历史及放垦的执照存根，发现数十年来的垦户，大都是些与旅蒙商有关的商人及豪绅。他们都是用一、二两银子，或者几钱银子，向垦务局挂个号，拿上若干领垦证，便串通垦务人员满滩遍野寻找能作农田的好地，随便编个地号，作为

他的领地，就筹建垦庄经营起来。这样，每个垦庄都占地百余顷，乃至千顷，于每年春季由晋北、陕北，以及甘肃、河北等地前来河套的勤劳农民（所谓“跑青牛犊”）到河套租地耕种。农民种到哪里，这些大户们便说靠近他们垦地的都是他们领地；秋收后派他们的帐房先生向农民们三、七或四、六地分收租粮。如果某年收成特别好，他们还要对半分粮。河套这块土地当初本来是初开垦的处女地，又有黄河灌溉，耕种非常粗放，每个农民携带他的家人，一两个劳动力，便能耕种百八十亩地。这些“跑青牛犊”的佃农们收获后，便把不能运走的粮食卖给地主们，买上一两头牛，拴上一辆木轮车（二饼子车），携家带小又返回原籍。其余不能运走的粮食，换些牛、羊、马匹，就满载而归了。河套地区的大户们把他们所勒索“跑青牛犊”佃农们的粮都在沙窝中埋窖着。傅作义将军于一九三九年冬季与日军打游击时，这些大户们都纷纷逃匿，指使他们代理人设法拒绝给抗日军队供应粮食。

我偕同李居义代主席奉命所成立的“战地复兴委员会”及“土地整理委员会”就在五原进行工作。不几天，用傅作义将军的名义出了一张布告，简要地规定了几条。现在事已过四十余年，详细内容我是记不清了，但主要我还能写出来：

一、绥远全境一律停止放垦。二、凡只向垦务局挂过号而未交地价的领地，一律无效。三、凡向垦务局挂号而只交一部分地价的，交过多少地价，只留给相当的土地，其余一律撤回。四、对所有领垦地一律进行丈量。领垦地的地户于其所领的土地内，靠一边指定地段留其应得的垦地。五、凡是包租蒙古王公贵族的土地，承租权由土地整理委员会接收，支付给王公们租银，地商们今后不得过问。六、领垦户和地商们，在国家收回的土地上建有牛圈（农庄）及经营的土地，也一律由国家收回。其附设的房舍、酿造设备作价归国有。如有愿租种国家的土地者，其原建设牛圈者有优先承租权，但是不得转租。七、凡过去在此一地区内租种土地的，土地清丈后，属于领主的地段，由领主继续收租；但其租粮不得高于该土地上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其所租用土地，清丈后，属于领主侵占国家的土地，一律收回，由绥远省政府田粮处公田科收租，不再向地主、地商交租。其交租额为这块土地上正产物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这是当时国民党土地法上规定的地租标准，也就是抗日时期我党在解放区实行三五减租所规定的地租标准）。佃农们耕种的这段土地，由土地整理委员会发给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印发的土地照（当时农民们称为“部照”），

作为耕种人的永租土地，只许耕种，不得买卖转让，也不得作为抵押向外借贷。八、地主包商们在自己所设的牛圈附近经营的土地，如果代经管的人愿意继续耕种的，可以继续耕种，惟不得转租或变相转租。

傅作义将军如此决定后，即在五原就地召集了一个军政人员会议，宣布了他的意图，并向部队的军政官员们，详细地说明了这八条办法的意义，并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说明去冬打游击时，军政用粮困难的主要原因。我们这样对土地进行整理，使地主、地商们就不能再控制粮食。

当时最困难的问题，对河套地区的放垦地图无法核查，垦务局的垦地簿上，只是简单用墨笔勾划了四至概略图，而且所谓的四至，也都是垦务人员与豪绅们勾结有意马虎地写上“南至圪梁，北至水渠，东至芨芨梁，西至白刺滩”之类所谓的四至地图，哪能据此划定佃农、地主的土地界限呢？此时在河套这个地区又不可能招收一批测量人员对土地进行测量并绘出图来。于是我就商请代理主席李居义老先生，准备招收三、五百人的一个土地整理工作队，作一两个月的简易测量学习；但一时又哪里去请这些青年人？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派到傅作义军部的政治主任张彝鼎，要整顿他的政治工作人员队伍，准备分批把我



原来在傅部领导的政治工作人员，送到兰州进行整训。这些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一九三八年初向毛主席当面提出傅作义将军的请求，由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派来的学生和一九三八年春到秋分批从西安、临汾招收的抗日青年学生（我于一九三九年夏离开傅部后，这些人陆续走开了一些）。这时，张彝鼎又要进行整顿，那么这些人，自然就不愿留在军队的政治部了。不少人向傅写信请求要参加土地整理工作。我向傅呈明后，就收集了一、二百人，又商得李居义代主席的同意，到西安招收青年参加土地整理，前后三、四批共招收了二、三百人。这样就在陕坝用红柳笆搭起了一片泥窑洞，开设了一个“土地整理训练班”。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分批训练后，都分配到各地进行简易测量。并从这些青年中，选择了一百多人作为土地登记人员，携带原垦务局的放垦簿，到各地向地主们查对他的领垦证书及所交的地价。这一工作开展后，并决定先作粗糙的登记手续，务于一九四〇年秋收前概略地将应留给原领垦的地主土地和佃农们租种的土地面积弄清楚。并告诉农民说，这些土地多年都被地主们冒占收了地租。现在，既往不追了，而今后按土地上所收粮食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向县乡的田粮处公粮科交租粮。

一九四〇年初，绥远省政府正式恢复了抗日前的绥远省地政局，并任命我为地政局长，结束了土地整理委员会。各县都成立了土地登记处，全面开展了地籍登记。省政府又因田赋征实，同时成立了田粮处，征收田赋粮。田粮处附设公田科，专门征收所清理出来的公田地租。同时省政府又成立了粮食局，收购农民出卖的余粮。

这一措施很见效。全区粮食绝大部分都控制到政府手中。除留足军用粮外，以私商的名义船运包头换取杂货布匹。这样，傅作义将军所统辖的地区，不但粮食无虞，而且还将经济搞活了。

到一九四一年秋收后，绥远的豪绅便闹腾了，深深地憎恶这个土地整理办法。绥远的地务局于抗日前，本来是由绥远的头号绅士张钦担任局长，现在由我担任这个局长，他们不敢攻击傅作义的土地整理，便一齐起来向我进攻。绥远的绅士本来是分焦、祁、潘、赵四大派，他们中间互有斗争，但对于反对土地整理，意见是一致的。

傅作义将军对土地整理是很坚定的，这是他粮食和经济的命脉，所以他对豪绅们所捏造的谣言，置若罔闻。

当时对土地整理提出的口号是“垫低而不垫

高”。因为河套老百姓平整土地，有一句俗语是“铲高垫低”，就是把老乡这个俗语翻过来，用作土地整理的口号。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这些土豪认定这是对他们利益严重的侵犯，所以就用当时最耸人听闻的话向我进攻，说我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打进傅将军部的挖墙脚的人。打算用这样的恶毒办法打击我，打击傅作义对土地的整理。

一九四二年春，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行政院地政署（相当干部）召集全国地政会议。傅作义主席命我出席这个会议。行时叮嘱我到重庆时设法见蒋介石面，申述傅的土地整理用意及办法，并又告我说：他打电报给孔祥熙，请求孔设法使我拜见蒋介石。

蒋介石的土地工作是由CC派主持的，各省的地政局长大都是二陈的派系。当时会议宿舍是在重庆市夫子池一个楼舍。我在这一期间，明显地感受到会议空气对我的压力。

在会议进行中，我听到蒋介石准备接见全体与会代表，所以我会见王则鼎（傅的驻渝办事处处长）时，就将此一情况协同与傅拍了个电报。

全国地政会议闭幕了，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曾家岩要接见我们全体出席会议的各省地政局长。我们在被接见前，都先在一个候客室等待。此时

我乘便就向地政署署长郑震宇说：“我来参加会议前，因为我在绥远搞土地整理，开罪于当地的豪绅地主们，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傅作义主席的土地整理，便想把我反对掉，由他们的人承办这一件事，这样一来对他们所侵占的土地就不会有损害了。傅作义是清楚这一阴谋的，所以临行时傅告诉我说：‘你去吧，我已电告王则鼎设法对你安全作妥善安排’。并说：‘你面见蒋委员长时，可陈述绥远省对土地整理的整理情况’。”郑震宇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令我随他到了屋子外边，对我说：“前两天，调统局的顾建中曾对我说，对你的情况要注意。还有缉私总局的叶翔之告我，命你于会议结束后到他住的观音岩漱庐去和他谈谈话。你的情况我也知道点儿。你打算当面向委员长呈报你的情况，很好，只是说话要小心点！”

蒋介石接见我们时，除了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外，在旁座的还有陈立夫，张砺生。我对蒋介石说了几句普通照例的话后，就站起来说：“我来开会时，傅作义主席对我吩咐，如果能面谒委员长，可以将绥远省的土地整理情况向中央陈述明白。绥远省河套地区的地主，占有土地不是一、二百顷，大都是成千顷及至数千顷，而且多是随意侵占国家放垦的土地，有的是承包蒙古王公的

土地，大约都是方圆数十里的面积。他们霸占住土地放租收粮，所以前年五原战役时，他们都把粮食埋藏到沙窝里逃跑了，使军队得不到粮食。收复河套后，傅主席就开始停止放垦，并对已放垦的土地进行清查，把清查出的土地，变成谁种由谁直接向政府交租粮。这样当地的豪绅们就捏造是我促使傅作义主席没收人们的土地。傅主席令我向中央陈明。”

蒋介石听了后，沉吟了一下，就站起来踱着步子，告我说：“你参加完会后，就回去吧！傅主席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转过头来问郑震宇：“这一情况你们知道吗？”郑说：“口外的土地占有情况是大大地不同于关内，尤其是清朝末年领垦的土地商人和包租蒙古王公土地的地商们，更是动辄几百顷乃至千余顷。”蒋介石听了，只是点头，也没有说什么。这一场接见便算结束了。在我返寓的路上郑震宇对我说：“你这一场话说得很好，我们所顾虑的满天云雾都散了。”

这样，地政署对待我的态度马上大变了样子，并给绥远地政局批了二十万元的地籍整理费，还批准了绥远省地政局地籍整理人员编制二百人。我就在重庆购买了些平板测量仪；乘飞机到兰州后，又买了一千多根竹竿，准备由黄河顺

流而下运到绥远陕坝，作测量标杆，更大规模地在河套地区展开土地测量和登记，并普遍地成立地籍整理处。就这样在“垫低而不铲高”的口号下，把地主豪绅占国家的土地都收回来了。

这便是傅作义将军对绥西土地整理的概略情况。

（节录于《傅作义生平》《傅作义对绥西、华北的土地整理和改革》）

# 傅作义主持下的绥西地籍整理

任安国

## 一、地籍整理前的基本情况

富饶美丽的河套平原，东西长六百余华里，南北宽一百余华里，依山傍河，发展农牧业生产的条件十分优越。远在秦汉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拓荒垦殖。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政权更迭，河套平原长期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清同治四年，清军曾一度在河套设防驻军，河套归萨拉齐厅管辖。从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起，河套平原又开始了逐片、逐段地零星垦殖。由于连年荒旱，晋、陕、甘、冀、鲁等省区的灾民，陆续到河套谋生。到公元一八八三年前后，王同春、陈锦秀等大地主、大商人，从蒙旗王公及召庙租买来大片土地，雇用大批灾民，开渠灌溉，拓荒垦殖，大发其财。大地主之间互相倾轧，争地称霸，矛盾日趋尖锐，以至杀戮残害。大地主之间的争斗，使沉睡多年的这块膏腴之地兴盛起来，农业生产逐步繁荣。

河套平原的繁荣发展，引起了清王朝的关注。到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委派贻谷为绥远垦务大臣，开始大量放垦荒地。贻谷又委派姚仁山为西盟垦务总办，并在河套设立了五个分局，督办放垦事宜。过去私放私垦的土地，全部收回归公；对蒙旗王爷占有的土地，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面劝导蒙旗自愿报垦荒地，一面强令蒙旗垦荒达万顷之多。在此期间，放垦大员们乘机贪赃受贿，以“押荒银”为名，搜刮蒙汉民脂民膏。除中饱私囊，挥霍无度之外，还将搜刮来的大量资财上贡清廷，以博得宠信。贻谷放垦既收去了汉族大地商的土地，也把蒙古族人民的户口地放垦，大片草原被破坏，因此，引起了蒙汉人民的强烈不满，贻谷也被迫下台。

清末民初，仍沿用流弊多端的放垦办法，使河套地区的土地属有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辽阔的河套平原，被切割得四分五裂，什么王爷地、召庙地、户口地、公产地、屯垦地、天主教堂地、牧场地、耶稣教堂地、国有农场地、官僚地主占有地及一般中小土地占有者等。名目繁多的土地属有关系，使河套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构成了河套地区的特殊的阶级关系和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蒙族



牧民和汉民争牧场、争垦地；大地主之间争水的矛盾；地主与中小土地占有者及佃农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在河套地区十分尖锐，各据一方，弱肉强食，各有自卫武装，甚至大动干戈。在临河三区有张维世与王峰亮因争水伤害人命案；在五原有王同春和陈锦秀之争；米仓县的杨米仓、临河的德和泉，以及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隆兴长、同义隆、祥太奎、锦秀堂、义太奎等商贾兼地主，均有分庭抗礼之势力。

在河套这块土地上，不仅封建地主猖狂一时，而且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官僚军阀也趁机而入。1932年，阎锡山抽调了他在山西的一大批退役军官和士兵，组成军垦大队，开进后套。名义上是开发后套，实际上是霸占土地，扩大地盘，牵制傅作义。屯垦队以狼山、新华为营盘，逐步向外扩张到临河、五原、安北一带，图谋永驻后套，割据绥西。屯垦队把霸占来的大片土地出租给佃农耕耘，坐收地租，与农民经常发生矛盾。阎锡山的屯垦队和蒙族王公贵族、官府豪绅互相勾结，互为利用，蒙汉人民深受剥削压榨。特别是屯垦兵痞、二流子，更是胡作非为，奸污妇女，拦路抢劫，吸食料面，无所不为，依仗枪杆在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官僚军阀的魔掌伸进后套后，给河套土地关系造成的又一特殊矛

盾。

洋教堂是后套人民头上的一把刀。从1901年至1902年，河套地区给洋教堂赔款白银两千余万两。庚子赔款割让给洋教堂的土地达四千四百余顷。洋教堂坐收其利，盘剥农民，后套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后套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军阀、官僚、地主和教堂，垄断了后套的绝大部分土地。据1949年地籍整理资料统计，河套耕地共四百二十二万九千余亩，90%为地主军阀所占有。李干臣、王乐愚、杨义、唐六等，占去了90%中的40%。因而，公元1912年冯玉祥率部入套，军粮、军饷靠王同春等大地主筹措。

## 二、绥远省地政局的设置及河套地区的地籍整理工作

1939年傅作义将军为了抗日，率部从河曲来后套，经济十分困难，不得不向豪绅地主如临河德和泉的李干臣等筹借军粮。为了解决清廷放垦以来河套土地占有关系的弊端问题，以保证军政人员的粮饷，增加战区的财政收入，于1940年在五原设置了“绥远省地籍整理委员会”，对河套地区的土地进行测量，清理地，富多余占有的土

地。这次地籍整理，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政署的认可。一方面他们认为河套是一块得天独厚的肥沃草原，人少地广，灌溉便利，有开发前途，公地面积极为广阔，可体现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另一方面认为可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所以，绥远省地籍整理委员会的一切经费开支，皆由国民党的地政署负责拨款。

1940年5月，傅作义开始丈清全套土地，取缔包租转租。委派周北峰组织绥远省地籍整理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地政局。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地处抗日前线的河套，不但人材缺乏，连招用普通工作人员亦有困难。1936年到1940年，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战役”和“五原战役”相继击溃了日本侵略军，取得了名震中外的辉煌胜利，吸引了一大批爱国青年。为了开展繁重的测量整理工作，周北峰局长于1942至1943年先后派人去西安、临汾分批招来一、二百名青年学生；这批学生有的是沦陷区来的，有的是从大后方来的，多是有志抗日的热血青年。这些青年经过一定时期的专业培训及形势教育，为全面开展后套的地籍整理工作准备了力量。还有一部分是张彝鼎整顿傅部政工工作人员整下来的一批人，约一百余人，两批

共二、三百人。其次是将原垦务局的放垦人员接收过来，如黄郁庭、永泉、阎祯等都是。这些人保存有较完整的放垦帐簿，而且业务熟悉，在核对垦帐、计款留地、土地登记等实际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将绥远省地政局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列表如下：

职 务	姓 名	主 管 工 作
局 长	周北峰	总揽全局行政业务
副 局 长	赵国鼎	协助局长工作
秘书主任	永 泉	干部任免考核、公文缮拟等
秘 书	孙子和	缮拟公文、批阅文件等
第一科长	阎 祯	总管全局总务及职工生活
财会主任	张玉岭	全局财务管理
第二科长	王振兴	土地行政、土地纠葛、地权处理
第三科长	郭开周	土地登记、土地估价、地价编造
核帐专员	黄郁庭	核对垦帐、计款留地
督 检 员	马乐善	检查、督导职工生活纪律

说明：每科室有科员2—3人。第三科设有土地登记处，人数在十余人以上。各县、乡均有土地登记处，主要任务是核对垦帐、计款留地，即根据原垦务局的放垦帐簿，核查各户缴银数和

土地数。对只在放垦帐上挂个名号而未缴纳“押荒银”者，不予登记土地。赵国鼎原任狼山县县长。永泉是垦务局老垦务员，汉文造诣较深，深受局长尊重，故委以秘书主任。

### 绥远省地政局测量队技术人员编制表

职 务	姓 名	主 要 工 作 任 务
测量队长	叶正明	地籍测量人员配备、考核
副队长	杨国次	协助队长安排测量计划， 部署工作
第一分队长	赵朝虎	有关三角导线工作的开展 计划、大地面控制等
第一三角导 线 组 长	邢国瑞	有关三角点设置、打桩、 地面计示控制
第二组组长	卡其伦	" "
第三组组长	郑继武	" "
第二分队长	刘次卿	地面碎部测量，分管十三 个测量组，各组领导十六、 七名测量员及测工进行测 量，全队共有测绘人员 221人，每幅平板仪配备测 量员一人，测工二人，根据 三角导线桩点投影绘图。 进行土地面积的碎部测
第一组组长	余 恒	
第二组组长	孙树动	
第三组组长	王殿华	
第四组组长	苏永华	

第五组组长	边永治	量,包括地形、地貌、地物、
第六组组长	成文明	渠道、公路交通、河流、乡、
第七组组长	徐相苹	县界,湖泊、沼泽、桥梁、
第八组组长	李绍庚	公共设施、树木、村庄、
第九组组长	袁子儒	沙丘、熟荒、碱地等都
第十组组长	袁万谷	须在图纸上注明。每幅图
第三分队长	梁效伟	纸控制面积为四十八顷,
检查组长	张海峰	不得有差误。图纸统一编
制图组长	王立生	号、统一比例,测绘好
秘 书	方景云	后,移交检查组审查。
秘 书	谢守安	对原图进行检查描绘
技 正	李署权	对原图复查接边
土地登记处	刘振汉	对原图检查无误后进行复
主 任		制
土地登记处	任安国	建立部队有关规章制度,
主 任		制定工作计划,职工调配
		及记录整理,文书处理等。
		“ ”
		负责技术室全部工作
		根据计款留地收据划分
		公、私土地,并发放土地
		权状
		“ ”

绥远省地政局所属测量队、技术室，是抗战时期傅作义领导下的，拥有三百余名职工的庞大机构。完成后套地区地籍整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具备雄厚的技术力量。以周北峰为首的地政局，从大后方招聘了一批具有测绘专业技术的人员，如测量队长叶正明，技术室技正李署权、以及梁效伟、刘次卿等即是。

三角导线组的工作，要求精密度很高，计算必须准确，不得超出规定误差。图与图之间的接边必须相投。当时只有两架求积仪，不得不用三棱尺按比例分度量出，并计算出每坵面积，每幅原图经过逐坵计算后，总面积不得超过原图控制的总面积，更不得超过允许误差。核对无误后，交复印组复制。复制的每份图纸都有接边对号和数字排号，并注写每坵面积、熟、荒、碱化情况及地物名称，然后交土地登记处。各县都设有土地登记处，人员由地政局委派。登记处的任务是核对垦帐，按照计款留地的办法进行土地登记工作。余出的土地用红色标记，图纸上公私分明。清理出的公田，按图纸分坵入册，以资统计汇总。这样，地籍整理工作经过核对垦帐、计款留地、土地测量、面积计算、图纸复印、土地登记、权状发放、公田汇总等一系列工作后，方告完成。

地籍整理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职工队伍庞大，大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精力充沛。周北峰局长在思想上、纪律上、生活上对青年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他要求青年们树立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对于完成任务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怕风沙打，不怕太阳晒，跑路淌渠，足迹遍布河套平原。餐风宿露，起居均无定时。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地处绥西前线，生活极其艰苦。吃粮、穿衣均有定量，工资十分微薄，姚华元干了两年多测量员，母亲有病，催他回天水探望，但苦于路费无法筹措，只好作罢。生活是艰苦的，工作是繁重的，但人们都没有怨言，情绪都很高涨，只盼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的绥远省地政局，设在陕坝镇大转盘东（现农具厂院）。办公室很简陋，只有十余间低矮的土房，外型似一座蒙古包，四角挂有耳房，中间有六十余平方米作办公室，屋顶是个大天窗，几个科室挤在一起。办公桌是泥台子，上面铺一块大羊毛毡。泥台周围是长木板搭的坐凳。到了冬天，办公室只有一个大土炉子取暖。职工宿舍的条件就更差了。数十间破土房，每间房都盘有一个大土炕，上铺麦草，作为冬季测量人员的寝室。

地政局的经费是由国民党中央地政署拨款



的，但办公费扣得很紧，绘图铅笔要用得抓不住时，才能用这个铅笔头换领一支新铅笔，因为图纸和绘图铅笔都是从大后方买来的。对昂贵仪器，如精微仪、求积仪等，均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谁使用谁负责保护管理，不得损坏。

从1941年至1945年，经过四年多艰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河套各县的地籍整理任务。清丈出万千顷公田，根据辖区分别编选出各县的公地册、地亩册，发放了私有土地权状，移交给地方县政府接管。这样，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公田，对充实地方财政提供了可靠保证。地政局根据河套地籍进展情况，由勘察队长赵朝虎率领一部分三角导线组赴伊盟勘察，以便为今后的测绘准备条件。之后，又在五原县设立了地籍整理办事处，以永泉为主任，将各项工作继续向安北县境推进。当时大余太是敌占区，仅完成了乌梁素海以西的测绘工作。当时的乌梁素海，东西宽二十余华里，南北长一百余华里。

### 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地政局情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军民精神振奋，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傅作义将军领导下的军政人员东进包头、呼和浩特、张家口以致北平。绥远省地政局在局长周北

峰、副局长赵国鼎组织下，率领一大批得力人员返回呼和浩特，在绥远省政府大院，建立起办公厅，挂牌为绥远省地政局。在原旧城设立归绥市地籍整理办事处，副局长赵国鼎兼任处长。地政局东进后，陕北地政局的遗留问题，由第一科长阎祯负责处理。任务完成后，部分人员东调，部分人员遣散回家，另谋生计。

由于国内时局动荡，人心惶惶，有的官太太、家属陆续返回后套。东进的地籍整理人员，有的分配在归绥市地籍整理办事处，但由于工作无法全面展开，人们上班聊天，下班逛大街无所事事。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抢占胜利果实，争夺地盘，时局愈加紧张。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中央地政署停止了拨款，绥远地政局则岌岌可危，直到无法维持，不得已，各奔前程，自谋生计。有的返回故乡，有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几年的地籍整理中，国民党中央拨出巨款，意欲以河套为典范，实施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是，几年的艰苦测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清理出万千顷公田，却只能是一纸空文。1947年，在绥西各县政府设立了地政科，科长由地政局委派。五原县的地政科长王世昭，安北县是任安国，晏江县是景世贞，狼山县是宋连城，临河县是刘福元，米仓县的地政

代科长韩泽普。地政局当时决定了租放公田的办法，是“谁耕归谁有”，但执行起来矛盾重重，阻力很大，根本执行不了。阻力主要来自于国民党官僚和地方豪绅。比如，原来佃农租耕地主霸占的公田，经过地籍整理后，土地应归佃农所有，或自耕农所有，但在抽拨土地时，地主不放手。如梁九洲团长、武俊峰师长、朱霁青委员，都占有大片公地，而不愿划归无地可耕的农民。另外天主教、耶稣教、召庙等，都占有不少公田，却不肯放手。面对这些矛盾，作为一县之主的县太爷，都只能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当然，也有一些佃农、自耕农领到了公田，毕竟为数很少。所以，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只能挂在嘴上，写在纸上，难能见诸于事实。

# 抗战时期河套交通 和陕坝市镇建设片断

石兆璠

抗日战争以前，河套地区交通十分不便。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进驻陕坝后，对河套交通建设极为重视。一九三九年春，他目睹当地交通破烂、满目疮痍，曾先后指令绥远省府发动五、临、安各县征派民工补修主要道路。一面由傅长官部命令部分军队，配合民工整修陕五南路。如此零星整修，曾初见效果。

“五原战役”后，河套道路因决坝放水，十之九被破坏，水运也受阻，影响了军民生活物资与军备输送。恢复发展交通，成为当时关键问题。仅由省建设厅二科主管交通，因人少事繁碍难胜任。经多方研讨乃有组建交通管理专业机构之设想。

一九四二年五月，绥远省第一个交通管理机构——绥远省公路管理处在陕坝成立。第一任处长许其昌，以具有建修公路管理经验，为时人寄以重望，惟到任不久，即坚辞离去。继任者赵恩绶，未几亦因体力不支转调。第三任特由八战区

傅长官部、副官处长温永栋少将兼任之，温为人精练，处事有方，但因军务缠身，不能内外兼顾；至此又另委长官部副官主任刘鉴训继任之。这已是一年来四易处长了。

刘鉴训山东平阴人，曾以处事审慎负责著称。刘到职后，又推荐许其昌为副处长。由于刘许二人配合得当，不遗余力，采取扩大机构、广招工程技术人员……从而河套交通建设，开始起步。

我当时充任省公路处技正，曾参与部分工程的计划、修建与测设施工。兹据个人亲历与耳闻目睹，即普修道路，组建各种运输队；广造船只，开辟区内外航线；始建飞机场、渡口增设电话；修建中山堂、塞上新舍等，分录如后。因时过四十多年，挂一漏万、数据错误之处，实所不免，并请各方知情人士赐予指正！

### **普修道路、组建各种运输队**

一九四二年以前，傅作义仅对河套地区主要大车道，由各县征派民工进行了修整。对于公路尚未进行全面整修。

一九四三年始整修畅通了陕五南线。即五原、郝镜桥、蛮可素、邬家地、熊万库、天吉太桥、赵三地、靳家台子、张家庙、临河，又西北

行，经红海店、至陕坝全长125公里。

一九四四年整修了：（1）陕五北线：从陕坝、二十五里桥、世成西、桃园公、公义恒、永安堡、百川堡、七股地、五分子桥、良忱乡、塔尔湖、乃马召、新公中、任宝圪旦至五原、计长110公里。（2）陕三线：从陕坝西南行过河北店、八岱、黄羊木头、头道桥、补隆淖、东堂、天兴泉至三盛公。计长78公里。

同年还新修了三盛公至石咀山间黄河东线。中经萝卜召、百眼窑、棋盘井至石咀山全长173公里。因原公路旧线是走行黄河西岸，中跨“乌兰布和”沙漠，汽车难行，又时有土匪出没，抢劫事件屡有发生，商旅视为畏途。傅作义对此乃指由省公路处改线从黄河东岸移至西岸变艰险为通途，从而能使汽车奔驰于草原戈壁了。

一九四五年初，已决定整修五原至西山咀段。这条路中经燕安和桥、西槐木、扒子补隆等地，计长65公里。抗日战争胜利后，傅作义率绥省军政人员东返绥包，秋末又抢修了西山咀至包头段公路计长130公里。西包段，改行于乌拉山麓前的砂砾自然路上，汽车可以晴雨通行。

以上各公路总长681公里。是河套内外交通动脉，对当时与西北大后方补给供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是傅作义坐镇河套时，军民所付

出的艰苦劳动，取得的重要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部驻扎大军之布防，遍及黄河南北两岸及狼山与白云常合山以北的高台梁、伊克昭盟的陶力民一带。只靠几条公路，不能担负全部运输任务。几年来普修了各县乡村镇间简易的大车道数以百计，总长一千余公里，星罗棋布、四通八达，为车、驼运输创造了条件。此外，还将一些大车道改修为可通汽车的公路支线，共九条、全长142公里。这些支线有：

- 1、五原至万和长线，计长25公里；
- 2、五原至南牛渠线，计长18公里；
- 3、五原至乌兰脑包线，计长25公里；
- 4、陕坝至大顺城线，计长5公里；
- 5、陕坝至胡柜城线，计长15公里；
- 6、陕坝经三道桥至梅令庙线，计长20公里；
- 7、陕坝至二道桥（杨柜）线；计长20公里；
- 8、陕坝至蛮会线，计长19公里；
- 9、蛮会至大发公线，计长10公里。

在这一时期，对河套境内各公路桥梁、涵洞，都改建提高了通过等级标准，由原建“汽5吨”者，分别改建为“汽8吨”或“汽10吨”。而临河西马道桥则改建为深基大跨的“豪氏木桁

桥”。实绥西首建木桁桥。

由于汽油缺乏，境内军民运输很少依赖汽车，古老的运输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全境军政商民，组建了好多车驼运输队，每队有车、驼三五十头、总数达数千辆。向后山、黄河西等地输送粮、油、军用品，则由沙漠之舟的“骆驼”队承担，它具有抗渴耐饥之特性。到一九四五年末，骆驼总头数达三千余只。

一九四二年五月，原西北公路局、宁夏运输分处，派员来陕坝建立汽车运输站。属官方汽车营运机构。虽开始了陕宁、陕兰（兰州）等地商运，但终因汽车太少，说是每周陕宁对开，并无保证，且票价昂贵，故一般百姓鲜少问津。

### 制造船只开辟航线、渡口

抗日战争时期，河套水运有很大发展，现从开辟航线、整顿渡口、制造船只分述之。

一九三八年初，包头南海子的绥远省航运中心已转移到临河马道桥，原绥远省设在南海子的黄河船筏总会与黄河河路社均迁于此。

黄河船筏总会，是绥省境内旧船业的法团组织，经官方允许办理黄河船筏营运业务及航政等。其经费由船筏营收中提取捐费，每发一船，船户缴费6元，货主缴纳12元。



黄河河路社，为船业之公证与调解机构。当船户与货主发生争执时从中调解。经官方允许，每发一船，货主向其缴捐1元，船户缴捐1—2元为办社经费。

这两个组织迁移临河马道桥后，绥省为简化船运机构，合并为“绥西船筏同业公会”。但由官方派一人为主任，其经费仍由船筏营收中提取手续费。但法币贬值一日三变，已是水涨船高，早晚市价不同了。

这个“公会”组建后问题不少，且时有水运事故与劳资纠纷，人们怨声载道。一九四四年绥省特指由省公路处，组建绥省航务管理段于马道桥，为官方航政管理机构，以加强航运业务之开发。

在一这时期，西来船筏大增（青、甘、宁船筏），年在千只次以上，所载商品有木材、水烟、皮毛、药材以及煤炭、瓷器等，运出物资则为粮油等土产。再加当地木船的增加，河套境内新开渠河航路12条，总长340公里。计有：

- 1、三盛公黄河岸至沈家河桥线计长2公里；
- 2、黄河至乌拉河桥西线计长45公里；
- 3、黄河至三道桥航线计长45公里；
- 4、黄河至陕坝园子渠、黄济渠航线，计长

35公里；

5、黄河至马道桥永济渠航线，计长42公里，可下流通崇发公桥；

6、黄河至天吉太桥、丰济渠航线可下流至五分子桥，计长35公里；

7、黄河至五原隆兴长县城、义和渠航线，计长35公里；

8、黄河至燕安和桥、通济渠航线，计长30公里；

9、黄河至西槐木桥、长济渠航线，计长25公里；

10、西山咀退水渠航线，计长10公里；

11、黄河至葛舍桥、塔布渠航线计长25公里；

12、五加河航线，季节性分段通航，全年累计长35公里。

以上境内航线连通了黄河往来船筏，负担了河套军民内外物资交流的大部分。因其运载量大、运费低，成为一支强大的运输力。1938年至1945年间，是河套航运的高潮，几年中建造公私船只约千只左右，其中以兵站分监部居首位，绥省粮食部门次之，民造私船较少。

当时造船只、兴水运中，曾一度提倡仿造“羊皮洪洞”，即羊皮筏子，其工艺简易，运转灵活。惟其习惯不同与操作搬运技术所限，造者

寥寥，故流用者多为西来船户所备。

当时所用的主要船型有：

1、东船，就是当地及包头、河口一带所造船只的通称，分七站船、五站船两种。七站者由七块柳板拼装而成。船分三舱，高2.3米、宽8.1米、长10米；吃水深1.2米。下水可载重3—4万斤；上水可载二万斤左右。

2、西船，就是高帮船，属西来船只通称，为甘、宁一带船户所造。船两头尖形，船头仅宽1米、高1.5米、宽5.5米、长12—14米，底平。吃水深0.6米，全部用柳板钉成。下水可装货3万斤，上水也可装2万斤。

3、盐碱船，也属东船，为当时黄河中最大船只，由七块柳板拼成。高2.6米、宽8.5米、长17米，吃水深1.4米。下水可载重10万斤，多系河口来河套由碱柜（渡口）去伊盟碱淖尔拉碱船只。

4、平底渡船，分大、中、小三种，状皆相同，底平。大者长20—30米、宽10—15米、高1.7米。船舱上铺平厚木板，可平放四辆汽车，备于三盛公渡口。中、小渡船则备于一般或较小河渠渡口，供渡行人车马用。

5、木筏、皮筏，系由甘、青、宁流来。

抗日战争时期，在兴造船只，开辟航路大兴

水运时，对境内渡口分别、分期作了整顿与加强管理。计有：

一、黄河渡口。自三盛公以东依次计之有：

1、三盛公渡，位于磴口，系黄河包宁公路渡口；

2、渡口堂渡，位于磴口县境；

3、塔儿湾渡，位于临河县境；

4、三苗树渡，位于临河县境；

5、碱柜渡，位于五原县境；

6、马七渡，位于五原县境；

7、奎素渡，位于乌拉特前旗境；

8、刘和仁渡，位于乌拉特前旗境；

9、孟家营子渡，位于乌拉特前旗境；

10、万兴西渡，位于乌拉特前旗境；

11、色气渡，位于乌拉特前旗境。

以上各渡口多属行人不渡。

二、境内渠道渡口有：

1、四柜渡口，位于五原县东部；

2、义和园渡口，位于五原县东北部；

3、大财主圪旦渡口，位于五原县北部；

4、万和长渡口，位于五原县北部；

5、辛柜圪旦渡口，位于五原县西北部；

6、贾格尔旗庙渡口，位于五原县西北部；

7、三岔口渡口，位于临河县境东北部；

- 8、东皮房渡口，位于临河县北部；
- 9、铁匠圪旦渡口，位于杭后旗东北部；
- 10、二喜渡口，位于杭后旗东北部；
- 11、大坝渡口，位于杭后旗东北部；
- 12、李主任渡口，位于杭后旗东北部；
- 13、黄羊木头渡口，位于临河黄羊乡东。

一九四六年初，黄河航运中心已转移到包头南海子。河套航运大落，每况愈下。

### 增设电话、修建陕坝飞机场

一九三七年以前，河套虽地处包头宁夏之间，但五原、临河等县境的电话，皆通讯不灵，网点太少。

抗日战争后，傅作义转战到此，总感电话不能畅通，影响军务。曾几度整修线路，也未达预期目的。一九四四年任命刘鉴训兼绥省军电局局长，关恒凯为副局长，明令整顿、改进、提高通讯能量。他们采取增架电杆网络、培训专业线路话务人员、新增话点与总机配备……年末军政电话通讯得以灵活畅通。于是各县乡之间及军队团营以上营地，均可通话，电话不灵有所改观。

“五原战役”后，河套驻军以歼灭日伪进犯，毙日寇水川中将，战果辉煌，为国人所赞誉。此后，军政大员来河套视察劳军者纷至沓

来。他们以汽车往来不适，乃有乘飞机来套之呼声，傅作义于1942年春，指由副长官部派员修建“陕坝飞机场”。该飞机场位于陕坝西南10公里处（今陕磴公路河北店道班东北），占地约一万余平方米。只作了平整场地，铲高垫低，工程极为简易，以达飞机起降目的。

一九四二年张治中来河套视察，一九四五年美军将领魏德迈来陕坝，都是在此机场降落起飞的。傅作义还在陕坝塞上新舍，接待了魏德迈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农业，这个机场已恢复为良田。

### 修建中山堂、塞上新舍

一九三八年后，原来临河县第三区所在地太安镇——陕坝，因军政机关聚集，一变而成为绥远省军政中心。新县制后升格为“陕坝市政筹备处”，同县级。居民由过去的三千人，猛增到二万人以上。尤以五原击退日伪侵略军后，各地报刊，咸以“绥西前线某地”蜚声国内。

这个阶段市面日呈繁荣，人口开始稠密，有时虽可听到枪声，毕竟是偶然的军事演习。在居住的抗日人员与“避难者”中，委实缺少闲庭信步，走游处所，以寄离乡背井之思！

在陕坝开始出现八景：东街井、西沙梁、三义巷、钻天杨、大转盘、高油坊、塞上新舍、中山堂、园子渠口，天主堂的八景如何，且不赘述。因中山堂与塞上新舍，曾为当时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所主建，人们对这两项工程建筑记忆犹新，略写其鳞爪。

中山堂，1942年建于今杭后陕坝剧院旧址。属旧式剧场，系砖木结构，占地面积约一千平方米。分楼上、楼下两层；地面呈前低后高。地面上置长条木凳椅；楼上分正楼与两厢，也均置长条木凳，计可容纳观众千余人，为官方会场与群众集会文娱场地。初由副长官部督建。工程技术负责人为副官处技士高季彭。施工后，因木材规格不符，达不到设计标准，尤以“人字木屋架”料为最差。施工后期，高君因故离开工地。在停工中有李长春者（毕业于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承担续建工程。中经李君详为计算，人字屋架材料规格，配料加工如期竣工，交付使用。（李长春时充任省公路处技正兼工务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充绥省交通局、内蒙交通厅工程师，已病故）。

中山堂建成后，为当时陕坝唯一文娱演出场所。为副长官部戏曲学校，以其名演员张丽君、张伟君、新艳琴以及老教师杨鸿林、名琴师曹丹侯等演出场地，曾为时人瞩目！山西蒲州梆

子票友社，则有王元凯、舒明贵等主角，双方交换对台，脍炙人口。所演剧目：京剧主要有“四郎探母”、“武家坡”；蒲剧有“柜中缘”、“鞭打芦花”……名噪一时。在硝烟弥漫、战火方殷中，颇具升平景象。

“塞上新舍”，修建于一九四四年，位于今杭锦旗旗委旧址。占地总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包括广场）。大门庭房为人字形房顶，上置旗杆，后院房屋布局，大体分客房、餐厅（代舞厅会议室）、小会议室、厨房、警卫室、工作人员室……。造型属老三合一式，系砖木结构，总建筑面积约二千八百平方米。修建这个接待贵宾新舍，实为当地土建房舍所望尘莫及！人们对此见仁见智，毁誉也是不同的。

这项工程由省公路处第三工程队（绥省营建委员会）承建。主建人梁振基，毕业于陆军工兵学校，对房建工程颇具匠心，时任省公路处技正，兼技术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某建筑部门工作，现不详）。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上述事物，已是昨日黄花了！傅作义将军自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在临河马道桥目睹他乘汽车离开河套后，绝少旧地重游。而他所撒下的交通建设种子，在继续茁壮成长中。



# 傅作义将军在河套兴修

## 水利和修建军营略述

白焕瑜 李敏才 陈祖良供稿

张世杰整理

一九三九年二月间，傅作义将军奉命率领三十五军由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出发，途经伊克昭盟所属各旗，进驻河套。

那时河套人口不到二十六万，其中从事农牧业的人口约为十七万多一点。共有可耕土地面积约为十多万顷，其中已开垦的土地约为四万多顷（每顷一百亩），占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远在傅作义将军进套之前，套内早已大军云集，他们都是在归绥、包头陷落后，由前线溃退下来的正规军、杂牌军和一部分似军而匪的武装部队。其中有：门炳岳的骑兵第七师，阎锡山屯垦军的五临警备旅，安华亭的步兵第五旅，马鸿宾的八十一军，白海凤的新三师，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邓宝珊的八十六师，井得泉的骑兵师，张砺生的晋察绥边区挺进军，李大超的游击军，姚景川的热河挺进军以及游杂部队的邬青云、赵

炽昌、王有功、郭长青、鄂友三、武驼羔（俊峰）等为数众多的队伍，再加上傅作义将军带来的三十五军和他后来扩编的步兵暂三军与骑兵第四军。当时驻扎在河套地区的各路军队约有十几万人，统归傅作义将军节制和指挥。

傅作义将军率兵进套时，河套地区原设有五原、临河、安北三个县。但安北县的一、三区和有余太等地方，均已陷入敌手，实际上安北只能算为半个县。一九四二年，傅作义将军在套内实行新县制，将原有的两个半县的地区划分为：安北、五原、宴江、狼山、临河、米仓六个县。看来县的数目是多了，但地盘和农民的数目如故，并未增加。此时，面对着千军万马的后大套，不仅大有人满之患，并且还遇到了最大的困难问题，这就是广大军政人员的吃住问题。

在困难面前，傅作义将军并没有低头。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组织军队大兴水利；为了解决军队的住房问题，他采用自力更生的方法，发动军队修建军营，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的这种做法，不但妥善地解决了当时的军需民食以及军队的营房问题，特别是他发动和组织广大官兵兴修的水利，确实给后套人民办了大好事。

现将傅作义将军在河套兴修水利和修建军营

的简要情况，分别叙述于后：

## 一、兴修水利

河套素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说法。这是由于几千年来的黄河河道迁移频繁，淤积而成的后套平原，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水利方便，农牧咸宜之故。早在清代，入套的农民即由黄河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及至后套放垦时，套内已有公私渠道三十四道。这些渠道，对发展农业，生产粮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军云集河套后，在地广人稀的后大套里，骤然增加了如此众多的人马，而且军粮、马料全要由当地人民来负担，于是便出现了生产少，负荷重，粮食紧张，人民痛苦的局面。当时，在军队官兵的伙食里，每餐都要搭配杂粮和饲料作为主食，广大官兵整整吃了一年半的黑豆和豌豆，致使他们的身体健康日益恶化。而农民的生活，也在半饥半饱之中。

为了解决军需民食问题，傅作义将军考虑到，要想促进套内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必须从兴修水利开始。为此，他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季，决定以军队为主，以民工为辅，开挖复兴渠，以改善当时五原、晏江两县自流渠口的引水设施，扩大水浇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渠名“复兴”

者，系指在五原抗战大捷后，河套开始恢复发展之意。

计划开挖的复兴渠，它是与黄河平行的大型输水渠道，工程完成后，可向毛家渠、旧皂火渠、新皂火渠、新议渠、广泽渠、中兴西渠、郎家地渠、哈拉乌素渠、阿善渠、十大股渠、沙河渠等十一道干渠供水。其灌溉面积将近五原、晏江两县土地面积的一半，在四十万亩左右。

一九四三年初，傅作义将军委派绥西水利局长王文景兼任复兴渠工程处主任，由工程师即测量队长程瑞琮（美国留学生）主持业务，委由屯垦队派来的樊步鳌管理总务，还特邀五原和宴江两县的领导人员参加挖渠工程的协作。工程处以下设六个段，由靠近渠道的各乡长兼任段长，每段各派测量员一名，在段内搞施工业务。

渠道经过测绘后，经研究决定，复兴渠沿黄河东向平行，西起李根子圪旦，与在丰济渠口同一处的河湾开口，东至阎罗圪旦，即现在的五原县白银乡东界，接入沙河渠，全渠总长为八十华里，渠口段设计为：底宽20米，一般挖深1.5—2米，一般开口宽30米，旱台8米，输水能力20—30立方米/秒；下游逐渐缩窄到底宽15米，旱台6米。全渠设控制草闸四座：第一闸在李根子圪旦村北，第二闸在皮坊圪旦，第三闸在代州圪旦，

第四闸在王乾五圪旦。所有各闸都用土法提拉束放。建闸材料除从兰州购进少量红松外，以就地取材为主，征用当地出产的哈木儿、红柳、河柳、家柳和芨芨草等。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根据当时河套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冻土才能消通的气温条件，决定开工时间为四月二十日；为了及时放水，不误灌溉，要求工程任务必须在四十天内完成，至迟在六月十日前保质、保量的挖通复兴渠。

在开挖复兴渠道工程的整个过程中，全部挖渠的土方量，都是由副司令长官部指派官兵担任完成的。这些部队的番号有：三十五军、暂三军、挺进军、别动队等，出动的人数在两万人以上。

一九四三年四月下旬，傅作义将军亲临五原，召集三十五军全体官兵讲话。在讲话中，他除了阐述兴修水利工程的重大意义外，并要求全体官兵积极行动，努力奋斗，必须在四十天内开挖出一条新的大干渠来。接着，他又算了一笔帐。他说，渠成之后，可扩大灌溉面积十万余亩，每年能增产粮食一千五百多万斤，供三万人一年的食用。

在施工中，领队人员均为团级军官，董其武、孙兰峰等高级将领也亲自参加了指挥，各师

师长，都经常住在工地上，现场指挥挖渠。如师长袁庆荣在开挖期间，一再向全师官兵申明：

“挖渠如打仗，谁要完不成任务，以作战不力论处”！他在工地视察期间，如发现排、连长挖渠不力或东游西窜的，立即予以训斥，对屡教不改的人员，还给以撤职处分。同时，对挖渠特别卖力的官兵，他都及时地予以表扬，有的还被提升晋级。如该师九十五团一营二连排长李敏才，他和士兵一样的担土方，工作出色，干劲很大，在工地上不仅受到了袁师长的表扬，并在复兴渠竣工以后，袁师长还提升他为本连的上尉连长。

驻在五原县的三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团团长张惠源在挖渠部队出发前，曾在南茅庵村集合全团官兵讲话，要求本团官兵一定要按期、保质、保量地完成挖渠任务。如工作不力，影响放水者，定以军法从事。他还以命令形式，规定了自连长以下的所有官兵，一律要承担土方任务，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四方土（每方为一米宽，一米长、一米深）。

该团一营二连驻扎在五原县邬家地附近的阿善村，他们承担了阿善村附近的挖渠工段。在开工前，该连连长王宝瑗给全连官兵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四方土的任务，谁先挖完，谁就回去休息；谁挖不完，谁就得连夜干，以完成任务为

准。凡士兵挖的土方，由班长验收；各班挖的土方，由排长验收；各排挖的土方，由连长亲自验收。

在挖渠初期，因天气不热，阿善工段内的二连官兵均着棉军衣担土方（当时单军服尚未发下），但劳动不多时，便觉汗流浹背，热不可耐，不得不脱去棉衣、棉裤，进行劳动。抗日期间，物资奇缺，官兵们除棉衣外，没有衬衣，只好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在担土方。尽管条件困难，生活艰苦，但在抗战建国，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广大官兵终于在六月十日前，按质、按量地完成了挖渠任务，保证了农田的及时放水灌溉。

在傅作义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在驻套全体官兵的一致努力下，他们抱着爱祖国，爱民族，抗战救国的高度热忱，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吃的是糜米杂粮，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地劳动在挖渠工地上，终于在河套的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胜利地完成了复兴渠的开挖任务。

开闸放水之际，正值麦苗孕穗之时，此时此刻，需水正殷。在渠水滚滚东下当中，水势旺盛，水量充沛，对此，农民莫不欣喜若狂，他们载歌载舞，同声为傅作义将军祝福，并不断地歌颂他留给河套人民的功德。

为了庆祝复兴渠的开挖成功，竣工典礼是在

王四圪旦召开的，由副司令长官部派副军长刘万春主持会议。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除奖赏挖渠有功人员外，还演剧助兴。各师团也都分别举行了庆功慰问大会。地方政府也都发动和组织群众对挖渠部队进行慰问。当时凡参加挖渠的各连，均得到慰问的猪肉五十斤，粉条三十斤。同时，还有铃铃红和筱月仙的晋剧团，孙小辫的魔术团，为各部队巡回演出，以示慰问。

除此之外，傅作义将军还命令所属部队，大力帮助各县兴修水利，开挖渠道，如米仓县的机缘渠就是由部队帮助挖成的。原来在机缘渠未开挖前，当地农民利用大沙沟的退水在大坝坐坝进行灌溉。其灌溉的范围有今杭锦后旗小召乡的先锋、永增、刹台庙、新胜、永丰、坚强、坚胜、坚永各村及南渠乡的长庆村的土地。在一般的情况下，每年春秋坐坝二次，每次坐坝用柴三、四十万斤，用人工两、三千个。有时水大，还需要坐三次坝。通过坐坝鼓水，使水流入二丈四渠，送往各小渠浇地。这样可浇地两万多亩，最多时，可达到三万亩左右。若遇水小，大沙沟退不下水来时，那么，三万亩的耕地，就灌溉无望，只好废弃不种。

傅作义将军有鉴及此，他决定支援农民开渠灌溉，以稳定农业生产。一九四一年时，他派出



所属部队第十七师的全体官兵约三千多人，开往农村，帮助地方兴修水利，开挖渠道。经过官兵们一个多月的努力奋战，很快的完成了由三淖口起，至刹台庙止，全长二十华里的一条大渠。计全渠共挖土方三十多万立方米。大渠挖成后，它直接引用杨家河水浇地，从而保证了三万亩耕地的及时灌溉。

在当时，军队挖渠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也是百年不遇的奇事，人们认为，这事只有在傅作义将军的主持下，才能做得出来，因此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说：“好机会，有缘法”。后来在给这个渠命名时，人们一致同意叫它为“机缘渠”，以志傅将军的功德。

## 二、修建军营

在三十年代的河套地区，是一个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由于套内的可耕土地面积既大又多，因此，农民耕作的习惯，不受一地、一处之拘束，而是以游种土地的办法，随水而选择地块进行耕种。其性质仿佛牧民的游牧。

在游种土地的情况下，农民们势必要年年搬家，岁岁迁移。这样一来，在当时的套里头，除大地主和大商号建有规模可观的房屋、院落用作住宅外，绝大多数农民都习惯于逐耕地而居。他

们并不建立像样的房屋居住，而是在耕地附近搭盖能蔽风遮雨的临时性的茅庵、窝棚，用以存身。这种临时性的房屋，既低下，又简陋，而且还很窄小。有的人家因住房不足，往往祖孙三代同居一室。

在傅作义将军入套之前，套内早已集聚了几万大军，在房少人多的后大套，士兵的居住条件已感到十分困难。及至傅将军的三十五军进套后，军队的人数骤然增加到十几万，这时，住房问题已成了紧张而又紧张的事情了。为了解决官兵的居住问题，当时采取了分散居住的办法，以缓和住房不足的困难。多数官兵被分配住在蒙古的召庙上，有的则住在农民的凉房或驴棚、马圈里，有的甚至和老乡一家人同睡在一个火炕上。在军民杂居的情况下，经常发生一些问题。即：一方面不能保持军纪，还容易失密、泄密；再方面往往发生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和士兵的偷盗老乡物品的行为。

基于上述原因，傅作义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在河套地区用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办法，为军队修建营房。他的打算，不仅在于解决军队的住房问题，同时，对整顿军容、军纪，加强军事保密，消除群众对部队的不满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修建军营工作，是分两次进行的：

第一次修建军营工作，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开始的。当时因套内树木稀少，木料奇缺，这就决定了修盖营房的原料，必须采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办法。经过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采用了深秋时期套内已成熟的芨芨柴充作原料，将它捆扎成为长棒，圈成窑洞房屋的形状，然后再在窑洞里外抹上泥土，晒干之后，就成了很好的房屋。士兵们对他们的创造，美其名曰：“芨芨卧龙”。

新房建成后，正值傅作义将军为配合华南抗日战争，发动的包头战役开始之际，套内各部队纷纷奔赴战场，因此，当时并未在新建成的营房里居住过。

第二次修建军营工作，是在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开始的。当时在木料缺乏，芨芨不足的情况下，经广大官兵研究采取拿土坯圈窑洞的办法，用以解决修建军营的原材料问题。具体做法是：先用麦草和泥，把泥用坯模子脱成长方形的泥坯，俟泥坯晒干后用以圈窑。开始时，由于经验不足，在砌窑过程中，土坯不能合卯对缝，勉强凑合，反而招致了随盖随塌，造成了前功尽弃。

对此，大家又开始动脑筋，想办法，反复研究土坯的制作方法，使之适应修建窑洞房的需

要。不久，就由军部工兵营的一位副营长研究出一种梯形的坯模来。用这种坯模脱出来的土坯，一边比另一边稍短，使用这样的土坯圈窑洞，在圈到窑顶时，正好对缝，而且每块土坯之间，也很合卯。在窑洞圈好后，里外用泥抹好，质量比较坚固。至于窑洞房内的窗户，则是用几根树枝棍做成的。士兵们还利用土坯，给连部办公室抹出来桌椅，以便办公使用。

在营房盖好后，所有的部队，都在当年秋天进入了新营房，从此，部队再未占用过民居。由于室内没有取暖设备，入冬后，在墙上到处结着冰霜，士兵们又戏称这种营房为“水晶宫”。

三十五军的九个步兵团，在两次修盖营房中，就修盖了十八个团官兵的驻地。这些营房的地点，一般都修在召庙的附近，如沙坏庙、拉僧庙、兰加巴庙等处，有的营房则修在远离居民村庄的荒滩野地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既能防止士兵外出扰害群众；又可使官兵少受外界影响，更有利于集中训练，还保守了军事秘密。

这种因陋就简，就地取材修建营房的办法，不仅适用于在野外修建军营，傅作义将军也用来修建过抗建讨论会的会场及位于临河县八岱的绥干团礼堂，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一九四二年，绥干团准备在八岱修建一座能

容纳八百人的礼堂时，因缺乏木料，只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整个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大梁是从宁夏买回来的，剩下的部分，全靠自力更生完成的。其修建方式是：以挖地窖的形式，来代替下半截的墙壁，上面再用泥土垒墙。建房所需用的椽子，则是采取当地出产的芦苇、芨芨等柴草捆扎而成。至于会场内的桌凳，全是用土坯制成。尽管房舍粗糙，设备简陋，但傅作义将军在这里，集中军事上和行政上的人力、物力，完成了整军和在河套实行新县制的干部集训。

# 傅作义在河套时期的工商业概况

高德富、孟传志、王廷英

1931年傅作义将军主政绥远时，绥西城镇工商业已初具规模，由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生产不发达，加之重农牧轻工商的思想存在，阻碍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当时的工商业是三多：即夫妻商户多，小商小贩多，个体手工业多。仅有10%的店厂雇用店员工人，资金极为缺乏。那时傅作义为了振兴绥西工商业，曾授意绥远省银行，给绥西各城镇的工商业贷款，投放幅度较宽，致使工商业由萧条开始繁荣了一些。

1939年春，傅受命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率部进驻河套。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与日寇进行了闻名国内的“袭取包头”、“会战绥西”、“五原歼灭战”三大战役，奠定了绥西偏安的局面。

## 一、推广几项措施给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副长官部进驻陕坝后，绥远省政府也设此地，

人口猛增至五万余，秩序混乱，供应紧张，商品短缺，住房困难。傅见于此，急命火速整顿治安，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使工农兵学商各安其业，并决定陕坝建市，为战时绥远临时省会，委派常佩山等筹组市政管理处，规划市区。市区东起黄济渠的园子渠口、南临三大股渠与临河太成乡毗连，西北两面与临河太乐乡交错。市内置南北两区、郊区置四个乡保，（即今之杭后跃进乡的团结、丰产、晨光、跃进四个村），市内以大转盘作中心，东西大街为中正路，南北大街为中山路，两路交叉于大转盘，形成大“十字街”。南北为抗建路与中正路，交叉于小转盘，形成“小十字街”。另外中正路东侧尚有复兴路，中山路北段有忠孝路。中正路西段有维新路，即为陕坝六大主街。并且陆续兴建长官部八大处，省级各厅处，中山堂，奋斗学校，《奋斗日报》社及塞上新舍等处。

“五原战役”后，绥西社会趋向安定，生产开始发展，为适应战时需要，傅决定改行新县制，设置米仓，临河、狼山、晏江、五原、安北六个县和陕坝市，以加强集中领导。土地整理和新县制的实施，给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 二、陕坝市的工商业发展情况

1942年陕坝正式建市，相应地组成了市商会，由各行业民主评议，选出委员九人，计有：王乐天，孙梅坞，徐诚，张玉源，杜晋文，邢守谱，樊祥，陈汝明，王秀；推选孙梅坞为正会长，王乐天为副会长。领导绥西各县商会，兼管陕坝市的工商业事务。

孙是大学生，稳重机智，精通业务，善于交际。为解决商民资金短缺，资源不足等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向省银行联系，获得大批工商贷款，加速市场经济周转，保证了军政民的供应。

（二）、划分行业，便于领导管理，使各行业相互协调，克服分散性。

（三）、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组织小商小贩下乡送货上门。由商会担保从货栈赊购商品，到农村牧区出售后再偿还；或以从农牧区回收的皮毛、土特产品、畜、禽、蛋品等抵偿。

（四）、组织货源，活跃市场。对凡能到外地采购商品的商号、商会介绍优先贷款，满足需用，促使货物流向我区，奖励到沦陷区购买商品，凡有商店能将皮毛及土特产品输出，保证换回布匹、日用杂货和紧缺商品、文化用品等，商会都



给于大力协助，向绥远省物资管理局担保，准予开介绍前往。

1944年，陕坝市有了较象样的建筑，街道、马路建筑已初具规模，成为绥远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重镇。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店铺已达五百余户。街道两旁布满了商店，行人往来，熙熙攘攘变得热闹起来。市内各商务行业有：

（一）百货棉布行有：万利和、中兴号、万祥号、复圣隆、宝衣隆、信义成、福星久、福星瑞、同义隆、正昌合、民生商店、大昌商店等；

（二）副食杂货行有：万盖德、信义久、成城商店等；

（三）五金颜料行有：信义生、万义茂等；

（四）、糕点制造行有：蚨来号、元祥号、玉记号、庆和瑞、恒玉兴、万亨利、义生泉等；

（五）文具书籍行有：益友书局、中华书局、中和书局等；

（六）中西医药行有：福生堂、义生堂、广和义、复生永、复兴永及兴亚、雷克斯、美利斯三大西药房等；

（七）货栈旅店行有：宏祥栈、永兴隆、义合城、汇泉店、民生栈、积成公、利民旅店、四海车马店等；

(八) 粮油酒糖加工行有：吴有福缸房、信和源、公和源、成记粮店、永记粮店等；

(九) 饮食服务行有：恒玉永、信德饭庄、同兴饭庄、集贤林等；

(十) 陕坝街上还设立了综合市场，由王秀、关森领导。在中正路朝鲜巷西侧，约在八百平方米的地段，筑有高一米宽两米的土台四行，二百余户摊贩的货物，堆放在土台上。其中有百货五金、绸缎布匹、医药文具、干鲜果品、糖茶烟酒、高档商品、手工铁器、车马挽具等。在市场外围，还有缝纫、照像、钟表修理、理发食堂、说书、测字算命、小茶馆等，十分热闹。

工业方面以手工业为主，且增加得很快，1943年已达二百五十余户、从业人员约八百余人。计有：铁木铸造、洗染钟表、刻印照像、黑白皮坊、编织修配、毡毯制革、鞋帽服装、车船建筑，其产品在人民生活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供应，商会号召他们向五化进军，即艺术化、时装化、药物化、运动化、礼品化。

另外，在军供方面，副长官部还设置了被服厂，军鞋厂，军械厂，造纸厂。其中造纸厂规模较大，除生产红、绿、白包装纸外，还研制鞭炮烟火，给绥西造纸、制炮起了示范作用。

### 三、各县的工商业发展情况

各县所在地的工商业，由于地理、交通、人口各异，发展极不平衡，如米仓、狼山、晏江是新建县，安北地处敌我前沿地带，工商业基础薄弱，市场冷落。五原建于1913年，工商业比较发达，抗战开始后曾被日寇占领又遭敌机轰炸，焚烧劫掠，元气大伤。直至1944年才复苏繁荣起来，城市人口一万五千余众，工商业达五百余户，一些河北、山西商人来这里经营商店也发展起来。有代表性的商店是：福义隆、福和隆、吉兴和、兴隆茂、德星明、复兴西、集仁堂、达仁堂中药铺、西北、民生西药房、义昌茶庄、大北照像、德玉成缸房、永兴西皮毛行、天昌旅店、会元芳、宴宾楼饭庄等。

临河建于1925年，至1943年人口已拥有一万三千余众，商店四百余家，矗立在中山路两旁，形成东西一条鞭。有代表性的商店是：天然小商店，万利和，同福元，晋源昌，万记斋，同合，玉记两酱园，宝灵堂，寿山堂，西北医院，临济诊疗所，华兴文具店，济源刻字局，李振兴饭庄，老陶熏肉铺，靳林森的白铁铺，马登甲的客货栈，董三和的理发馆，王兴油房，王琏、白贵元、纪永昌、王得功的碾磨房等。

#### 四、工商业者的服务态度与经营管理

绥西工商业者，由于抗战时期资金短缺，注意了勤俭节约，承袭商业格言“经商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他们在接待顾客时，大多做到“笑迎千家客”，百拿不厌，百问不烦，一问介三；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生意不成仁义在。他们一面注意走街串巷，一面深入农村，既卖也收购农民需要出卖的产品，对城乡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在手工业作坊里，强调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经常外出的手工业者，还制定了公约互相制约。作坊的条件很差，劳动也十分艰苦，师徒从属关系也很严格。工人们极其艰难地生产供应着市场所需的产品。

在经营管理方面有的商店则以“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用人有度，推销有路，广告有术”为宗旨。如陕坝蚨来号经营灵活，面向顾客，不惜用高工资从太原聘请糕点师王学礼，从保定聘请酱菜师苑木安。人常说：“高师出优品”，自此该号生产的点心，“花样多，味香美，“包装美观”，蜚声绥西。在中秋、国庆、春节，顾客盈门，争先选购，恐后脱销。生产的八宝酱菜，技术精，颜色紫红透明，气味甜脆清香并有红柳编的小

篾盛装，灵巧坚固，便于携带，使使用和欣赏价值结合统一，因而蚨来号的八宝酱菜不仅驰名绥西，还远销银川、伊盟一带。

临河有的小商店视顾客如衣食父母。售出的自行车、钟表、留声机，由店员携带工具另件亲登顾客家门，热情传授其使用、保管、修理方法。在销货发票上印有“货真价实，保退保换，奇缺商品，代找代办”字样，以作广告宣传。

在人员的管理上，除有严格的店规外，有的商店对店员采用灵活的工资制度，一年两调整，加发奖金。凡有才能的职工，只要视店为家，吃苦肯干，善于经营，为厂、店做出成绩，所得奖金有时高出工资。并鼓励店员工，人人都当市场的情报员，掌握市场余缺情况，灵活调整价格，研究供求变化，以销定进，加速商品流转。对过时或冷门货、残品等及时削价处理。

在抗战中，河套地区因物资缺乏，少数奸商囤积居奇，物价不够稳定，大小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倾轧，公营贸易中的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也是存在的，而当时来城镇买东西的也多是有钱人户，这些情况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傅主席坐镇绥西时，在1942—1945年出现了一个安定的局面，各行各业有了较大发展，为争取抗日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忆傅部在河套时期 的思想政治工作

张 沧

—

傅作义先生一贯重视部队的思想工作。他认为对部队做好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思想工作，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因此，他除了亲自经常对部队做思想工作外，还力求部队的思想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以适应抗日作战的需要。

一九三八年，傅先生即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山西柳林、河曲等地，完成了他的老部队——35军的政工组织建设，而后在绥远游击军中，也恢复、新建了政治工作组织，并为排除干扰、坚持自主的政治工作方向，作了不懈的努力。

一九三九年一月，傅先生在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仍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从河曲来河

套之前，他在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曾召集要员、包括政治部人员在内的重要会议，讨论、研究是否接受新的任命而转战到河套。事实上，这既是一次确定未来大政方针的会议，又是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战斗动员会议。开始时，大家意见有分歧，后来统一了思想，完全同意他到河套整军经武、抗日杀敌的方案。这是傅先生亲自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例。

傅先生进军河套，胸怀着为国家出力、报效绥远人民的宏愿。早在一九三一年，傅先生即担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剿除了长期危害绥远人民的土匪，取消了绥远地方的不少苛捐杂税，并推行了绥远乡村建设运动，在“整飭吏治”、“实施义务教育”、“发展生产合作事业”、“建立地方自卫武装”诸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九三六年，傅部还取得了绥东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正当他领导绥远军民励精图治之际，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大举进犯，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当时晋绥划为第二战区，部队编为第六、七两个集团军，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平绥铁路沿线防务。军民虽浴血奋战，屡挫敌锐，终未能阻止敌人的疯狂进攻。在日寇占领孔家庄后，阎锡山以山西危急，命令傅部向

山西撤退。傅先生始终觉得，在民族危难之时，未能和绥远人民共甘苦而问心有愧。河套是当时绥远仅存的未被日寇占领的一块土地，又是我国大西北的门户，保卫河套，并把河套建成一个收复失地的根据地，不管困难多大，都是责无旁贷的。

从当时的情况看，部队是傅先生依靠的主要力量。若没有好的部队，要实现保卫河套，并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办不到的。在山西时，傅只有一个军（35军）、包括两个师（101师和73师）和一个旅（211旅）。傅一说要离开山西，阎锡山就说35军的73师是山西的老部队，不让他带走。本来在河套还有个五临警备旅（原绥远屯垦军）可望能依靠，但阎锡山又说，这个旅是山西王靖国的部队，不归他指挥。不仅如此，阎还派来60多名政工人员，正式建立该部队政工组织，企图达到控制该部队的目的。鉴于此种情况，傅一方面寄希望于后方的补充；一方面对现有部队、包括临时归他指挥的部队加强整训，力求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战斗力。他学习八路军，吸收了一批政治和文化素质较高的政工人员，加强了部队政工组织建设，其中35军的多数政工人员，虽然到部队的时间不长，但在挺进绥南战役和晋西北的一些小型战斗中，能与部队



共进退，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展开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日救国热情，和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在部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特别是当73师决定不来河套时，73师的全体政工人员和一个整团自动脱离73师，追随傅先生投奔河套来。这些生动的事实，使傅先生进一步感到政治工作的威力，从而更加坚定了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心。

然而，傅先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来自蒋、阎的干扰。傅部在柳林等地建立了政工组织后，蒋介石和阎锡山就都怀疑他，说傅成了“七路半”，“赤化了”。蒋介石还因35军官兵不佩戴全国统一的白布兰边兰字臂章，而自行用红布黑字臂章，来电质问。傅答复是为了识别本部队人员，以利检查本部人员纪律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才算了事。这就使傅先生对组建部队政工组织，觉得既要积极，又要慎重，避免节外生枝。

傅部到河套后，傅对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了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一方面注重做好35军的工作，因为随着部队换防和担负任务的变化，部队在思想和实际生活诸方面都可能发生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及时适当地予以解决；另一方

面注意向其他部队，开展宣传活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如曾派张沧到日寇占领区包头附近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三团工作过一个月。之后，又派张沧带15人到驻乌加河北的绥远游击军第一纵队工作过。

为了不失时机地把河套军队和地方行政工作推向前进，于一九三九年四月至六月，傅在临河百川堡召集部队连以上干部、地方乡以上干部，分五批举行“抗战建国讨论会”。会议期间，傅与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还进行个别谈话。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全体军政干部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树立整体观念，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搞好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傅作义为坚持对干部要经常轮训，对新来干部要经过训练后才去从事实际工作，对所有干部都要进行军事训练和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训练首位的主张，接着他把在河曲时第二战区军政干部第二分校（亦是35军干部学校），正式改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军政干部训练团（亦即绥远省干部训练团），在临河八岱乡的一个旧营盘又成立起来。

以后不久，傅为能根据他的希望，实际很好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又系统提出一个“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的要求。四为就是为

国家、为整体、为抗战、为胜利；四有就是：有抗战必胜信心，有奋斗牺牲精神，有对职务的责任心，有民主平等作风；四要就是要积极工作，要艰苦朴素，要团结互助，要学习进步；五个一致就是：生活一致、作风一致、官兵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以此作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and 必要依据。

## 二

傅先生在河套刚刚站稳脚跟，新的工作刚刚起步，从重庆方面就来了一系列的干扰，使他不得不分心妥为处理，以保证工作不受影响。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蒋介石电告傅，要委派张彝鼎担任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是留美博士，曾任蒋的国际问题秘书。不久，张彝鼎带领十余人从兰州来到河套。若说是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傅当然是欢迎的，但张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任务，即监视傅部，清除傅部中“赤化”的政治工作人员。无疑，这对傅是个很大的压力。

在张彝鼎来到河套的同时，蒋介石又电告傅，要委派担任山西省党部委员的苏寿余为35军政治部主任。傅感到自己原有的政工组织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便赶快托人疏通，改派苏为副长官

部政治部副主任，才将他原任的35军政治部主任周钧留任，使工作得以照常进行。

以张、苏为首的副长官部政治部成立后，就要给部队政工人员定级别（原傅部政工人员无级别，上下一律每月生活费20元），并决定非国民党党员不能担任政工人员。原来傅部队干部不要求什么党派，而只注重是否爱国。为了不惹出什么麻烦，傅密告部队原有政工人员，凡未加入国民党者，迅速在各驻地国民党部设法加入国民党，力争定级留用。同时傅不得不和担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的中共特派员潘纪文同志打招呼，并进一步协商共产党员怎么办的问题。傅提出可否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办法，共产党员也加入国民党，但潘纪文同志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结果，潘纪文同志离开了部队，而后又有鲁志浩同志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30多人离开了傅部。这些同志走时，傅都给拿了路费，并设法护送至安全地区。傅为失去这些好同志的帮助，深感不快。

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重庆军委会总政治部通知，撤消军政治部，并规定师政治部主任非军人不得担任。对此傅对于军政治部采取了明撤暗不撤的办法。同时为防止该总部再给师派新人来，急忙推荐周钧及两个老资格军人，配齐了35

军所属师的政治部主任，但实际皆不到职，而把原任的三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康保安、王中、彭光祖改为秘书名义，实际上继续执行主任职务。

张彝鼎和苏寿余为了达到清洗傅部政工人员的目的，又和重庆、兰州方面联系，让傅部原有政工人员分批去受训。中、上级人员送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其他人送到兰州西北干部团。名为训练，实为审查考核，借机清除异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周钧等四人在中央训练团期间，蒋介石突然电告傅，说周钧等都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还说周钧是共产党河套地下负责人，傅颇费了一番周折，周钧等才免于被扣捕。一九四〇年四、五月，彭光祖作为领队带一部分人到兰州受训，彭光祖又被说成有共产党嫌疑扣留在兰州；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徐秀泉、张沧等二十二人在重庆受训期间，时有特务盯梢监视……凡此种种，既在受训人员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也使傅极为不满。傅在和张沧等受训回来的人谈话时问：

“你们抓住了个什么？”大家不由一愣。他又说：

“你们看到的那些，都是社会渣子，将来都要被社会淘汰的”。当时傅的话虽然很含糊，但跟他多年的人都清楚，傅是说，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我们在前方受尽了千辛万苦，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躲在后方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

活，政治黑暗腐败，上下交相争利，把社会风气搞得很坏，甚至还有人在想方设法破坏我们，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我们决不要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不良影响，而要一如既往，团结奋斗，抗战到底。

在一九四〇年四、五月间，重庆军委会总政治部又发来通知，恢复军政治部，撤销师政治部，改设师政治督导员室，并派李茂永为35军政治部副主任兼101师政治督导员。傅立即推荐周钧仍任35军政治部主任，并立即配齐了新31师和新32师的政治督导员，将原来以秘书名义留作主任工作的康保安、王中、彭光祖调回军政治部任科长和其他适当职务。与此同时，重庆总政治部还发来一个“防止异党兵运方案”，要求部队各级均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一律以部队长为主要负责人，称特派员，实际工作由政工负责人担任。军、师级均称为书记长，团级称总干事，独立营及一般连队称为指导员。规定特别党部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事宜，而不在政治工作之外搞其他活动。特别党部以后撤销，又规定军队干部未取得国民党籍者，不得正式任职。

一九四二年间，重庆总政治部又通知撤销军政治部，恢复师政治部，同时派来五、六人到傅部担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傅立即调周钧为战

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以后又调为副主任、主任）同时一面对来人作适当安排，及在原有政工人员中选派副主任，一面对尚未安排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师，从本部选择适当人员进行推荐（此时傅部已扩编为三个军，除35军外，增加了暂三军、暂四军）。

以上，由重庆总政治部派来的人员，加上自一九四一年起几次从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和战干四团毕业学员派到傅部的人员达六、七百之多。然而，这些人到傅部不久，受傅影响，即和傅部的原有政工人员打成了一片，其中不少人还被培养成了傅部的军政骨干。

一九四三年，重庆军委会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河套视察傅部，听取了各师和独立团以上的人员工作汇报，“当时张沧为一〇一师政治部代主任曾经参加了该会，对傅部的政工人员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通过张治中的视察，重庆方面对傅部逐渐改变了看法，所以来自重庆方面的干扰渐渐减少，使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按照原定方针进行。

### 三

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过不断总结提高，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制度。

部队政工机构设置：最初，傅的总部设有政

治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七、八人，委员三、四人，秘书一人，军队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两个组，秘书和组长均由委员兼任，从事实际工作的有五、六人。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改设战区政治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秘书一人，四个科，另附有一个工作大队，共有工作人员百余人；军设政治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四个科工作人员共30余人，最后一度被撤消。师设政治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三人，以后工作人员增至十余人，分为两个科；团设政训室，设指导员一人，干事一至二人，工作人员共五、六人；独立营设指导员一人，一般营不设；连设指导员一人（起初还配设助理员一至二人）。

部队政工人员的配备，傅一直注意掌握。有少数政工人员，是原在绥远做行政、教育工作的干部，多数是从外面招收的新生力量。计先后从山西招来青年学生三百余人，三次从西安招收来流亡青年学生二百余人；从延安请来二十余名陕公、抗大毕业的学员和参加革命较早的共产党员；接收阎锡山派来的七十余人；接受重庆派来、西安派来军分校和战干四团毕业学员六百；七百人；还有许多从各地自行投奔而来的人员。傅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不管来自何处，只要有高昂



的抗日救国热情，有一定的文化和实际工作能力，办事踏实，作风正派，身体健康，能适应部队生活，均量才予适当安排。如在35军政工组织初建立时，鉴于当时由各地新来人都是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全民族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正确主张坚决拥护的进步青年（有的已是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并有帮助35军增强作战力量的至诚愿望，因此一开始给其中不少人就委以重任，使其担任军政治部科长，师政治部主任，团政治指导员。现在还记得的除以上提到的潘、鲁、康、王、彭、徐等人，还有杨文斌、阎又文、由竹生、陈有道、冉志恒、李刚、李仲、冼依等。再如原在阎锡山控制的五临警备旅政治部工作的干部刘培荣，还被提为团政治指导员。

部队政治工作内容：最初，傅规定的部队政治工作任务有五项。一、激励抗战士气；二、严明部队纪律；三、实行经济公开；四、增强军民合作；五、瓦解日伪敌军。以后又分为部队政训工作、民运工作、对敌工作三大项。每项中又分为平时工作和战时工作两部分，各有详细内容。实际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保持原规定精神和优良传统。

部队政训工作的要求是提高官兵政治觉悟，活跃官兵政治文化生活，严明部队纪律，实行经

济公开，改善官兵关系。平时的具体作法是：①举行朝会，根据驻地情况分片，于每日清晨集合全体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并利用这个时间由军政负责人轮流作报告，讲述当前形势和任务。②上政治文化课。官兵分别进行，军官以团、师直为单位，士兵以连为单位，一般每周三次，均由政工人员负责授课。③开展文体活动，一般每天都有，曾一度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最好，要求部队人人会唱，并经常唱；有时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比赛；有时组织集体游戏；有时组织听戏（当时不少部队均有自己的剧团，以晋剧、秦腔为多，个别部队有京剧）；有时组织看电影。④设奋斗室——具有图书、游艺两种性质，部队各级、特别是连队均设有。备有报章、杂志、书籍、棋类、乐器等，供官兵自由阅读和娱乐。⑤实行部队经济公开。向上级领取粮饷、服装等一切财务时，必须由部队长和政工人员共同签名盖章方可付给，并要收支帐目清楚，定期向上报告、向下公布。⑥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由官兵选举适当人员组成，协助负责经办伙食人员搞好伙食，保证士兵吃好。河套当时人口不多，部队云集，粮食有时供应不上，部队还食用过牲畜饲料

豌豆，因而伙食引起了重视。傅为此还规定办军耕农场，各部队都要种菜、养猪。并且他每到部队视察，总要看看士兵伙食，总要把士兵的眼皮翻开看看，了解士兵的营养状况。⑦组织小组生活会，每月一次，官兵一律参加，发扬部队的民主作风，培养官兵真诚相处、互助互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⑧检查部队纪律，不得欺上欺下，不得实行打骂教育，不得克扣士兵粮饷，不得欺侮百姓，不得有烟、赌、赃等一切不法行为。如有发现，政工人员有权直接向傅告发。⑨协助部队处理好与友军的关系。⑩编印阵中简报（有的称奋斗简报、扫荡简报）。一般一周一次，主要报道部队活动和好人好事，有时刊登国内外新闻综述、小评论等，对官兵进行政治宣传教育。战时的具体作法是：①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与部队同进退，随时鼓励官兵士气，印发战地宣传品。②照顾伤病员，并协助卫生人员将伤病官兵转送到后方医院。在战斗中，政工人员阵亡、受伤者也很多。如，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在阻击日寇西犯的高台梁战役中，35军的一个团指导员李秉权阵亡。同年十二月在反攻包头战役中，35军91团政治指导员杨凯南、团政训室干事任宏远、连指导员李荣庆、新31师政治部科员张沧等均在战斗中受伤。一九四〇年一月间，

在绥西战役中，35军101师野战医院指导员周洪峰阵亡，都注意作了妥善处理。③审查处理好缴获的敌人文件。

民运工作的要求是：认真做好部队、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动员工作，做到军爱民，民助军，军民密切合作，共同对敌。平时的具体作法是：①宣传军民合作。根据抗战形势，经常将上级发的和自行编印的传单、画报等广为张贴、散发，书写宣传标语，给学生和地方群众教唱抗日歌曲，作宣传讲演。②组织军民联欢。部队每到一新驻地，均由军政人员一方或共同出面，访问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知名人士。部队初到一地或逢有重大节日，均举办军民联欢会，有剧团的部队由剧团作专场演出，无剧团的部队，由军民协商，各演出一些小节目，演出前由部队和地方代表讲话。③组织部队开展为地方群众服务的活动。部队在进驻和离开一个地方时，都要对当地的环境进行一次大清扫，平时每天坚持清扫，以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帮助驻地群众挑水；有损坏的道路、桥梁，要及时修好；在生产大忙季节，要尽力派出人、畜帮助群众生产劳动。特别是挖渠，部队经常是全员出动，连续数日甚至一两个月地去干，现在河套的复兴渠，就是几个部队合作完成的。傅规定，部队无论帮助群众干

什么，都要自带工具，必须有干部带队，保证做好，并不准向群众索取任何报酬。遇到群众发生意外灾害，部队要立即尽力予以帮助。④加强部队群众纪律检查，做到秋毫无犯。傅规定，对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速还，损坏东西必须赔偿，不得擅入民宅，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骂群众，行军时不准践踏庄稼。为此，政工人员常邀请地方政府人员一同定期访问群众，在部队离开之前，更要普遍检查一次，如有违纪事件，部队长要予以及时妥善处理。战时的具体作法是：①组织群众担架队。动员地方青壮年协助部队运送伤病员。②动员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在敌人可能到来前组织群众、特别是妇女妥善隐蔽，防止被敌欺辱。③实行化装潜伏民间，随时观察敌情，动员人民群众将敌人的行动报告国军。在一九四〇年的绥西战役中，采取这一办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对敌工作的要求是：积极主动地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从心理上瓦解日伪军，争取其投降。在平时的具体作法是：①尽力设法给敌人投送宣传品，讲述我国抗战必胜，日寇侵华必败的道理，宣传国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凡部队驻地距敌较近时，经常利用部队派出侦察人员进行这一工作。②对俘虏进行教育，这一工作只上级政治部有。

战时的具体作法是：①给敌人投送宣传品，进行战场喊话宣传。②做好优待俘虏工作，不准搜俘虏腰包，不准私拿俘虏的财物，不准虐待打骂俘虏，根据需要对俘虏进行教育动员后，及时转送后方。

# 傅作义将军的喉舌——

## 《奋斗日报》在陕坝出刊前后

刘映元

《奋斗日报》是傅作义将军创立的。民国成立三十八年当中，以傅作义在绥远的统治时间最长，由一九三一年开始到一九五一年结束，达二十年之久。绥远自从1913年王定圻创办“一报”以来，好多报纸此起彼伏，有的甚至三月五月而昙花一现，唯有《奋斗日报》存留了十一年余，起义后又延续了一载多，共享了十三年寿命。

傅作义将军非常重视报纸，在1928年至1930年任天津警备司令期间，就和天津《大公报》的关系很好，总经理胡霖、主笔张季鸾，后来都成了他的朋友。傅在解放以前亦得力于《大公报》的捧场。1931年，傅任绥远省主席后，除礼待外省记者，团结本省报人外，并于就任当年，建立了自己的喉舌——《绥远日报》。《绥远日报》共出了二年光景，1937年9月因傅退守山西而停刊。

✓  
《奋斗日报》是《绥远日报》的继续，开始只是三十五军的随军油印小报，以后，随着傅集团势力的扩张，发展成为陕坝、归绥、张家口三个分社的大中型报纸。解放前的北京《平明日报》和华北剿总的《阵中日报》都是由《奋斗日报》分出的。秦丰川于日本投降后，在天津创办的《民生导报》和国民党在绥远的《民国日报》也有《奋斗日报》的人做班底。从《奋斗日报》前前后后许多同人的来龙去脉，还可概括出内蒙西部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报业概况。我于一九四四年参加《奋斗日报》，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离开。在《奋斗日报》的同人中，以我工作的时间最长。其次是高也彭，他于1938年夏末秋初即到《奋斗日报》工作，不过到1946年冬天，就调绥远省政府担任秘书。比我在报社少半年时间。这篇回忆的开头，是根据高的回忆写的，末尾由刘文俊提供。刘在1950年12月31日《奋斗日报》结束时，担任了将近五年半会计主任。当中绝大部分是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 (一)

《奋斗日报》创刊是在1938年七月傅作义将军的第二战区北路总司令部由山西离石县柳林镇移到河曲县城以后。《奋斗日报》在1939年七、八



月之前，是三十五军的军报，由政治部主任周钧和宣传科长梁剑一领导，因为当时傅在全军中提出艰苦奋斗的口号，所以定名为《奋斗日报》。

报社最早的负责人叫杨乐之，他是三十五军从太原撤退到柳林，傅作义将军派于纯斋和高云山到西安招回来的政工人员中的一名。那时报社只有两架机器，一架是美国的干电池收音机，一架是缴获日军的油印机，纸张是仅能用一面的有光纸。由杨乐之自编自校，山西大学文学系的阎又文刻腊板，美国留学归来的贺宗生收音，郭少甫兼印刷工人。抗战初期，傅作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三十五军政治部可以说是由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延安“抗大”和“陕公”，以及阎锡山在陕西宜昌县秋林镇成立的“民族革命大学”毕业学生领导，所以一切都学习八路军，人们都热爱工作，叫干啥就干啥。《奋斗日报》版面虽然只有两张腊纸那样大，但包括国民党中央社的记录新闻，傅作义将军的言论，三十五军的战报和短小精炼的短评，编得生动活泼。除了供给三十五军各个联队和阎锡山晋绥军在晋西北的各师各团外，还供给岢岚山区贺龙将军八路军的一二〇师，并且往绥远沦陷区两个专区、十三个游击县政府和太青山、蛮汗山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中寄发。偶而也敢在日伪蒙疆首

府归绥新旧两城张贴。《奋斗日报》一开始就作为二战区北路军总部和流亡的绥远省政府的机关报，代表傅作义将军的喉舌，在鼓舞士气，激励民心上起着宣传作用。

傅作义将军在坐镇山西河曲时，表现得非常开明。河曲城内救亡歌声盈耳，街头标语多系进步词句，傅本人穿着草鞋，军政人员出门背着背包。尽管如此，河曲不是革命圣地，青年人都向往延安。杨乐之领导了《奋斗日报》三个多月，即提出辞呈要到“抗大”或“陕公”学习。傅先生叫周钧慰留无效，让杨乐之搬到北路军总部和他同吃同住，以便长夜促膝谈心，但杨仍不为所动。杨乐之终于去陕北，后来才派景昌之为《奋斗日报》社长。景是山西安邑县人，系晋南《国风报》社长景定成（梅久）的族侄，1927年以前在北京邵飘萍的《景报》里担任过编辑。抗战开始后，景先在民族革命大学工作，由杜任之介绍到三十五军协助并影响傅作义将军。

景昌之接办《奋斗日报》以后，阎又文当了傅将军的随从秘书，贺宗生亦离开报社。由抗战以前乡村工作建设训练所出身的郭映宸用美术体字刻写钢板，高也彭为编辑主任，高杰、雷洪、杜思诚和杜彦之等四个晋南青年担任编辑、记者和收音员。景昌之非常关心青年们的生活。报社的

伙食办得很好，除了吃晋南人最喜欢吃的没碱馒头，并想办法弄来辣椒炒菜，虽吃小米亦很可口。抗战初期，人们都没成家，象中央社特派员王华灼，前游击军政训处处长郭灵墅，他们都在“北路军”总部当参议，经常在外边“打游击”吃饭，因为都属文化人的范畴，并且报社有没碱馒头、辣椒，遂成了景昌之的食客，也就变为《奋斗日报》的顾问了。其中，尤以郭灵墅和《奋斗日报》的关系最深，对景昌之的影响最大。报社移到后套陕坝以后，郭搬进报社居住两年之久。

郭灵墅是运城山西第二师范的高才生，跟景昌之同学，是阎又文的老师。1928年初，以同乡关系到天津追随了傅作义将军；抗战以前给绥远民政厅长兼省会公安局长袁庆曾担任秘书期间，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来往，并跟绥远新闻界以及文艺界的青年接近，也是“五四”以后绥远新文化旗手杨令德志同道合的朋友。郭的学生吴希圣经郭叫来绥远，先给杨令德办的《绥远新闻》刻腊板，并替杨编辑《社会日报》，后参加了中央社，最后成了《奋斗日报》的社长。特别是在1936年冬天，百灵庙抗战期间，《民国日报》因受日本归绥特务机关压迫，已改称《西北日报》。郭灵墅通过杨令德的关系，让中共地下党员王一然在《西北日报》上编辑《边防文

垒》周刊，连载了美国记者斯诺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引起很大震动，招来国民党中宣部的查究，把杨令德撤职。1937年春，傅作义将军出任华北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郭为傅招收青年学生成立政工人员训练班，聘杨植霖、章叶苹和武佩莹为分队长，王一然、潘纪文、周北峰为教官。训练班还未始业，“七七事变”爆发，傅于八月十日率三十五军东进折往山西，郭鼓动留在绥远的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于保卫归绥以后，撤到后套建立抗日根据地，以训练班的学生为基础，并结合“乡训所”出身的政工人员组成新的国民兵政训处，由郭灵墅为处长，潘纪文为主任。在十月上半月保卫归绥期间，王一然和章叶苹编辑出刊了《抗战日报》。包头沦陷时，政训处最后撤退，王一然、潘纪文等辗转到了晋西北柳林和陕北榆林，郭灵墅带着大部分人退入后套陕坝。不久，绥远国民兵改称绥远游击军，仍由郭任处长，改由另一共产党员李衡任主任。民先队员章叶苹为宣传科长，王建功、马映光等任团政部主任。章叶苹和刘映阳等编刊了《一条线》油印三日刊，成为当时后套唯一的宣传报纸。因为绥远游击军政训处容纳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一条线》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论，被后套的军统和中统特务密报了国民党中央，所以，一九三八年四月

间，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解散了。绥远游击军政训处的人大部分离开后套，前往陕北延安。此时，傅将郭调到河曲，给以空头参议名义。郭在失意之际，《奋斗日报》社便成了他消愁解闷和吃饭住宿的地方。遂和《奋斗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景昌之好客，《奋斗日报》社成了当时河曲文人们的俱乐部，不仅左派的郭灵墅住下食宿，右派的王华灼亦常来“钉锅”。王在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在太原办过《华闻晚报》，因为参加了CC组织，转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抗战以前即特派来绥远，成为追随傅作义将军的战地记者。王那时喜欢在报纸上“放炮”，他不满意河曲县长孙万化贪污腐化，借在押汉奸越狱逃跑事件大做文章，除他自己向中央社拍了电报，并让景昌之在《奋斗日报》揭发攻击，结果孙万化因受舆论谴责而自动辞职。从此，《奋斗日报》有了地方新闻，不仅表扬好人好事，也批评坏人坏事，内容开始丰富多彩起来。

1939年春天，傅作义将军脱离“二战区”，率领三十五军由晋西北开拔绥西，在八战区就任副司令长官，《奋斗日报》也跟着驻到五原城。当时，后套的五原、临河、陕坝，各有一个石印

局和一架油印机器，在《奋斗日报》到达以前，已被三家报纸占用。头一家是临河的《民众日报》。时王一然出任临河县长，刘进仁担任临河动委会书记。侯福荣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中共河套地委书记刘瑞森、宣传部长王国华也在临河县城内。《民众日报》实际是河套地委的机关报。该报由侯福荣兼任社长，侯的中小学同学李寿民以及原游击军政训处留在河套的人员刘映阳等担任编辑记者，原乡建会中的陈万华、李段成等给投稿。侯福荣、李寿民都是抗战前在杨令德主编的《民国日报》的《十字街头》和章叶莘的《塞原》上写文章的中学生，李段成也在这两个刊物上登过散文小品。《民众日报》由于侯福荣、刘映阳做台柱，并由王一然、刘瑞森和后来三十五军政治部与动委会中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写社论与短评，所以，办得朝气蓬勃，执后套四家报纸之牛耳。

后套的第二家报纸是陕坝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的《通俗日报》，该报由通俗宣传组组长杨格非领导并任主笔，宣传组的流动宣传队的青年肖离、肖凤等给写稿。如果说《民众日报》是由绥远旧有的革命文化人组成，那么，陕坝《通俗日报》则是由抗战以后新来的进步文化人组成。原来傅作义将军在晋西北的时候，继从柳林镇派于

纯斋和高云山到西安招回第一批大中学生后，1938年秋，又派于纯斋和崔载之招回第二批大中学生即肖离、肖凤、杨格非等五十余人。这两批学生路过延安时，都进抗大和陕公学习过。第一批回来组成以周钧为首的三十五军政治部，第二批回来组成以于纯斋为书记长的绥远省动员委员会和以崔载之为首的游击军政治部。崔载之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并团结了非晋绥两省的青年干部，在三十年代末的绥远形成了他领导的文化派系。所以《通俗日报》依靠动委会的政治背景和绥远游击军的群众支持，也办得有声有色。

除了上述两家革命进步报纸外，还有在五原一家民营的《强民日报》。这个报纸由山西闻喜人赵伯廉担任社长，用向游杂部队司令和蒙旗王公敲竹杠筹款维持。（赵抗战前在归绥办过通讯社，1940年五原沦陷后给汉奸王英办了伪《绥西日报》，五原收复后被傅作义枪毙。）但该报于1938年创刊，因偏重报道社会新闻，有“鸳鸯蝴蝶”的副刊，拥有一些读者。

《奋斗日报》随军进入后套，首先是八开油印版面，包括不了上述三家报纸四开石印版面的内容；其次是他既没有《民众日报》的强烈政治倾向，也缺乏《通俗日报》的浓郁文艺气氛，更缺少《强民日报》的低级趣味，这就只能在部队

中流传，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当1939年移到陕坝改为铅印以前，后套好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一家报纸存在过。

## (二)

傅作义将军脱离二战区就开始向右转，可是，他本人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仍然有好感，想在绥西国防左翼前线继续维持统战局面。但蒋介石怎能允许？逐步向他施加压力。1939年秋后，政治形势已经逆转，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潘纪文，宣传科长梁建一，省动委会组织科长武践实，陕坝三区区长兼动委会书记黄剑拓等共产党员，都被从重庆前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山西的CC头子姚大海逼走；许多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也都自动离开。《奋斗日报》在这种形势下虽然报纸改为铅印，但很难发展。

由于五原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部于1939年9月间移到临河县的陕坝镇和省府各机关集中在一起，那里便成了绥远省的临时省会。在陕坝城南的王板三圪旦成立了副长官部印刷厂。《奋斗日报》为迁就印刷，也移到陕坝和王板三圪旦中间的袁昌义圪旦，并安设了一部副长官部电务处的收报电台，专收《中央社》、《新华社》和《蒙疆通讯社》的电讯，除



《中央社》的电讯复写一份供给《奋斗日报》登载，其余严禁外人观看，每天晚上由阎又文给傅念读。由于《奋斗日报》也与阎又文联系，所以以后阎便操纵了新闻出版事业。而在1939年秋后，1949年夏初这一阶段，《奋斗日报》是由阎又文的老师郭灵璧在幕后指挥。

《奋斗日报》设在元昌义圪旦史柜的后院，正房两间做同人们的宿舍，东房一间做了伙房。景昌之又在西南盖了三间办公室，左边房是编辑室，右边房是营业部。在西墙底下有史柜的两个谷仓，景专给郭改成一间宽大敞亮的书斋，郭就在这里生活、学习和接待朋友，1942年夏初，郭离开《奋斗日报》后，这里便成了第四任社长崔载之的社长室。景昌之则在黑夜和报社的编辑、记者、营业员、传令员、伙伙同挤在一盘大炕上睡觉，白天在用土坯架上木板抹灰的办公桌上伏案编辑报纸和写文章，是一派因陋就简，艰苦朴素的作风。

景昌之对待报社的青年也是父兄爱护子弟的态度，很使全体员工感奋。所以，后来王华灼接办《奋斗日报》时，景要离开，同人们都痛哭流涕。

1940年1月，日军进入后套，陕坝各机关都仓惶向宁夏石咀山撤退，印刷厂和电台都有长官

部的大车运送。傅长官在前方指挥，其他首长各顾逃难，《奋斗日报》谁也不管。郭灵璧有一匹乘马，景昌之只好雇了一辆牛车，把《奋斗日报》1938年创刊以来的合订本和同人们的行李给养装载。好在日军占领陕坝不到半月就被赶走。

“三原战役”结束以后，报社从宁夏回来东西没有遗失。收复五原，奠定了绥西的偏安局面。傅为了巩固他的割据局面，进一步靠拢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开始疏远和防范。中共河套地委刘瑞森和傅的县长王一然等，都在1940年初夏，先后离开临河，共产党在河套的活动更隐蔽起来。所以，临河的《民众日报》在五原战役以后没有恢复。《通俗日报》由于流动宣传队的骨干肖离、肖凤等在五原战役前后都到了西安，随着“流宣队”的解散，在五原战役后复刊又停刊。从此，只剩下《奋斗日报》一家，成了进步人士发表文章的唯一园地。景昌之便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重大责任和同人们在绥远的临时省会全部担负起来。

傅作义将军为了弥补好多共产党人离开给绥西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空虚，在五原战役结束不久，把秦丰川从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请来陕坝。秦来以后，成立了副长官部联合办公厅。由

秦任主要参事，下设设计、视察、文化三室，由秦带来的察哈尔阳原县人贾晓峰为设计室主任，绥远丰镇人张凯然任文化室主任，郭灵墅为视察室主任。秦由二战区带来的殷草野、鲁凤昌、陈湘萍等非晋绥籍文化青年都安排在各个室内；出了《西北文化半月刊》，作为副长官部的机关杂志。另外，副长官部还成立了一个《西北通讯社》，由高云山任社长。这个通讯社由副长官部秘书长曾厚载领导。但《奋斗日报》和西北文化不和它合作。高聘乡训所毕业的刘殿文、李养年担任记者和编辑，所发通讯稿《奋斗日报》采用它很少一部分。不久国民党省党部改组，重庆派来特务头子张庆恩担任书记长。张就和傅的秘书长建立了一个肃反领导核心小组，展开对中共地下党的调查研究与侦察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绥西的后套和伊盟，在二月春节前后到处发生捕人事件，以各级动委会中被捕的最多。共有一百余人，绝大多数是参加过“动委会”的，不少人参加过郭灵墅的绥远游击军政训处。一个托克托县青年李丕才，抗战以前担任过绥远《社会日报》社记者，这时从榆林前来陕坝探亲，由于他胸前佩戴《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证章，亦按共产党嫌疑被捕。我那时在达拉特旗第一游击区，给

苏开元担任秘书。因为在归绥进步报刊上写稿，还编过《铁血半月刊》；特别是一度参加过“民先”，又经傅作义将军保送到抗大学习过；从陕北归来后，担任过省动委会组织科的科长；我虽和河套的地下党没有一点瓜葛，也未逃出此次罗网。在元宵节后被捕，被送入绥远战时青年训练团第一期受训。张庆恩为加强反共的歇斯底里叫嚣，建议傅改组《奋斗日报》，企图将此宣传阵地占有。傅在皖南事变后的形势下，只好松手。把景昌之调到联合办公厅，委派中央社特派员王华灼任《奋斗日报》社长。可是中统里边很少笔杆子，于是从战青团中把我和李西成、陈万华打发到《奋斗日报》。

4月1日上午，王华灼领我们三人去接办《奋斗日报》。景昌之带高杰到了联合办公厅，雷洪和杜彦之辞职，旧人还剩下高也彭和杜恩诚两人。除高也彭仍任编辑主任、杜恩诚任编辑而外，让我也担任编辑，李西成任记者，陈万华任校对。不久，高云把他的朋友赵锡介绍给王华灼担任总编辑。《奋斗日报》自从副长官部造纸厂成立后，就改成八开土报纸两面印刷。王华灼接办后，改成四开报纸，第一版是《中央社》电讯，第二版和第三版的上部是省县消息，底下是两个副刊，第四版是社会新闻和广告。王华灼用

左手写字，写不出长篇大论；赵锡和我们都爱好新文艺，不愿、不敢、不会写社论。两个副刊，一个是赵锡编的《草原》，完全是国际文学的内容，以前给《奋斗日报》写稿的现在都不来稿，遂变成国立绥中学生们习作园地；另一个副刊叫《前进》，由省党部宣传科编辑，战青团的学员们给供稿，全是空洞无力的反动文章。第四版的社会新闻，针对陕坝物价高涨，打击奸商囤积居奇，并含沙射影抨击公营的贸易公司，在这一点上颇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至于广告栏内，很少商业广告和服务广告，除了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便是“误入共产党”的“悔过”声明，真真假假，谁也不愿相信。

我们参加报社不仅负责编报，最初还负有特务使命；让陈万华注意印刷厂的工人，叫我和李西成监视郭灵墅。由于张庆恩和曾厚载的“肃反”小组不敢逮捕晋南人，特别是“荣柜上的人”（傅作义是荣河人，人们把傅的同乡、亲友都称作荣柜上的），所以景昌之调离后，郭灵墅依旧在《奋斗日报》住，和我们搭伙吃饭。王华灼和郭是老朋友，他不好意思催撵。在中统从陕坝各机关捕人时，长官部联合办公厅也受到冲击。参事秦丰川被保送重庆“中训团”受训，秘书中的陈良璧，则是由省款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他们同车离开陕坝，路过西安时，被军统特务扣捕。至于景昌之、高杰、冉志恒与朱子平等，是傅给每个人发了五百元路费，由周北峰和郭灵墅设法掺到甘肃接新兵的队伍中，冲出陕坝城周和特务在要径所设的包围圈，辗转进入了革命根据地。景昌之和高杰后来到了信阳，办了陕甘宁边区《陇东日报》。郭因秦丰川一走，联合办公厅无形中停顿了，把殷草野，鲁凤昌、陈湖萍交给阎又文的《贯彻社》，编辑傅集团的军事《贯彻》和政治《贯彻》两种内部刊物，以及转载全国报刊主要作品的《文摘》杂志。郭灵墅不到长官部上班，索兴住到《奋斗日报》社内，除了闭门读书，便是走进编辑部和我们聊天。报社的人都尊称他郭大人。每天下午不断有人来找郭，星期天更是门庭若市。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兴高彩烈，以为日本人惹下滔天大祸。唯独郭灵墅根据日本的海空军力量和英美在太平洋的防御空虚，认为东南亚都要沦陷，只能保住印度。隔了一两天，傅作义将军突然来到报社，问我们这次日本人压了一个什么宝，王华灼瞠目结舌无以为对，我便把郭跟我们谈的全盘说给傅听，傅边听边点头，对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1942年春天，王华灼担任《奋斗日报》社长

快一年，但报纸办得很低级。这时皖南事变后的反共高潮逐渐低落，傅作义想收敛，表示中立，打电报给驻榆林的《大公报》记者杨令德，请杨给《奋斗日报》提意见。杨在覆电中说，重庆《中央日报》尚维持国共表面合作，《奋斗日报》不宜登载反共文章启事，破坏团结抗战。这时，王华灼见此情况对自己不利，并且他已捞到省党部委员，便主动向傅作义将军提出辞呈。经过孙兰峰、张彝鼎、于纯斋的推荐，傅便同意崔载之接办《奋斗日报》。

崔载之到《奋斗日报》也是4月1日。他只带来一个人，便是他在正定师范的学生张心友。崔跟我们初次谈话便提出向《大公报》学习的口号，第二天就把报纸变成大报的样子。这样，第一版有了社论的空间，第二版有了登载长篇通讯的地方，副刊的面积扩大，可以容纳较多的内容。把《草原》改名为《驼铃》，《前进》退给省党部宣传科。并且，从此不登共产党的脱党声明。这时绥西实行了新县制，各级动委会取消。省动委会归并到民政厅内。民政厅有两个从前省动委会招来的青年文艺爱好者，一个叫宋永年，是西北联大毕业生，一个叫乔东君住过延安抗大，他们的新诗和散文写得很好；还有两个湖南青年，一个称塞北诗人叫李行，一个是吴荣琦，

笔名吴家河，他们擅长写作，很快寄来稿件。其他青年也动起笔来。这时，崔载之写社论，李西成写长篇通讯，赵锡和张心友编《驼铃》，阎又文为了人们学习时事，还让鲁凤昌仿照《世界知识》社的蔡若虹和朱育莲，以铅、石两印编制出一册最新国际形势地图，送给有关人员参考，报纸又开始活跃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五月的一天早晨，副长官部给报社打电话，说是傅作义将军召开会议，指名赵锡、李西成和我前去参加。我们去得较迟，走进副长官部大会议室，里边已经坐下办公厅的卢文桀、殷草野，省政府的马映光，民政厅的王滋桐，财政厅的张象曙，《西北通讯》社的李养年，以前动委会的李行与吴荣琦，参加过绥远游击军政训处后，又参加省动委会流动宣传队的李佩衡以及国立绥远中学的语文教师王绥之、王佐兴。此外，还有一个叫黄河的南方人。被邀的人到齐以后，傅进来向我们说：“外边的人对你们有所怀疑，我对你们非常相信，特保送你们到西北干训团受训，叫他们看一看是真是假。”然后，傅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叫我们和他个别谈话。傅对我说：“回来还叫你在报社工作，到了兰州，言语要特别谨慎。”我们离开副长官部，省党部调统室的杨恒三在巷口等着，每人给了一



套新军装单衣，叫第二天上午在此集合出发。我们回到报社报告情况，崔载之好象听见晴天霹雳，叫我们稍微等候，他进城打听一下。不大一会，他沮丧地跑了回来，说是经过再三恳求，傅只允许把我一个人留下，赵锡和李西成非去不可。第二天他们由杨恒之押解前往兰州，进了“西训团。”不久，即转往西安胡宗南的“劳动营”，日本投降前后始分别释放。

赵锡和李西成走后，崔载之把杨格非从民政厅调来担任总编辑。让我代李西成担任外勤记者，把魏沛升为正式编辑。杨任总编以后，减轻崔的社论负担，使崔腾出身子能读书、看报，所写的东西越发犀利流畅。可是不到三个月，杨格非进城突然失踪，经过多方打听得悉已被关进省党部调统室。崔载之察觉，报社有两个后来来的练习编辑行动鬼祟，才把他们两个开除出社。从暂三军调来一个团政治部主任段孔昌。段是于纯斋头一次从西安招来的大学生。笔杆子也很硬，（解放前为袁庆荣一〇四军的新闻处长。）段到报社以后。傅作义将军让崔载之到重庆“中训团”受训，到一九四三年张治中将军到绥西视察时，崔方随张回来。在崔到重庆后，阎又文代理社长，段写社论，让我每天早晨去旁听傅主持的党政军团首长联合汇报，把傅的重要指示写成新

闻。“五原战役”以后，傅的正规军加紧练军而不主动出击，以鄂友三在大青山的战报来表示绥远的抗战，傅就让我好好地宣传大青山。傅曾向众人说，共产党是说法一致，国民党是众说纷纭，以致互相矛盾；并说《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印得很好，《奋斗日报》印得不太清楚。这是印报的纸张造得不好，应赶快加以改进。我回去报告了阎又文，造纸厂添设了压纸的滚子，原料进一步磨碎研细，纸面尽量压平，比以前平整许多。关于如何求得说法统一，阎采取了两项办法，一是借口纸张困难和印刷拥挤，不让省党部的《前进》半月刊继续出版，并抵制战前的《民国日报》和《绥闻晚报》复刊，在绥西只能有一家铅印的《奋斗日报》和傅许可的杂志。另一方面是防止重庆各大报在绥西聘任通讯员，具体办法是他用阎晏宾的笔名给《大公报》写稿，并叫我给《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新蜀报》投通讯稿，以加强傅作义的对外宣传。同时以我的名义成立了《绥蒙新闻》社，把《奋斗日报》容纳不了的长稿，铅印寄往全国各报和英美等国驻重庆的新闻处。

在崔载之赴重庆期间，五原战役以前离开“动委会”的肖离、肖凤，在西安组织了一个青年剧团，带着丁尼，白玲和崔超等演员，被

请回到了绥西。他们回来，不仅使绥远的话剧由动委会表演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小戏，提高到能演《钦差大臣》和《日出》等名剧，从而丰富了《奋斗日报》的副刊《驼玲》。《奋斗日报》配合青年剧团每次演出出专号，并增加了版面较大的《青年文艺》，于诗歌杂文之外，还登载短篇小说。由此，在绥西涌现出好几个青年文艺作者，其中有两个河北省的后生，一个叫王鸣鹤，笔名高塞，专写乌兰察布盟的抗战故事，很有乌拉特草地的风味；一个叫王德薇，笔名瀚海，偏重反映伊克昭盟的蒙汉团结情节，颇富鄂尔多斯的高原色彩。崔载之从重庆归来，段孔昌到部队去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崔便从河北行唐叫来他的一个同学高凤鸣，此人很能干。1945年，傅派我和他去伊盟旅行，在此期间我在报上写的通讯，傅曾给予表扬。后来我任了采访部主任并兼《中央日报》记者，1946年兼任上海申报驻绥记者。

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奋斗日报》在崔载之主持的三年零四个月的这一阶段，可以说是黄金阶段时代。由于张庆恩调回重庆，省党部由王玉宾担任书记长，中统的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不再继续捕人。同时中统的中美训练班在陕坝成立，傅作义将军为了在美

国教官面前标榜自由民主，因此广开言路。崔载之渐渐敢于说话了。这时订户逐渐增加，由三四千户发展到五六千户。日本投降后，崔率主要人员东进归绥，《奋斗日报》留下高也彭和杜恩诚继续出报。1946年春天，崔去北平和杨格非、肖离、肖凤等人办《平明日报》。归绥《奋斗日报》由阎又文接办。

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绥远和平起义，这期间的陕坝《奋斗日报》就由绥西专署负行政与业务领导，与归绥的《奋斗日报》，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报社，到1949年起义前夕，董其武主席在派苗平章接任归绥《奋斗日报》的同时，并派张家口《奋斗日报》的经理樊一夫接管了陕坝的《奋斗日报》。起义后，维持到一九五〇年，随着绥远人民的新政权的建立，移交给河套地区的中共领导机关。

# 傅作义先生创办的私立

## 奋斗中、小学

私立奋斗中、小学，是傅作义先生所创办，傅始终是学校的董事长兼校长。学校创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值民族危急之秋，国难深重之时。从1940年创立至1956年归于公办，历时十七年，其间随军多次搬迁，其艰苦办学之举，在我盟、我区、乃至全国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实是抗战时期值得一书的盛事。

私立奋斗中、小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之才，而且从整个办学过程中，可以看出傅作义先生的教育思想，了解抗日战争中傅作义先生在军政之外的另一个侧面。现根据有关史料，将奋斗中、小学的主要情况概述如下。

### 办学的历史背景及指导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犯。祖国外侮频仍，国难日益严重。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大好

河山，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接着，日寇步步进逼，长驱直入，攻占热河，侵犯绥远，全国告急。值此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人皆伤痛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傅作义先生率部御敌，几经和日寇作战，深感抗日阵亡、残废将士的遗属、家属生活清苦。虽然从1933年起，傅即以干部互相合作方式入股集资创办“共济实业合作社”，所获利润专供抚恤救济之需，终感非一次抚恤或私人救济所能济事。

1936年傅部在百灵庙和日寇进行了一场恶战。翌年爆发了“七·七”事变，全国全面抗战开始。傅先生率部转战晋、察、绥各地战场，阵亡、伤残将士愈来愈多，除抚恤之外，干部子女就学成了长期抗战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1939年末至1940年初的突袭包头战役，日寇大举入侵后套后的绥西战役和五原战役之后，干部子女的入学问题就更加迫切。于是，抽取了部分互助基金，筹办学校，以解决干部子女的入学问题。这是兴办学校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傅先生创办奋斗中、小学，还有其更深远的意图，即建国图强，急需人才。这从1945年5月5日奋斗小学成立五周年、奋斗中学

成立三周年时，刊印的《私立奋斗学校一览》的《序言》中所述，可见一斑。

“中国之有新型教育，垂半世纪矣。为臧为否，自有国家之兴替，社会之隆污，为之权衡。本校董事长兼校长傅宜生先生，治军缩政之余，而深慨吏治之不清，人才之不盛，虽欲图强，不可得也。”

“闻尝召明德而诲之曰：‘中国积弱，已及百年，瞻国之士，不曰实业之不兴，即曰军备之不振，此犹浅之乎视之也。其较深入者则谓文化之落后，政风之颓圯，斯则庶几近之，而犹未及肌里。余思此弊三十年，乃知贪渎之原，胥由享受过高，或家累太重。昔人以五世同居传为美谈，然而张公百忍，抑何酸苦！迨至廉俸不足以养廉，此优孟之所诋，不可为而可为也’。故吾人领导干部，欲求其功，宜养其力，欲责其廉，先释其累，余立斯校，意即在此。更明白言之，即所以为国家育人才，代干部教子弟，能使仰事俯畜之不忧，始有高风亮节之足言也。”

“若夫余之教育憧憬，恒觉学术为神圣之事业，亟须保持其超脱与尊严。遇事驰驱，终非盛事，此其一。”

“中国自魏晋以来，竟尚黄老，说理谈玄，羌无故实。今后之教育，当以用为重心，而教育

之生产化实为医贫治虚之良剂。吾尝曰：‘用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做什么’，即系此意，此其二。”

“至于即将举办之中小学校，悉当遵照部令，以期更成。吾尤以为小学多重美育，发展其健硕纯善之身心；初中着重生活，启迪其作事作人之认识，而高中则以不窒碍文科天才之进取，约略侧重理科为原则。町衡国势，不得不然。将来大学专科，亦应依循此往，再及其他。天假时力，当庆全成”。（摘自王明德序言）

由此可见，傅先生是纵观中国积弱的诸种弊端之后，认为要想建国图强，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要想使自己的干部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就必须“养其力”，“释其累”，解除其后顾之忧，代干部教育子弟。这是经过三十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可见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决非应急之计，而是长久之策。同时，对创办奋斗学校的宗旨、方针和设想，都作了明确指示。他以“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乐事。

### 办学经过及沿革

1939年2月末，傅作义先生率部从山西转战到绥西后套。从1939年末到1940年三月，在一百来天的时间里，连续进行了包头、绥西和五原三



大战役，给日寇以沉痛打击。此间，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眷属团驻于宁夏黄渠桥。1940年5月1日，傅作义先生约集同志，筹募基金，聘请蒋志伟女士为校长，在黄渠桥创立了奋斗小学。校名暂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奋斗小学”，5月5日开学授课。建校之初，因陋就简，仅借得陋室数间，供学生起居课业。当时在校学生仅有十七名，却分为六个年级，课业均由校长、教员二人担任。这是奋斗学校的初创时期。

1941年，随着前方战事稳定，流散后方各地的眷属陆续集中到宁夏石咀山，学校也迁于此。这时学生增加到近百人，教职工增至十人左右，校长改由田玉珊女士担任。校舍有所扩大，有了一定的教学骨干，教学活动逐步走向正规。到1942年，即有了第一、二届小学毕业生。

由于“五原战役”的胜利，日寇因兵力不足，不敢冒然西进，龟缩于包头，绥西河套一带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局面。时局的稳定，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傅先生鉴于绥西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深感成立中学是势在必行之事。于是在1942年5月4日，约请樊福煊、王明德、周钧诸先生积极筹办中学。八月十一日，借得陕坝教堂十余间房舍，作为临时校舍，并设立了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校董事会。8

月20日，召开第一次校董事会议，公推傅作义先生为董事长兼校长，由校长聘请王明德先生为校务主任，曾士先先生为教导主任，余咏晨先生为事务主任，并决定了三条办学原则：一、课程标准及教学时数，完全遵照教育部规定。二、初、高中采用二、三制，男女合校，每班50人为限。初中双班，高中单班，逐年发展，六年完成。三、施教重点有三：1、不仅传授知识，更须导正认识；2、不仅训练个体，更须切合整体；3、培养学生头脑，实行战时生活。

这次校董会议还通过了招生简章、学生待遇以及学校建制等章程。九月十一日奋中正式招生，二十六日上课，奋斗中学宣告成立。当年招收新生七十八名，分置初一两个班。教师多系兼任。

奋斗小学专收军政干部子女，而奋中除招收军政干部子女为主外，也收一般非干部子女，为社会青少年开辟了就学之路。录取新生时，由于考生来自多方面，程度参差不齐，傅先生指示：“录取的新生要广泛，要照顾到家长的具体困难，不要怕程度低；收进来的学生要让干部、家长都放心，要使学生在又活泼又严肃，又紧张又比较舒适的艰苦奋斗环境中受到较好的培养；毕业时的成绩要好，毕业出去的学生程度要

高”。这是当时实事求是的设想和要求。

1943年元月20日，校董会议决定，集资兴建新校舍，校址选在陕坝北郊，购地一顷零九亩，并成立了以王明德为主委的建筑委员会。次年6月25日，礼堂、教室、宿舍等竣工。1943年7月，校董会决定，宁夏石咀山奋斗小学迁入陕坝，与奋中合校。电聘山西郭揽青到校任职，总揽奋小事务。同时，还从部属及西安等大后方选聘热心和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富有经验，学有专长的优秀教师十多人。健全和加强了行政领导工作，充实了专职教师队伍，明确了各项要求，完善了制度，积极开展了各项教学工作。

新校落成之后，经过了两次续建，虽是土木建筑，但基本上适应了教学需要。校大门坐北向南，一进门是校本部，前墙两边是两条醒目的标语：“德智体兼修”；“教学做合一”。东西两边前排是单人宿舍兼办公室，后面两排，是一座座整洁的教室，并逐步配齐了木制课桌椅。教室后面是宽敞的操场。校本部后面是简易小礼堂，礼堂后面是每日朝会师生讲话台。

以校本部和礼堂为中心，东为中学部，兼有男生宿舍和食堂，西为小学部，兼有小学教师食堂，中、小学教职员家属宿舍及中学女生宿舍。最后面有二十余亩大的劳动园地，菜

园、磨房、豆腐房、猪圈等，主要副食可自给。

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奋斗小学成立五周年，奋斗中学成立三周年校庆时，奋小已拥有一至六年级十二个班，学生300余人；奋斗中学拥有初中班六个，高中班一个，有了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先后增加了数、理、化、英语、地理，各科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七、八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部回师归绥。1946年秋季开学时，陕坝奋斗中学搬迁到归绥市，更名为归绥奋斗中学，在归绥奋斗中学对面，增设归绥奋斗小学。归绥奋中增设代理校长职务，由王克俊先生担任，郭揽青为校务主任，归绥奋小先后聘请陈昭、唐自强、潘云青为校务主任。1947年秋，奋中高中部随军迁往张家口市，归绥市只剩初中部。张家口奋中又增设两个初中班，以靳仙舟为校务主任。在张家口市还增建了私立张垣奋斗小学，拥有一至六年级六个班。在奋小西侧增设奋斗幼儿园，由傅先生兼任园长，向霭云为园务主任。1948年夏，张垣奋中送走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考取大学的占毕业生的98%。1948年冬张垣奋中迁往北平，归绥奋中、奋小又迁回陕坝，复为陕坝奋斗中学、小学。同年增设私立北平奋斗小学、附设幼儿班一个。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先生呈准继续办学，张垣奋中，改为北平市私立奋斗中学和北平市私立奋斗小学。解放后，奋中、奋小改变了原来统属干部子女的性质，一切与市立学校基本相同。贫寒学生凭派出所证明，亦可酌情免费入学。但是，教职工自动请求免去了“年功加俸”（到校三年以上即有年功加俸，逐年增加）和全体教职工冬夏各一套制服的供给。

1950年2月，傅先生为照顾绥远教育的需要，报请将北京私立奋斗中学迁回绥远，复名为“归绥奋斗中学”。1951年，陕坝奋中、奋小和归绥奋中相继决定交由公办。1952年暑假，归绥奋斗中学改名为“归绥第二中学”，后又改名为呼市二中；陕坝奋斗中学与陕坝普爱中学合并，先为“陕坝中学”，1958年改名为“杭锦后旗一中”；“陕坝奋斗小学”于1952年3月与陕坝普爱小学合并为“陕坝镇三完小”。北京私立奋斗小学一直办到1956年8月交为公办。交由公办时，已拥有20个班、863人。

至此，历时十七年的奋斗中、小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 **顽强的办学精神      丰硕的教育成果**

傅作义先生戎马半生，身居军政要职，不仅

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其躬躬教育一十七年，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情况下，都不放弃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的顽强精神，亦令人钦佩。

办学之初，傅先生即提出八项要求，被称之为“校长八训”：一、要有科学的头脑；二、要有愉快的心情；三、要有活泼的体态；四、要有健强的身体；五、要过朴素的生活；六、要有明白而坚决的语言；七、造成互助合作的团体；八、养成说实话做实事的风气。这八条，始终是奋斗中、小学教育学生的依据。

私立奋斗中、小学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经费筹措就是一大难题。经费靠校董会提供，其中一部分是傅作义先生“多年从政所得俸禄之节储”，一部分是靠募捐，一部分则是靠学校所办工厂和农田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傅先生要求学校师生生活力求自给自足，号召“教育生产化”。即便是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傅作义先生对学校的经费亦给予应有保证，以实现其“学术为神圣之事业，亟须保持其超脱与尊严”的理想。因而，奋斗中、小学教师的待遇，生活上俸薪比一般市校为高，并实行到校三年以上开始“年功加俸”制，以鼓励教师巩固专业思想，稳定教学人事。每年供给冬夏制服各一套。学校备有教员单人宿舍和食堂，带家属的另有家属宿舍院，

尽力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公务之余，傅先生常与教师谈话，百忙中还抽时间约请学校负责人到家中便饭，亲自参加家长恳亲会，以示对学校日常工作的关切与期望。为了增加学生的知识和便于学生学习，傅先生还把自己珍藏的万有文库及其它工具书赠给学校图书馆应用。

奋斗学校的学生，每年冬夏两季由学校统一发给制服，学生一律免收学费、图书费、体育费，中学生也免收住宿费。每学期还设置傅宜生先生奖学金三十名。奖学金数额很大，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对家境贫寒的非干部子女是个很大的鼓励。由此可见其良苦用心。

私立奋斗中、小学校耗资甚巨，仅1943年就支出3551705元；1944年支出11395884元（均为旧币额）。这在艰难的抗战年代，决非易事。试想，若无顽强的精神和崇高的信念，若不是傅先生慧眼识才，聘任一批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努力前进，治学有方而又勇于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奋斗中小学历时十七年而不衰，是不可能的。

辛勤耕耘育桃李，喜看百花结硕果。经过全体教师严谨治学，既教书又教人的辛勤工作，培养了一批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才。解放后，经过党和国家的进一步培养，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

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有的承担着重要任务，为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例如，奋中第二届高中毕业生薄筱泉、傅希贤、王孝廉、温玉莲、韩保川、张俊明等十多人，解放初期即参加地下组织“民联”，不久即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后，有的随军南下，有的参加军政大学进军西南，有的考入北京等地大学学习。1948——1950年的第一、二、三届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当年在奋中凭奖学金学习的非干属子女，如李兴春、傅希贤、赵满、樊世忠、乔瑞华、张德普、胡景云、王天铺、王祖武等，均在各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工作，不少已成为教授。

正如在榆次师专任教的赵满给王克俊老师的信中所言：“现在，可以告诉您，奋中学生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出了不少人才。就我们班来说，高级工程师和副教授就不少。北京不少大学都有咱们的同学，而且，现在已都是教学科研的骨干，都工作的很好。”

又如，原在河北农大任教，后当选为河北省副省长的奋中第二届高中毕业生王祖武说：组织上经过外调，各方面证明傅先生办学是正确的。一般人不一定办而他要办，目的是纯正的。所有



教师作风正派，认真负责，同学也是艰苦奋斗，勤苦好学，处事做人表现都是好的。

奋斗中小学的教师，在教书又教人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1949年解放初，他们都欢欣鼓舞地奔向革命之路。许多教师考上了革大、华大，以后有的随军南下，有的进入别的大学学习，有的担任了领导工作，也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辛勤工作。

傅作义先生创办的奋斗学校，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快事。当人们看到培养出来的学生，处处以大局为重，为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献身终生时，更会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根据《私立奋斗学校一览》和唐自强 郭轶平等提供史料整理）

# 抗战时期河套地区的医疗

## 卫生工作概况

抗战时期的河套地区，交通不便，文化闭塞，经济落后，广大人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无论城镇或乡村，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人民穷困、医药缺乏，各种传染病不断流行。疫病猖獗，人民不堪其苦。群众得病往往是“小病抗”、“大病躺”，任病魔折磨。

1939年绥远省政府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迁来陕坝后，当时绥远省政府尚未建立卫生行政领导机构、地方上没有公立医院，更没有防疫组织。除少数几个私人开业医生外，社会上出现较多的是江湖医生、神官、巫医等，搞迷信卖假药进行欺骗、敲诈活动。这些人焚香祈药，装神弄鬼花样百出。用香灰、纸灰作为“灵丹妙药”高价出售，哄骗无知群众。不知有多少病人为他们耽误而死。此外，在农村还留行着一些毫无医学常识、不懂药性的冒牌医生，也是看病卖药，哄骗

群众。在有病无医并缺钱的情况下，民间用相沿已久的习惯疗法治疗。如拔火罐、十指放血，偏方、验方等。如遇流行性传染病，防治十分困难。如天花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病情险恶、致命性的传染病，但在1940年以前，还未使用过牛痘苗接种。当时闯江湖种痘的医生多从河南来，这些医生只懂些土法接种的操作常识，一般在儿童上臂外侧接种一个牛痘就索要一、二斗米，一个小孩一次往往接种6至8个，按接种痘的个数来收费。有钱的给钱，无钱的给米，敲诈勒索十分苛毒。有的种痘先生，不仅种痘还兼看病，老乡们有了病也请他们诊治，日子长了，由种痘医生又转化为看病医生。这些人因剥削有方，手头宽裕，于是取妻生子建立家业，有的还置买了房产和土地。1940年后，牛痘苗在河套出现了，不过当时兰州在制药厂生产的痘苗有限，仅够城镇居民和学龄儿童用，广大农村仍是沿用土法接种。1945年后，牛痘接种才较前普遍。

抗日战争前，河套地区开业医生，无论城镇和乡村都是寥寥无几。仅有的一些开业人员，一部分是在教会医院，当过学徒或护士；一部分是部队离职的医生，其中有的当过军官（军医正或军医佐，以军医佐为多），有的当过医士（看护士），有的当医兵（看护兵）。有些在工作期间，

白吞些药械、作为开业应征的资本。这些人一般医药知识贫乏，医疗技术不高，仅仅当过医兵的水平更低。大多资金微少，设备简陋。虽然挂的牌子是“医院”或“药房”，实际上看病卖药只有一个人（一般携带家属），租赁上一间迎街门面，从外地或当地购买些常用药品，就可开业看病、卖药。有的在开业之初，将门面粉刷一新，药架陈列的整齐充实。实际三层药架上，只有一层是药品，其余两层都是装过药的空盒或空瓶，借此装点门面，招徕顾客。不管牌子是“医院”或“药房”，大多是看病带卖药。这是一人班（家属大多只能做些杂务）事业。有的是院长兼医生，象头痛感冒一类小病是可以应付的，大病诊断不清也无能为力。

旧社会的城镇一般都有妓院，是性病的发源地。那时的河套地区也不例外，染上性病的不少。五原、陕坝、临河不论是“药房”或“医院”，较多的都在门外悬挂着“德国六〇六”或“法国九一四”的广告牌。因为这两种药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信誉，认为是治疗花柳病（当时称性病为花柳病，包括梅毒、淋病、下疳）的特效药。其实那时治疗性病的药品国产的也不少，如上海信谊药厂生产的新懂花散，新亚药厂生产的新消毒素，患者却都不愿用，多愿购德国狮子牌

六〇六、法国皮隆氏九一四、日本撒尔佛散和新益拉梅佐儿，其中以六〇六最为畅销。型有：0.15、0.3、0.45、0.6、0.75、0.9。一个疗程从0.15开始，逐渐增到最后的0.9为止。每星期静脉注射一支。当时老乡们对六〇六迷信过深，再加上对病理、药物无知，个别富裕的人竟认为六〇六有清血作用，每在春季草木萌芽时，有病无病叫诊所注射一支六〇六、认为无病可以预防，有病可以治疗。

老乡们对医药的无知，给一些医德败坏的医生造下可乘之机。有的卖药的是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甚至使用和出售失效药品，运用卑劣、违法手段敲诈哄骗群众。当时的政府既无卫生行政机构，也无专设管理人员，对开业药房和诊所的业务是不闻不问的。因而，那时的开业医生，价格自定，信口索要，因人而异，随时变更。卖药的利润一般是百分之五十，高的达到两倍。医生看病的诊疗报酬（尤其是出诊），更是漫无边际，高得惊人。民间流传的许多说法如“药无十倍不出门”、“黄金有价药无价”、“除了卖药就是盗窃”，都说明了当时药商剥削的苛毒。

傅作义进驻绥西，尤其1940年“五原战役”之后，开始对医药卫生工作进行了管理，河套地区的卫生工作有了一些改变，医院药房逐渐增多，

医生质量也提高了一些，当时河套地区开设的医院及药房情况是：

### （一）陕坝的西医和西药房

美利斯药房于1934年成立，是陕坝开业最早的西药房。创办人张新全。地址在陕坝小转盘北街路东，资金约现洋一千元，从业人员三人。首任经理魏懋廷、1938年换为魏子范。初开业时张贴广告、散发传单，鼓吹药品齐全，夸张疗效惊人。从表面上看，门面粉刷一新，药架陈列的整齐充实，实际上内容是空虚的，药架虽然是三层，其实只有一层放的药品，其余两层都是装过药的空盒和空瓶；借以炫惑群众，招徕顾客，人们称这类药房为虎牌药房。

夫妇医院于1940年开业，地址在旧市场内。男人姓董，是江湖医生，门口挂着专治花柳病的牌子。他对一般医药知识懂得很少，只知道六〇六是治花柳（性）病的特效药，其他所知甚少。他从其他药房用一元多现洋买上一支日产六〇六，给别人注射时说是德国狮子牌六〇六，以次冒好，从中获取暴利。当时日产和德产六〇六差价很大，以一元一支的日产六〇六，冒充德产六〇六、每支能收费高达五至七元之多，剥削是十分苛毒的。

新华药房于1938年开业，经理兼医生魏懋廷，卖药带看病。地址在旧小转盘路西。

仁善医院于1937年开业，卖药带看病。虽名曰医院，实际只是赵子轩一人，另外带两个徒弟。赵是阎锡山部队下来的军医，依靠看小病、卖西成药维持生活。地址在小转盘东街路北。

雷克斯药房于1939年开业，地址在当时省银行对过。经理张新全（从美利斯药房退出后开设的），业务只限于卖西成药。

赵魁五诊所——赵是东北人，在旧社会搞军医工作，开业时间不长，在1943年前后就离开陕坝，回了家乡。

## （二）五原县的西医和西药房

美利斯药房成立于1935年，地址在桥东路北，创办人张新全。开设前曾大吹大擂，说是“香港美利斯药房天津分公司五原美利斯药房”，究其实际创办人是天津的上海中西药房的一个股东，其他名称却是虚构和假冒。因资金较其他同业雄厚（据说开办资金是一千元），药品也比较齐全，因而声誉较大。从业人员五人，经理董兴周，会计于连怀，医生卢捷之，徒弟一人，炊事员一人。

民生药房系于1932年开业，地址在桥东路北

二招待所西侧，经理兼医生韩鸣岐，山东人，耶稣教徒。资金不大，药品不多，零星卖点小成药，也看点小病，以维持生活。

亚北药房于1930年开业。地址在旧北街路东。卖西药附设诊所。该药房是由贺松坡与井星阳合资经营的，二人都是山东人，耶稣教徒。

中西药房于1924年开业，经理兼医生董树德（又名秉之），河南人，耶稣教徒。早年在张家口教会医院学徒，并充当过护理人员。来五原开业后，因所占用的地址狭窄（在现二招待所的对过），只好前房作为看病和卖药，后屋为住室。资金不大，卖药兼看病，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绥西医院于1940年开业，地址在旧桥东路北。院长是吴玉山，山东人，河北医学院毕业。他是从部队下来的，是当时河套地区从业医生中唯一的大学生。医疗技术不错，就诊患者不少，收费也比较合理，解决了群众一些实际医疗问题。

蒙古卫生院乌盟卫生所五原分队，地址在原来的北街，现在天然巷的东隔壁。队长兼医师邵子英（安徽蚌埠人），下设医师、护士、会计和工勤人员共十一人。开设门诊部，市民、农民、机关职工都可就诊，大大疏缓了有病无医的困难。每日门诊人数达五至十人次。那时五原没有



公立医院，该队在五原是唯一的公立医疗机构——中央卫生署直属单位。还负担预防接种工作，但仅在县城开展。

### （三）蒙古卫生院

蒙古卫生院是属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领导的，1936年创设于绥远归绥市。1937年“七七”事变后，迁设于宁夏银川市。当时的院长是桑沛恩。下设三个卫生所，有乌兰察布盟卫生所，伊克昭盟卫生所，阿拉善旗卫生所，

下面重点介绍乌兰察布盟卫生所，因为该所的业务开展以河套地区为主。

1939年乌兰察布盟卫生所于陕坝成立，地址在原小南门路西。该所首任所长陈怀礼，北京医大毕业，从事外科工作有年，因工作需要，于1943年调回银川院部。继任院长薛鸿圻，曾留学日本，内科医师谢光树，江苏南通医学院毕业（当时兼任国立绥中校医）。此外，还有医师任永丰、王桐岗，均系河北医大毕业，从事内科工作。助产士、护士、药剂师等，都是高级助产士学校和高级护士学校毕业。行政人员中，有总务、财会等40余人组成。所需经费、药品、器材等，都由重庆中央卫生署直接供应。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员配备比较齐全，医疗技术水平也比较

高。该所在陕坝仅设一个门诊部，因条件限制，没有设置病床。门诊部对外开放，不论军政人员、城镇居民、乡村农民，凡来就诊者一律接受。基本上承担了陕坝及附近农村数万人的疾病治疗，一般病症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该院门诊制度比较健全，患者须履行挂号手续，设有门诊病历，医师对患者的诊断用药情况，须认真详细填写（以英文和拉丁文为主）。每日门诊量达200人左右。收费较低，只收成本费，对少数民族的贫困者免费治疗。稍后又在城镇机关学校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如牛痘苗接种，伤寒疫苗注射等。与此同时，还推行新法接生，承接助产者以机关职工、家属居多。除门诊外，后两项工作限于条件均未普及到农村。但对当时江湖医生种痘的苛毒敲诈和旧法接生不安全、不卫生的危害，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冲击的作用。

1942年，在临河城内东街路北分设一个医疗分队，其业务开展情况，基本与五原相同，本文不再详述。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盟卫生所的陕坝门诊部、五原和临河门诊部，确实解决了一些贫苦人民的就医困难，为临河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广大群众的赞誉。

#### (四) 抗战时期的河套卫生工作

太平洋战争于1941年爆发后，日军进攻重点南移，河套地区一时趋于缓和局面，给绥远省政府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前提。1942年底，绥远省政府对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置问题，几经商讨和斟酌，最后决定在民政厅设置卫生科，承办全省（主要是河套地区）医药卫生的管理工作。

民政厅卫生科设科长一人，技正一人，技士二人，科员一人，共计五人。

卫生行政机构成立后，做了以下工作：

(一) 对开业医生和药商的管理。

为了防止庸医杀人，取缔流串城乡的江湖医生、旁门巫术，于1943年冬制定了《绥远省开业医师管理办法》和《绥远省开设药店、经销药品管理办法》两个文件，并转发各地执行。

前一个文件的基本内容是：

1、对现在从事医疗工作并以此为职业的人员，凡未在高等医科学校毕业或未经省市以上主管、卫生部门考试取得医师证者，如欲继续行医，均需参加本省举办的医师甄别考试，经考试合格者发给医师证。

2、持有医师证者如自行开业时，须在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县由民政科代办）领取开业执

照，否则不得行医。

3、开业医师因故停业时，须将执照缴销，如再开业时，再申领开业执照。

4、开业医师须建立病志、对每一个患者的治疗情况要详加记载，如遇烈性传染病患者，应立即上报卫生主管部门。

5、对无医师证和领得开业执照而行医者，严加取缔并课以罚金。

为进一步加强对开业医生的管理，1944年春，对河套地区既无高校医科毕业证书、又无医师证而申请行医的人员，举办了一次甄别考试。报考者六县一市共381人。考试分中医和西医两大类。中医考试科目有：古文、中医诊断学、方剂学、古典医著；临床课在中医内、外、妇、儿、五官、及针灸科中任选一门；西医考试科目有：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临床课在内、外、妇、儿及五官科中任选一门。这次考试历时三天，集中在陕坝进行。经评卷后，各科均分在六十分以上者即为合格，共录取37名。其中中医26名，西医11名。对于合格录取人员，均发给医师证。另对经营中西医药品人员也作了登记注册。

(二) 制定环境卫生实施办法：

这项实施办法主要是针对城镇制订的，重点

开展以下工作：

1、修建公共厕所和垃圾池，禁止随地大小便，和随地倾倒垃圾；

2、保护水源，防止水井污染；

3、建立街道院落的清扫制度；

4、搞好家禽、家畜的管理；

5、宣传卫生知识，印发了《民众卫生课本》、传单标语以及卫生署下达的各种卫生宣传材料。培养群众的卫生习惯。

（三）新县制实施后，省、县及乡镇增加了不少机构，调整增加了不少人员。为使所有干部掌握卫生知识，体现省当局意图，对各级干部进行了分批轮训。讲授了卫生保健课，以便有效地开展卫生工作。

（四）组织群众性卫生团体。民政厅卫生科成立后，着手筹建了：《陕坝医师公会》、《中华医学会陕坝分会》、《绥远卫生事业促进会》等三个群众卫生组织，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卫生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壮大卫生队伍，引起各界对卫生工作的重视，使卫生工作不断前进，使群众在医疗保健方面能够有所受益。

（五）协助开展禁烟、戒烟工作，监制戒烟药丸。“七七”事变包头沦陷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毒化政策下，鸦片源源不断地向套内流入。

有的是烟商私贩，有的是国民党一些军政官员勾结敌区烟商公开贩运，致使城乡人民吸毒者有增无减，就是傅部的军政人员中，吸食者也大有人在。

1943年后，绥远省政府在全境开展了禁烟、戒烟运动，并责成民政厅负责该项工作。该厅一科负责戒烟的组织领导，并在各县成立戒烟所，制定烟民登记与烟民入所后的管理，戒烟后出所手续等。卫生科负责制造烟丸，监制、检查和鉴定烟丸生产质量等。烟丸分甲、乙、丙、丁四种，根据吸烟人的烟瘾大小，分别由甲种到乙种依次服用、直到瘾退停药为止。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傅作义先生在河套推行戒烟戒毒，的确为河套在鸦片烟毒害下的人民作了一件大好事情，为河套人民所称颂。

（根据《五原文史》第四辑李俊、杨自强文稿整理）

# 忆傅作义先生生活中的两件事

许庆阳

## (一) 杜绝人们给他祝寿

傅先生在一生中生活十分俭朴，对我国传统的婚丧喜庆之事，他力主从俭举办，反对铺张浪费。抗日期间在河套地区机关干部或部队军官中，他提倡集体婚礼。指定三青团在陕坝“塞上新舍”（绥远省三青团委开办的旅店和饭庄）为新婚夫妇办理集体婚礼。主人不接受贺礼，不设宴席，以清茶、纸烟、糖块、瓜籽招待来宾。有时他在百忙中还抽空去为新婚夫妇当主婚人，当时这种节俭的风尚博得人们赞颂。

傅先生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正是端午节。他在河套期间，每逢他过生日这一天，他一早就从陕坝去五原住三两天，以躲避长官司令部和省政府的要人们为他祝寿的纠缠。不仅在移风易俗，勤俭节约等方面做到身体力行，同时也可借此机会到县乡去体察一下民情。由此人们给他编出一个荒诞而带迷信色彩的传说：“傅先生是个大蛤蟆精转世的，一遇到过端午节这天他就像

所有的蛤蟆一样要躲端午。”

## （二）傅先生穿士兵服装引起的风波

一九三七年傅先生孤军守太原，因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得不作战略转移。傅先生率部从太原转移到晋西北时，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期间，在傅先生作战失利之时，共产党八路军向傅先生伸出援助之手，除给予兵源补充外，并派一部分政工人员到傅先生的部队里，帮助傅先生整训军队。傅先生见到这些政工人员都穿着士兵服装，也亲眼看到八路军的指挥员们生活同士兵一样，都身着士兵服装，这对傅先生影响很大。从此他也号召所属部队官兵生活一致。他个人的穿着也是一身草绿色粗布军装，腰系一根窄皮带，脚穿一双粗布军鞋。同士兵在一起谁也识别不出他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一九四二年春，蒋介石在西安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参加的都是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的高级官佐。这些将领们都穿着黄呢军服、佩着武装带、脚登马靴，马靴后跟上还带着明光锃亮的马刺。但在会场上出现一位身穿草绿粗布大兵服装，腰系一条窄皮带的将领。那就是在多次战役中重创敌寇，名扬中外的抗日将军傅作义先生。因为傅先生穿着一身大兵服装，引起与会



将领们对傅先生怪诞的议论，说傅先生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傅先生被赤化了。会议中要对傅先生严加防范，免得傅先生把军事会议的重要决议机密向共产党泄漏。蒋介石对这一情况更为警惕。会后特告诫傅先生不要受中国共产党的“毒化”宣传的影响，回去后要彻底清洗部队里的异己分子，肃清共产党的影响，尤其高级将领要注意仪表，不能同士兵穿着一样，今后应该注意。傅先生要官兵结成一体，官兵生活一致，却未曾想到因穿着士兵服装会在这次会议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会后跟随傅先生去西安的随从官兵劝傅先生在西安做一套黄呢军服，以后蒋介石再召开会议时好穿上呢子军装进会场，免得蒋介石对先生的怀疑，也免得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再给先生扣上“红帽子”。傅先生在西安是做了一套黄呢军装，可是他在河套时期一直未穿过一回，仍然保持官兵生活一致，身穿大兵服装从未改变他普通一兵的象形。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 - 傅作义在河套

作者 =

页数 = 3 8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